

/上卷/

# 红色陕北

历史见证了西北红军用生命和鲜血浇铸的这块红色土地，对于中国革命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

1919-1937



李建雄 著

史诗性历史纪实作品  
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始末的详尽解读

# HONGSE SHANBEI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上卷/

# 红色陕北

李建雄 著

1919-1937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上卷·

---

第一部 黄土地的觉醒

第一章 贫瘠苦难的家乡 / 3

久远的故事 / 3

从李子洲少年时代说起 / 6

发起反日反袁学潮 / 8

第二章 陕籍学生在五四运动中 / 10

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成立 / 10

火烧赵家楼 / 12

血溅总统府 / 14

第三章 接受马克思主义 / 17

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 17

创办《共进》和共进社 / 19

第四章 力挽狂澜 / 24

杜斌丞力邀魏野畴 / 24

李子洲到榆林中学 / 29

红石峡题匾 / 30

第五章 播撒火种 / 36

井岳秀府邸遇将军 / 36

肝胆相照识至交 / 38

绥德四师新校长 / 42

## **第六章 创建中共陕西地方组织 / 45**

崭新的办学宗旨 / 45

陕北第一个中共支部 / 47

杨虎城南下驱刘 / 51

## **第七章 点燃星火 / 55**

陕北的一颗“炸弹” / 55

刘志丹入黄埔军校 / 57

国共初次合作 / 59

杨重远痛打恶管家 / 61

## **第八章 山雨欲来 / 64**

榆林中学学潮 / 64

刘镇华围西安城 / 66

打骡柜 / 69

中共绥德、榆林地委成立 / 71

惠记工厂罢工 / 72

## **第二部 清涧起义**

## **第九章 把军队抓过来 / 77**

谢子长办民团 / 77

归编石谦团 / 79

第一个中共军特支 / 80

## **第八章 西安解围 / 83**

驱逐刘镇华 / 83

石谦访绥师 / 87

中共陕甘区委成立 / 89

## 第十一章 解散“红枪会” / 94

榆林中学罢课风潮 / 94

李瑞阳怒饬军纪 / 96

破除“刀枪不入”的神话 / 98

## 第十二章 大革命高潮 / 101

集义镇军政训练 / 101

新式婚礼 / 103

“谢青天” / 105

## 第十三章 四一二政变 / 108

蒋介石“清党”反共 / 108

中共陕西省委成立 / 112

部署武装斗争 / 114

## 第十四章 白色恐怖 / 118

井岳秀举起反共旗 / 118

魏野畴北上 / 120

石谦之死 / 122

## 第十五章 不能坐以待毙 / 126

筹划起义 / 126

中共陕北军事委员会成立 / 127

清涧县城行动 / 130

## 第十六章 挥师南下 / 132

打响第一枪 / 132

智取延长县城 / 135

宜川会师 / 136

## 第十七章 血战突围 / 139

坐守孤城 / 139

宜川城受困 / 141

冲出县城 / 142

### **第十八章 率军北上 / 144**

接受收编 / 144

西庄镇整顿 / 146

“分家” / 149

### **第十九章 第二次起义 / 151**

再打宜川城 / 151

艰难西进 / 152

兵败豹子川 / 153

## **第三部 渭华起义**

### **第二十章 魏野畴血洒皖北 / 157**

太和整军 / 157

阜阳起义 / 163

王官集突围 / 167

### **第二十一章 许权中旅的抉择 / 170**

刘志丹返西安 / 170

改组陕西省委 / 172

宣化事件 / 173

离冯归李 / 176

瓜坡镇起义 / 179

### **第二十二章 建立苏维埃政权 / 181**

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 / 181

高塘镇突围 / 184

撤人终南山 / 187

李子洲被捕 / 188

### **第二十三章 李子洲在狱中 / 190**

笑对酷刑 / 190

妙语智斗 / 191

领导狱中斗争 / 192

壮志未酬 / 193

## **第四部 农民运动**

### **第二十四章 恢复建立各级地方组织 / 199**

中共陕北特委成立 / 199

绥德农民斗争 / 202

中秋节事件 / 204

### **第二十五章 与右倾错误作斗争 / 207**

米脂反饥饿群众运动 / 207

榆、葭、横、吴、清反饥饿群众运动 / 209

红石峡会议 / 210

### **第二十六章 神木手枪连起义 / 214**

杜斌丞联络“倒井” / 214

开办军官教育团 / 216

仓促举事 / 218

彭岐周被害 / 220

### **第二十七章 榆林起义 / 222**

榆林中学事件 / 222

马明方被迫离陕 / 226

碧血染古城 / 228

## **第二十八章 打出红旗的革命武装 / 232**

延川游击小组 / 232

淮宁湾寨子夺枪 / 234

永坪镇战斗 / 235

刘善忠遇害 / 236

寻找刘志丹 / 238

红九支队成立 / 240

冲破“围剿” / 242

## **第二十九章 神府南区红旗飘 / 244**

成立中共地方组织 / 244

王兆卿死里逃生 / 247

马旺全匪性不改 / 249

## **第三十章 抗粮抗税斗争 / 252**

裘洁忱响水镇丧胆 / 252

请愿不胜不罢休 / 254

# **第五部 兵运斗争**

## **第三十一章 掌保安民团之权 / 261**

兵运新思路 / 261

刘志丹当选团总 / 262

张廷芝送“金兰谱” / 267

## **第三十二章 苏雨生部扩编 / 269**

谢子长到平罗 / 269

张东皎陕北募兵 / 270

未举事的肤施起义 / 272

### 第三十三章 三道川受挫 / 276

宁安堡溃败 / 276

打人谭世麟部 / 278

周维琪中计 / 281

张廷芝夜袭三道川 / 283

### 第三十四章 再拉武装 / 285

太白镇夺枪 / 285 王世泰取枪 / 288

败走芦保梁 / 292

联络罗礼臣 / 295

### 第三十五章 刘志丹彬县落难 / 297

南下职田镇 / 297

生死关头 / 299

杜斌丞施救 / 303

### 第三十六章 合水脱险 / 305

收编李培霄 / 305

高广仁哗变 / 308

刘志丹只身脱险 / 310

## 第六部 晋西游击队及红二十四军

### 第三十七章 传达中央纠“左”指示 / 315

小兵朱敏与军长高桂滋 / 315

杨重远赴天津 / 318

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 / 320

### **第三十八章 东渡黄河 / 323**

战友情深 / 323

设立汾阳联络站 / 326

接受新任务 / 328

### **第三十九章 威震晋西 / 330**

在土客队伍 / 330

晋西游击队成立 / 333

攻打留誉镇 / 335

永安起义 / 336

楚家嫣战斗 / 338

奇袭灵城岭哨所 / 340

交山伏击战 / 340

### **第四十章 红二十四军 / 343**

平定起义 / 343

阜平诈降 / 347

鬮河岔被围 / 349

### **第四十一章 转战陕北 / 352**

坡牛山突围 / 352

抢渡黄河 / 355

南沟岔斗豪绅 / 357

### **第四十二章 南梁会师 / 359**

安条岭胜敌 / 359

营盘山激战 / 360

收编土客队伍 / 361

玉家湾歼灭战 / 362

攻打瓦窑堡 / 363

雁门关伏击战 / 364

清平川突围 / 364

受命南下 / 365

· 下卷 ·

第七部 陕甘红军

第四十三章 三嘉塬改编 / 369

谢子长受命赴南梁 / 369

暂归陈硅璋 / 371

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成立 / 373

突起的枪声 / 375

成立陕甘游击队 / 377

第四十四章 红旗插上旬邑城 / 380

阳坡头战斗 / 380

两打山河镇 / 382

首夺旬邑城 / 384

第四十五章 靖远二次起义 / 386

起义刻不容缓 / 386

向海原进发 / 389

水泉堡再举红旗 / 392

水北门起义 / 397

第四十六章 挥师北上 / 400

刘志丹临危受命 / 400

九战八胜 / 401

临真镇失利 / 405

“光杆司令” / 406

香山突围 / 407

#### **第四十七章 两当起义 / 410**

王德修营换防 / 410

成立红五支队 / 413

#### **第四十八章 西华池起义 / 417**

曹又参和他的新编独立营 / 417

潘立夫磨刀霍霍 / 419

操场举义 / 420

#### **第四十九章 周旋在“围剿”的缝隙中 / 422**

“新路线” / 422

“战略进攻” / 424

习仲勋到照金 / 426

谢子长重任总指挥 / 428

王兆相、杨文谟寻找游击队 / 432

会合黑慕塬 / 433

#### **第五十章 “左”倾错误是罪魁 / 435**

杜衡“大清洗” / 435

红二十六军成立 / 437

火烧香山寺 / 438

攻打庙湾镇 / 439

保卫陕甘根据地照金苏医 / 440

#### **第五十一章 红二团南下渭华 / 445**

北梁会议 / 445

杜衡擅自离队 / 447

东进箭峪口 / 449

被围终南山 / 450

## **第五十二章 返回照金 / 452**

找到刘志丹 / 452

坝龙庙脱险 / 453

获救出山 / 457

巧过渭河 / 458

北上洛川 / 459

走进薛家寨 / 461

## **第五十三章 严峻的形势 / 463**

王泰吉耀县起义 / 463

福盛楼事件 / 465

高岗潜出西安城 / 467

第五十四章重聚照金 / 469

陈家坡会议 / 469

古城川会合 / 472

再破旬邑城 / 474

## **第五十五章 扭转被动局面 / 476**

“梢山路线”还要走 / 476

攻破合水城 / 477

薛家寨失守 / 480

痛击赵文治 / 482

## **第五十六章 再振军威 / 485**

包家寨会议 / 485

开辟新的根据地 / 488

高岗到第二路游击区 / 490

## **第五十七章 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 493**

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 / 493

西华池战斗 / 496

南下第三路游击区 / 498

刘志丹举家到南梁 / 500

荔园堡会议 / 502

## **第八部 陕北红军及第一、二次反“围剿”**

### **第五十八章 镇米事变 / 507**

永坪事件 / 507

谭家砭战斗 / 509

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 / 511

无定河畔六烈士 / 513

### **第五十九章 红一支队分散隐蔽 / 517**

二次南下 / 517

埋枪散伙 / 518

贾仰青就义 / 522

### **第六十章 红二、三、四支队成立 / 525**

黑窑沟取枪 / 525

神府特务队 / 528

中共神木县委成立 / 533

夜袭木头峪 / 537

### **第六十一章 谢子长回陕北 / 541**

抗日同盟军失败 / 541

恢复红一支队 / 544

解家沟镇“闹腊八” / 546

楼则塌山缴枪 / 547

马文瑞在三边 / 549

神堂沟会议 / 552

## **第六十二章 南梁会师 / 555**

第一次“围剿” / 555

攻打安定城 / 556

阎家洼子联席会议 / 558

## **第六十三章第一次反“围剿” / 563**

景武家塌战斗 / 563

张家圪台战斗 / 564

河口镇战斗 / 565

土黄梁山、董家寺战斗 / 567

太和寨战斗 / 569

刘鸿飞阵前起义 / 570

“扯包皮”斗争 / 571

## **第六十四章 红军发展壮大 / 573**

寺嫣里会议 / 573

再打安定城 / 574

安定民团起义 / 576

万镇起义 / 577

开辟新局面 / 579

## **第六十五章 根据地建设 / 581**

清涧县土地分配试点 / 581

打破经济封锁 / 583

谢子长带病工作 / 585

黄翰视察陕北 / 588

## **第六十六章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 / 590**

第二次“围剿” / 590

郭宝珊起义 / 593

打开环县县城 / 596

刘志丹北上 / 597

灯盏湾会面 / 599

## **第六十七章 第二次反“围剿” / 603**

王家圪坨战斗 / 603

陕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 / 605

周家硷联席会议 / 606

谢子长英年辞世 / 609

## **第六十八章 保卫苏区 / 612**

南沟岔战斗 / 612

阎王砭战斗 / 613

红五团撤离吴堡县 / 615

## **第六十九章 两支红军归一统 / 620**

玉家湾联席会议 / 620

张秀山奉命北上 / 621

寺儿畔歼灭战 / 623

## **第七十章 三战三捷 / 625**

白庙岔会师 / 625

一日两捷 / 626

马家坪大捷 / 628

## **第七十一章 两块根据地连一片 / 632**

声东击西 / 632

解放延川城 / 633

高桥镇战斗 / 635

解放新安寨 / 637

血战李家塌 / 638

## 第七十二章 红军北上威震三边 / 642

解放靖边城 / 642

解放保安城 / 645

杨森出击南线 / 646

## 第七十三章 神府苏区第二次反“围剿” / 649

收编史文华 / 649

柴瑞叛变 / 652

屠杀吓不倒革命群众 / 654

## 第九部 第三次反“围剿”及西北根据地错误肃反

### 第七十四章 陕北来了个“代表团” / 661

第三次“围剿” / 661

高家塌战斗 / 662

永坪镇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 / 664

### 第七十五章 不听“左”倾瞎指挥 / 670

慕家塬战斗 / 670

定仙嫣“围点打援” / 672

组建红军陕北战斗团 / 676

攻打横山县城 / 677

识破假起义 / 680

### 第七十六章 红十五军团首战告捷 / 683

三军会师 / 683

永坪镇联席会议 / 688

劳山战役 / 691

### **第七十七章 从鄂豫皖带来的“肃反”利刃 / 695**

罗织“右派反革命”罪名 / 695

鄂豫皖的“肃反经验” / 698

严刑逼供 / 701

### **第七十八章 黑云总是遮不住太阳 / 706**

“我知道你们在找我” / 706

大抓捕 / 710

狱中劫难 / 714

三边事件 / 719

## **第十部 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 **第七十九章 长征的落脚点 / 727**

战略大转移 / 727

“这里就是我们的落脚点” / 729

到达吴起镇 / 734

### **第八十章 毛泽东命令刀下留人 / 737**

危急时刻 / 737

中共中央接管西北保卫局 / 739

下寺湾会议 / 741

直罗镇战役 / 743

重见天日 / 745

### **第八十一章 “我们对党是忠贞不贰的” / 747**

平反 / 747

毛泽东接见刘志丹 / 748

“你们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 750

瓦窑堡会议 / 752

组建红二十八军 / 754

## **第八十二章 红军东征 / 756**

践行抗日主张 / 756

东征大本营 / 758

毛泽东率先过黄河 / 761

## **第八十三章 打通神府苏区 / 765**

刘志丹带着红军上来了 / 765

到抗日前哨去 / 767

神府苏区第三次反“围剿” / 771

## **第八十四章 第三路东征军 / 775**

赶造渡船 / 775

罗峪口战斗 / 777

三交镇刘志丹牺牲 / 780

## **第八十五章 西进三边 / 787**

高岗奉派赴伊盟 / 787

油房头战斗 / 790

开辟三边根据地 / 791

## **第八十六章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797**

打开甘肃、宁夏西大门 / 797

与张学良、杨虎城联合逼蒋抗日 / 799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 804

西安事变 / 808

洛川会议 / 811

主要参考资料 / 815

后 记 / 825

HUANGTUDIDE  
JUEXING

第一部 ★

## 第一章

# 贫瘠苦难的家乡

### 永远的故事

陕北，位于陕西省最北部的黄土高原，东临山西，与晋地以黄河为界；北连内蒙古，在毛乌素沙漠依稀可见长城烽火雄关的遗迹；西接宁夏、甘肃，自古土地贫瘠，风高气凉，人烟稀少；南至金锁关一线，正好与盛产小麦的关中平原分割开来。在这高原僻壤之地，山峦重叠，岭峻沟深，交通闭塞。古往今来，这里一直是边塞战乱之地，人口大部分为汉族，还有回、蒙、苗、满、藏等少数民族。这里地处边远，历朝历代受着地方统治者的剥削欺压。



有一久远传说称，不知是哪里来的一位风水高人，游历天下的名山大

川偶至陕北，观其山形地理，推其阴阳卦术，留下一句话：这里的延绵大山之中潜有九条长龙，日后必有相争天下的英雄出现。

事有巧合，就在明朝万历年间，陕北的米脂、横山两县之交界，真还出现了一个敢与世道问不平的英雄，把大明朝的天下闹了个天翻地覆，他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

李自成出身贫苦农家，从小给地主老财放羊，受尽有钱人家的欺凌。有一年陕北大旱，他逃荒讨饭到中原河南，饥饿难忍，曾为吃别人啃过的一块西瓜皮而受过有钱人胯下之辱。李自成目睹不平世道，经历人生苦难，与高迎祥、张献忠等英雄好汉带领家乡农民子弟，在陕北揭竿起义，打起反明大旗。高迎祥遇害后，余部推李自成为闯王。李自成几度东渡黄河，驰骋中原，兵临湖广，与明军大战，虽几经挫败，数十万义军一度被明军打得仅剩 20 余骑，被逼隐匿陕西商洛山区，但他不气馁，又重振旗鼓，再次举兵西安，重入中原，席卷大半个中国。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最终推翻了朱明王朝，在北京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

那年，据说李自成才 38 岁。当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大军能作战勇猛，破城夺寨，连败明军，直指京师，主要是他打出“均田免赋”旗帜，执行了一条依靠农民的建军路线。在陕北至今还流传着几百年前歌颂李自成的一首歌谣：

快开城门快投降，城下来了李闯王。  
打开城门迎闯王，闯王进城不纳粮。

李自成领导的这场农民起义运动，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虽历时很短就告失败，其中原因诸多，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又一次得到历史的印证。

毛泽东曾在写给李鼎铭先生的一封信中对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这样评价道：“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北人的光荣。”

据传，大顺皇帝李自成在山海关兵败、退出北京之后，朝廷曾派陕西督军到陕北的米脂、横山一带，撒开数万兵丁，不仅挖了李自成家的祖坟，掘墓扬尸，而且把这里貌似龙蛇之状的绵延山形统统挖沟削壁，发誓要断绝这里的“龙脉”。

但是自此陕北这块土地上再也不平静了。农民们反抗封建王朝的情绪和意识就像播入黄土高原的一粒种子，在地下等待着春天的到来。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把李自成看做是从陕北腾跃而出的第一条长龙，并一代又一代虔诚地期盼着另外八条长龙将会逢时应世，重造当年李自成夺取天下的历史辉煌。

陕北有三大重镇：在北部地区的是古长城脚下的北塞门户榆林，旧为魏上郡地；在南部地区的是锁定各县南下通道的要塞隘口延安，旧称肤施；在中部腹地的是通往东西南北各县的咽喉要道绥德，旧称绥德州。绥德城依山傍水，有大理河和无定河交汇绕城北、城东流过，自古驻有重兵把守。秦王朝时期，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和蒙恬大将军为修筑长城，抗击匈奴，就曾率 30 万大军屯兵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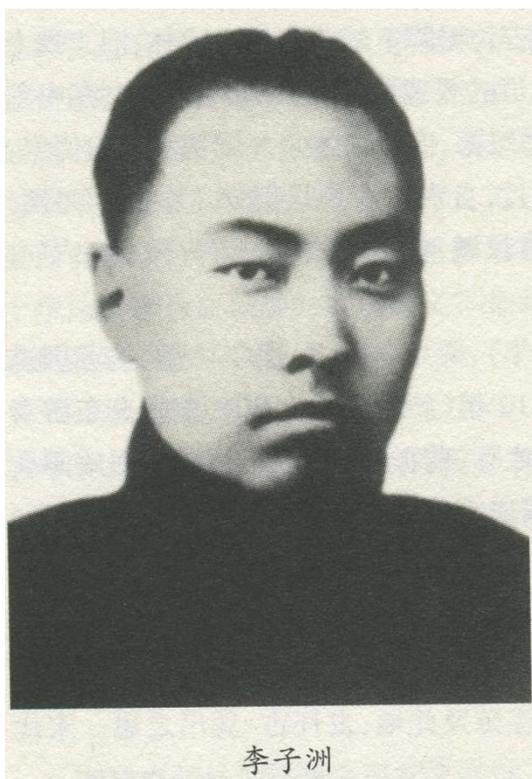
据说在公元前 213 年(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焚书，次年坑儒，扶苏因进谏而被贬于上郡监蒙恬之军。公元前 210 年(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东游泰山途中，病逝于河北沙丘。秦始皇病危之际，曾派人到上郡，召扶苏回咸阳登皇位。但赵高、李斯等人为拥立胡亥，谋逆篡位，假传诏旨赐扶苏、蒙恬一死。扶苏、蒙恬将帅二人蒙冤屈死于绥德城南卢家湾。从此，人们把卢家湾改名为呜咽泉。

扶苏、蒙恬死后，扶苏葬于疏属山顶，人称扶苏墓(亦称扶苏府)，蒙恬葬于大理河川。多少年来，有许多文人墨客游及此地，发怀古、凭吊之思。宋代孔武仲曾作《吊扶苏》一诗道：

天下精兵掌握间，便宜长啸入秦关。  
奈何指剑区区死，不辨从来赵李奸。

## 从李子洲少年时代说起

大清光绪年间，绥德城是陕北的第二大城镇。在城里住有五六百户人家，高、安、蔡三大户族是大地主、官僚之家。城内有一条小巷叫兴隆巷，巷里住一户李姓人家，户主李元贞是个银匠，其艺祖上传下，故人称李银匠。



李子洲

李元贞酷爱武术，经常习拳练剑，人称绥德的十八条好汉之一。他身魁力大，性格豪爽，耿直善良，平素好交朋友，遇事勇于打抱不平，肯拔刀相助，深得当地群众赞李元贞娶妻白氏，生有三子一女。长子李子洲，又名登瀛，生于1892年；次子李登云，三子李登霄，一女李登岳。李元贞天性聪明，记忆力惊人，只因从小家贫，没有读书识字，未成大器，这是他人生的大憾事。在四个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李元贞一心想要子女们放弃祖传银艺，读书识字，将来出人头地，改换门庭，能在社会上

干出一番事业。无奈银铺生意不景气，收入微薄，还得租种地主的几亩田地，才勉强养家糊口。

清朝末年，绥德城里没有公学，只有一两家有钱人家办的私塾，读书的都是豪门巨富的子弟。私塾的学费昂贵，穷人家的孩子很少能够进入其中读书。李子洲15岁那年，李元贞的生意有了转机，李子洲才被送到一家私塾去读书。学堂里都是七八岁初入学的学生，李子洲如同鹤立鸡群。有钱人家的子弟见李子洲个儿大，讥笑他是个“大笨蛋”“没出息的穷小子”。李子洲听到这些话，心里非常气愤，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功课，做出个样子让他们看看。

私塾的教书先生是位老学究。这位先生年近半百，胡子都已花白，可惜满腹经纶，屡科不中，到头来还是个秀才佬。当时的私塾里，学的全是

《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由于天资聪明，学习用功，李子洲很快成了学业最优秀的学生。教书先生对李子洲的人品、学业甚为赏识和器重，称赞他是“寒门才子”。李子洲高小毕业后，教书先生特地叮嘱李元贞：你的儿子学不可误，其才能无可限量。李元贞记住了教书先生的话。

1910年春，李元贞将李子洲送到关中的三原宏道书院读书。次年，转往西安求学。李子洲到西安后，寄宿在钟楼旁边的一个旅店里，预备考学。

1911年中国爆发了一场震动世界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因这一年是农历辛亥年，所以也叫“辛亥革命”。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起义，武汉革命党人在武昌相继起义，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全国形成一股革命洪流。陕西革命党人闻风响应，以张凤翔为大统领与钱鼎、张云山、万炳南、郭希仁、张钊等组成了秦陇复汉军，在西安起义，宣布陕西独立，建立了军政府。但是，清朝封建统治的反动势力不甘心末日来临，一些旧官僚组织武装力量不断反扑，西安街头动乱不安，时时可能发生战事。李子洲见如此时势，难以考学，只得离开西安，返回绥德。



孙中山

这时，清朝政府的榆林驻军在杨昆山领导下成立了榆林洪汉军，后因洪汉军内讧，杨昆山惨遭杀害。地方孙中山上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官匪混乱，出现了大股的土匪队伍，到处打家劫舍，四处骚扰，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在纷乱动荡的年代，各县村镇乡绅地主惧怕出没无常的土匪劫财害命，组织乡民在各个险要山头筑高墙，削断壁，挖深壕，修建起一座座土堡、石寨子，聚集丁勇，各保生命财产安全。绥德县城的哥老会为保卫地方社会治安，防止土匪队伍的袭扰，办起了地方民团，有许多青年参加。李子洲一回到绥德，亦随之参加，修筑城堡，日夜巡城放哨，直到形势稍稳。

## 发起反日反袁学潮

1912年1月1日，革命军攻克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

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将这一年称之为民国元年。

这一年，李子洲再赴西安，考入三秦公学日文预备班读书。当时，中国赴日本留学之风盛行，李子洲也准备留学日本，但因家境困难，经费不足，未能如愿，遂转入中学班学习。

三秦公学是辛亥革命之后陕西仿日本公学体制成立的一所介于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之间并以理工教育和留学教育为主的新式学校。这所学校成立于1912年4月，同年6月正式招生，由田种田任校长，张台耀任教务长，董明铭任庶务长，韩声平、周元略任学监。学校设有英文专修班、日文专修班、德文专修班、数理化专修班、中学高等预备班和蚕桑专修班。三秦公学成立后，仅办三年即并入西北大学。

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在南方取得一时的胜利，学校的教职员中有许多人是同盟会的会员，拥护孙中山，积极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文化，对教育进行改革，使学校很有生气，一时在陕西享有盛名。

在三秦公学，李子洲有幸结识了刘天章、魏野畴、杨钟健、呼延震东等发愤图强的有志青年，萌发了革命思想。他们不仅在学习上都能努力上进，功课优良，而且在政治上见解一致，志同道合。在清王朝面临土崩瓦解的社会变革之际，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共同谈论国家大事。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之机，阴谋独占中国，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山东，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这一年，袁世凯派心腹陆建章率军人潼关，取代陕西都督张凤翔主政陕西，派刘国栋、商震分别率军驻榆林、绥德、肤施，把持陕北军政大权。

1915年5月，篡夺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为复辟帝制，称帝心切，竟然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到12月，宣布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次年元旦登基，改年号为“洪宪元年”。袁世凯卖国求荣、复辟帝制的消息传开后，激起全国民众的无比愤慨，各地义军四起，反日反袁的斗争如火如荼。孙中山在日本成立的中华革命党立即发出讨袁檄文，骂袁世凯为“民贼”，号召“杀此民贼，以救人民”。立宪党蔡锷和国民党人李烈钧等在云南宣布独立，并组织了护国军，武装讨袁。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在三秦公学进步教职员工的支持下，李子

洲联络刘天章、杨钟健、魏野畴、呼延震东等同学，发起了反日反袁的学潮运动，由埋头读书转而走向社会，在校内外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声讨袁世凯和他在陕西的爪牙——陕西督军陆建章，积极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斗争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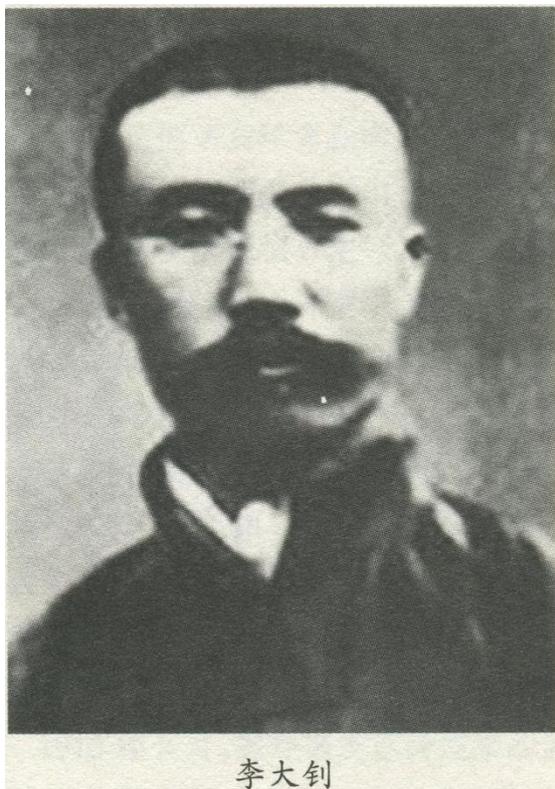
不久，李子洲因学费不济，被迫休学，回到绥德县劝学所任视察员。后家庭经济状况略有好转，并得到地方公费资助，李子洲重返西安三秦公学继续学习。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这个当了三个多月的“皇帝”，在全国一片咒骂声中，忧惧病死，结束可耻一生。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四分五裂。中国形成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 第二章

# 陕籍学生在五四运动中

### 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成立



李大钊

1917年春，李子洲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这一年的俄历十月，俄国发生了伟大的十月革命。俄国的工人、农民、士兵，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看到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在中国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1919年，李子洲转入北大哲学系学习。当时，北大的校长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文科学长是陈独秀，还有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任教，在这所中国最高学府里汇集了一批知名的进步思想家和学者。在中国最早传播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是陈独秀、李大钊，他们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革命精神，追求真理，宣传真理，与陈独秀最早把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告诉了中国人民。陈独秀在上海首创《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李大钊是《新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应该沿着十月革命照亮的道路前进。同时，他热情而充满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陈独秀

4月，北大《每周评论》登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的译文。李子洲很快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受到李大钊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熏陶，积极参加了由陈独秀、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哲学会、雄辩会、新闻研究会等组织，还参加了由蔡元培和李大钊发起成立的进德会和体育会。



1918年李子洲(左六)与陕西旅京学生合影

在北大期间，李子洲寓居在三眼井吉安所左巷6号院里。这里是陕西旅京学生聚会的地方。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居住别处的陕西同乡，经常在这里聚会，从国家民族大事到学术思想问题，话题广泛，无所不及。在李子洲、刘天章等人倡议下，在北京创建了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李子洲的寓居。联合会的活跃者主要是北大的李子洲、刘天章、杨钟健、杨晓初、刘含初、耿炳光、方仲如、营尔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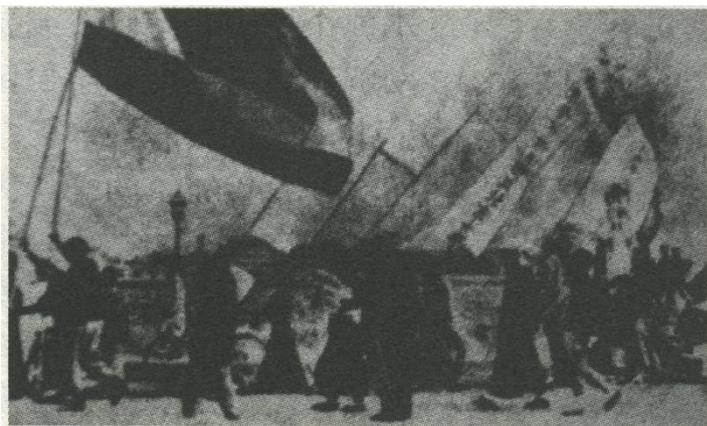
潘自力，北高师的杨明轩、魏野畴等。在天津的陕西籍学生也相继成立了旅津陕西学生联合会。

在三眼井吉安所左巷7号，寓居的是湖南新民学会在京成员，与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只一墙之隔。湖南与陕西这两个进步社团的成员接触频繁，交往甚密。李子洲、刘天章、杨晓初等陕西同乡经常与湖南新民学会的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萧三等聚在一起，彼此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时在北京的毛泽东及新民学会成员对李子洲等陕西旅京学生质朴、豪侠、勇敢、坚强的气质，曾以《大学·中庸》中的“北方之强”给予评价；李子洲等陕西旅京学生则对湖南学生聪颖而热忱、敏于事、慎于言、好学深思的“南方之强”的品德深为钦佩。

## 火烧赵家楼

1919年初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也称巴黎和会。这次会议上，中国虽然以战胜国的名义参加，但得到的却是战败国的待遇。中国代表团根据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向巴黎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废除日本与袁世凯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却被巴黎和会拒绝。卖国的北洋政府竟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



北京五四运动学生集会游行

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成为爆发五四运动的导火线。全国各地学生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怒火，纷纷走出校园，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组织讲演团，散发传单，向商人和市民宣传抵制日货，抗议中

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强烈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这次运动首先由北大发起，李子洲和陕西旅京学生积极踊跃地参加了斗争。

5月3日下午，北大学生1000余人聚集在北大法学礼堂召开大会。北京其他中等以上学校也派来学生代表参加了会议。会场上群情激昂，法科学士谢绍敏当场咬破手指，在白布上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大会推荐李子洲、段锡朋、方豪、罗章龙、张国焘、许德珩等十余人为5月4日游行大会主席团成员，定于次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学界大示威。

5月4日，北大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云集天安门前，组成3000多人的游行队伍，以湖南新民学会、辅仁社和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京成员为主的行动小组有李子洲、罗章龙、易克嶷、吴雨铭、罗汉、匡日休、刘天章、杨钟健、杨明轩、郝梦周等十余人，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边，手举大小旗子，沿路散发传单，向东交民巷进发。到了东交民巷巷口，巡捕手持木棒不准通过。经交涉后，游行队伍便接着预定路线，向东单赵家楼胡同走去。

下午4时许，当游行队伍赶到东单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时，只见朱门紧闭。学生们高呼口号，要求曹汝霖出来，但他躲在家里不肯露面。曹汝霖曾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外交次长，后任交通总长，卖国的“二十一条”就是他经手签订的，人们早已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李子洲和同学们不顾门外军警威胁，用搭人梯的办法，先登上窗台，打破窗户跳进去，从里边把曹宅大门打开。最先跳进窗户去的是匡日休，接着李子洲、罗章龙、呼延震东等跟着跳进去。曹宅大门一打开，门外学生像潮水一样涌入曹汝霖的住宅，顿时一片喊打之声。

此时，曹汝霖和另一个出卖中国铁路主权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正躲在房里，听到学生们的呼喊声，吓得没处可藏。李子洲和同学们不认识曹汝霖和章宗祥，把章宗祥误认为曹汝霖，围上去便打，直把章宗祥打得头破血流，倒地装死。

这时，有几个同学从客厅墙上取下曹汝霖照片，一看被打的人不是曹汝霖，便到处找寻，谁知曹汝霖早趁学生们痛打章宗祥的混乱之机溜了。学生们找不到曹汝霖，心中愤怒难消，有一个同学就用火柴把卧室里的丝绸帐点燃。顿时，大火熊熊，曹宅火光一片。

半小时许，军阀段祺瑞政府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李长泰闻讯率领“白腿狗”赶来，消防队也赶来。他们用枪杆和水龙向学生们乱打乱

喷，强行把学生驱散。在与反动军警搏斗中，李子洲和许多同学被打伤。李子洲被打得鼻青脸肿，呼延震东被扭伤右臂，陕西籍学生杨明轩、郝梦周及湖南籍学生易克嶷、匡日休、罗海潮等 32 人被捕，其中行动小组的人半数以上被捕。5 月 5 日上午，北大召开学生大会，蔡元培校长出席。为营救被捕同学和进行下一步的斗争，北大学生干事会成立，大家推举李子洲为干事。7 日，被捕的学生被全部释放。19 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决定总罢课，继续进行斗争。

## 血溅总统府

五四爱国运动像一声春雷震动了全中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

1919 年 5 月下旬，全国许多地方的学生为了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纷纷派出学生代表陆续来到北京。6 月下旬，新成立的陕西学生联合会推选屈武和李伍亭为代表，也来到北京。



屈武

屈武和李伍亭到北京后，住在陕西会馆。李子洲、刘天章等立即到陕西会馆去看望，并向屈武和李伍亭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北大学生干事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行动计划及决心。为了欢迎陕西学生联合会代表来京，李子洲和刘天章等联络陕西在京的大中学生 100 多人，为屈武和李伍亭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会上，李子洲热情洋溢地致了欢迎词，屈武和李伍亭汇报了西安学生开展游行示威、抵制日货运动的情况。

欢迎会后，李子洲和刘天章领着他俩会见了北大学生会负责人段锡朋、方豪、许德珩等人，特别是拜见了李大钊，使屈武、李伍亭很受鼓舞。

从 5 月下旬开始，李子洲和同学们以 10 人为一组组织起来，到处组织发动“救国十人团”，由十而百、由百而千地大规模开展街头讲演活动。参

加讲演活动的人数很多，仅北大就有 800 多名学生参加，遍布北京内外的大街小巷甚至家庭院落。他们向市民、士兵、警察宣讲爱国反日的道理，有许多同学讲到激动之处，声泪俱下，情景十分感人。北京爱国学生声势浩大的讲演活动使北洋军阀政府极为震惊。反动军警蛮横干涉学生运动，进而采取镇压手段。但是，反动政府的压力愈大，北京爱国学生的反抗愈烈。他们已下定决心，为了救国宁愿牺牲自由和生命。6 月 1 日至 3 日，被捕的学生已近千人。

在 6 月 27 日下午，李子洲和北京爱国学生及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代表，人数一两万之众，将新华门总统府包围，强烈要求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出来与学生见面，回答学生提出的正义要求。但是，徐世昌躲在中南海避而不见。

到掌灯时分，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才大摇大摆从新华门走出来，慢条斯理地对大家说：“总统不在，你们等也没用，时间不早了，快回去休息。可以把请愿书留下，政府以后自有答复。”

但是，学生们根本不听吴炳湘的鬼话，不上他的当，坚决表示：“不见徐世昌，决不回学校！”

吴炳湘毫无办法，只好灰溜溜地回去禀告。

这时候，新华门外人越聚越多。许多过往行人或是前来看热闹的人，都被爱国学生的热情深深感动，主动地参加到请愿示威队伍中。许多人力车工人用一天辛苦挣下来的血汗钱买了烧饼、糖果、茶水送给学生，热情支持爱国学生的革命运动。

躲在中南海里的徐世昌，听到了新华门外的怒吼，急忙召开内阁成员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在内阁会议上，以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参谋长为首的一些武职官员认为学生无法无天，主张用武力解决，并建议把大炮架到景山，轰平北大。内阁其他官员则主张和平解决。徐世昌采纳了和平解决的主张，同意由学生推举代表进行谈判。

到晚上 10 点许，徐世昌打发了两个秘书出来传话道：“学生可以推选 10 名代表，有何问题到里面去谈判。”

北大学生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立即在新华门外临时开会协商，

推举出段锡朋、方豪、屈武等 10 名学生代表。由段锡朋、方豪领头，10 名代表一同进了总统府。

总统府里戒备森严，布满双岗，如临大敌。警卫人员荷枪实弹，层层设防。徐世昌在勤政殿接见了代表们。北大的学生代表段锡朋代表全体请愿示威学生首先讲话。他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

- (一) 政府下令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 (二) 惩办卖国贼；
- (三) 释放被捕学生。

徐世昌避而不谈学生代表提出的三点要求，而是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架势道：“你们学生爱国的心情可以理解，陈述意见，情有可原。但是，你们年纪太轻，没有政治经验，容易被人利用。如果聚众滋事，那就不好了。你们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安心读书，今天游行、明天示威，成何体统！我们国家多年积弱，不能操之过急，国家大事政府自有权衡。”

陕西学生代表屈武对徐世昌这种恶劣的行径十分气愤，冲着徐世昌涕泣陈词：“我们的国家现在都快要亡国了，我们都快要做亡国奴了，今天丢青岛，明天失山东，后天就可能丢掉整个华北！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只好以死力争了！”说罢，就一头撞倒在墙壁之下，顿时血流满面。

徐世昌见此情景，一扭身进入殿后。谈判未成功的消息传到新华门外，激起了请愿学生的更大愤怒。李子洲带着大家要往中南海里面冲，找徐世昌当面讲理。学生与军警发生了冲突。

直到次日凌晨 1 时许，徐世昌才又派出一个内务总长，匆匆出来对学生说：“刚才内阁成员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同意学生们的要求，即日打电报给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命其拒绝签字……”

请愿斗争取得胜利后，在李子洲和同学们返回北大的途中，北洋政府派出大批反动警察，突然对学生施行大逮捕。李子洲和许多学生被捕，被关入北大三院临时监狱。

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激怒了全国各界民众。罢课、罢工、罢市之举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在举国一致爱国行动的强大压力之下，北洋

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并下令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的职务。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 第三章

# 接受马克思主义

### 参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觉醒了的一批知识分子，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想、新文化之风大兴。1920年3月，李大钊、陈独秀首先在北大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初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是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张国焘、何孟雄、王复生等人。

4月，经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批准，俄共远东局派出维经斯基等来华，会见了陈独秀、李大钊，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8月，由陈独秀发起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任书记，参加者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施存统、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李达等人。这个小组是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组，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10月，由李大钊发起，建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年底成立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时有成员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等。同年秋到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湖北，毛泽东、何叔衡等在湖南，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张申符、赵世炎、周恩来、陈公培、刘清杨等在巴黎，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与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在广州建立了共产

主义小组。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会者有李达、李汉俊(上海)，毛泽东、何叔衡(长沙)，张国焘、刘仁静(北京)，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等，还有受广州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共产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会议。当时因没有联系上，巴黎小组未派代表参加，陈独秀因广东离不开，李大钊因北大工作繁忙，均未参加。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参会代表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工作决议，建立了中共的中央机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具有伟大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有了本阶级的坚强战斗司令部，中国革命有了英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这次会议，史称中共一大。中共一大以后，在北京的李大钊等决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活动。

11月间，《北大日刊》正式刊出启事，公开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开宗明义指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极为艰巨的工作，致意校内外的同志给予热情赞助，倡导大家加入该会共同研究。启事刊出后，

北大乃至整个北京学界立即为之轰动。热烈赞助、积极支持者有之；漠不关心、若无其事者有之；强烈反对、横加指责者也大有人在。当时的“国粹派”人物诬蔑马克思主义为“异端邪说”。

当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中国还仅为少数人所理解之时，李子洲、刘天章、魏野畴等陕籍学生对“国粹派”的胡言乱语进行了有力批驳，并首批报名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很快成为骨干会员。

李大钊是李子洲所在哲学系唯物史观课的讲授者。李子洲与李大钊接

触较多，李子洲在新文化运动方面的见解及日后能成为一名杰出的中共陕西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与李大的启蒙和影响不可分。李子洲和很多同学非常敬重李大钊，经常围绕在李大钊的身边，聆听其讲演，接受其教诲，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髓。李大钊对李子洲也甚为赏识。

### 创办《共进》和共进社

1920年1月，随着革命洪流的发展，李子洲和刘天章等陕西籍学生，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创办了《秦钟》月刊。《秦钟》的宗旨是介绍新知识于陕西，唤起陕人自觉心；公布陕西社会状况于外界，提倡民主、自由、科学和妇女解放，反对封建道德、尊孔读经和早婚、缠足等旧习俗，向陕西人民揭露反动军阀的祸陕罪恶。《秦钟》月刊创办了六期后，同年6月停刊。

在此期间，武止戈、屈武、崔孟博等陕西籍旅京津两地学生在天津创办《贡献》白超然等陕北旅津学生成立了陕北教育促进会天津分会，在天津创办《促进》和《改进》；雷晋笙、严信民、刘秉钧等陕西籍旅沪学生上海创办《秦铎》《汉钟》和《南针》等。这些刊物都不同程度刊登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随着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潮不断深入人心，新文化运动的矛头集中指向孔学，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给予空前的批判和冲击，并激起人们关心国家民族大事、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情，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当时，陕西学界在省教育厅厅长郭希仁的把持下，新文化运动仍处于低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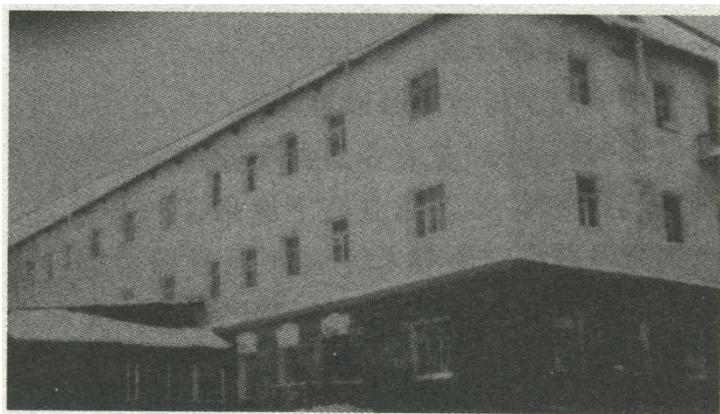
这年8月间孔子诞辰节，郭希仁命令学生一律赴文庙朝拜。当时王授

金是西安女师教务主任，他积极倡导女子教育，在陕西教育界是一名思想进步的教育家。王授金认为，在五四运动之后，学生朝拜孔子有碍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王授金等的抵制下，女师学生拒不执行郭希仁赴文庙朝拜的命令。郭希仁对王授金的违命大发雷霆，以“违反定章，有失厥职”为由，将王授金免职。

消息传到北京，《北京晨报》以其为五四运动之后陕西学界出现的一桩怪事，首家作了报道。继而，全国各地学界纷纷鸣不平，迅速掀起了全国性的“评孔风潮”。李子洲和刘天章等旅京的陕籍学生对此事件十分气愤。于是，李子洲联合刘天章、魏野畴、杨钟健、刘含初等 11 名陕西旅京学生，联名上书郭希仁：

顷闻 9 月 30 日，《北京晨报》载，对于陕西女子师范讲演训令一则，不胜骇异……在中华民国法律之下，学术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人人皆知，而教育厅何能不知，乃竟非法干涉，妄施阻挠，以此藐视国法，贻祸教育，殊属荒唐绝伦。若不设法挽救，贻害何堪设想……

郭希仁接到信后，恼怒不已，竟把手里端着茶碗摔碎在地上，以泄其愤。但是，终因陕西学界和旅京陕籍学生的强烈反对，郭希仁在一片指责的舆论声中被轰下了台。



《共进》在北大红楼地下一层的印刷厂印制

1921 年 10 月，李子洲、刘天章、杨钟健、杨晓初等创办了《共进》。他们将《共进》的社址设在北京三眼井吉安所左巷 6 号，在北大红楼地下一层的印刷厂内印刷，刊物的发行由《共进》在北大红楼地下一层的印刷厂印制李子洲负责。《共进》半月刊大量刊登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起到很大作用。

1922年10月，《共进》杂志社改变为政治性的社团组织，即共进社。共进社的宗旨为“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共进社一经成立，即把许多进步的陕籍旅京学生团结在《共进》的行列，为尔后发展中共陕西及西北党的组织建设孕育了一大批创始者和骨干分子。共进社创办后，人称共进社有“四大金刚”，李子洲为“大脑”，刘天章为“小脑”，赵国宾为“赵龙”，杨晓初为“杨虎”。这四位“金刚”全是西安三秦公学的学生，一时使三秦公学大增殊荣。

自共进社成立之后，李子洲、刘天章、魏野畴等积极在陕西旅京学生和旅京青年中发展成员。当时，在旅京青年中有一人叫李象九，从陕西来京后住在陕西会馆。不久，李象九有幸结识陕西旅京学生李子洲、刘天章、魏野畴、刘含初、耿炳光、呼延震东等人，与他们十分投合，即应李子洲之邀离开陕西会馆到三眼井吉安所左巷6号居住。

李象九，陕西白水县人，曾在同州师范学校读过书，因家境贫穷而辍学，于1919年到陕北投在井岳秀部下。他在井岳秀部一个连队任士兵头目，数年辛苦，虽竭诚努力，终一事无成。1923年，因不满井岳秀专横残暴的军阀作风，借故请假回家。后辗转到北京，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李象九寓居三且良井吉安所左巷6号，经常和李子洲、刘天章等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同时，有机会阅览一些马列书籍和进步书刊，这使他耳目一新，茅塞顿开，对革命有了初步的认识。李子洲和李象九很亲近，李象九对李子洲也很钦佩，亲切地称李子洲为“李大哥”，有什么难处总要找李子洲倾诉。不久，李子洲介绍李象九加入了共进社。

1922年冬，陕北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托陕西旅京学生在北京的高等学校聘请高才生，到榆林中学任教。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明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对于中共制定当时的革命纲领给予了直接的帮助。

7月16日至23日，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

代表 12 人，代表全国 195 名共产党员。在这次代表会上，提出中共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现阶段的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会上，选出以陈独秀为委员长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3 年初，李子洲在北大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共产党。相继又有武止戈、邹均、屈武、耿炳光、方仲如、潘自力等一大批陕籍旅京学生也加入了共产党。

2 月 1 日，在中共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无理禁止和武力破坏，激起工人无比愤慨。2 月 4 日，总工会发动京汉铁路全线举行罢工，长达 1000 余公里的交通大动脉顿时陷入瘫痪。2 月 7 日，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出动军队，对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等地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林祥谦、施洋和 50 多名共产党员和群众被反动军阀吴佩孚杀害，100 余人受伤，40 余人被捕入狱，1000 余人被开除流亡。消息传出后，全国人民为之愤慨。

3 月 22 日，为了沉痛悼念“二七惨案”死难烈士，中共北方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分别组织追悼会，均由北大学生会出面主持。一个大会会场在琉璃厂北高师风雨操场，一个大会会场在东区一个学校。李子洲作为北大学生会的干事，参加了北高师风雨操场追悼大会。

会上，由中共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王铮、京汉铁路工会会长辛店参加火神庙斗争的工人刘监堂等作了报告。大会通过了严惩凶手决议案。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示威。李子洲参加追悼会归来，悲愤地挥泪提笔写下了《施、林及“二七”被害诸烈士追悼会有感》的挽诗，并在《共进》上发表。挽诗这样写道：

阶级战争开始了，  
我们平民阶级的先锋已被敌人戕害了！  
我们站在后线的人啊！  
鼓舞起奋斗的精神，

拿定了牺牲的决心，  
手枪、炸弹，  
前仆、后继，  
争我们最后的胜利！  
那才对得起为我们牺牲的诸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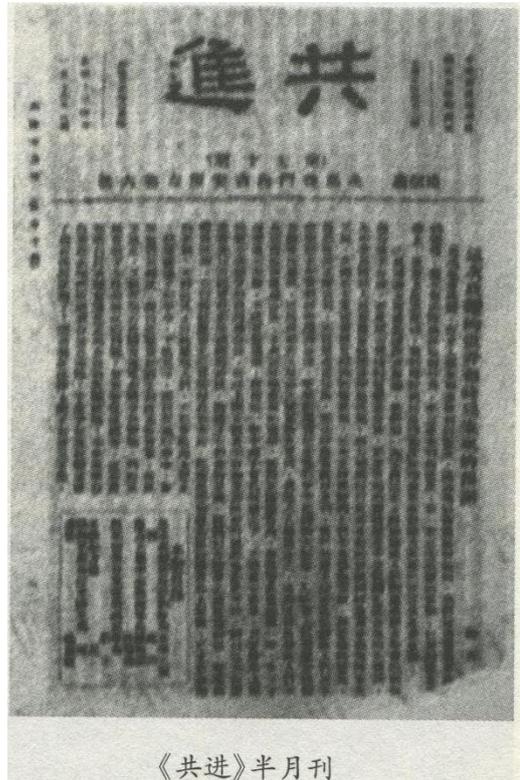
.....

3月下旬，北京各界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强烈要求北洋军阀政府按约收回被日本占领的旅顺、大连。为了声援群众的斗争，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李子洲在《共进》上发表《澄清内政运动中的外交问题》一文。同时，还先后撰写了《陕西师范学校应改革的几点》《释教育的意义》等文章，在《共进》上发表。

由李子洲、刘天章等领导的共进社是五四运动后全国影响较大的进步社团之一，共进社成员最多时达600多人。《共进》的许多文章在全国民众之中影响甚大

《共进》从创刊到停刊共出版105期。在李子洲、刘天章等的周密筹第一部黄土地的觉醒《共进》半月刊划下，刊物发行全国，并远达日本和东欧许多国家，销售量达四五千份。以《共进》为媒介，在天津、上海、南通、武汉、开封等地都有了共进分社，在陕西更是发展迅速，分别在西安、三原、渭南、华县、榆林、绥德、肤施、南郑等地建立了共进分社，尤其在咸阳，通过《共进》的影响，成阳中学几乎全校师生参加了共进社。1926年10月，奉系军阀张作霖以“赤化”罪名，封闭了共进社总部，几十名共进社成员相继被捕，共进社被迫解体。

1923年夏，李子洲在北大取得哲学学士学位后，受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委托，回到陕西开展党的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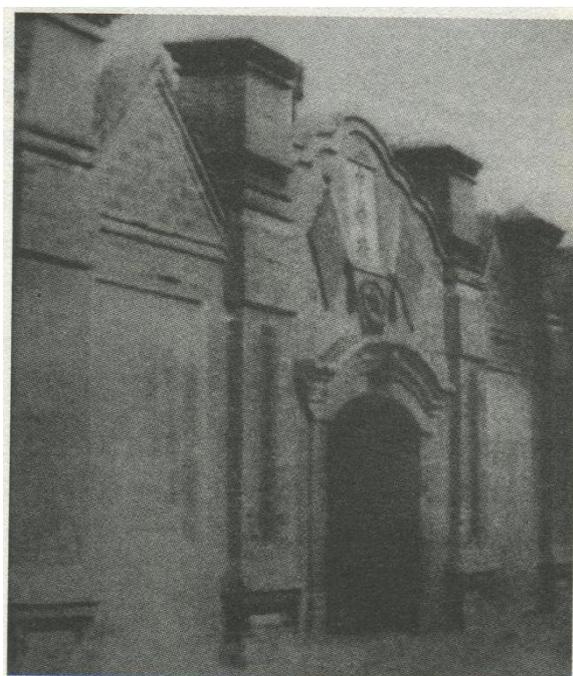


## 第四章

# 力挽狂澜

### 杜斌丞力邀魏野畴

榆林中学在榆林、延安两府 23 县里是仅有的一所省立中等学校。这所陕北的最高学府，早在 1472 年(明成化八年)设立，时称卫校，后改为文会堂，并设教授、训导两宅。清朝改设学府，后改为榆林书院。1903 年清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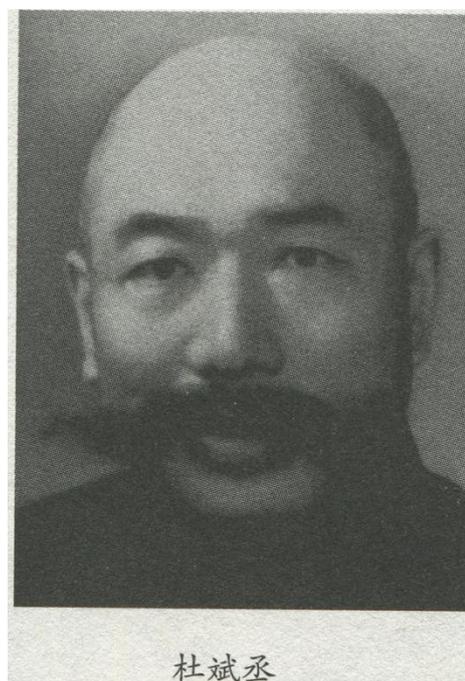
榆林中学

府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又改称为殖边中学。辛亥革命之后，先为陕北联合县立中学，后改为陕西省立第六中学(简称榆林中学)。这所中学由于处长城古塞，沿袭旧制，在前清秀才、举人、翰林等一些封建老学究的把持下，读经尊孔，至五四运动之后仍办得死气沉沉。

杜斌丞，原名丕功，陕西米脂县人，生于 1888 年，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是一位深怀爱国热忱、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甚为拥护的教育家。1907 年考入三原宏道书院，与张熙若(张奚若)等同学结为挚友。1913 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杜斌丞在旅京期间认识了同盟会会员惠

又光。

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强烈的愤怒和反抗。这时，惠又光正好从日本回国，先后住在北京棉花二条胡同和延安会馆，秘密联络反袁人士。杜斌丞登门求教，惠又光对许多重大政治问题的分析和论述使他深为佩服。杜斌丞对惠又光联络各方武装力量反对封建军阀的活动虽深表赞同，但还是选择了从教育着手，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1917年，杜斌丞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拒绝了许多朋友的挽留，放弃在北京、天津就业的机会，接受陕西监学袁刚的聘请，回到陕北。他先在榆林中学任教，次年担任了学校校长。1930年，在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任总参议。1942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10月，被国民党杀害于西安玉祥门外。毛泽东曾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自杜斌丞担任榆林中学校长之后，为了树立新的学风、提高教学质量，为陕北培养出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他苦心策划先后诚聘杜斗垣、李鼎铭等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人士任教，后又决意在北京一些大学聘请思想进步和才华横溢的毕业生来校执教。当魏野畴作为第一个陕籍旅京大学生应聘来到榆林中学时，杜斌丞真可谓喜出望外，把魏野畴视为学校教学改革的一颗明珠。

魏野畴，陕西兴平县人，1921年夏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春，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共产党。同年到榆林中学，在杜斌丞这位校友支持下，致力于传播新文化、宣传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使榆林中学校园很快出现了新文化运动的勃勃生机。在课堂上下，魏野畴经常给学生们讲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介绍《向导》《新青年》《共进》等进步刊物上的重要文章。他给学生们讲到国家内忧外患的形势时说：“人家

拿刀架在咱们的脖子上，不起来救国，亡国了，我们还有书读吗？”

魏野畴善于团结群众，富有组织才能，作风朴实，平易近人，经常利用课余饭后的点滴时间，到学生宿舍谈心，或与学生们一道散步聊天，讲



魏野畴

述革命道理。学生们视魏野畴亲如兄长。在魏野畴的指导下，学校整顿了学生自治会(简称学生会)，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话剧研究会。他还组织学生们走出校门，开展破除迷信、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欺骗人民的斗争，并到社会上开展反对苛捐杂税和拉夫差的斗争。除此，还组织学生们开办贫民学校，利用假期到农村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团结更多的人投入火热的革命洪流。

为了唤醒民众，魏野畴曾编写了话剧《爱国贼》，描写一位爱国青年深入军阀巢穴，盗出了军阀与帝国主义签订的卖国密约，揭露了军阀卖国的丑恶嘴脸。演出时，他亲自扮演主角，把那位爱国青年机智、勇敢完成任务的义举生动地表现出来，使观众看后很受感动。

在魏野畴的影响下，榆林中学一批进步学生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蒙，开阔了视野，从陕北的小天地知道了中国的大时局，从中国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为他们寻求真理、立志拯救国家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如刘志丹、王子宜、曹力如、霍世杰、李波涛、白志诚等学生，受到魏野畴的革命思想影响甚深。

当时，刘志丹是榆林中学学生会主席，是极力拥护魏野畴在学校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学生领袖。

刘志丹，原名景桂，字志丹，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楼子沟人，家境小康，生于1903年。其父刘培基，是前清秀才，曾在乡里当过私塾先生，母亲王氏。刘志丹自懂事时起，常听爷爷刘士杰讲述当年在官府的欺压下如何打富济贫、除暴安良的事。爷爷说，他曾投在董福祥领导的一支农民

义军中当红笔师爷，后西北回民造反，清政府又拉拢诱骗董福祥的农民义军与回民义军相互残杀，他心灰意冷离开农民义军，跑回家来。在刘志丹幼小的心灵里，从小就烙下了对不平世道的反抗意识。刘志丹先在保安永宁山一所由私塾改的小学里读书，小学毕业后，与同乡的曹力如、王子宜考入榆林中学。

刘志丹是榆林中学己班学生，魏野畴给他们当国文教员。魏野畴与刘志丹均爱好体育运动，魏野畴经常和刘志丹等学生到球场上打球。学校的一些老学究们认为魏野畴有失师道尊严，横加指责。



保安县(今志丹县)楼子沟刘志丹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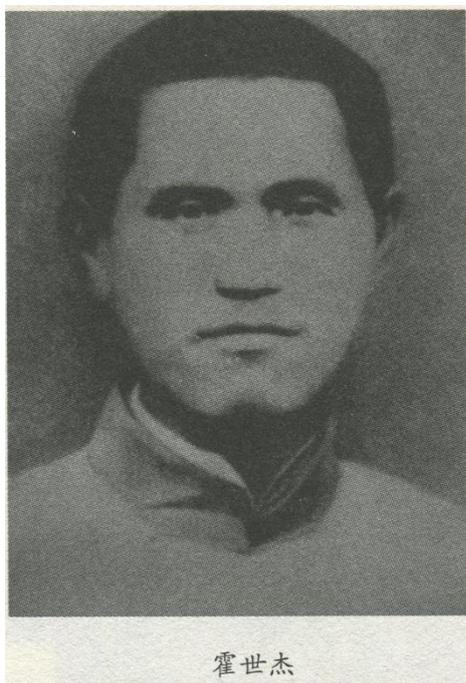
有一次，魏野畴给己班学生上国文课，下课后，刘志丹和霍世杰等同学围住魏野畴不让走，一定要他到球场上和学生们打一场球。魏野畴十分高兴地在学生们簇拥下到了球场。杜斗垣等一些老学究们视之摇头。

杜斗垣脑后一直保留着一条辫子，学生们叫他“老腐朽”“猪尾巴”。杜斗鼐在一旁说：“这篮球是伤风败俗之物，你争我夺，毫无温良恭俭让，把老规矩都破坏了，难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

霍世杰听得真切，把球虚晃一晃，朝着杜斗垣站立的方向一掷，喊声：“杜老师，接球！”

杜斗垣吓得面如土色，立足不稳，身子一歪倒在地上。魏野畴赶忙跑过去赔礼，扶起杜斗垣。霍世杰的父亲是榆林道台衙门的秘书长，杜斗垣

不敢去惹，却把一腔怒气撒给魏野畴，连声叫嚷：“我要找校长！”其他学生都抿嘴而笑。



霍世杰

杜斗垣，陕西米脂县人，1891年科考举人。陕西大学堂创建伊始，曾被聘分教习，主讲数学。1904年（光绪三十年），榆林知府聘其创办陕北联合中学。他与杜斌丞同乡，是庚班的古文教员。平素庚班许多学生在课外时间经常去听魏野畴讲授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学校的老学究们都认为魏野畴是在蛊惑人心，鼓吹阶级斗争，讲的是乱党所干之事。有一天，杜斗垣到庚班上课，教室里只剩下十几个学生，一打听，才知道大部分学生都听魏野畴讲课去了。杜斗垣觉得大为丢

脸，跑到校长室去找杜斌丞：如不驱逐魏野畴，我就辞职回家。杜斌丞虽然好言相劝，但杜斗垣怒气难平。不几天，杜斗垣联络了几个老学究向校方递上集体辞职呈文，并宣布与魏野畴是死对头。

不到半年时间，魏野畴在榆林中学的革命活动被陕北军阀井岳秀发现。杜斌丞初创事业，要在榆林中学开辟一块新天地，与什么人都得周旋，尤其是新文化、新思想初始渗入这块教育阵地，学校的守旧势力还是一层密布的阴云。杜斌丞很关心魏野畴的安全，唯恐他遭到井岳秀迫害，但又无力想出良策来保护他。

1923年暑假前，魏野畴被迫离开榆林中学。魏野畴虽在学校执教时间很短，但他利用榆林中学这块学校教育阵地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成为在陕北最

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主张的主要人物之一。

临行时，刘志丹拉着魏野畴的手，悄声问道：“魏老师，我有一句话，早就想说，一直没说出来，今天再不能不说了。我不怕苦，更不怕累，只要对大家有好处，舍上这条命也心甘情愿。你给我们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早已在欧洲传播，现在又在亚洲、在咱中国传播了，我不知道到哪

里去找共产党，你能告诉我，共产党在什么地方？”

魏野畴望着刘志丹，兴奋地回答：“我想告诉给你的，也正是这个问题，大概不会有多久，这个党就要到陕北了，你们准备迎接吧。”

魏野畴离开榆林中学一事，杜斌丞甚为遗憾。好在魏野畴离开学校之时，通过北京蔡元培、李大钊、林语堂的推荐，学校又从北京聘请来一位新文化运动的闯将王森然先生，稍使杜斌丞心里有所慰藉。

## 李子洲到榆林中学

魏野畴离开榆林中学后，仍对榆林中学的教学情况十分关心，尤其对陕北开展革命活动的前景甚为关注。他途经三原，与好友李子洲、郝梦周在三原渭北中学相见，小住几日。魏野畴向李子洲说了许多有关榆林中学教育改革方面的情况，并征得李子洲的同意，立即写信给杜斌丞，力荐李子洲到榆林中学执教。

杜斌丞接到魏野畴的信后，欣喜若狂，连忙写出聘书寄往三原渭北中学，诚邀李子洲于秋日来榆林中学。杜斌丞与李子洲有过一面之识，对李子洲的胆识和才学印象深刻。李子洲在北大期间，杜斌丞在旅京陕籍学生带回的《共进》刊物上曾看过李子洲撰写的许多文章，深感李子洲文思广阔、见解高超、富于开拓，一直赞赏不绝。特别是在一年前，李子洲为把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绥德四师）的校址争到陕北，到处奔走、到处呼吁的那种热衷于教育事业的精神，给杜斌丞留下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那是 1922 年的事情。当时，陕西当局拟成立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因校址择到关中还是陕南，意见分歧，一直未能确定。李子洲饱尝千里求学之苦，当他在北大得知此消息，为解决陕北地区 23 县各小学

毕业生外出求学的困难，目 9 发动陕北旅京津学生，呼吁把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校址定到陕北，并立即决定利用暑假回到陕北进行活动。陕北旅京学生推出李子洲为代表，旅津学生推出白超然为代表，同回陕北各地，向陕北各界游说，阐述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办在绥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此间，李子洲为了争得教育界德高望重的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的支持，以便通过杜斌丞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政治影响说服陕西当局，便亲自来榆林，

拜访了杜斌丞，并与杜斌丞面谈。李子洲见到杜斌丞，谈到陕北教育改革方面的许多设想和建议，杜斌丞听得连声赞同。之后，李子洲与陕北旅京津学生联名上书陕西当局，并通过杜斌丞的极力周旋，终于把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校址定到陕北的绥德。对李子洲的此番作为，杜斌丞赞赏不已，陕北学界也一直传为美谈。

1923年夏天，李子洲北大毕业后，应三原渭北中学校长郝梦周的邀请，到该校执教。郝梦周是李子洲在北大时的同学，又一起在共进社共过事，二人情如兄弟。当时，郝梦周在三原渭北中学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宣传新文化的基础很好，尤其靖国军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有不少人是老同盟会会员，再加上郝梦周在学校发展了许多共进社成员，使这里的革命气氛很浓。李子洲到三原渭北中学后，很快适应了那里的环境，他利用那里的有利条件，在学校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学生中很快发展了庞诚斋等一批共进社的新成员。秋天，李子洲准备按杜斌丞的聘书约定，到榆林中学执教，但在郝梦周和学生们的再三挽留下，他只好回复杜斌丞，把赴榆林中学的约定推迟到第二年春。转眼冬去春来，郝梦周亦见杜斌丞几番邀请，心情迫切，书信催促不断，并深知李子洲从来是言必信、行必果，既已应诺杜斌丞之邀，难以再作挽留，只好让李子洲应邀北上榆林。

1924年春，李子洲离开三原渭北中学，北上榆林。途经绥德，在家小住几日。此时，凑巧王森然路过绥德，李子洲恐误了赴榆林中学的约定期，便给杜斌丞写了一封信，先托王森然带给杜斌丞。在家稍作安顿，李子洲即离开绥德。从绥德到榆林骑着脚夫的骆驼，足足行走两天，到榆林城南门外时，天已近暮黑。他趁着暮色步入城内，行至榆林中学校门外时，只见王森然陪着杜斌丞挑着灯笼迎面走来。

王森然一见李子洲就说：“杜校长到南门外已经接过你一趟了，你看，又正准备再去接你！”

## 红石峡题匾

1923年6月12日至24日，中共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多名共产党员。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

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在讨论中，多数代表批评了张国焘等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会上，选出以陈独秀为委员长的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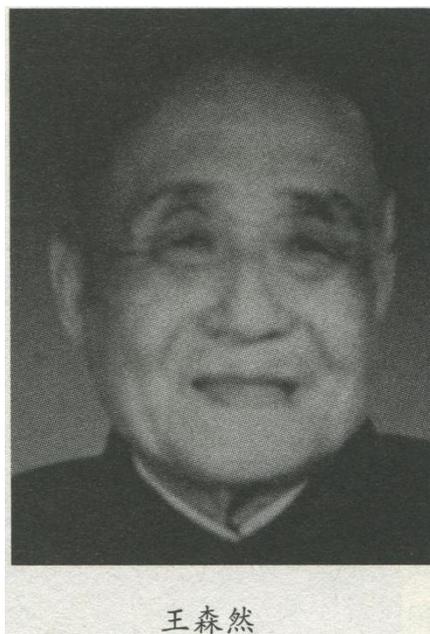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参加了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根据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形成了革命统一战线。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通过了由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大会选举了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多名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中，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伯渠任农民部长，毛泽东任宣传部代理部长。

这年春，李子洲到榆林中学后，由杜斌丞指定，担任教务主任兼教国文和历史。当时的国文课本只有《论语》、“四书”等一套陈腐封建的教材，要讲白话文，就得自己编写新教材。

王森然，河北定县人，保定直隶高等师范国文专科学校毕业。王森然与李子洲住得很近，只有一墙之隔。为了改革国文教学，王森然同李子洲一起商讨，决定编出白话文教材。在编写白话文教材时，选择了鲁迅、陈独秀的几篇精粹短文，还有一些创造社的诗歌，交给学校刻印室，油印成讲义，一边讲一边发给学生。学生们对白话文很感兴趣，因有魏野畴及王森然的启蒙基础，他们对新文化、新思想接受很快，而且很快和李子洲亲近起来。

在李子洲的宿舍里，经常挤满了探讨社会学、文学、历史、时事问题的学生。这些学生中，有刘志丹、王子宜、杜聿明、白志诚、曹力如、李波涛、霍世杰、杨国栋、汤登科等，与李子洲来往频繁。

李子洲到榆林中学不久，学校出现了空前的新文化热潮，以杜斗垣为



首的一批老学究很不满，认为李子洲、王森然两个新教员带着书生气，欲废孔孟千年学说，不尊孔崇儒，失师道，传邪学，学生会误人歧途。为了得到杜斗垣这些老学究的理解和支持，李子洲、王森然借向他们求教、谈论学术问题的机会，从诸子百家谈到王船山、谈到桐城派，使他们大为惊诧，赞叹两位青年教员年纪虽轻，古文修养却非浅。李子洲和王森然又给他们讲新文化的意义，介绍数篇白话文小说让他们一读，杜斗垣才有所领悟(杜斗垣是杜聿明、杜聿德之父)。

在学校，李子洲每周上 20 多个小时的课程，要批改 100 多篇作文。他从学生们的文章里，看到了陕北一代青年绝非等闲之辈，尤其是刘志丹等人写出的文章，大有气吞山河之气魄。如刘志丹写的《爱国歌》道：

黄河两岸，长城内外，  
炎黄子孙再不能等待。  
捷弓持戈，驰骋疆场，  
快！内除国贼，外抗强权，  
救我中华万万年。

李子洲看了《爱国歌》后，对刘志丹的抱负和志向赞叹不止。为了引导学生们对新文化的浓厚兴趣，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使他们树立远大理想，李子洲在讲授历史时，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从《马克思主义浅说》讲到《资本论》，从俄国十月革命讲到中国遭受外国列强践踏的现实，从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讲到当今北京政府的腐败，极大地吸引了学生们，使他们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十分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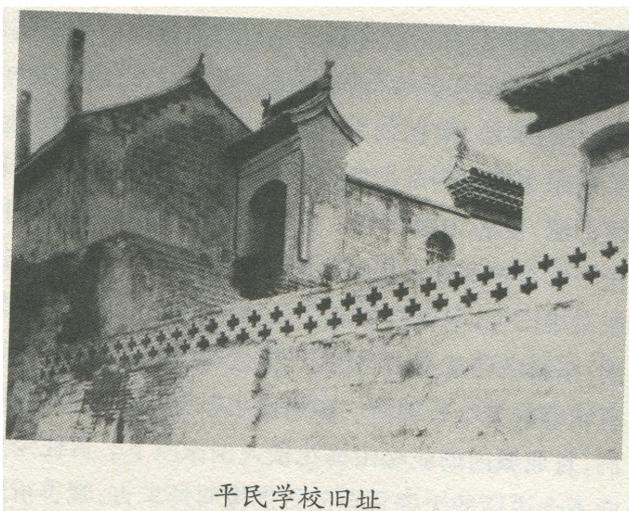
在李子洲和王森然的倡导下，学生们成立了青年文学研究会，创办了《榆中旬刊》和《塞声》杂志；并在学生中发展了刘志丹、王子宜、曹力如、刘文蔚、焦维炽等一大批共进社的成员，在榆林建立起共进社榆林分社。在共进社的成员中，李子洲开始注重为发展中共党团组织积极作准备，经常找共进社中的积极分子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刘文蔚、焦维炽、霍世杰、杨国栋等人谈心，教给他们工作方法和斗争策略，让他们在实际

工作中经受锻炼，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

1924年春夏之交，由李子洲、王森然建议，得到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和蛰居榆林的杨虎城赞助，在榆林正式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平民学校成立后，杜斌丞任名誉校长，刘志丹、王子宜任教务主任，教师全部由榆林中学学生义务担任。暑假期间，杜斌丞特为平民学校在榆林中学修建一处校址(在榆林中学第十斋)，平民学校随即搬至榆林中学的校园之内。平民学校的负责人先后有刘志丹、王子宜、汤登科、武开章、刘景象、王季明、李文芳、胡颖民等。

李子洲到榆林中学没过几个月，学校丁级学生要毕业了。杜斌丞倡议，为丁级学生在榆林城北三里处的红石峡崖壁题匾，以纪念新

文化在榆林中学兴起之后一代新人的迅速崛起。杜斌丞征求李子洲和王森然的意见，他们十分赞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主张。于是，杜斌丞和教务主任崔焕九带着几个学生，亲自到红石峡选定了题匾的位置



平民学校旧址



刘志丹(后排左七)等榆林中学学生与榆林平民小学师生合影

选好后，学校定了日子，由杜斌丞、李子洲、王森然等教员和丁级全体学生到红石峡举行毕业欢送仪式。

红石峡，又名雄石峡，是榆林八大名胜古迹之一。此峡东西对峙，壁如刀削，北通蒙地，榆溪河穿峡直达榆林城西。据史料记载，1472年(明成化八年)，余子俊为副都御使巡抚延绥，驻榆林，凿石为渠，引水由西而下，与无定河汇流，定名为榆溪河。渠成，夕阳东照，红石映日，分外耀目，名为红石峡。由于红石峡地处古长城的要道隘口，历代派有雄兵驻守。红石峡名冠边塞，东崖有雄山寺，寺内殿宇都在悬崖上凿的十多个石洞之内，寺顶有一阁名翠然阁；东崖南端建有山门楼子，穿过山门楼子沿石砭而下，石窟窿洞一字排开，内有精雕的大小石佛像。在东崖水渠旁，有一个深黑地洞，相传是西夏军的转兵洞，直通城内的驼峰山梅花楼大铜像座下。古往今来，善男信女经常到红石峡向不会说话的千姿百态的石佛像叩拜求吉，焚香祈愿，使峡间朝暮香烟缭绕如生紫雾。更有许多达官名士慕名而游，多至石峡宴饮，吟咏唱和。仰看东西石壁之上，题匾镌字到处皆是，如“雄镇三秦”“中外一统”“华夷天堑”“中华天柱”“天成雄秀”等，笔力道劲，气势雄浑。



红石峡题匾

在红石峡为丁级毕业生题的匾是“力挽狂澜”四个红漆大字。这是由杜斌丞与李子洲、王森然一起择选的，由教务主任崔焕九亲笔书写，镌刻

在东崖石壁之上。四个大字笔锋雄健，给人们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在欢送仪式上，李子洲仰望着“力挽狂澜”四个大字，脸上激动得泛出红光。他深深感到榆林中学的新文化兴起，将造就一大批改造世界的勇士，从此与黑暗搏击，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奋斗。“力挽狂澜”就是这一代热血青年要摧毁一个旧世界、开辟一个新世界的呼喊、誓词和宣言。

## 第五章

# 播撒火种

### 井岳秀府邸遇将军

1924年春，李子洲到榆林中学后，很快成为学校改革教学的顶梁柱。杜斌丞经常到李子洲的宿舍长谈小叙，两人从改革教学到中国的政治问题，从学校新文化运动到全国国民革命蓬勃发展的形势，无所不谈，甚为投机，常常谈到夜深人静方散。

杜斌丞在榆林政界和军界与许多头面人物有广泛的接触和交往，社会声望很高。杜斌丞对李子洲十分器重和赏识，经常有意让李子洲陪他进出一些井岳秀重要的社会交际场所，以熟悉和接触各界人士。



井岳秀

井岳秀，陕西蒲城县人，早年在陕西武备堂习武，清末考了一个武秀才。1907年参加同盟会。1914年，袁世凯委派心腹陆建章取代陕西都督张凤翔主政陕西时，他纠集地方土匪，扩充势力，投靠原陕军头目陈树藩，作为陈树藩第一混成旅的一个营长，带兵来到榆林。1916年，陈树藩又取代陆建章主政陕西，提升井岳秀为团长。从此，井岳秀开始了对陕北20余年的反动统治，成为陕北

一霸。井岳秀为人计谋多端、诡诈无常，是个随波逐流的政客。他到榆林后，先到山西尊拜阎锡山为义父，并通过阎锡山去北京晋谒了曹锟、吴佩孚等人，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支持。

1917年5月，井岳秀被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为陕北镇守使。井岳秀为了巩固其在陕北的统治，勾结地方豪绅，扩充武器，编练民团，实行军阀割据。他将其所属军队以营、连为单位派驻到各县，直接操纵地方政治经济大权，并与地方恶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肆意征粮收税，拉丁派捐，巧取豪夺，逼得百姓苦不堪言，民不聊生。

人常说：山高皇帝远。在陕北，尽管井岳秀没有多大本领显露，但谁又能奈何得了他。他就是这里的“土皇帝”。在军阀政权的频繁演变之中，井岳秀只凭自己灵敏的政治嗅觉、随机应变的狡猾手段，不但一根羽毛未损，反而在陕北的根基扎得更稳，势力得到扩充。井岳秀就是这样，谁得势时倒向谁，谁有奶便喊谁娘，人称手举“五色旗”的草头将军。

井岳秀在榆林做镇守使期间，未见举兵血刃有过战事，却好大喜功。1922年10月，为标榜他在陕北的“功绩”，授意心腹及地方绅士向各县索银洋4万，在榆林城大街为其建起名为“长春楼”的生祠，内塑本人铜像一尊。后因各进步报纸的猛烈抨击以及社会各界舆论的强烈谴责，被迫将长春楼改为钟楼，但楼顶阁内仍悬挂井岳秀的画像，并设置长生禄位的牌子。

杜斌丞在榆林中学办学，得不到井岳秀的支持是不行的。尤其是学校打破陈规，搞教学改革，引入新文化和新思想，学校的学监和那些固守旧的教学秩序的老学究就视之为“叛逆”之举，嘀嘀咕咕，说长道短，极尽诋毁之能事。因此，杜斌丞为办好学校，也少不得经常走动于官场，以肃清许多流言飞语，更不得经常给井岳秀洗耳朵，解释教学改革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好处。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井岳秀是大军阀庇护下盘踞陕北的一个小军阀。他心里明白，杜斌丞的一些政治见解和办学主张与自己的思想截然不同，但因杜斌丞在学界德高望重，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要在陕北把持地方统治，也少不了要利用杜斌丞给自己支撑门面，所以对杜斌丞显出亲热的样

子，常以礼相待。

有一日，李子洲陪着杜斌丞到井岳秀的府邸，商谈有关事宜，意外地碰到在榆林蛰居的杨虎城正和井岳秀谈话。杨虎城的副官惠又光在座。

惠又光，又名惠师温，陕西清涧县人。辛亥革命初，在省立西安师范



惠又光

学校。求学期间参加了革命。1914年，到日本留学，是同盟会早期成员，与李子洲早有交往。惠又光一见李子洲，悄声告诉杨虎城：“与杜先生一起来的就是李子洲。”

杨虎城虽与李子洲未尝谋面，但经常听人说起李子洲的才华和胆识。杨虎城细细端详李子洲，瘦削身材，虽然穿着的长袍已很旧了，但显得非常精神，一派磊落大度的气魄。杨虎城虽为一介武夫，文化水平不高，但对学界名流从来都是十分敬重的，且结识了许多朋友。杨虎城当即与

李子洲攀谈起来。杨虎城提及一些发展陕西教育事业及当今时局的大事，见李子洲思维敏捷，对答如流，并颇有见识，心里甚为赏识和敬重，因在井岳秀的府邸不便长谈，遂约李子洲改日到自己的住处做客。

## 肝胆相照识至交

杨虎城，陕西蒲城县人，与井岳秀同乡。他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刚满13岁时，就给一家小饭馆当童工。到15岁时，父亲杨怀福被清政府以绞刑处死于西安，他为埋葬父亲，和村里七户贫苦农民成立了“贫困相助”的互助组织，名叫孝义会。后该会成员联络若干人，在农历八月十五日改名为中秋会。到辛亥革命前夕，该组织已发展到数百人之众。

武昌起义首战告捷后，陕西也爆发了反清革命。在陕西著名的同盟会会员井勿幕的影响下，杨虎城带领中秋会部分会员参加了陕西反清的革命队伍，被编入秦陇复汉军的张云山部，与清军在乾县、永寿等地作战，多次击败清军，为辛亥革命立了战功。后因军队内部腐化，纪律松弛，甚至

奸淫掳掠，欺压百姓，杨虎城大失所望，即告退回家种地。杨虎城回到家乡，便又带领中秋会成员进行抗暴抗捐的活动。

当时，蒲城东南乡有个劣绅名叫李禛，勾结官府，包揽词讼，霸占民女，无恶不作。杨虎城借得一支匣子枪，只身闯入李禛开设的粮号，将李禛打死。县衙门派出差役四处捉拿，杨虎城走投无路，只得带领中秋会一部分青年农民，携刀流浪关山镇一带，除暴安良，群众称他们为“刀客”。有一次，杨虎城侦察到澄城县有一批税款要经蒲城解往西安，便带领刀客劫夺了这批税款，之后转到同州、朝邑、合阳一带活动。



杨虎城

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全国群起声讨。陕西各地义军四起，驱逐袁世凯的爪牙陕西督军陆建章。这时杨虎城在同州、合阳一带聚集起乡民数百人，在井勿幕和一些同盟会会员的策划下，率部参加了陕西护国军。讨袁胜利后，陕西整编军队，杨虎城所部被整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一营，杨虎城任营长。

1917年，孙中山为反对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北洋军阀，在广州树起“护法”旗帜，同时就任大元帅之职。陕西以国民党人士于右任和井勿幕为领导，建起了靖国军，与隶属北洋军阀段祺瑞系统的陕西督军陈树藩相抗。杨虎城率部参加了陕西靖国军，被任命为靖国军左翼军第五游击支队司令。

陈树藩为了加强北洋军阀在陕西的统治地位，先以“省长”职位引镇嵩军自河南入陕。接着，北洋军阀又发动了“八省援陕”行动，集中豫、晋、直、甘、川、奉、绥、鄂八省军阀企图歼灭靖国军。在关山、界坊，杨虎城率不满千人之兵力，与陈树藩万余之众鏖战六昼夜，并在抗击北洋军阀的围攻时期屡战屡胜，成为靖国军中的一支战斗主力。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打败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权。曹、吴派本部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督陕。阎相文、吴新田等部入陕后，由于靖国军正处内部分裂，各部即被逐个改编。当时，吴

佩孚曾派出曹锟的参议找杨虎城谈判，答应将杨虎城部改编为一个独立旅，甚至原靖国军的重要人物也派人劝杨虎城接受改编，但都被杨虎城拒绝，使杨虎城部成为仅有的维护靖国军旗帜的一支孤军。后来，于右任与杨虎城虽在武功重建靖国军司令部，并与直系军阀交锋取胜，但终因寡不敌众，加之部队伤亡过重，为保存实力，由杨虎城率领部队转移到陕北。

杨虎城来陕北之前，原想井岳秀与他是同乡，过去也有交情，到陕北可以借井岳秀为靠山，使靖国军重振旗鼓，东山再起。谁料到井岳秀嘴甜心狠，自知德行远比不上杨虎城，害怕暂时失利的杨虎城久居榆林，待日后养精蓄锐，羽翼丰满，成了气候，会反客为主抢走自己的地盘，因此，给了杨虎城许多刁难。杨虎城的靖国军一到陕北，井岳秀就把杨虎城带来的部队派驻定边、靖边、安边、横山、肤施、延川等地分散开来，并限制队伍的扩充，只留杨虎城的靖国军司令部在榆林，让杨虎城当个光杆司令。

杨虎城迫于困境逆时，力不从心，心里明白井岳秀对自己时刻存有戒心，但不得不暂时委屈，做出各种让步，待日后为国为民以图再举。杜斌丞恳切地向井岳秀建言：“虎城是暂退陕北，他胸有大志，非池中之物。”意谓杨虎城对陕北这个贫瘠的小地方并未放在眼里，井岳秀听了稍稍放心。杨虎城闻知后，深为感动地说：“真正知我者斌丞先生，真正助我者斌丞先生。”从此，杜斌丞与杨虎城结成休戚与共的挚友。

杨虎城到陕北不久，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元帅府，加害孙中山。孙中山虽然大难不死，离开广州，但当时不知去向。杨虎城虽曾通电讨陈，但知无补大局，心里非常苦闷。杨虎城真不明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建立了民国，为什么军阀混战，百姓更苦？靖国军拥护革命，南北转战，为什么四分五裂，一败涂地？他苦恼难解，病倒床上。

此时，正好魏野畴在榆林中学执教，经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的介绍，杨虎城结识了魏野畴。杨虎城与魏野畴一见如故，甚为融洽。两人经常在一起谈论中国的政治、时局，为中国的前途兴亡而担忧。魏野畴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谈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重要性，指出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指导革命走向胜利。杨虎城听后，豁然开朗，病也很快好了。

杨虎城视魏野畴为难得的知己。杨虎城革命思想的萌发，与结识魏野

畴有着密切关系。魏野畴离开榆林后，杨虎城经常惦记着魏野畴的情况。李子洲既是魏野畴的好友，又是陕北学界的名流，杨虎城早有心与李子洲结识，并乐意成为肝胆相照的挚友。

不几日，杨虎城即派惠又光邀李子洲到靖国军司令部做客。杨虎城的司令部设在榆林城内芝圃上巷的辘轳井湾，距榆林中学不远，只是一墙之隔。李子洲与杨虎城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杨虎城对李子洲的才华、卓识、谋略赞叹不止。

当杨虎城问及中国的政局、军事和教育的问题时，李子洲道：当今中国，一是停止军阀之间的混战，中国人自相残杀苦的只能是中国人，建立一个统一意志的民主政府，才是国家之当务之急；二是争取外交，驱逐列强，主张国权，收复失地，洗雪国辱，以振我民族精神，否则，引狼入室，遗患无穷；三是改革教育，倡导新文化，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杜绝异教在中国的文化侵略。

谈论到建立一个统一意志的民主政府时，李子洲对中国各军阀势力精辟地分析道：靠张作霖、吴佩孚的直奉军阀和当今的北京政府，拯救民族、振兴中华均无希望，只有孙中山所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主张才是人心所向，应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以其革命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民主政府，国家才有前途。李子洲这番深入浅出的谈论，句句点拨了处在彷徨之中的杨虎城，从此，李子洲便成了杨虎城的座上宾。

李子洲经常去杨虎城的司令部，与杨虎城促膝谈心，一起谈论全国及陕西的形势，尤其对杨虎城如何在榆林摆脱井岳秀的控制、重整队伍、开辟新径献策献计，杨虎城在一些重大决策中采纳了李子洲的建议。由于与李子洲的密切交往，杨虎城对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有了更多的了解。杨虎城日后追求革命，曾向中共组织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请求，并在西安与张学良共同兵谏蒋介石，达到国共两党二次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可以说魏野畴、李子洲是最早影响他政治思想的重要人物。

那时候，李子洲到杨虎城司令部去时，经常有意带一些北京、上海、天津出版的进步报刊和书籍，让杨虎城阅读，使其开阔眼界，了解全国大局，以鼓励他的爱国热情。杨虎城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对李子洲送去

的报刊和书籍从没有少看过一本，每看完一本后，总是催着李子洲为他再多借来几本。尤其是看完了《水浒》一书后，对他触动很大，经常对李子洲谈论那些英雄好汉悲欢离合的命运和打富济贫的义举。

## 绥德四师新校长

1924年5月，共产国际和中共帮助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国民党的党代表，共产党



高竹轩

党员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教授部副主任，中共还先后派出恽代英、熊雄、聂荣臻、萧楚女等到这里工作。这所军校的创办，为培养大批军事干部、建立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国共合作中，为促进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在广州开办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

夏初，在陕北刚成立的绥德四师，由于校长高竹轩私自扣发学生衣服费、徇私舞弊的事情败露，学生们闹起了全校性的学潮，罢课、联名上书要求撤销高竹轩的校长职务。

高竹轩，陕西榆林县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绥德四师建校之初任校长。高竹轩思想陈腐，仍沿袭旧的一套教育方法，对五四运动以后兴起的新文化、新思想排斥于外，学校没有活力，为社会一般人及学生所不满。学潮发生初期，高竹轩企图用强硬的师长手段压服学生，到后来压服不成，反倒使学潮越闹越凶，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高竹轩自知理亏，怕上峰怪罪下来吃不消，不得不辞去了校长之职。

高竹轩辞职后，对绥德四师新校长人选，杜斌丞十分关心。杜斌丞首先想到的是李子洲。他觉得李子洲为人师表，精明能干，品学兼优，要收拾绥德四师这个混乱摊子，并能以新文化、新思想改变学校的陈腐学风，

唯有李子洲最为胜任。当然，榆林中学的教学改革不能少了李子洲这样的人才，但权衡利弊，杜斌丞还是决定让李子洲出任绥德四师的校长。为使这一抉择得以实现，杜斌丞不但在陕北政界、学界竭力周旋，并以自己在陕西学界的权威和影响，向陕西当局呈上荐书。经杜斌丞的一番奔波努力，8月间，陕西教育厅发出公函，李子洲被任命为绥德四师校长。

在李子洲将要离开榆林中学之际，杜斌丞真是有难舍之情，像李子洲这样一位备受全校师生尊敬的教员，要离开自己，对他来说，确是失去了在榆林中学进行教学改革的一只有力的臂膀。杜斌丞相信，李子洲在绥德四师独当一面，将会使其才华和智慧发挥得更充分，把绥德四师办成一所为陕北培养出更多优秀人才的学校。

在李子洲到绥德四师赴任之前，杜斌丞要求李子洲通过北京的熟人关系，给榆林中学推荐几位在京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来学校执教。李子洲已料到杜斌丞的心头之虑，告诉杜斌丞，他已经给北京上学的两位朋友寄去了信，一位叫呼延震东，一位叫朱横秋，邀他们秋日来榆林中学执教。杜斌丞一听，高兴得合掌赞道：“知我者，李先生也！”

刘志丹、王子宜、曹力如、霍世杰、杨国栋、焦维炽等同学得知李子洲要离开榆林中学，出任绥德四师的校长，相继到李子洲的宿舍话别。

刘志丹是榆林中学学生会和共进社的负责人。李子洲对刘志丹叮嘱道：“今后有许多要做的工作落在你的肩上，我相信你会干得很出色，遇到困难要多想办法，多找王森然老师商量，革命的高潮很快要到来，你们要做中国革命的先驱者。”

王子宜是榆林中学学生会所办的平民学校的负责人。李子洲对王子宜叮嘱道：“平民学校是为城市产业工人、贫民和没有上学机会的童工们办的，学生们在学校担任义务讲课一定要坚持下去。我和王森然老师到城内的社会底层作过考察，特别是在惠记地毯厂看到童工们的生活凄苦不堪。你们办校的任务：一是让他们读书识字；二是唤醒他们的阶级觉悟，让他们心里明白，是谁吸走了他们的血汗。”

临行，李子洲把自己珍爱的几本书分别送给刘志丹、王子宜、曹力如、杨国栋等同学。

在李子洲离开榆林中学的这一天，杜斌丞、王森然及刘志丹、王子宜、曹力如、霍世杰、焦维炽、杨国栋等学校师生都来送行。杨虎城和惠又光亦特地前来送行。大家一直把李子洲送出榆林城外的凌霄塔下，才依依止步。

## 第六章

# 创建中共陕西地方组织

### 崭新的办学宗旨



1924年秋，李子洲到绥德四师担任校长后，为把学校办成一个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尤其是培养一代新人的教育基地，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精心设计。他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建一支有力的师资队伍。他很快拟定了聘请教员名单，并亲自将招聘启事专程送往北京，在《北京大学日刊》登出，以招聘在京高等院校毕业的高才生来绥德四师执教。同时，李

子洲在北大见到了李大钊，要求中共北方区委能派几名共产党员到陕北开展中共组织的发展建设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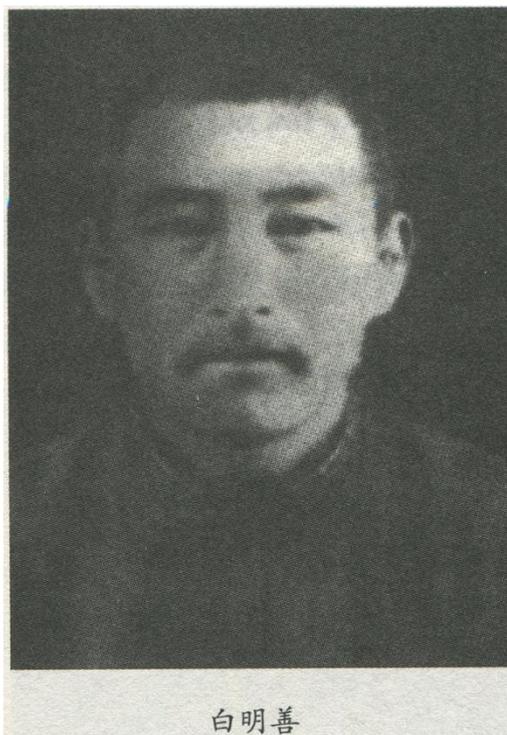
不久，通过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一些旅京的陕籍学生的协助及李大钊的精心安排，聘请教师之事基本办妥。他先后聘请到了云南籍人士王懋廷、王复生弟兄俩（来时还带着在学运中受伤的小弟王馨廷，不久病逝于绥德），关中籍人士田伯荫、韩述勋等人，还聘请了杨明轩为教务主任、常汉三为训育主任。在这些应聘的教员中，有的是李子洲在西安三秦公学时的同窗，有的是在北京一起办共进社的同学，有的是由李大钊直接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派来的共产党员。这些教员大多是从北京高等院校毕业，思想进步，学识渊博，在陕北、西安以至整个西北学界也是有名的学者。李子洲相继聘请了何寓础、罗端先、常士杰、蔡南轩等来校执教。在李子洲的主持下，绥德四师很快成为陕北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在绥德四师，如何对待原由高竹轩聘用的教员，在新的教员队伍组合中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李子洲经过一番谨慎思考，未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决定对不称职的予以解聘，择品学兼优者留用。在筛选工作中，李子洲既光明磊落，任人唯贤，又注意分化瓦解旧教员中的陈腐势力，很快组建起一支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师资队伍，使学校的教学秩序尽快恢复了正常。当时，在旧教员中有个头面人物叫王汉屏，这个人平时只搞学问，不大过问政治，人又老诚呆板，如能对他续聘，可避免许多的社会非议。李子洲权衡再三，决定专程上门拜访王汉屏。

王汉屏原是高竹轩聘用的一位老学究，在高竹轩主持绥德四师时是个大红人。自李子洲到职后，王汉屏眼看有许多旧教员被解聘回家，自料树倒猢狲散，自己一定也在解聘之列，自觉无颜见人，整天在家里装病，心里却为要另谋生计而忧虑不安。正在王汉屏焦虑之际，没想到新校长李子洲叩门光临，亲自将一张大红聘书放到炕头。王汉屏接过聘书，十分感激，力表不负李子洲的厚望，遵从新校长的办学宗旨，把书教好，以作报答。

同时，由于李子洲重视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消除学生们对校方的对立情绪，与此前因不满高竹轩扣发学生衣服费而闹学潮的学生领袖白明善交朋友，这场学潮迅速得以平息。

白明善，字乐亭，陕西清涧县人，幼年时父母双亡，靠族兄抚养长大。他小学毕业后，因学费不济，曾到外县乡下当过几年私塾先生，直到 27 岁时，始得亲友济助考入绥德四师。在学校，由于成绩出色，毅力惊人，加之思想比较成熟，为人正直，做事敢说敢当，在学生中博得很高的威信。李子洲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便先找白明善谈心，倾听学生对校方的意见。



没几天，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李子洲在大会上郑重宣布了自己的办学宗旨，公开申明：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学校要冲破

旧的陈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秩序，倡导新文化、新思想，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学生，把学校办成培育英才、改造旧中国的革命策源地，唤醒工农劳苦大众起来解放自己。

白明善听了李子洲在开学典礼大会上的一番公开讲话，不但自觉消除了对校方的对立情绪，反而主动找李子洲，表示拥护李子洲的办学主张，以致最后成为李子洲在学生中能够推心置腹的知己。

在李子洲的启发和引导下，白明善作为学生会主席，协助李子洲很快在学校发展起共进社绥德分社，大多数学生成为共进社的成员，其主要骨干是白明善、李蓉鉴、杜嗣尧、马瑞昌、罗百福、栾本朴等。面对榆林、绥德等地共进社的发展和影响，陕北军阀井岳秀恐慌不安地说：“我不怕大共(指共产党)，最怕小共(共进社)。”

## 陕北第一个中共支部

绥德四师在李子洲的主持下，不仅新文化、新思想之风迅速兴起，而且革命的气氛非常高涨。当时，绥德四师只有两名共产党员，即李子洲、王懋廷，成立了共产党小组。王懋廷主要负责共进社的工作，他和李子洲很快发展创建了陕西省绥德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团及其干事会(后改称共

产主义青年团陕北特别支部)，白明善、杜嗣尧、马瑞昌、罗百福、杨应举、邓重庆、乔国祯、丁学浚、徐步墀、李蓉鉴等参加共进社的学生，首批被发展成为青年团员。同时，白明善先后协助李子洲、王懋廷在学校创立了绥德四师青年社和陕北青年社，并担任了陕北青年社的领导工作，创办了《陕北青年》刊物，成为绥德四师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最活跃的人物之一。



王懋廷，云南祥云县人，生于1898年。早年就读于大理县高等小学、昆明成德中学。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1922年，加入共产党。1923年夏，先到陕西的华县成林中学任教，后受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派遣来绥德四师。

王复生，王懋廷之兄，生于1896年。1918年，先于王懋廷考入北京大学，受李大钊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1921年，加入共产党。1922年，先到陕西的华县成林中学任教，后与王懋廷同受中共北方区委的委派先后来到绥德四师。

1924年10月，由李子洲、王懋廷介绍，田伯荫成为陕北地区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同时，经李子洲倡导，在榆林中学由教师王森然、杜良奎、呼延震东及学生刘志丹、武开章等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4年冬，中共绥德四师小组成立（一说1926年初），成员有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荫等。

1925年初，李大钊派遣北京大学共产党员耿炳光，以于右任代表的身份来榆林做井岳秀的工作，鼓励井岳秀参加国民革命。耿炳光到绥德后，与李子洲、王懋廷等在绥德四师创建了陕北地区第一个中共支部组织，受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的直接领导。

中共支部创建后，于1925年遵照中共四大《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必须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努力扩大党员的数量”的精神，在绥德四师迅

速发展青年团员的同时，在教员和学生中先后吸收发展了白明善、李明轩、杜衡、乔国祯、杨玉峰、邓重庆、徐步墀、王兆卿、白雪山、张承忠、杜嗣尧、马瑞昌、高光祖、韩述勋、马明方、霍维德、白作宾、张肇繁、赵通儒、李瑞阳等 26 人为共产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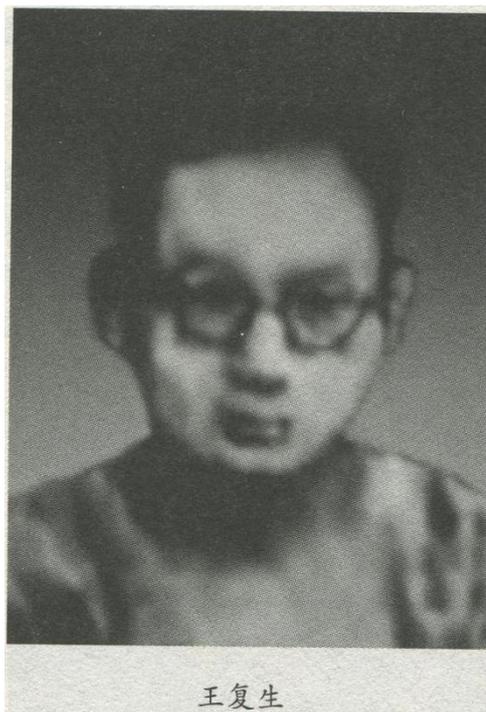
根据杜嗣尧的回忆，在绥德四师学生中“白明善、罗百福、杜嗣尧最早发展为共产党员”。

陕北第一个中共支部在绥德四师一经成立，为了便于开展群众工作，李子洲考虑到自己是绥德四师校长，容易引起反动势力的关注，决定由田伯荫担任支部书记。1924 年寒假期间，在绥德发展了回家度假的绥德籍榆林中学学生张肇勤、李登霄加入共产党，他们成为榆林中学最早的两名共产党员。

1925 年春，王懋廷、白明善等多次组织绥德四师学生到榆林，以与榆林中学学生比赛篮球为名，在榆林进行革命活动。由王懋廷到榆林中学指导发展共产党员的

工作，在该校成立了陕北地区第二个中共支部，由张肇勤任支部书记，并在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和榆林街道相继成立了中共小组，先后发展刘志丹、郭洪涛、武开章、王季明、刘景象、苗存权、周梦雄、周发源、庄培、李含芳、李力果、焦维炽、杨国栋、王子宜、曹力如、刘文蔚、汤登科、曹必达、王俊让、柳长青、王怀德、周家琪、吴碧云、王佩珊、韩慧芝等一大批共进社成员为共产党员。

同年，绥德四师、榆林中学的学生共产党员利用寒暑两个假期，很快在葭县(佳县)、定边、安边、吴堡、绥德、榆林、米脂、清涧、神木等县相继发展了一大批地方共产党员，并成立了许多中共支部和小组。根据陕北北部和中部地区共产党员人数迅速发展、中共的力量不断壮大的情况，李子洲、王懋廷等从 1924 年冬至 1925 年春先后在绥德、榆林建立起中共



王复生

特别支部，分别领导陕北北部和中部地区各地支部、小组的工作。中共绥德特别支部书记田伯荫，委员王懋廷、李瑞阳；中共榆林特别支部书记刘景象，委员李含芳、庄培。中共榆林特别支部暂由中共绥德特别支部领导。

1925年夏，陕西教育厅在陕北南部地区的肤施设立了省立第四中学(简称延安中学)。同年秋，在榆林中学执教的呼延震东被任命为延安中学校长。在组建学校师资队伍时，李子洲十分重视中共组织的发展工作，他积极协助呼延震东聘请了共产党员白超然、刘尚达等到延安中学执教。



呼延震东

呼延震东，外号“呼拍”，陕西清涧县城人，善于辞令，毕业于北京大学。1923年，由李大钊介绍加入共产党。1924年秋，到榆林中学任训育主任。1925年调任延安中学校长。1926年任中共肤施特别支部书记。他按照党组织指示，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积极开展活动，对肤施县的国民党县党部进行了改组。刘尚达、田均田等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刘尚达为县党部宣传部长，田均田为县党部组织部长，呼延震东为县党部委员。由于共产党的力量控

制了国民党肤施县党部，加之有肤施驻军高双城参谋长张采芹和杨虎城部副官惠又光的一定作用和影响，延安中学一经办起，学校的革命气氛非常浓厚。为加强该校中共组织的工作，李子洲又先后派出共产党员李明轩、焦维炽等以从绥德四师转学到延安中学读书为名开展党的工作，使学校中共党团组织迅速得到发展壮大。

从此，榆林中学、绥德四师和延安中学这三所学校成为陕北革命的三大策源地，革命的火种撒遍陕北各地。

这时，李象九来绥德找李子洲。李象九自随魏野畴从北京回到陕北后，即投杨虎城靖国军所部，随军驻防在瓦窑堡。一次，杨虎城到肤施去阅兵，李象九趁此时机，从杨虎城部驻瓦窑堡的军队里拉出几十个人的武装，南

下到黄龙山孙家沟的大南川。驻韩城的麻老九要派兵围歼，亏得杨虎城的副官惠又光与李象九甚有交情，得此消息立即递与李象九。李象九在黄龙山不能立足，闻得李子洲在绥德，即来找李子洲给其定主意。

当时，在绥德县城驻守着井岳秀部石谦团的一个连，连长叫王有才，因王有才是李象九的拜把子弟兄，李子洲建议李象九暂投王有才连。石谦与李象九是白水同乡，经王有才推荐，李象九几十个人的武装被石谦收编，并奉命与王有才驻守绥德县。

李象九在绥德县驻防期间，经常到绥德四师找李子洲，倾听李子洲谈论救国救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许多道理，受革命思想的熏陶甚深。同时，李象九在绥德四师结识了一大批进步的教员和学生，很快经由李子洲介绍加入共产党。据有关史料记载，李象九是李子洲在陕北旧军队中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从此，共产党的活动发展到军队中。

不久，因石谦团受命移驻安定县瓦窑堡，李象九随王有才连离开绥德，驻防瓦窑堡。李象九到瓦窑堡后，得到了石谦的赏识，当了安定县警佐。

## **杨虎城南下驱刘**

从1924年开始，随着国共两党合作后革命运动的不断发展，北洋军阀内部发生了分化。

9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将领冯玉祥因受革命影响，趁吴佩孚与张作霖激战时，从前线倒戈回师，于10月打回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政权，贿选的曹锟宣布退位。皖系段祺瑞在北京成立了临时执政府。冯玉祥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徐谦、顾孟余等人的影响下，将部队改称为国民军，逐步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致电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当时，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也派出干部帮助冯玉祥进一步对其军队进行改造。北方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局面。

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准备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孙中山到达北京后，由于段祺瑞等

军阀的阻挠，国民会议未能召开。这时，陕西在国共合作新形势的推动下，掀起驱逐刘镇华的斗争高潮。



刘镇华

刘镇华，河南巩县人，原是河南法政专门学堂庶务长、河南省视学。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豫西一带从事反清活动。不久，刘镇华组织民间武装参加了秦陇复汉军。中华民国成立后，被任命为豫西观察使，统领豫西地方部队镇嵩军，后投靠皖系军阀段祺瑞。当时，镇嵩军下设三标一营，由柴云升、张治公、憨玉琨分统，仅有军队 4000 余人。1918 年，刘镇华率部入陕，支援受到陕西靖国军围攻的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同年 3 月，刘镇华接任陕西省长，到 1922 年被

冯玉祥任命为陕西督军，独揽了陕西军政大权。镇嵩军很快扩大到四个师，柴云升、张治公、憨玉琨、马沂清分任师长，军队约达 10 万之众。刘镇华到陕后，纵兵殃民，迫民种罌，摧残教育，滥发纸币，为害百姓，引起陕人的强烈反对。

李子洲分析陕西的形势，认为要使局势得以安定，必须促成蛰居榆林的杨虎城出兵南下驱刘。李子洲深知杨虎城是一位有远大抱负的爱国军人，他蛰居榆林寄人篱下，实属无奈，并非是雄心消沉。扭转陕西的局势，正是杨虎城大显身手的转机。于是，李子洲在绥德分别致函于杨虎城、杜斌丞、王森然及杨虎城的副官惠又光等人，请求杨虎城出兵南下驱逐刘镇华。随之，李子洲为了抓紧促成杨虎城的决策，以迎合北方革命时局的发展，又亲自奔赴榆林，到杨虎城的府邸就出兵南下驱刘进行敦劝。

杜斌丞、王森然、惠又光等接到李子洲的信后，均分别就出兵南下驱刘之事与杨虎城多次磋商，但杨虎城疑虑重重，举棋不定，不敢贸然举事。

杨虎城一见到李子洲，听了他对北方局势的分析和出兵南下利弊的陈述，很快作出了倾其军队出兵南下的最后决断。李子洲分析道：当今驱刘形势紧迫。陕军的胡笠僧、郑思诚、高桂滋在河南，一时不能返陕；汉中

吴新田受刘镇华以汉中肥富民脂豢养，不会参加驱刘；榆林井岳秀是个手举五色旗的大滑头，见风使舵，根本靠不住。驱刘之重任，唯杨虎城一人可胜任，且此大业顺陕人之心，举之必能成功。

杨虎城深感李子洲言之有理，但担心这几年由于井岳秀把自己的部队分散到陕北各边远地方，军饷有限，队伍没有扩展，训练涣散，士气低沉。李子洲即就兵源问题和部队训练问题向杨虎城建议道：兵源问题可通过榆林各界呼吁井岳秀派兵相助解决，料井岳秀慑于各界舆论不会拒绝出兵；部队训练问题可在出兵南下之前解决，即创办一个军官学校，抓紧训练一批部队骨干，并建议聘请魏野畴和黄埔军校的陕籍毕业生到该校负责训练工作。

在兵源问题上，李子洲为了促成井岳秀出兵相助，特约惠又光、杜斌丞、王森然等政界、军界、学界的知名人士，与井岳秀共商其事。井岳秀正愁找不出借口逐走杨虎城，担心杨虎城久居榆林，养虎为患。此时，听得杨虎城愿意出兵南下驱刘，心里喜不自胜。井岳秀有他的鬼心眼，心想只要杨虎城愿意出兵南下驱刘，自己派些兵马相助，不是一箭双雕而是一石三鸟：一是把杨虎城逐出了自己的地盘，再无后患；二是驱刘大功告成，少不了自己的赫赫功绩；三是顾及了社会舆论，也给杨虎城一个顺水人情。于是，井岳秀慷慨答应愿派出部分兵力，随杨虎城回师关中，让其另辟新径。

杨虎城决定出兵南下驱刘后，惠又光迅速将杨虎城的部队从陕北各边远地方集中起来。榆林城内外，群众纷纷主动为杨虎城挥师南下募捐军资。部队从榆林启程这天，榆林城莲花池的广场上隆重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南下驱刘誓师大会，杨虎城以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号令全军将士回师关中，奋勇作战，驱逐刘镇华，收复古城西安，不负陕北和三秦父老重托。

此时，突然黄沙漫天，狂风大作。杨虎城端起酒碗仰天说道：“云从龙，风从虎，你们等着吧，虎城定取胜。”

杨虎城率军由榆林出发，经镇川、米脂，到绥德县时，李子洲早已带着绥德四师全体师生敲锣打鼓，出城到无定河边迎接。部队在绥德县城宿

营一天。当天，李子洲特地请杨虎城到绥德四师做客，并邀杨虎城给全校师生作了一次军事报告。李子洲、王懋廷等亲自陪同杨虎城拜谒了扶苏墓、蒙恬将军墓和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的故里。

在绥德，李子洲告诉杨虎城，他已经写信通知了在西安一所中学执教的魏野畴，按部队预定的计划，让魏野畴赶赴耀县一带协助杨虎城创办军官学校。杨虎城听后，再次向李子洲表示，他一定与共产党搞好合作，决定委任魏野畴为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

同时，杨虎城向李子洲提出，要在地方上动员一批青年学生，前往军官学校学习军事，以提高部队的素质。李子洲满口答应杨虎城的要求，随即在绥德四师和城内选拔、动员了一批共产党员、团员及进步青年随军南下，到即将在耀县创办的三民军官学校学习。

1925年3月，杨虎城率陕北国民军浩浩荡荡南下，联合陕军李虎臣与胡景翼部陕军一部，在关中道发起驱刘战争。战争很快结束，陕西督军兼省长的刘镇华兵败逃到山西。

刘镇华退至山西后，段祺瑞政府企图再任刘镇华为陕西督军和省长，遭到陕西军民坚决抵制。陕军在韩城、合阳、朝邑、潼关一线的黄河渡口陈兵，堵死刘镇华的归路。刘镇华在无奈之下，宣布愿意下台，表示再不返回陕西。

## 第七章

# 点燃星火

### 陕北的一颗“炸弹”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代表20人，代表共产党员994人。大会认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取得胜利”，并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农民问题“特别重要”。这次会议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多的经验教训，选举出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央局，为迎接全国革命新的高潮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3月，正当全国的民众运动走向高潮时，应冯玉祥电邀北上的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逝世。孙中山先生的病逝，是中国革命的极大损失，引起全国民众的巨大悲痛，国共联合发动各界悼念。在陕北的绥德四师、榆林中学，为孙中山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绥德四师在中共绥德特支领导下，10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王懋廷主持大会，李子洲在会上讲了话，表示国共两党要加强团结，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嘱，拥护三大政策，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反对军阀列强。

同时，为了开展革命活动，使陕北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中共绥德特支根据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向绥德四师、榆林中学、延安中学三所学校的中共组织提出学生运动的五项方针：①推动新文化运动；②到民间去开展农民运动；③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④建立青年的各种团体组织；⑤鼓动学校风潮，反对封建教育。

5月4日，省立西安一中学生在课外活动时，误将足球踢出校墙外，落在吴新田的兵营。兵营士兵蛮横成性，借故打伤数十名学生。这一事件引起西安各校总罢课，在陕西又掀起了驱逐军阀吴新田的运动。

吴新田，安徽合肥人，早年就读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原在皖系北洋陆军张敬尧部第七师任旅长，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后，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由吴代理第七师师长。1921年，率部入陕，参加驱逐陕西督军陈树藩的战争，任陕南边防军总司令，盘踞安康、汉中一带。初到陕南时，吴部只有8000人、枪6000支，三年时间，就膨胀到拥有3万之众、枪2万多支。1925年3月，刘镇华被陕军驱逐出陕后，4月，北洋政府又任命吴新田为陕西军务督办。

绥德四师党团组织积极响应因吴新田殴打学生的暴行引发的驱吴运动，在学校礼堂召开了城乡五个学校师生400多人参加的“驱吴”大会，声讨军阀吴新田，并举行了示威游行。

5月15日，上海棉纺七厂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日本资本家枪杀。

30日，上海中共组织发动工人和学生在公共租界举行了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英国巡捕悍然对游行的中国工人和学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余人，伤者无数，群众的鲜血染红了南京路，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北，在中共绥德特支的组织下，绥德四师全体师生走上街头游行，组成讲演队分赴各县进行宣传，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并开展了援沪募捐活动。王懋廷北上榆林，联络各界人士，成立了“陕北各界反对英日残杀同胞雪耻会”，开展了援沪募捐和抵制英货、日货活动。

6月25日，绥德、榆林两县城商家同时罢业半天，下半旗哀悼

“五卅惨案”死难者。陕北各界募捐到的3200多块银洋，汇交上海总工会，抚慰死伤者及其家属。

不久，延安中学学生在呼延震东、陈俞廷、王超北等的组织下，发起了一场反外教运动，触怒了肤施天主教堂的西班牙籍教士易兴化。易兴化勾结地方当局，将延安中学陈俞廷、王超北等师生30余人逮捕。

消息传出后，李子洲立即以绥德四师学生会的名义草拟了《为援助省

立四中被难学生宣言》，强烈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驱逐易兴化出境，撤换和严惩肤施知事李泰。该宣言发表后，引起全国各地学生的强烈义愤。肤施当局慑于压力，被迫释放了被捕师生。由于绥德四师在中共绥德特支的领导下成为陕北革命的主要策源地和活动中心，陕北军阀井岳秀为之震惊，惊呼绥德四师是陕北的一颗“炸弹”。

## 刘志丹入黄埔军校

1925年夏，北京共进社总部定于7月19日在陕西三原县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同时，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也定于同期在三原召开全省学联代表大会。

榆林中学共进分社和学生会推选刘志丹，绥德四师共进分社和学生会推选杜嗣尧、李瑞阳共三人为代表出席两个代表大会。

榆林到三原近千里之遥。刘志丹先从榆林赶到绥德县城，后与杜嗣尧、李瑞阳从绥德县出发，每天徒步百余里，赶到三原县时，学联代表大会已开完，共进社代表大会正举行开幕式。

共进社代表大会在渭北中学召开。在大会上，刘志丹报告了陕北的社务情况和“驱吴”及声援“五卅惨案”群众运动情况。他向大会挥笔题词：

共进！共进！

同志们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进攻！

不惜牺牲，

杀开血路！

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

这次大会上，已任杨虎城部三民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的魏野畴，也特地从耀县赶来参加了共进社代表大会。当时，耀县三民军官学校的校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唐嗣桐，总队长是刘子潜，共产党员刘含初、赵葆华、吕佑乾、宋树藩等是政治教官。在军校的学生中，有不少是中共各地方组织选送来的。刘志丹高兴地见到了魏野畴，并激动地向这位曾激发他的革命

理想的启蒙老师报告，自己已经是步入革命行列中的共产党员了。他还告诉魏野畴，李子洲从绥德四师派人在榆林已经建立了好几个支部，榆林中学的支部发展很快，有好多同学都加入了共产党。

在共进社第二届代表会上，刘志丹被选人审查委员会，审查有关社内事务的议案。会后，杜嗣尧由西安赴北京，后转上海考入上海大学。刘志丹、李瑞阳急着要赶回去汇报会议的精神，布置陕北的工作，魏野畴亲自赶来为刘志丹、李瑞阳送行。临分手时，魏野畴提出要刘志丹到耀县三民军官学校学习军事，刘志丹满口答应下来。

刘志丹、李瑞阳离开三原，日夜兼程，赶到绥德县城时，刚好特支接到中共北方区委的通知，要陕北党组织选派一些共产党员分赴苏联、黄埔军校学习。

中共绥德特支拟定刘志丹、杨国栋、霍世杰等到黄埔军校去学习，其他同志去苏联学习(后来未能成行)。

刘志丹、杨国栋、霍世杰等被定为去黄埔军校学习的人选后，刘志丹到三原县开会还未归。李子洲正为此事着急之时，刘志丹风尘仆仆从三原赶到绥德。李子洲一见刘志丹，立即向刘志丹通知了这一组织决定。刘志丹听此消息非常兴奋，表示一定不失这次机会。

刘志丹接受去黄埔军校学习的任务后，李子洲叮嘱道：“这次到黄埔，要看看外面的大世事，开拓眼界，更重要的是增加军事知识。想要打倒军阀、打倒井岳秀，光搞学潮不行，必须要掌握军队，会指挥军队，把枪杆子握到手中，这是党组织交给你的任务。”

没几天，刘志丹、杨国栋、霍世杰等即从绥德县出发。临行，中共绥德特支给他们凑足路费，从吴堡县东渡黄河，取道山西，直奔北京。到了北京后，通过中共北方区委的关系参加了黄埔军校入学考试，均被录取。刘志丹、杨国栋、霍世杰等一行又从北京坐火车到天津，由天津搭船到上海，然后乘去广东的轮船辗转到黄埔长洲岛。翌年初，参加了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习。霍世杰到黄埔军校不长时间，即转到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不久，中共绥德特支派白明善到革命气氛浓厚的上海大学深造，白明

善与在同校学习的杜嗣尧结为莫逆之交。白明善在上海大学未及一年，即调到中共中央发行部工作，于1926年8月又由党组织派往广州黄埔军校政治宣传科工作。

## 国共初次合作

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将黄埔军校的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万余人。共产党员周恩来等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消灭了盘踞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部和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并平息了滇军、桂军在广州发动的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7月间，陕西人民的驱吴斗争发展到了最高潮。吴新田见陕西民众对他已是群情激愤，又有国民军的援助，自料在西安久驻有遭歼灭之险，遂于7月下旬率部离开西安向西撤退。吴新田的军队行至宝鸡的虢镇一带，即遇杨虎城国民军的截击，被歼两个团，残部狼狈地逃往汉中，驱吴运动至此取得了胜利。

7月底，杨虎城的国民军开进西安。魏野畴离开耀县，也从三民军官学校回到西安。魏野畴到西安后，与高克林、关中哲、刘含初、杨明轩、张金印等在西安创办了《西安评论》。《西安评论》一经创刊，由于反映了陕西人民的革命心声，指导了陕西人民的革命斗争，深受省内外各界群众的欢迎，一时被称为“陕西革命舆论的唯一指导者”，魏野畴被称为陕西青年的“导师”。

8月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建立组织、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指示，魏野畴、刘含初、王授金、杨明轩、李子洲等于18日共同发起成立了国民党陕西党员俱乐部，以联络国民党党员、宣传三民主义为宗旨，进行国民党党员登记和宣传工作。9月，该俱乐部在西安召开第二次会议。与会者64人，推举刘含初为主席，杨明轩、赵葆华为书记。

9月，中共北方区委派安存真以特派员的身份来西安。安存真，河北丰润县人，1922年初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共产党，先后在天津、北京、杭州等

地从事党的发展工作。在安存真的指导下，同月 26 日成立了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会议通过了临时省党部组织大纲，选举杨明轩、刘含初、张性初、赵葆华、焦易堂等 9 人为临时省党部执委，师守命、王圣域等 5 人为候补委员。临时省党部以共产党人为核心，团结国民党左派，积极发展组织，大力宣传孙中山联战、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一成立，分别向于右任、冯玉祥等军队将领发出通电，同时派人到三原、肤施、华县等地成立县党部，使陕西各县国民党组织迅速得到发展。

接着，共青团中央和中共豫陕区委派吴化之到西安。魏野畴和雷晋笙、吕佑乾、吴化之一起，整顿了西安的团组织，成立了团的特别支部和西安地委。



安存真

10 月，在安存真和吴化之的领导下，在西安成立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由安存真任书记，魏野畴、雷晋笙任委员。这是在西安地区建立的第一个中共组织。国民党在陕西成立临时省党部后，杨明轩以国民党陕西省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和国民党陕北 23 县的党务特派员身份，从西安回到绥德。到绥德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必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凡无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共则为之建立”的指示，即在已建立的绥德、榆林、葭县、肤施四个国民党临时县党部的基础上，与李子洲共同安排，派出绥德四师、榆林中学和延安中学的共产党员、团员学生分赴陕北 23 县从事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很快在各县成立了国民党临时县党部。临时县党部的权力大部分被共产党控制和掌握，使陕北的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此时，在中共绥德特支的领导下，绥德四师党组织的力量发展得特别迅速，全校的党团成员很快就占到 80% 以上，在陕北地区，一时被群众称誉为“陕西的上海大学”，李子洲被称誉为“陕北的李大钊”。

秋日，中共北方区委调王懋廷返回北京，共青团陕北特支由绥德四师青年教员李瑞阳负责。共青团陕北特支成立于同年2月，直接隶属团中央。当时，王懋廷是共青团陕北特支书记，李瑞阳是委员。后改由学生党员马瑞昌任书记。

王懋廷到北京后复入北京大学，任共青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兼经济斗争委员会主任。1926年夏赴广州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1928年到苏联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回国后，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1930年1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国民党杀害于昆明。

1926年4月，陕北团组织改由共青团北方区委管辖。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陕北各地团组织发展很快，遍及各县中小学校及瓦窑堡驻军李象九的连队。

6月间，王复生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派遣离开绥德四师，前往云南参加筹组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和云南省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又调往东北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6月在黑龙江齐齐哈尔被日军逮捕，惨遭杀害。

## 杨重远痛打恶管家

在李子洲主持的绥德四师，搞好学校教学改革的同时，十分重视社会教育。经李子洲提倡，绥德县当局把原来的劝学所改为教育局，并要求政府拨出部分专款，创办了简易师范学校、市民学校和成人补习学校，兴起男女老少识字学文化的新潮。市民学校设在绥德城内高家祠堂，能坐百十人。李子洲、王懋廷、杨明轩编写出通俗易懂的教材，带着学生们轮流去上课。市民学校主要利用晚上空隙时间为农民、雇工和失学青年上课，所以又称平民夜校。

平民夜校一经办起，深受绥德城内外民众的欢迎，城外农村的青年农民为得到读书



杨重远

识字的机会，每天晚上从十余里外赶来听课。李子洲、王懋廷利用讲课机会，经常给听课民众宣传革命道理，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使平民夜校许多学员很快成为开展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有丁锦业、郝进德、李邦俊、杨重远等，先后成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平民夜校学员杨重远，又名杨敬熙，家住绥德县城东四十里铺的麻地沟村，生于1894年。他从小丧母，父亲是个打长工的农民。杨重远在本村私塾曾念过两次冬学。由于他天资聪明，毅力惊人，练出一手好字，后来通过县城里一个远亲介绍到一家商店当店员。杨重远白天在商店里干活，等到夜晚商店门铺一关，就跑到平民夜校听课。由于他学习用功，成绩优秀，很得李子洲的喜欢。

杨重远与绥德四师的进步学生交往频繁，尤其是与学生共产党员乔国祯、高光祖等过从甚密。李子洲和乔国祯、高光祖等经常给杨重远送去一些革命书刊，让他阅读，使他的思想进步很快。

绥德城内有个绰号叫高大老爷的劣绅，他家有财有势，上通官府，下欺百姓，是城里一霸。当时，高大老爷家有个大管家，平时依仗主子的权势，眠花宿柳，欺行霸市，无恶不作，群众十分痛恨。一天，有个乡下妇女进城赶集。这个大管家瞅见她有几分姿色，便在闹市用污言秽语调戏，被妇女臭骂一顿。大管家恼羞成怒，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将那个妇女抢回高家宅院，企图奸淫。

那个妇女哭天喊地叫“救命”，但街市行人知道大管家是个无赖之徒，不敢去惹他，都眼睁睁地看着大管家强行把妇女拉走。此事一出，街市哗然，人人唾骂。杨重远正在商号里干活，闻得这一消息，愤然不平，立即跑到绥德四师去找熟悉的学生们，商量营救那个妇女的对策。刚进校门，正好碰到了乔国祯。乔国祯认为事不宜迟，决定由自己在绥德四师联络学生，杨重远到平民夜校联络学员，火速赶到高家宅院救人。不多一会儿，乔国祯、杨重远联络了20余人，迅速朝高家宅院冲去。

高家宅院的大门紧闭，四周围墙又高，乔国祯和杨重远带着的人无法进去，就用石块使劲撞击大门。大管家正在厢房里威逼那个妇女就范，又剥衣又扯裤，听得大门外一阵撞击声，只好把那个妇女关到厢房，自己

去开大门。

大管家刚把大门拉开一条缝儿，没等看个仔细，乔国祯和杨重远领着的人群一拥而入，将大管家撞个仰面倒地。大管家见势不好，连忙从地上爬起，没命地朝后院窜去。杨重远紧追在后，猛扑一步抓住大管家的头发，接着人们一拥而，将大管家按倒在地，你一拳我一脚地乱揍起来，直把大管家打得鼻青脸肿，口鼻出血，趴在地上哀嚎“饶命。乔国祯和杨重远等把大管家打了个痛快，救出那个妇女。

高大老爷闻知大管家被人人宅殴打，岂肯善罢甘休。他气急败坏地跑到德县衙，状告绥德四师和平民夜校的学生聚众侵犯私宅，殴打他的家人，滋事生非，扰乱治安，要求当局予以严惩。此时，绥德县衙正按井岳秀密令对绥德四师严加监视，便借此事件大做文章。绥德县衙立即以刑事通缉捉拿乔国祯、杨重远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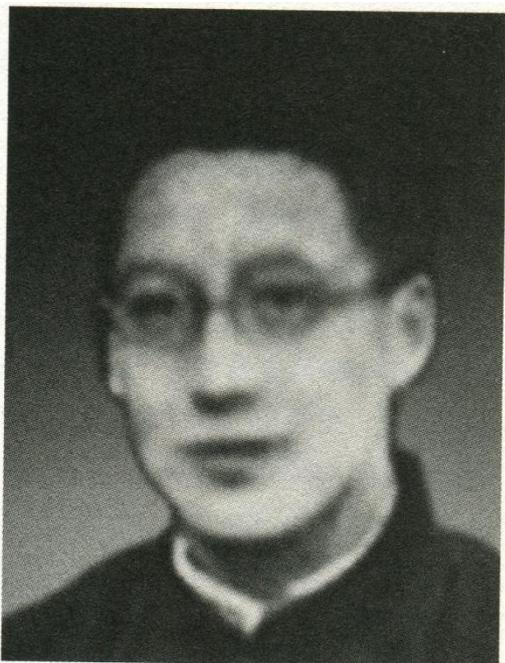
李子洲闻讯后，通过党组织将绥德县衙通缉捉拿的“首犯”杨重远秘密转移出绥德城，后派往石谦团。在李子洲的出面周旋下，乔国祯等学生虽被取消通缉，但因迫于当局的压力，还是离开了学校。乔国祯先通过中共绥德特支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回陕北，不久又被派往北京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的学兵连搞兵运活动。

## 第八章

# 山雨欲来

### 榆林中学学潮

1925年11月，由于榆林中学中共组织的活动日益频繁，井岳秀疑学校校长杜斌丞与共产党有关系，从中支持，即施以种种压力，杜斌丞被迫辞去学校校长之职。杜斌丞离开自己呕心沥血建设的榆林中学后，即请长假到西安等地去了。杜斌丞一走，学校派来一个叫高崇的文人，主持榆林中学校务工作。



高崇

高崇，陕西榆林县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思想守旧。他到学校主持工作后，完全改变了杜斌丞校长原有的办学宗旨，按照井岳秀的旨意，公开宣布学生不得干涉校务，只能循规蹈矩地在学校读书学习。

当榆林中学的党团支部根据7月在三原召开的陕西省学联代表大会所形成的关于学生参与校务会议的决案，以学生会的名义出面，向高崇提出要求准许学生参加校务会议、民主管理学校时，高崇以种种理由拒绝。在一个星期日，校方与学生举行辩论。学生会代表李登霄、栾本植、杜鸿章等相继发言，驳斥高崇等反对学生参加校务会议的谬论，并当众揭露了高崇许多倒行逆施

的做法。学生们向各界散发传单，强烈要求当局撤销高崇的职务，并进行了罢课示威。罢课持续一周，学校一片混乱。

高崇采用以守为攻的策略，立即煽动学校部分教员提出辞职，并声称学校闹学潮是学生中的共产党分子在煽动。高崇利用学校里一些后进学生及少数坏分子，暗中盯梢，列出学生中闹事者的黑名单，交送到井岳秀的手里。井岳秀正在为绥德四师共产党的活动日盛一日而恐惧不安，此时，又听得榆林中学学潮是共产党分子活动所酿，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发生，决定采取武力整治。

这天早晨，天刚亮，榆林中学的学生正起床。榆林道尹带着一营的武装士兵，突然将学校团团包围。士兵冲入校园，将全校学生从各个宿舍撵出，全部赶到操场上。操场的四面，士兵们荷枪实弹，机关枪高架，如临大敌。

这时，有个参谋官手持高崇交来的黑名单，走到学生面前，满脸凶气地拉长声儿，按黑名单上写的名字，念一个，由士兵在人群里抓一个。然后，将抓起来的学生排成一行，由榆林道尹主持，开始宣布“罪状”，以“罢课滋事”“扰乱社会治安”之罪名，一律开除学籍，并强行命令立即离开学校。被开除学籍的学生有王子宜、汤登科、周发源、李登霄、柳长青、高玉钰、焦维炽、龙施普、霍学光、王怀德、周家琪、周梦雄、栾本植、李含芳、樊俊、王俊让、曹力如、霍作霖等 19 人。

宣布开除上述学生学籍后，每个学生由两名士兵押解，并在脖颈上挂上纸牌，押出学校大门，游街示众，强行押出榆林城南门外。到南门外后，参谋官向 19 名学生宣布：“从即日起，被开除学籍的学生永不得再进入榆林城，如有违者，以刑律处之。”士兵们乘机将学生身上所带的钱物抢劫一空。这 19 名被开除学籍的学生都是榆林中学党团组织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由此，榆林中学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在榆林城南门外，有一所破旧的寺庙，19 名被开除的学生聚在寺庙里，就这次学潮引发的事件商量对策。大家认为，为暂避风险，以保存在榆林中学还未暴露的刘景象、郭洪涛、武开章、王季明等党团组织负责人，决定暂不与榆林党特支和团组织联系。同时，因王子宜原是学校党支部的负

责人，要路经绥德，决定由他到绥德县向中共绥德特支汇报榆林中学学潮失败的情况。

榆林中学学潮中，19名学生党团员被开除学籍后，引起学生中许多党团员和进步学生的无比愤慨，有不少学生愤然离校。最后校方迫使学生复课时，全校在校学生仅余三分之一。汤登科、周发源、周梦雄被学校开除后，到定边县高小以当教员作掩护，在定边县秘密成立了中共定边支部，由周发源任书记。王怀德被学校开除后，到清涧县与马瑞生、白作宾、景仰山、白志强相继到第一、二高小以当教员作掩护，在高杰村、县城建立党团组织，发展了一大批党团骨干分子。

王子宜到绥德县时，王懋廷已接中共北方区委指示调回北京。王子宜一见李子洲，如见亲人，哭述了这次榆林中学学潮的始末。李子洲听完汇报后，与王子宜一起总结这次学潮失败的经验教训，安慰王子宜不能灰心丧气，要鼓起勇气继续斗争，在斗争中不断接受考验和锻炼，革命迟早会成一个浩大的声势；目前中共组织的力量还很薄弱，军队操持在军阀的手里，革命的道路很曲折，以后的斗争将更艰苦，要王子宜回到农村，在农民中间播撒革命种子，发展壮大党团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并引用杜斌丞校长的一句话“吾宁斗智，不可斗力”，嘱咐王子宜在今后的斗争中要发挥智力与敌斗争。

王子宜离开绥德县后，李子洲立即通过绥德四师的《陕北青年》杂志刊出有关文章，并由绥德四师学生会向北京、西安等地报刊发通电、写文章，声援榆林中学学生的正义行动，抗议井岳秀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

不久，魏野畴主持创办的《西安评论》上发表了旅京陕北同乡会的《旅京陕北同乡会对于榆中风潮经过之报告及宣言》，北京《共进》半月刊相继登出《榆中学潮》《榆中学潮真相》两篇文章。这些文章尖锐地指出，榆林中学学潮是高崇等人为了取代杜斌丞校长、勾结井岳秀蓄意挑起的一起事件。对井岳秀利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的行径，一时全陕乃至全国舆论哗然，无不愤怒斥责。

## 刘镇华围西安城

1926年初，经中共中央和中共豫陕区委批准，中共西安地委正式成立，黄平万任书记，吴化之负责组织工作，魏野畴负责宣传工作，委员有雷晋笙、张秉仁、吕佑乾、刘含初等。

1月，魏野畴、王圣域、师守命作为陕西代表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相当比例，但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竭力主张妥协让步，在选举的国民党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7名，12名中央监察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1名。在这次大会期间，陕西代表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彭湃、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

大会闭幕后，正值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筹办，魏野畴即赶到北京，与李达、陈毅等一起，选拔了60余名党团员和有志青年去广州学习。这些学员中有乔国祯、李维屏、霍世杰（从黄埔军校转来）、杜松寿、马致远、刘友珊、李波涛、亢维恪、李秀实、鲁振之、冯文江、张克敏、苏士倜、郭忠仁、韩崇正、王述绩等16名陕籍共产党员和团员青年。他们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有幸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何香凝、陈延年、邓中夏、彭湃、张国焘等人的讲课和报告，结业后返回陕西，对陕西农民运动尤其是陕北农民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魏野畴在给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选送学员的同时，还在西安、陕北选拔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团员到黄埔军校学习。

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谎称共产党人指挥的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发动暴动，并要劫持蒋介石，借以宣布戒严，派兵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中共中央的陈独秀、张国焘等和共产国际代表继续主张妥协退让。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凡是共产党员均被迫退出军队。这一事件后，汪精卫称病去职。

5月15日，国民党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中共派出的张国焘、彭述之等人按照陈独秀的右倾主张在会上妥协退让，这一决议案获得通过。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之，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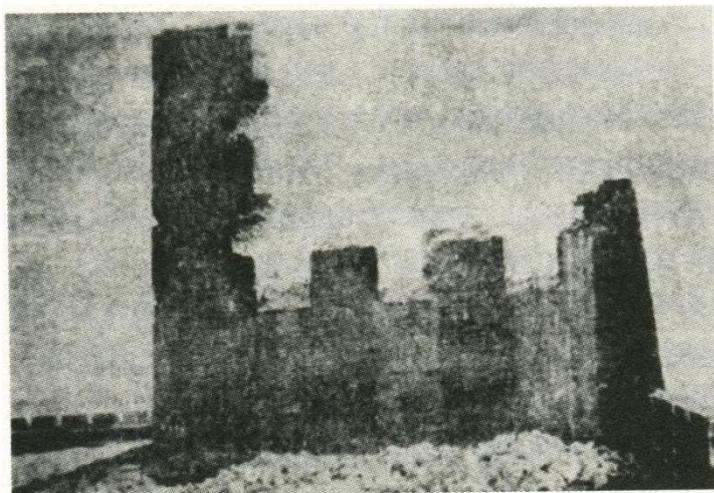
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4月间，西安形势发生恶变。被陕西民众驱逐到山西的皖系军阀刘镇华在山西运城经阎锡山的斡旋，投靠了直系，由吴佩孚委任为“陕甘剿匪总司令”，率镇嵩军8个师10万之众的兵力，西渡黄河。由于关中地区守军成分复杂，兵力分散，驻同州的麻老九、驻蒲城的侯章保等部乘机迎刘入陕。所以镇嵩军轻易地攻占潼关，长驱直入，如人无人之境，直扑西安。华阴、华县、渭南、临潼相继陷落。

刘镇华用7万大军包围西安城，派2万多兵马包围进攻三原、高陵、泾阳等县城。西安城内顷刻间如捣蚁巢，有钱的富贾商家纷纷携带金银细软逃离省城，远避川蜀、平凉诸地，而城郊百姓因畏惧镇嵩军的“土匪”名声，又纷纷携家带口涌入城中。

当时，城中的守军是国民军第二军第十师李虎臣和陕西陆军第四师卫定一的两个团，部队总计约5000人。李虎臣内心慌乱不堪，一边呼救要求援军，一边随时准备弃城而逃。当镇嵩军的枪炮声逼近西安东城下时，亏得在关中西府追击吴新田的国民军第三军杨虎城及时赶到救援，才稍稳住惶惶乱乱的古城危局。

杨虎城决定守卫西安，除将部分兵力留三原、泾阳与镇嵩军外线周旋作战外，亲率主力5000余人，于4月16日经高陵，渡渭水，从北门进入西安城内。杨虎城的部队入城后，顾不得歇息吃饭，立即出城作战。经一场激战，暂把刘镇华的镇嵩军赶出东郊。



被镇嵩军大炮炸毁的西安南门城楼

5月19日，进入西安城的各军将领召开联席会议。会上，杨虎城提议取消国民军二、三军番号，一律改称陕军，公推李虎臣为陕军总司令兼第一师师长，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兼第三师师长，田玉洁为第二师师长，卫定一为第四师师长。从此揭开

“二虎守西安”的八个月围城激战序幕。

西安周围各县及渭北、陕东的大部分地方被刘镇华的镇嵩军占据。在刘镇华的串通下，盘踞在陕南的军阀吴新田及甘肃军阀孙繁锦占据了西府的大部分地方。

刘镇华部队这次入陕后，竭尽所能，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兵到之处，一见少年女子或年轻妇女，即大施奸淫，少女呼痛之声、被淫之状，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无数妇女被掳去，装车向河南载运。以土匪著名的麻老九和背叛国民军的侯章保投靠刘镇华祸害陕局。

在临潼、渭南、华阴、华州等县一带有歌谣道：

麻老九，真死狗，  
扎在乡里不开走，  
我们不特把陕喂麻雀，  
还要喂死狗，  
夜间打的要妇女，  
日中拷的要银土，  
拿了我们的东西不上算，  
可怜我们的妇女、女子被人践，  
我们的心肝被气炸，  
活的这一条命儿比屁淡，  
我们只有拼出死命与贼战。

## 打 骡 柜

1926年夏季已到，陕北一直大旱无雨，绥德、米脂、吴堡、清涧一带到处都有求神祈雨的人群。但是，官府的苛捐杂税反而越来越名目繁多，什么田粮税、人口税、羊圈税、槽头税、烟筒税、印花税、骡柜税，无奇不有，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在陕北这山高沟深的地方，毛驴和骡马是唯

一的交通工具，城乡群众的生活日用主要依靠赶牲口的脚户运输。可在这战乱年代，只要脚户们赶着牲口一进县城，当局政府和驻地军队与设立的“骡柜”就串通一气，逼迫脚户将牲口无代价地送去支差。支差少则几天，多则几十天，让脚户们叫苦连天。

在当时，绥德县的骡柜又叫厘民局，是地方劣绅们为敲诈脚户而雇用一帮地痞、恶棍和流氓耍着花样诈取脚户钱财的组织。许多脚户的牲口一旦被骡柜拉走后，如果不暗送钱财赎回支差牲口，黑心的骡柜就让脚户的牲口连着几次支差不给退还，甚至宁肯把牲口闲拴在骡柜大院，也不让脚户拉走。有些脚户试图拒绝交出牲口抗命，结果被骡柜的这帮家伙打得半死不活，还连人带牲口都被拉走。因此，脚户们一提起骡柜，就恨得咬牙切齿，痛骂是“官方土匪”。

有一天，李子洲刚从农村发动群众回到学校，有一位米脂县籍的学生跑来向李子洲哭诉：临近暑假，父亲赶着毛驴来学校接行李，走到城东岔路，遇上骡柜的人，他们把牲口扣押起来，说不交出钱赎回，就要把牲口拉去支差，乞求李子洲给骡柜说情。李子洲听后十分气愤，随即带着学生们准备前往城东，要跟骡柜评理。当走出学校，他又冷静一想，觉得贸然前去与骡柜评理，不能解决脚户们的根本问题，遂决定把所有的脚户组织起来，与骡柜开展一场斗争。

于是，李子洲与田伯荫、蔡南轩商量后，由中共绥德特支和团组织通过学生会和青年社串联绥德城内外所有脚户，在平民夜校举行了有30多名脚户和农民、学生共500多人参加的“脚户自保会”成立大会。会场中悬挂孙中山先生的像，院里、街巷张贴了标语，在会上推选出马瑞昌为脚户会的会长，委员有石泰清、罗百福、李明轩、张礼庭、赵通儒、姬世道、刘斌章、邓重庆、刘三、郝林瑞、严念祖等。大会号召全体脚户和农民团结起来，抵制骡柜的敲诈勒索。

脚户大会一结束，参加会议的脚户、农民和学生立即从平民夜校的会场出发，浩浩荡荡的人群朝城外东岔口涌去。城里的许多市民也闻讯响应，加入随行队伍的行列。骡柜的这帮家伙正在猜拳行令喝酒，被群众出其不意地包围在院里。人们把院子围得水泄不通，在一片“砸烂骡柜”的怒吼

声中，石头、砖块纷纷乱乱朝院里一齐飞来。骡柜的这帮家伙平素称王称霸，这阵子吓得魂不附体，有的躲到桌子底下，有的头钻到灶坑里，露着屁股不敢动弹。人们对骡柜这帮家伙早已恨之入骨，尤其是脚户们更恨不得把他们抽筋剥皮才痛快。人群像潮水一样涌进骡柜院子，见东西就砸，见人就狠揍，直把这帮家伙打得鬼

哭狼嚎，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地哀求“饶命”。接着，脚户会历数骡柜罪状，并要这帮家伙立即解散，关闭骡柜，再不得为非作歹。

群众捣毁了骡柜，把骡柜扣押支差的牲口夺回到脚户的手里。脚户们牵着自己的牲口，都激动得眼泪汪汪，难以表达内心的喜悦。

为彻底取缔绥德县的骡柜组织，以防死灰复燃，在群众砸毁骡柜后，李子洲随即亲自到国民党县衙，向县长韩兆鹗为民请愿，要求当局明令取缔骡柜组织，遣散骡柜里的这帮家伙。韩兆鹗随即发出告示，将骡柜组织取缔。群众看到县衙告示，都高兴地说：“官方土匪消灭了，脚户赶脚路平了。”

## 中共绥德、榆林地委成立

1926年6月，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再次派耿炳光来到陕北整顿党团组织。6月8日，在耿炳光的主持下，绥德县召开中共党团组织联席会议，决定将中共党团组织分开。在中共绥德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中共绥德地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绥德地委），隶属中共北方区委。中共绥德地委由田伯荫任书记，组织委员为蔡南轩，宣传委员为赵少西，原中共绥德特支所属组织，统归中共绥德地委领导。

不久，中共北方区委又派耿炳光到陕北巡视工作，并指示耿炳光在陕西积极筹备建立中共陕甘区委。11月间，中共北方区委通知李子洲，赴西安共同筹备中共陕



马云程

甘区委的组建工作。李子洲离开陕北时，先后派出绥德四师学生党员常黎夫、李馥花、高崇实等人到米脂县发展中共米脂县党组织，指定李馥花为中共米脂直属党小组组长；学生党员田庆丰、贺维新到绥德县苗家坪小学任教，与苗仰实等组建起中共苗家坪小学支部。

12月，就学于北京大学的马云程尚未毕业，即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回到陕北，筹建中共榆林地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榆林地委）。

当时马云程以榆林中学教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对于中共榆林地委的成立时间，众说不一。一说是1926年12月，马云程从北大回榆林后，中共绥德地委派蔡南轩来榆林，与马云程在榆林组建的；一说是到1927年5月，始由中共陕甘区委负责组建。总之，虽组建时间说法不一，但都认定中共榆林地委建立后，由马云程任书记，委员先后有周家干、刘景象、郭洪涛、张光远等。当时，中共榆林地委管辖横山、神木、府谷、靖边等县城高小和榆林中学、榆林女师、榆林单级师范及高小、榆林兵工厂等党支部，还有陕北北部各县城、农村的党支部、党小组工作；中共绥德地委管辖米脂、绥德、葭县、吴堡、清涧、延长、延川、安定、肤施各县高小及绥德四师、延安中学等党支部以及陕北中部南部各县城、农村党支部、党小组的工作。在中共榆林、绥德两个地委的领导下，中共陕北党组织的力量日益扩大，领导群众斗争的规模也愈来愈大。中共绥德地委一经建立，就明确提出“党到农民中去”的号召，使党的力量很快发展到农村。

1927年4月初，中共延安地委在延安中学正式成立，由田伯荫为书记，陈俞廷为宣传委员，易厚庵为组织委员。8月，中共延安地委改为中共肤施县委。

## **惠记工厂罢工**

1927年春，国民党在榆林正式组建县党部，马云程、周家干、张光远、郭洪涛、井岳秀、郝敬修、白幼宜等为委员。凡在国民党县党部的共产党员，根据中共组织的指示，都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马云程、张光远利用国民党榆林县党部执行委员的公开身份发动了惠记工厂的工人罢工运动。

惠记工厂是井岳秀依仗其军阀权势开办的手工织毯厂。这个工厂的原

厂主叫张在田，工厂设在榆林城米粮市顶，厂内仅有工人 20 余人。后井岳秀为霸占工厂，将张在田逼得携家逃往包头。工厂落入井岳秀之手后，厂址迁到定惠寺庙内，改名惠记工厂，并扩大生产规模，招收工人 100 余人，井岳秀每月从

工厂榨取银洋达 1000 多块。工厂里少数是技工，大量是童工，每天生产时间长达 12 个小时，技工工资极低，童工只管饭食不发工钱，且饭食都是霉米烂菜，住房简陋，工人不得温饱。

井岳秀定出的厂规非常残酷：工人一旦进入工厂，未获批准整年不得走出厂门一步，如擅离厂区或干不完生产定额，即是所谓的“越轨”行为，不是要遭到监工的毒打，就是被关进私设的黑牢。

马云程、张光远通过县工会负责人李文正，派出女子师范学校学生李仙峰、张玉茹以到惠记工厂参观、购买地毯为名，向工人宣讲革命道理，提高工人思想觉悟，号召他们团结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反抗井岳秀残酷剥削工人血汗的行为，与厂方开展斗争，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提高待遇。惠记工厂的工人即向厂方提出正义要求，井岳秀授意厂里的监工薛平立刻将工厂大门封锁，隔绝与外界联系，并对出面抗争的工人进行毒打，迫使工人屈服。

4 月 22 日，在中共榆林地委的领导和榆林县工会的直接组织下，惠记工厂全厂工人罢工，向厂方明确提出：增加工人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余时间工人行动自由；改善工人伙食待遇；取消各种不合理厂规和私设的刑具、牢房；工人有组织工会、实行罢工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撤换监工薛平。

在榆林中学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下，惠记工厂的工人全体离开工厂，搬到榆林中学大礼堂居住，群众慷慨捐食物，解决生活所需，罢工持续十多天。井岳秀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派出代表与榆林中学学生刘绍绪、李登霄、豆成业、王朴所代表的工人方谈判。在榆林县县长王卓儒的周旋下，惠记工厂工人的罢工斗争最终取得胜利。

5 月 19 日，陕北 23 县在榆林举行各界代表大会，历时五天，会址在榆林中学礼堂。会议由中共榆林地委书记马云程（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榆林县党

部执行委员)主持，各界代表在会上愤怒声讨蒋介石、张作霖、何经纬等破坏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残酷捕杀共产党人、封闭农民协会的罪恶，并揭露批判井岳秀部队和地方各县地主劣绅相互勾结、鱼肉乡民的行径，提出“废除苛捐杂税、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劣绅土豪、反对拉差拉夫”等要求。

在会议期间，为7 唤醒民众、团结群众，推动陕北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在榆林城的榆林中学操场和北大街凯歌楼前分设两个会场，中共榆林地委以国民党榆林县党部名义，由马云程、张光远分别主持，隆重召开了追悼“四·二八”李大钊等死难烈士大会，到会各界群众有 2000 余人。

会后当晚，全城各界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提灯游行示威，参加游行的有榆林中学、女师、职中等校的学生以及市民、工人、商人。井岳秀企图弹压，命令城内的军队和警察沿街道排列两旁，但游行队伍毫无惧色，一手拿着花灯，一手高举小旗，高呼“打倒军阀，誓死北伐”“打倒张作霖”“打倒南京政府”等口号，排列长队昂然而过。

QINGJIAN  
QIYI

第二部 ★

## 第九章

# 把军队抓过来

### 谢子长办民团

李象九随井岳秀部石谦团王有才连从绥德县移驻瓦窑堡后，被石谦委任为安定县警佐。当时，安定县的民团团总是谢子长。

谢子长，号浩如，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人，生于1897年。早年考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后转入榆林中学，未及毕业即回家乡创办小学。1920年秋赶赴山西，投考阎锡山在太原开办的学兵团。当他到学兵团应试时，学兵团招生名额已满，且人家看他个头小，身体瘦弱，不愿意录取。这位满怀壮志的热血青年并不气馁，在太原设法找了些



谢子长

有名人士，多方说情，终被学兵团录取。在学兵团里，出乎主事人所料，这位其貌不扬的青年聪明好学，专心致志，各门功课都学得非常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1924年，谢子长从山西太原返回安定县。他回到县里，一心要在安定县办民团，以维持一方治安。他的父亲谢彪鹏是个开明人士，在县城颇有些影响，听说儿子要办民团，极力赞成，并动员县里的绅士、地主出钱出枪，支持筹办民团。

那时候，全国地方军阀各自抢占地盘，为扩张自己的势力，连年混战

不断，到处兵荒马乱，绅土地主们常常遭到兵匪骚扰。他们一听说上过洋学堂、见过大世面的谢子长要出头办民团，都满心欢喜，积极出钱、出枪、出物，县里很快就办起了有 40 多支枪的民团。民团一经成立，众绅土地主就给县长保荐，推举谢子长担任了县民团的团总。

1925 年夏，谢子长赴京津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这一年，正值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蓬勃的反帝高潮，京津两地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

谢子长到北京后，先住陕西会馆，后迁住三眼井公寓，在这里有幸结识了一批陕籍旅京上学的共产党员和共进社成员，特别是与陕北同乡白超然、白志诚关系甚密，并结识了当时的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刘伯坚等负责同志。在这些同志的影响下，谢子长在北京精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书籍和阅读陕西旅京学生创办的《共进》等进步书刊，对中国的政治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认定政治问题是改造社会的先决问题，积极要求进步，参加了共进社，并由白超然、白志诚介绍在北京加入共产党。

1925 年底，谢子长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回到陕北。他到绥德县与中共绥德特支接上关系，接受李子洲指示返回安定县。李子洲交给谢子长的任务主要是利用其团总之职，在民团积极发展共产党员，把这支地方武装掌握到共产党的手里，并协同李象九在安定县石谦团的驻军中开展兵运工作。谢子长、李象九在安定县，一个是民团的团总，一个是县警的警佐，两人拧成一股绳，有事就商量，在县里很有威力。他俩说什么，当时的县长王廷楠也不敢反驳，只得顺从。

在民团组建初期，有好些青年农民前来报名当团丁，不少人的朴素想法就是当兵扛枪为吃粮。谢子长为改变旧军队士兵的这种雇佣思想意识，除对民团进行步兵操典训练外，还经常给团丁们讲地主剥削农民、资本家压榨工人的现状，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激发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使民团里的一大批兵丁走上革命的道路，如雷恩钧、贾信之等不少普通的青年农民很快加入了共产党。

在民团，谢子长办事公道，铁面无私，原则性很强。有一次，谢子长

家乡的一个老乡从家里拿些大烟土要带进城时，被城门上站岗的团丁检查出来，责令不准带进城内。此人谎称：“这是谢团总的父亲让我带给别人的。”

团丁给谢子长报告后，谢子长道：“我父亲托人带的也不行！就是我父亲亲自往城里带也不行！公事要公办，决不可因私废法。”

安定县西区有个绅士的儿子任区团总，对老百姓非常凶残，无恶不作，群众对他气愤在心，但奈何不得。谢子长听得群众反映，将这个区团总抓来，杖打教训一顿，直到其告饶找保才释放。谢子长为老百姓出了气，群众拍手欢迎，坚决拥护支持他。绅土地主心里却既害怕又恼火，从原来积极地支持谢子长变为千方百计地对他刁难，竟连县衙里也不好好给民团拨经费了。这样一来，谢子长所办县民团的伙食、经费发生了困难，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为坚持把民团办下去，民团里没有了粮食，谢子长就派人赶牲口到他的家里去驮；没钱花时，就派人到他家在县城内开的一个杂货铺里去取。在谢子长的影响下，谢子长的家里人也对穷人济粮济钱，广行善事。

有一次，县衙逼着县里群众交纳苛捐杂税，谢子长却暗中组织发动各乡群众抗着不交。县长王廷楠没办法，就叫谢子长带着民团到四乡去催收钱款。谢子长公开违命，对着王廷楠说道：“群众没有钱，我没办法收来款。你看不行，就先把把我关押起来。”

县长王廷楠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把谢子长押到班房里关了几天。群众闻知谢子长为民获罪受罚一事后，都非常感激。

## 归编石谦团

1926年春，中共绥德特支根据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指示李象九辞去安定县警佐的职务，利用与石谦的关系，重返石谦团开展兵运工作。李象九辞去安定县警佐职务，返回石谦团，由石谦委任为第一营第三连连长。石谦视李象九为心腹知己，经常与李象九一起商量计议有关军情大事等。不久，石谦团部从安定县瓦窑堡移驻到宜川县，李象九三连继续留驻瓦窑堡。

在旧军阀的队伍里，空吃军饷无兵丁的事屡见不鲜。李象九到石谦部第三连当了连长后，该连号称为一个连，其实兵员严重不足，只有几十个士兵。为使连队士兵得到扩充，李象九与谢子长积极商量扩军事宜。

这时，谢子长的县民团已有五六十人的武装。他决定先从自己掌握的民团里拨出一个班的团丁，充实到李象九的连队里。谢子长挑选民团里共产党员、团员最多的一个班，由共产党员雷恩钧为班长，带白雪山、白齐林、郝怀仁、南风池等十余人编入李象九连队。同时，谢子长、李象九两人商议，决定到各县再招募一批青年农民，充实到李象九的连队里。

石谦得知谢子长从自己办的民团拨出一班人马扩充到李象九连队一事，对谢子长之举甚为感激。他特地从宜川骑马赶来安定县，准备以重金酬谢。

石谦秉性豪爽，为人侠义，是老同盟会成员，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甚为拥护。他跟随井岳秀出生入死十多年，深得井岳秀的赏识和器重。他虽说是当个团长，属驻守肤施的高双城旅所辖，但根本就瞧不起高双城。用他的话来说，高双城这个人“胆小如鼠，用兵无能”。因此，石谦与高双城之间素有隔阂，经常发生摩擦。

听说石谦要亲自到安定县重酬谢子长，李象九和谢子长一致认为，石谦思想倾向革命，在石谦团开展兵运，扩大共产党组织的力量，拉起革命的武装，有诸多有利条件，决定乘石谦来安定县之机，把安定县的民团全部归编到石谦团，以逐步赤化和影响整个部队。这一计划得到中共绥德特支的批准。

石谦欣然接收了谢子长的县民团，并将安定县民团改编为第一营第十二连，委任谢子长为连长，并命李象九第三连和谢子长第十二连一同驻守安定县。

## **第一个中共军特支**

在石谦团中，由李象九、谢子长掌握了两个连队后，中共绥德特支非常重视。为加强这两个连队共产党的力量，迅速扩充兵员，绥德特支派出呼延震东的胞弟呼延震西到石谦团，协助李象九、谢子长两个连队招募兵

丁。呼延震西一到石谦团，与雷恩钧先后到安定、清涧县一带招募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愿望的贫苦青年农民，充实到李象九、谢子长的两个连队。白锡龄、阎红彦、惠世良(又名马三)等就是在这次招募新兵时加入李象九连队的。

白锡龄，陕西清涧县东区白家川人，生于1908年。从12岁开始就给地主当放羊娃，长到17岁，因家里穷得难以生活下去，就四处流浪，以卖苦力糊口。一日，白锡龄讨饭流浪到距清涧县城15里地的小岔则村，听说县城设了募兵站，就联络该村青年农民惠世良，一起跑到县城里报名当了兵。这次，呼延震西和雷恩钧在清涧一个县就招募到新兵30余人。在县城内的文庙大院给新兵包场看了两天大戏，随即带到安定县，全部编入李象九的第三连。

阎红彦，陕西安定县瓦窑堡人，生于1909年。11岁时父亲送他到米粮山一所私塾读书，不到一年即因家庭经济困窘辍学，12岁始给地主放羊、带小孩、做杂活，后流浪绥德、神府一带靠打工糊口。在瓦窑堡到李象九连队报名参军时，他年仅15岁。当时，李象九招兵的条件和其他旧军队迥然不同，要求年龄在18岁左右，社会经历纯洁，五官端正，体魄健壮，具有一定文化水平。阎红彦虽然年龄小，只读了半年书，不符合招兵的条件，但因身躯高大结实，精力旺盛，要求入伍迫切，募兵站就破格录取了他。开始，阎红彦当司号兵，不久调到连部给李象九当了随从护兵。他入伍时，对革命道理并不懂什么，但经几个月的军队学习生活，在李象九、谢子长的影响下，第一次知道了中国有个共产党，懂得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就是要组织领导中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官僚、地主，推翻整个旧社会，让穷人翻身做主人。

当时，阎红彦在李象九连队中年纪最小，但由于性格耿直，工作尽心竭力，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改造社会的愿望，李象九非常喜欢他。不久，即由李象九介绍，与白锡龄、惠世良等先后加入了共产党。

同时，中共绥德特支通过李子洲、呼延震东分别在绥德四师、延安中学两所学校挑选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先后派遣到石谦团里去当兵，大多编入李象九连队，使李象九第三连的学生成分增多。

与此同时，呼延震西又向李象九举荐榆林中学毕业的学生共产党员史唯然到第三连当文化教员。士兵们读书识字，出操训练，学习文化的氛围很浓，多数士兵都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因此，当时人们把李象九的第三连称为“学生连”。中共绥德特支先后又派出一大批共产党员、团员到石谦团，加强了第三连和第十二连中的革命成分。史唯然到李象九连后，在石谦团很快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由史唯然任支部书记。

1926年夏，中共北方区委派耿炳光到陕北，将中共绥德特支党团组织分开，在原中共绥德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绥德地委。中共绥德地委一经成立，即派出绥德四师年轻教员、共产党员李瑞阳到石谦团，协助李象九、谢子长在军内开展兵运，并根据中共北方区委指示，将原党支部改建为中共军事特别支部(简称军特支)。

李瑞阳，陕西三原县人。当李子洲在北大学习期间，李瑞阳正在北京第四中学上学。这个时期李瑞阳经常去吉安所左巷6号，与寓居的陕籍旅京学生杨晓初、杨钟健、李子洲、刘天章、王君毅等相聚一起，并在这些陕籍旅京学生的影响下，参加了共进社。李瑞阳从北京第四中学毕业后，因父亲有重病，从北京回到三原，一直闲住家中。李子洲在绥德四师出任校长后，了解到李瑞阳虽年纪轻，但多才多艺，便写信约他来绥德四师执教。李瑞阳到绥德四师后，工作积极热心，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又加入共产党。李瑞阳能写会画，擅长文艺，是个十分活泼的青年教员。当时，在学校里许多学生与他年龄接近，都愿意和他相处。所以，李子洲认为在石谦团开展兵运，活跃士兵生活，李瑞阳是个很合适的人选。

在李瑞阳将要离开绥德四师前往石谦团时，李子洲握着他的手叮嘱道：“瑞阳，此番到石谦团，一定要协助李象九和谢子长把军队抓过来，使其成为党的武装。李大钊同志指示我们，军队中党的工作要从中下层做起。发展党团组织，尤其要注意那些年轻的班排长和士兵。咱们山区，不穷不会当兵，当兵也只懂能混饭吃而已。这些青年人思想比较单纯，容易觉悟过来。此外，还要处处注意群众关系，使军队和群众的关系融洽起来。要把以往军队欺侮群众、群众痛恨军队这个恶习从我们手里改一改。目前在中国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到革命。”

李子洲的这番话使李瑞阳很受启发。李瑞阳以前既不曾在军队里干过事，又未与军人打过交道，但他按照李子洲的指示，到了石谦团干得很顺利。

李瑞阳到石谦团后，在李象九、谢子长的密切配合下，与史唯然等积极开展兵运工作，使共产党员、团员在军队中逐步增多，很快发展到 30 多人。中共军特支建立后，直接隶属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与中共绥德地委发生横向联系。

军特支随李象九第三连、谢子长第十二连的驻防设在瓦窑堡，书记先后由史唯然、杜衡、李瑞阳、白明善等担任。

## 第十章

# 西安解围

### 驱逐刘镇华

1926年6月，由于刘镇华所率镇嵩军再度入陕，西安城受困，陕西国民军奋起反抗，关中道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保持中立的陕北军阀井岳秀只命驻守肤施的高双城旅派出石谦团少量军队，南下配合陕西国民军作战。当时，石谦团的各连分散在安定、延长、宜川县等地，受命后很快集结到宜川县挺军南下。

石谦团的军队作战非常勇敢，部队先开到澄县，立即将镇嵩军驻守在澄县县城的姜青海部队包围起来。刘镇华为解澄县之围，命段茂功率部队北上，火速前来增援。段茂功的部队未达澄城，半途又遭石谦团设伏阻击。经一场激战石谦团将段茂功的部队打得溃不成军。在段茂功部有个营长叫康子祥，带全营200多人投降。石谦将康子祥所部改编为第二营，仍任康子祥为营长。



冯玉祥

9月，从苏联考察归国的冯玉祥同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刘伯坚等一行由库伦抵达绥远五原。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从前线倒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政权，邀孙中山北上共商主持大计。孙中山在京不幸病逝后，冯玉祥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感到茫然。1925年春，冯玉祥被新的北京军阀政府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所部改编，暂称西北陆军。1926年，冯玉祥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赴苏联考察，途中加入国民党。

6月间，冯玉祥从莫斯科派刘骥和李鸣钟提前回国，与广东国民政府取得联系，决定归国重振旗鼓，准备从北方地区组织国民军，协助广州革命军北伐。

9月间，冯玉祥到绥远五原时，旧部西北陆军已由南口退至平地泉以西，部队损失惨重。冯玉祥与于右任、孙岳、方振武、石敬亭、史可轩等共商组织国民军联军，被公推为总司令。在五原，国民军联军从5万人树帜，很快扩大到25万之众。

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举行就职誓师典礼，宣布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并宣布全体官兵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同时，冯玉祥接受中共



刘伯坚

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的建议，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作战计划，任命孙良诚为援陕军总指挥兼第三路军司令，方振武为援陕军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弓富魁、马鸿逵、石友三、韩复榘为第二、四、五、六路军司令，向陕西进军，南下解西安之围，对镇嵩军刘镇华发起进攻。中共派出王若飞、刘伯坚、邓希贤(邓小平)等170余名共产党员及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夫林随冯玉祥南下。

国民军联军途经榆林、绥德时，中共北方区委派入国民军联军的史可轩正在帮助冯玉祥的军队创办军事政治学校。经史可轩、钱清泉、陈家珍、王圭三等随军共产党人提议，中共绥德地委选派马明方、武丕谟、邓重庆、安子文、李林民、张慕时、马承琪、常宣、崔仲英、张志文、李秉荣等共产

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冯玉祥部做军事政治工作。

史可轩，陕西兴平县人，生于 1890 年。早年投太原新军。1908 年加入同盟会，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1909 年出狱后入太原陆军学校学习。辛亥革命爆发后，先在晋南革命军第一混成旅任团长，后又投陕西革命军陈树藩部。1913 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加入孙中山在日本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后奉命回国，到山西策划反对袁世凯的活动，遭阎锡山的通缉。1918 年陕西靖国军成立，先后任总指挥部副官长、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混成旅副官长兼骑兵营长。1924 年 10 月，参与了



史可轩

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后任郑州警备司令。1926 年，与冯玉祥一同前往苏联考察，途经上海时由王若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冯玉祥率国民军联军向关中道运动之时，广东国民政府已出师北伐，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和孙传芳。北伐军经岳州、羊楼司和汀泗桥激战，势如破竹，驱军占领了武汉。

刘志丹从黄埔军校毕业，即随北伐军北伐。当冯玉祥五原誓师援陕后，刘志丹与白明善、唐澍一同被调往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工作。白明善、刘志丹、唐澍等到绥远追赶国民军联军时，冯玉祥已带大部队取道宁夏、甘肃、陕北开往西安前线，与包围西安的刘镇华作战去了。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留白明善、唐澍协助工作，派刘志丹随军南下西安。刘志丹随军赶到三原，见到魏野畴。魏野畴根据总政治部的指示，派刘志丹到马鸿逵的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司令部当政治处长。

马鸿逵，字少云，8 岁由其父马福祥带着到西安行营中晋谒过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12 岁时其父用 1500 两纹银为他捐得一“蓝翎知县”的虚缺。早年参加同盟会。1919 年，在其父手下当营长，后升任宁夏亲军统领，并



马鸿逵

当过袁世凯、黎元洪的侍从武官。1924年，在吴佩孚部任骑兵总指挥。

在冯玉祥五原誓师后，驻在宁夏一带的马鸿逵见吴佩孚大势已去，摇身一变，宣布倒戈，投了冯玉祥。马鸿逵老奸巨猾，害怕与刘镇华交锋，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愿损兵折将，率军队从宁夏向西安进军途中一直拖拖拉拉走得很慢。

刘志丹前往第四路军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动和催促马鸿逵的军队快速南下。刘志丹骑快马赶到宁夏，马鸿逵的军队已入甘肃；刘志丹又直奔甘肃固原县，才追赶上马鸿逵的军队。马鸿逵走走停停，军队一到咸阳就按兵不动了。这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乔国祯、李维屏、李秀实、鲁振之、李波涛、杜松寿、冯文江、霍世杰等返回陕西。因西安被刘镇华的镇嵩军包围，他们一到陕西，即分散到处于战乱中的关中道各县，以在农村办平民夜校等形式秘密开展农民运动，很快使关中道各县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如华县一带的农民从镇嵩军手中夺得了大批枪支弹药，组织起数千人的农民武装；渭南固市一带的农民武装不断袭击驻地镇嵩军，合阳、韩城、同官（今铜川）县等地农民不断截击出扰镇嵩军，使其疲于奔命，军粮匮乏；蓝田县的农民缴获了镇嵩军一个营的武器，一度控制了蓝田县城；户县农民将吴新田部包围了三天；周至县的农民在同吴新田的斗争中付出巨大的牺牲……这些农民运动积极地配合了冯玉祥国民军联军解西安之围的军事行动。

在国民军联军大举进兵关中道时，石谦的军队打入关中腹地，与冯玉祥部一起参与了驱击刘镇华的大会战。石谦部经渭南，过茂陵，一直打到岐山、凤翔县一带，又折回打到耀县。镇嵩军麻老九的军队遭到各路国民军联军的打击，成了惊弓之鸟，到处逃窜。在凤翔县一带，麻老九先被侯章保吃掉一部分人马，后又与石谦军队交战，一战打得麻老九落花流水。麻老九部有个连长叫雷进财，一见麻老九大势已去，带着自己的一连队伍，

向石谦团投降。

11月，经过全陕人民和国民军联军的英勇奋战，西安被刘镇华围困八月之久的危局，终于得以破解，并给予镇嵩军以致命的打击。国民军联军入陕和西安解围，不仅从战略上配合了北伐军的向北进军，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全陕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后刘镇华的镇嵩军和吴新田所部相继接受冯玉祥的收编。刘镇华的镇嵩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任刘镇华为总指挥；吴新田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路军，任吴新田为总司令。

## 石谦访绥师

关中道战事一结束，石谦团凯旋，返回陕北。井岳秀将石谦团的一个营调往神府(神木、府谷)一带驻防，谢子长第十二连随营迁防。在此期间，谢子长受石谦团中共军特支派遣，从神府东渡黄河到北京，向中共北方区委汇报了中共军特支在石谦团的活动情况，并对今后如何开展工作进行了请示。

当谢子长从北京一回到神府，连里的士兵即向谢子长反映：营里扣发了连队士兵的兵饷。谢子长听后十分生气，随即到营部质问原委。

营长姓崔，是个旧军官，当时在旧军队里军官扣发属下士兵兵饷是常有的事情。崔营长根本没把谢子长的话听进耳朵里，两人在营部就大吵起来。谢子长对崔营长擅自扣发士兵兵饷、贪污舞弊的行为愤慨至极，当面痛责崔营长后离开营部回到连队。

崔营长身为一营之长，遭到谢子长的一番斥责，大失体面，越想越不甘心，便带着几个随身护兵，气势汹汹地朝谢子长的连队赶来，扬言要枪毙谢子长。谢子长也不示弱，立即命令全连士兵荷枪实弹，并在连部大门口把枪架成一排，声称只要崔营长和几个护兵敢靠近连部大门口一步，就要开枪一个个撂倒。

崔营长原以为这么一诈唬，谢子长给赔个不是，自己也好收场，没料到谢子长是条硬汉子，也不是好惹的，真的要与自己发生火并，吓得带着几个护兵灰溜溜地跑回营部。谢子长把崔营长扣发士兵兵饷的贪污舞弊行

为反映到团部，石谦闻知大怒，立即将崔营长的职务撤掉。

这时，石谦团因南下与镇嵩军刘镇华作战打了胜仗，兵员得到扩充，部队得到扩编，谢子长第十二连及营部所属其他连队迁防到宜川县。井岳秀将高双城旅扩编为第二师，石谦团扩编成第十一旅，石谦升任旅长。效仿冯玉祥国民军联军的建制旅下不设团，只下辖三个营，李象九连扩编为第十一旅第一营，李象九升任为营长，康子祥为第二营营长，齐梅卿为第三营营长。李象九第一营奉命与康子祥第二营同驻防宜川。谢子长第十二连和种宝卿的骑兵队同驻防安定。

石谦升任旅长后，象取与石谦的密切合作对中共来说更显得重要。中共绥德地委先后派出绥德四师杨明轩等共产党员积极联合石谦，并经常到石谦旅部的驻地给士兵举办文化学习班，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

同时，绥德地委决定由李子洲以学界名义邀请石谦到绥德四师做客，以密切军队与学界的关系。李子洲通过李象九给石谦递送了请帖。石谦接后，也很乐意与李子洲交朋友，高兴地答应了。此时，正值石谦有军务之事要去榆林，他决定借此北上之行应邀到绥德四师拜会李子洲。

石谦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一队护卫兵，从宜川旅部动身，经延川、清涧，赶到绥德城外时，李子洲、蔡南轩、田伯荫等带领绥德四师全体师生，还有一班秧歌队，敲锣打鼓早在城东门外等候。石谦虽为一介武夫，但他非常珍视做人的义气。他对李子洲这位陕北赫赫有名的学者和共产党的领导者早有敬意，尤其是李子洲多次选送学校的优秀青年到其部队，不但提高了部队文化素质，而且多成为班排骨干分子，石谦深为感激。

石谦临行前曾向熟悉李子洲的李象九、李瑞阳等人多方了解过有关李子洲的情况，此时一见李子洲，即从鞍上跳下，不顾腿疾，拄杖徒步前行。在一片锣鼓声和欢迎的口号声中，李子洲等簇拥着石谦走进绥德四师校园。

当晚，全体师生为石谦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由石谦给师生们讲了话。师生为石谦表演了文艺节目，以盛情款待。次日，李子洲、蔡南轩、田伯荫等陪石谦参观了校园，走访了许多学生。

在绥德四师，李子洲和石谦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从教育谈到政治，从时局谈到军事，从全国谈到陕西，李子洲的渊博学识、精辟见解，使石谦

惊叹不止。石谦原以为李子洲只在教育方面造诣不浅，没想到他视野开阔、谋略过人，只恨相识太晚。听了李子洲深入浅出的论说，石谦对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重要历史使命和任务更明确了。石谦表示，在国难当头之时，一定奉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欢迎共产党方面派出更多的有文化和军事知识的人才到自己的部队中来。

石谦在绥德四师做客几日，即北上榆林。在离开绥德四师之时，石谦向李子洲提出一个私人请求，说自己有个独生子叫石介，在关中刚念完高小，想来绥德四师读书。李子洲满口答应。不久，石谦将石介送来绥德四师就读。此后，石介受绥德四师革命思想的影响，很快加入共产党。

1926年11月下旬，李子洲应石谦之邀到宜川部队驻地给士兵举办了一期文化学习班。回校即接到交通员送来中共北方区委的通知，委派他速去西安负责筹备成立中共陕甘区委的工作。

离开绥德四师前，为加强陕北党组织在石谦部的工作，李子洲又派出杜衡、冯景翼等到石谦部；同时对中共绥德地委工作做了安排。李子洲离开绥德后，常汉三继任绥德四师校长。

在李子洲启程南下西安这一天，绥德四师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杨明轩、田伯荫、蔡南轩、韩述勋、常汉三、王兆卿、白如冰、朱侠夫、李景林、张达志、贺晋年、高光祖、贾拓夫、常黎夫等教员和学生与李子洲握手挥泪告别。

## **中共陕甘区委成立**

李子洲赶到西安之时，正值西安解围不久。历经八个月的血战冲突，古城西安百废待兴。

这时的关中地区，中共组织的力量还很薄弱，又经这次围城，西安和周边数县党的地方组织，有的失去联系，有的陷入瘫痪状态。为了尽快加强这些地区中共组织的领导，以适应蓬勃兴起的革命形势需要，李子洲一到西安，即与魏野畴、黄平万、吴化之等组成中共党团联席会议，以此作为党的临时领导机关，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迅速在西安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联席会议的领导机关设在报恩寺的一个院落。报恩寺成了党组织领导机关的重要据点，也是培养军事、农运干部的教导队驻地。



于右任

这个时候，杨虎城已只身离开西安，到三原县城附近友人家里避居，以此表示向西安军民引咎，自责未能及时挽回西安的局势，不打算再干了，将西安的事情交给了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

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接收西安后，从表面看，西安城内照样是轰轰烈烈，过去的皇城变成了“红城”，戴着红帽箍的警察天天督促市民清理垃圾，钟楼上高挂着“十月革命胜利万岁”“国民革命胜利万岁”的长联；那些国民军联军的女兵们一律灰色军服、短发，肩扛一枪一镢，随时随地填垫战壕，还原市容，都把脸蛋晒得黑里透红；甚至连冯玉祥也身穿军服，扛着大铁镢走上街头，参加到城内拆堡修路的行动中。其实，西安许多善后事宜非杨虎城协助处理不可。

冯玉祥、于右任再三派人到三原，敦劝杨虎城回西安，就任国民军联军第十路军司令，但杨虎城坚不从命，不肯上任。李子洲得知此事，即配合国民军联军总部，派出史可轩带着一封亲笔信前往三原县。杨虎城见到史可轩，看了李子洲信中的陈述，终于被说服回到西安。

杨虎城回到西安，立即动员全城军民，将围城中死难者的遗骨 27413 具集中运到红城东北处，择地掩埋，筑成“负土墓”，由冯玉祥亲书“革命公园”题匾，并隆重举行大祭。杨虎城送上“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的挽联。

1926 年 12 月至 1927 年 1 月，在李子洲、赵葆华、刘含初、魏野畴等共产党人的协助下，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驻陕总司令部发布命令，宣布废止陕西督办、省长制，取消陕西省议会，由驻陕总司令部统管陕西党政军大权。驻陕总司令部由于右任、邓宝珊分任总司令、副

总司令，魏野畴任政治部副部长，史可轩任政治保卫部部长，并任命杨明轩为教育厅厅长，有 100 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各部厅担任工作。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所设的卫队约 1000 人，队长叫姚丹峰。下辖三个营，邓重庆为第一营政治指导员；马明方为第二营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该营营长叫任耕三，是一个有着强烈革命愿望的非党人士；武丕谟为第三营政治指导员。



西安革命公园

1927 年 1 月 20 日至 25 日，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会在西安举行，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改为正式省党部，选举邓宝珊、甄寿山、史可轩、黄平万、张性初、张含辉、刘含初、李子洲、吴碧云、魏野畴、杨明轩、王授金、赵葆华为执行委员，徐九龄、王尚德、呼延震东、陈俞廷、马云程等 9 人为候补执行委员；选举冯玉祥、于右任、杨虎城、雷晋笙、惠又光、薛笃弼、刘天章为监察委员，井岳秀、常汉三等 5 人为候补监察委员。在这次会议上，陕北的榆林、绥德、葭县、

清涧四县选出的代表就有 18 人，有郭怀章、吴碧云、张永耀、刘景象、王鼎臣、李含芳、白士侗、安志潮、康俊阁、李子洲、刘维东、罗百福、武丕谟、高能孝、高在位、惠又光、邓重庆、白诚斋。一些共产党员担任了重要部门的领导职务，如李子洲当选为青年部长，魏野畴当选为宣传部

长，吴碧云当选为妇女部长等。

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任命井岳秀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九路军总司令，井岳秀的军队被编为第九路军，仍驻陕北地区。同时，任命韩兆鹗为绥德县长，张益为清涧县长，梁海峰为米脂县长，王卓儒为榆林县长，田芝芳为吴堡县长，张风梧为安定县长，郭长城为定边县长。在陕北23县中，17个县的县长由新政权委任。

2月中旬，李子洲、刘含初等按照中共北方区委的批示，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名义创办了陕西《国民日报》，并以国民党西北政治分会的名义，在西安成立了中山学院筹备处。中山学院筹备处设在原西北大学，除在西北大学吸收了一部分比较进步的青年学生继续到中山学院学习外，筹备处还发出了启事和招生广告，由陕甘各地方党组织选送来许多共产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

不久，中山学院正式成立，刘含初任院长，李子洲任副院长。院部下设五个班，即农民运动、军事训练、组党、妇女运动、教育人员。其中农民运动班人数最多，约200人。中山学院是为党和革命培养干部的学校，学员们除学习学校开办的课程外，每天还进行军事训练，一律过军事化生活。中山学院结合课外教学，邀请共产党的干部和知名人士刘伯坚、邓希贤、杨明轩等人及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和赛夫林等人来校作专题报告，以开阔学员的眼界。

同时，共产党人以国民党省党部和驻陕总司令部的名义，在西安创立了一所中山军事学校，培养政治军事干部。当时，中山军事学校的领导都是共产党员，校长由史可轩兼任，副校长李林，政治部主任邓希贤，总队长由许权中兼任，刘志丹任政治教官。全校编有三个大队，学员有700多人，大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中的进步知识青年。学校课程设置军事与战术、军事理论、野外作业、中国革命史、形势政治教育、政治经济学等。这所军事学校为中国革命培养出一大批革命干部，一时被誉为西北的“黄埔军校”。

2月25日，根据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在1926年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为统一西北地区党的组织，在西安桃胡巷由耿炳光、李子洲、曹

趾仁、黄平万、吴化之、赵葆华等 10 人参加，正式成立了中共陕甘区委，耿炳光任书记，李子洲负责组织，魏野畴负责宣传，并召开了中共陕甘区委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陕西党组织的工作任务，并决定召开一次较大范围的区委代表会。

3 月 14 日，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东大街中山学院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到会代表有耿炳光、李子洲、魏野畴、阎揆要等 11 人，代表着陕甘地区 9 处中共地方组织和 388 名党员。这次代表会正式选举耿炳光为书记，魏野畴负责宣传，李子洲负责组织，亢维恪为农委书记，陈家珍为军委书记，后又增补刘天章、杜衡为区委候补委员。经过代表们讨论，决定了“工作集中”“人才集中”的工作原则，把中共陕西组织的力量先集中在东至潼关、西至长武及渭河南北这一区域内，然后扩大到其他地区，再由陕西渐及甘肃等地；陕北仍集中于绥德，渐及榆林、延安。在组织工作方面，要大力发展农村共产党员，开展农民运动，并提出了“党到农村去”的口号。

同月，西安全市举行西安解围庆祝活动，全省各地派出代表参加。杜斌丞作为陕北各界人士的代表，赴西安参加解围庆祝活动。中共绥德地委及团组织选派各县的共产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学生 78 人，随杜斌丞一同来西安。经杜斌丞的介绍，马子敬、杨岐山等 62 名青年进入中山军事学校学习，高岗、艾楚南等 16 名青年进入中山学院学习，后高岗又转入中山军事学校学习。

在中山军事学校的开学典礼大会上，应邀参加大会的杜斌丞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鼓励青年学生：“青春不再，乘此良机，在目前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努力锻炼自己。无论在怎样的艰难困苦中，怎样激烈的斗争环境中，都应该与之相适应，……这样才能为国为民多贡献力量。”

刘志丹见到杜斌丞老师非常高兴，详谈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情况。杜斌丞高兴地说，能看到自己的学生为革命为人民出力贡献，当老师的就感到无上的光荣，勉励刘志丹坚持革命，奋勇前进。

参加活动期间，杜斌丞拜访了苏联军事顾问，会见了乌斯曼诺夫、赛夫林等。苏联军事顾问见杜斌丞高大魁梧，留着两撇向上翘的胡子，外表颇像苏联骑兵名将布琼尼，都感到惊奇，一个个同他热情握手问好，有人

情不自禁地用俄语惊呼：“布琼尼!布琼尼!”

6月1日至8日，西安举行了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这时，陕北的绥德、神木、葭县、清涧、安定、横山等县在中共绥德、榆林地委的领导下均成立了总农会，所辖广大农村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仅绥德一个县就有鱼德明、徐雪尘、丁锦业、叶福云、李仰旭等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在会上，陕北籍的李波涛当选为省农协会执行委员，霍世杰、李仰旭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大会通过了全省农民反帝、反封建、反对新军阀的各项议案。

## 第十一章

# 解散“红枪会”

### 榆林中学罢课风潮



榆林城内万佛楼

1926年秋，正当全陕军民与刘镇华的镇嵩军在关中道大战之际，镇守陕北的井岳秀因保持中立，只派出肤施高双城旅石谦团少数军队南下，配

合杨虎城国民军参战，大部分军队仍然屯集陕北不动，静观关中道战局的变化，以不变应万变，准备谁胜举谁的旗，谁败合而攻之。他闲心一派，在榆林城内万佛楼前雇人搭起戏台子，说要看大戏寻找兴致。

万佛楼前的戏台子搭好后，井岳秀带着自己最宠爱的几个姨太太，乘着红顶大轿落在戏台前。早已搬来的几把高椅放在最前排，等着“井大人”和姨太太们入座开戏。

井岳秀的儿子井文龙，是榆林中学学生，长得一只眼大一只眼小，人称“独眼龙”。在戏台的开台锣鼓声中，井文龙也在几个护兵的簇拥下款步而来，神气十足地坐在最前排。

榆林中学放假一天，让全校学生赶到万佛楼前看大戏。因前来看戏的市民很多，人群拥挤，有个葭县籍的榆林中学学生叫苗存权，从井岳秀的几个姨太太和井文龙坐着的前排走过。几个姨太太立刻大发脾气，说苗存权影响了她们的视线，开口辱骂。苗存权争辩了几句，坐在一旁的井文龙不但不予劝解，反而指使几个随从护兵大打出手。当着闹市戏场，在众目睽睽之下，几个护兵举起椅凳，朝着苗存权的头上乱砸，顿时把苗存权打得满头鲜血直淌。

苗存权被殴打的事情发生后，榆林中学学生群情激愤，立即组织起来，聚集到榆林中武开章学代理校长高崇的门前，要求严肃处理在该校上学的井文龙。榆林中学中共支部因势利导，由学生会出面在学校大礼堂召集全校同学举行大会，声讨井文龙仗势欺人、指使护兵殴打学生的暴行，要求校方严肃处理井文龙。

在大会上，由武开章宣读了《告同学书》，宣布全校学生罢课，并向榆林当局和校方提出三条要求：①要求学校开除井文龙的学籍；②要求榆林县当局严惩打人凶手；③要求井文龙和打人凶手向被打学生公开赔情道歉。

同时，榆林中学党组织将《告同学书》印发到绥德四师、延安中学及陕北、西安等地。

高崇为讨好井岳秀，先采取压制手段。他到镇守使衙门向井岳秀要来一个连，由一个副官带队把榆林中学包围起来，声称学生必须马上复课，不然就把学校停办。

不料更加激起了学生的怒火，事情越闹越大，全校学生罢课持续 30 余天，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社会各界纷纷支持榆林中学学生的正义行动。在学校罢课期间，学生李力果等发动全体同学向社会各界和家长写信，揭露此次事件的真相和井岳秀的行径。一时间，陕北 23 县的学生家长有的写信劝井岳秀三思而行，有的托社会关系劝井岳秀慎重妥善处理，还有的干脆从数百里之外赶来榆林，声言大兵敢动其儿子一根汗毛，就要跟学校领导拼老命。

井岳秀自感无颜面对社会各界的哗然舆论，无奈之下派出榆林县长王卓儒来榆林中学和学生会谈判，表面答应学生的要求，但实际上不承允许诺。榆林中学学生便集体搬出学校，借住市民家和旅店里坚持斗争，并宣称榆林县当局和校方不承允学生的要求决不返校复课。

这时，杜斌丞正好回到榆林。井岳秀急忙恢复了杜斌丞的校长职务，要杜斌丞平息榆林中学这场学潮。经杜斌丞多方周旋，迫使井岳秀答应了榆林中学学生提出的全部条件。井岳秀派出所部旅长刘润民前来榆林中学，宣布井文龙从此离开学校；向被打学生苗存权赔礼道歉，并答应惩办打人凶手。同学们才返回学校，停止了罢课。

在这次学潮中，考入榆林中学的高岗对苗存权被打一事打抱不平，发泄心中愤怒，借故将井文龙殴打一顿。井岳秀虽传出话称“有个高岗敢打我儿子，是个有出息的学生”，其实恨之入骨。榆林中学党组织担心高岗会遭到井岳秀的报复，劝高岗辍学，高岗遂离开榆林中学（一说被校方开除学籍）。这次学潮，矛头直指陕北军阀井岳秀，大长了榆林中学所有共产党员、团员和进步学生的革命斗志，大灭了井岳秀及其反动当局的威风。

## **李瑞阳怒饬军纪**

1927 年 2 月，石谦带骑兵警卫队回白水县老家探亲。蒲城县的驻军头目程百川随即到石家登门“拜访”，说石谦平素重视练兵习武，邀其警卫队到蒲城县城合操表演。当石谦按约定日期率警卫队前往时，途中接到同乡王安吉的密信，告知程百川图谋不轨，可能有加害他的阴谋。石谦得到消息后，假装不知其情，继续向蒲城赶去。

石谦率警卫队一到蒲城县城外，程百川摆出迎接贵宾的热烈场面，将石谦迎进城内，安排在自己公馆里。石谦和警卫队刚一落脚，就被程百川的驻军团团包围。因石谦早有防范，警卫队立刻拉开了阵势。双方对峙，剑拔弩张。程百川见势不妙，急忙解释是误会。石谦说：“明日，我先去看望好友杨虎城的老母亲，等我回来再操演。”

第二天，程百川在石谦去杨虎城老家的途中又设了埋伏。此招早在意料之中，石谦在黎明前迅速集合所带部队，出其不意地改道出北门，返回老家白水。

这年夏，井岳秀在陕北的国民军联军第九路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九军，石谦第十一旅随之新编为第二集团军第九军第二师第六旅。第六旅仍下辖三个营，李象九为第一营营长，康子祥为第二营营长，齐梅卿为第三营营长。石谦旅的旅部设在宜川城内，李象九第一营随旅部同驻宜川县，营部设在集义镇。中共军特支负责人李瑞阳随李象九营部，公开身份是营部文化教员。李瑞阳在部队教士兵学文化、办小报，与士兵们相处融洽，他走到哪里，身边总围着一群士兵，听他讲述革命道理、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集义镇，李象九经常带着李瑞阳到石谦旅部走动，让李瑞阳给石谦讲一些新思想和革命道理。石谦不识几个字，但在李子洲、李象九、谢子长和李瑞阳的影响下，很快成了井岳秀军队中有激进思想的军官（一说石谦加入共产党）。

当时，石谦知道共产党在自己的部队里活动，从来不问，他认为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其他部队里也有同样的活动，这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有一次，石谦给士兵们训话，公开倡导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他说：“我赞同革命，我们都要革命，谁不革命，就是狗娘养的！井大人哄了我几十年，现在我才灵醒过来了。”石谦的话很短，语言虽不雅，但表现出对共产党革命思想的拥护和赞同。

在李象九身边有三个随从护兵，都是新发展的共产党员。这三个护兵枪法很好，打起仗来颇为勇敢，很得李象九的喜爱。三人由于受旧军队恶习的影响，加之李象九对他们有所放纵，不免有些骄横。平时，三人随便

出入营门，手头零用方便，经常不穿军装，不去上操训练，作风很散漫。护兵们的特殊表现，李象九营的班排长及全体士兵看在眼里，背后经常议论纷纷。李瑞阳作为中共军特支负责人，在党的会议上曾为此事对三人多次提出过严肃的批评，并与李象九单独谈过此事，要求三人改变作风，但一直不奏效。

一日，李瑞阳见全营士兵都出山寨操练去了，但三个护兵仍在营部里闲溜达，十分恼火地去找李象九。李象九认为护兵们的作风虽有散漫之处，但毕竟都是入党不久的新同志，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旧军队带来的恶习改掉，说了一些袒护的话。

李瑞阳生性急躁，觉得李象九不支持自己的工作，气冲冲地转身走出营部，回到营房把自己的行李捆好，匆匆离开李象九的营地，决定返回绥德四师。

李瑞阳刚走出营地的山寨，正好遇着士兵们出操回来。各连的班排长及士兵平时与李瑞阳处得很好，一见李瑞阳满脸怒气，背着行李要走，一窝蜂地围住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此时，李象九闻知李瑞阳不辞而别，离开营地要走，也急忙从营部追出山寨。李象九走到李瑞阳跟前，即向李瑞阳赔不是，表示完全接受批评，并愿纠正自己过去放纵护兵的管理和教育的做法。

李瑞阳本来也是一怒之下的举动，见李象九如此认错，又亲自跑出山寨挽留，不仅怒气全消，反倒觉得自己的举止鲁莽可笑。自此后，在李象九的严格要求下，三个护兵的散漫作风改变了，全营军纪也焕然一新。

## **破除“刀枪不入”的神话**

李象九第一营驻守集义镇时，为了活跃部队士兵的文化生活，李瑞阳经常给士兵们教唱歌，还排演了不少戏剧。不仅到部队各个连队巡回演出，还常到驻地附近的农村去演出。有一次，李瑞阳让士兵们排演了一个话剧，又到附近的农村巡回演出。为了保证这次演出顺利进行，李象九亲自带着演出队到农村。

这一天，李象九和李瑞阳带着演出队到离集义镇部队驻地 50 多里外的

一个村庄给农民演出。四邻村庄的老百姓听说部队来演戏，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赶来。当地的红枪会得知此消息，即乘机出动，企图捣乱。当晚，红枪会派出的暗探混入看戏的人群中，伺机骚扰。见部队演出队在村庄四周布置了许多岗哨，士兵们在台上演出时也是荷枪实弹，已有严密的防范，红枪会未敢轻举妄动。

这个红枪会是恶霸大地主与韩城县的反动军队勾结组织的有 500 余人的地方反动武装，成员一般都是农民。红枪会里的头目吹嘘：“红枪会是神兵，只要参加了红枪会，身上贴张护身符，便神灵护体，刀枪不入。”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兵荒马乱，旧军队和土匪骚乱不断，农民实在苦不堪言，乞求平安的心理普遍存在，所以，一下子就聚集了很多人。红枪会人多势众，与小股军队作战时，往往都能够徒手取胜。石谦旅的两个连，就曾吃过红枪会的亏。因红枪会的组成成分主要是农民，当时的军队都宁愿和军队开火，也不愿和红枪会打仗；而红枪会却又专门寻找军队打仗。

当晚，红枪会的暗探摸清了李象九带的演出队人数不多，决定在次日拂晓前将演出队偷偷包围在演出的村庄里，来一个出其不意的袭击。

次日拂晓前，正好李象九亲自带着 30 余名士兵巡哨，刚走到距村庄不远的一条河前，突然发觉红枪会偷偷朝村庄摸来。此时，红枪会并没有发现李象九的巡哨队伍，黑压压的几百人从河对岸涉水过河，离巡哨队伍越来越近。

李象九当机立断，沉着地命令巡哨队伍立即停止前进，在靠河边一座小土岭的草丛里埋伏下来，观察着红枪会的行动。士兵们平时训练有素，没有一个人相信红枪会是“刀枪不入”的神兵，大家都把子弹推上膛，枪口对准河边的红枪会，严阵以待。等到红枪会快要逼近小土岭时，只听见李象九一声喊“打”，士兵们立即扣动扳机，一排子弹射出去，红枪会顿时就倒下了许多人。

渡过河的红枪会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防备，突然遭到袭击，剩余的成员吓丢了魂，连喊带叫，乱成一团，扭头瞪水跑回河对岸。士兵们都要乘胜追过河去，将红枪会一举歼灭，李象九却命令停止射击，并不许过河追击。

李象九认为，红枪会里的人大都是些上当受骗的农民，他们都是无辜

者，罪大恶极的是红枪会里的煽动者和组织者。李象九决定通过宣传工作唤醒红枪会里农民们的觉悟。于是，李象九从村庄里找来一个很有威望又善于辞令的农民，打发他到河对岸去说服红枪会里的农民，要他们别相信红枪会“刀枪不入”的骗人鬼话，尽快放下刀枪回家去。

这个被派到河对岸给红枪会做宣传工作的农民，涉过河水，一边朝对岸走着，一边大声喊道：“红枪会的弟兄们，李营长有话，叫你们别再相信红枪会‘刀枪不入’的鬼话，看一看河滩上的死人，你们就明白是上当受骗了，赶快解散回家去吧！”

红枪会里带队的恶霸大地主急忙命令红枪会的人将这个过河的村民捆起来，但没有一个人肯动手。因为这个村民说的全是真话，刚才还是一个活灵灵的人，一阵子枪响后横七竖八倒下一地死尸，事实打破了他们对红枪会神话的迷信。那个恶霸大地主发急了，害怕这个村民继续说下去会引起人心大乱，举起枪瞄准这个村民。

这时，红枪会的农民一哄而起，将恶霸大地主团团围住。他慌忙朝天鸣枪，妄图震慑农民们，反倒激起更大的愤慨。大家一齐动手，一阵乱刀砍戳，将那个恶霸大地主杀死，并把头颅割下来，打发人过河送给李象九，还把红枪会仅有的几支枪也交了出来。

李象九正确指挥，破除迷信，以和平手段解决了红枪会，消灭了地方一害。至此，红枪会的农民哗变解散。当地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各村庄杀猪宰羊，纷纷赶来慰问庆贺。

## 第十二章

# 大革命高潮

### 集义镇军政训练

1927年初，北伐军自出师以来，连续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的几十万军队，从广东一直打到了长江流域，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国民政府迁到武汉。

在这期间，上海工人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历经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并成立上海特别临时市政府。与此同时，湖南、湖北以及江西、广东、河南等省的农民掀起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

2月，中共陕甘区委成立不久，西安、渭南、三原、肤施等地区根据中共陕甘区委指示精神，先后建立中共地委组织。田伯荫从绥德四师调往延安中学，任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公开身份为延安中学教员。中共绥德地委书记改由蔡南轩担任，委员先后有何寓础、关中哲、赵通儒、李波涛等。

3月间，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的曹必达(后脱党)和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在绥远国民军联军第三军骑兵团任营长的阎揆要先后辗转回到西安。中共陕甘区委根据李子洲的建议，派曹必达、阎揆要前往宜川县，到石谦旅对部队进行特别军事指导。曹必达、阎揆要接受任务，二人一路同行，北上到宜川。

曹必达、阎揆要到宜川县后，石谦接受了中共陕甘区委的建议，决定在全旅对班长以上干部进行一次军政训练，并成立了教导队，委任阎揆要为教导队长，曹必达为政治教员，专门负责这次训练。训练地址选在宜川



阎揆要

集义镇李象九的营部所在地，全旅班长以上干部预计分三期训练完毕，每期训练时间定为半个月。

石谦旅的第一期军政训练开始后，曹必达主张公开邀请绥德四师党的负责人到训练班来讲演，自己亦公开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进行活动。对曹必达的这种激进主张和行为，李象九与曹必达曾有过争论。李象九认为，在部队训练班内的班排长成分复杂，思想混乱，公开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并以过激的言辞发表议论，不利于党组织在部队的活动，一旦革命形势发生变化，在党还处于弱勢的时期，这些公开

暴露身份后的共产党员不但在石谦部难以站住脚，而且会使部队中的党组织遭受一些不必要的损失。曹必达则认为，当前国共合作关系大好，全国的国民革命形势日趋高涨，在全国许多省共产党的活动已经公开，并且在一些地区已经由工人、农民掌握了局势，各地大兴革命舆论，在石谦旅，共产党的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已是势在必行，否则，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有一天晚上，部队在草滩上看戏。在看戏中，石谦向坐在身旁的李象九询问曹必达、阎揆要对部队训练的情况，并要李象九对李瑞阳、阎揆要在部队的表现谈些看法。李象九沉默片刻后，评论道：李瑞阳年轻有文化，能写会画又会唱，活跃部队文化生活，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这样的人才不可少；阎揆要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经过正规化教育，懂得军事，部队要打好仗，没有懂得军事的人才不行。

石谦听后深为满意。他知道李瑞阳、阎揆要与李象九的关系甚好，就探问李象九：“他们俩愿不愿意在我这里长期干？”

李象九琢磨一番，故意说：“我也探过他俩的口气，都说年纪还轻，怕你不会重用他们，都想到北京有名的大学里去学习，说要混个有出息的前

程。”

李象九的话很起作用。石谦急忙向李象九表示道：“只要李瑞阳、阎揆要愿意留在部队里，我一定对他二人予以重用。”

没几天，正巧井岳秀新委任的亲信董卓五被派到石谦旅部来当中校团附。一到部队，石谦当着董卓五拍桌子，斥责他文化肤浅，不懂得军事，不会打仗，要撵他走。董卓五见如此情景，自知不能在石谦部立足，便灰溜溜地走了。

石谦撵走董卓五后，心中自思：井岳秀可以委任董卓五来部队当中校团附，为什么自己就不可以给李瑞阳、阎揆要授军衔，将此二人留下？于是，石谦找李象九商量后，决定委任李瑞阳、阎揆要为中校团附。李象九将石谦的意图告诉了李瑞阳、阎揆要，并汇报中共军特支负责人谢子长、杜衡等，一起商讨此事。大家都认为，在部队开展兵运工作，必须在军队中争得要职，共产党才能掌握军队，李瑞阳、阎揆要应接受石谦的委任，切不可错过共产党逐步控制军队的机会。

不久，李瑞阳、阎揆要被石谦委任为旅部中校团附。本来这一任命要上报井岳秀认可，石谦怕井岳秀不肯准许，便破例未报井岳秀。李瑞阳、阎揆要在石谦部任中校团附后，利用职务之便做起了半公开半秘密的革命工作。部队在集义镇军政训练一期结束后，李象九营受命移驻到清涧县。

## 新式婚礼

1927年夏，李象九第一营移驻清涧县后，部队得到了扩充，共产党的力量在部队中发展迅猛，使全营革命气氛达到高潮，在清涧轰动一时。

部队一到清涧县，李象九首先与清涧县城内地方党组织负责人白志强取得了联系。这时，清涧县城第一高小的教师白志强、王怀德、白作宾、马瑞生等以公开身份作掩护，在本校组建起了中共支部。在清涧县地方党组织的积极努力下，李象九营扩充了一个连的兵力，部队很快得到壮大。当时，清涧县有一个民团武装，团总叫韩子丰（又名韩启胜），与白志强关系甚好。通过白志强的关系，李象九将韩子丰的民团收编为一个连，并任命韩子丰为连长。此时，李象九第一营已下辖四个连，分别由王有才、白

雪山、韩子丰、雷进财四人担任连长。

在石谦旅所属各营中，李象九第一营共产党员的人数最多，全营有 200



白志强

多名士兵先后入党，各个连队建立起中共支部和党小组。由于李象九营党的力量迅速壮大，部队在清涧县配合地方党组织大张旗鼓地开展革命活动，士兵与城内县第一高等小学的学生每逢县城三、六、九逢集之日组织宣传队，一起到街头宣传大革命的形势，宣传禁止放赌、开烟馆，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剪辫放足，反对封建礼教。同时，部队士兵和第一高小的学生组织起来，一起到县城附近的农村去，宣传组织农民协会，举办贫民夜校，教群众识字和讲解革命道理，组织农民抗粮、抗捐税等。

有一次，李象九亲自带着几个人到县城附近的楼湾村，组织成立了农民协会，他说：“农民协会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抗粮、抗捐税、抗拉差，以后不管谁来拉你们的牲口支差，你们就说，没有李象九放话，不准拉老百姓的牲口。”

李象九走后没几天，部队里的几个士兵在楼湾村拉了一头驴。农民协会拦不住，就跑到县城向李象九报告了此事。李象九得知后，严厉地批评了那几个拉牲口的士兵，并把牲口亲手交给了农民协会。

这时，呼延震东的胞弟呼延震西是李象九第一营的一个排长，因他高大魁伟，人称“呼大排长”。呼延震西的家就在清涧县城内，他的未婚妻叫李佩春，两家的父母约好日子准备让二人完婚。

李象九得知李佩春是第一高小的学生，性格开朗，思想进步，便找到呼延震西和李佩春，提议由部队来主办婚礼，要打破旧的习俗，进行一次反对封建礼教的宣传。李象九说：“我们部队宣传男人剪一条辫子、女人放一只脚都要奖赏一块银洋，为的是叫穷人翻身，解除封建束缚，人人都有

自由的权利。你们这次结婚，来个反对封建礼教，新娘不坐花轿，不要吹手，不请客，不收礼，做个移风易俗的榜样。只要你俩同意，我一定在你们结婚时做主婚人。”呼延震西和李佩春欣然答应了。

到了娶亲的那一天，呼延震东从延安中学刚赶回清涧城，呼延震西告诉其兄：李佩春的父母捎来话，说呼家没有轿子来，就不让把女儿娶过门。呼延震东问明原委后，也非常赞同李象九的主张，便找到李象九，一起到李佩春家去给其父母做思想工作。经呼延震东和李象九的一番解说和开导，李佩春的父母虽对女儿不坐花轿之事不满意，但碍于面子，只得勉强答应听从部队的安排。

这天，正好是清涧城内逢集之日，城外附近村庄到城里来赶集的人很多。李象九派人在县城的东大街闹市处布置了一个台子。赶集的群众不知这里要干什么，纷纷前来观看。不多时，只见几个士兵在台子下排成一行，一齐举枪朝天鸣枪，连响数十声后，呼延震西和李佩春双双走上台子。

李象九军容整齐当主婚人，在台子上宣布结婚仪式开始，亲自给一对新人胸前戴上大红花，并首先讲话。他大声说：大家应向这一对新人学习，要反对封建礼教，移风易俗，树立革命新风；倡导新文化、新思想，婚事从简，反对铺张浪费。接着，一对新人也分别讲了话。

结婚仪式举行完毕，部队骑兵组成的仪仗队威武雄壮地将新郎新娘迎上街头，前边由骑兵司号员鸣号开道，后边簇拥着骑马的新郎新娘，在大街绕了一圈，然后才送入新房。围观的群众从没有见过如此的结婚仪式，一时在县城内外传为美谈。

## “谢青天”

这时，驻守在安定县的谢子长第十二连，在谢子长领导下，整个连队完全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全连班以上干部先后配备为共产党员。谢子长连的共产党员有一排长贾信之、二排长雷志坤、三排长张雄夫，班长有郝保成、白凤连、刘光汉、侯奉高、魏青山、贾成富、马凤珠等。在安定县一带，谢子长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革命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威震一方。

安定县有石谦旅的一个兵工厂。这个兵工厂的士兵沾染旧军队的恶习较深，时常到厂外打骂群众，老百姓平时惹不得他们，一见就躲得远远的。

1927年2月农历正月十五这一天，四处张灯结彩，看热闹的人熙熙攘攘。这时，兵工厂的秧歌高跷队和群众发生纠纷，士兵大打出手，当场打伤了几个百姓。正好被看秧歌的谢子长发现，便急忙上前制止。谁知兵工厂的士兵并不认识谢子长，不但不听劝阻，反而拿起高跷腿子要打谢子长。谢子长的随从护兵吴智和急忙大声喊道：“你们知道他是谁？这是我们十二连连长谢子长！”

兵工厂的士兵一听是大名鼎鼎的谢子长，吓得转头就跑。他们跑回兵工厂后还不放心，害怕谢子长会来抓他们，又派人来向谢子长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谢子长当即严厉地批评了这些士兵打骂群众的坏作风，要他们写下保证，并罚他们赶造300支枪，不付工钱。因谢子长在石谦跟前威信很高，兵工厂的士兵一连好几天吓得不敢出来，县城里安宁了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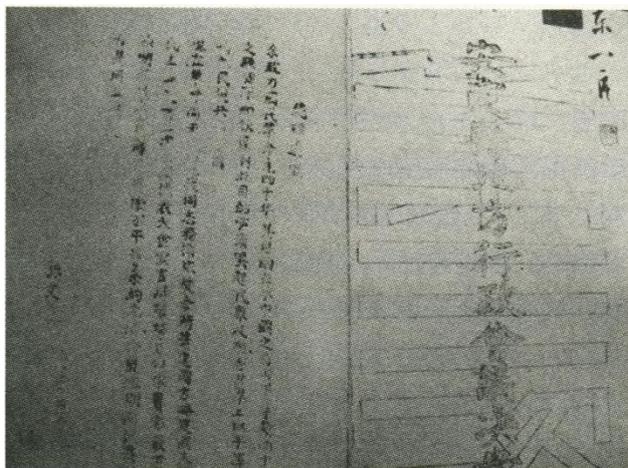
与谢子长连同驻在安定县的种宝卿骑兵队一个连，对老百姓骄横跋扈，经常抓乡下进城办事的农民为他们到河滩遛马、铡草、到十多里路外挑煤等，吓得农民轻易都不敢进城。谢子长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十分气愤。

有一天，这个连又抓了乡下人遛马。谢子长得知后，立即派人将抓人遛马的士兵押到连部，并通知这个连的连长前来领人。连长听说自己的人让第十二连连长谢子长抓去了，知道不好惹，只好硬着头皮前来，忙给谢子长认错道歉。谢子长让他们保证今后不再随便抓老百姓给他们白干活，

才让连长把人领回去。

在安定县，谢子长为了发展党的地方组织，与安定县第一高小的党组织紧密联系，让部队士兵和学生一起开展体育活动，增进士兵和学校师生的感情联络，并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安定区委。

谢子长善于做统战工作。他利用安定县县长张凤梧改组了国民



安定县(今子长县)农民组织参加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决案

党县党部，召开了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通过了由他草拟的《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组织大纲》《细则》及《农民协会章程》等三个文件，还作出关于天足会、农民协会、保卫团及捐税等方面的八个决议案。为了贯彻这些决议，谢子长协助中共安定区委筹办了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抽调 30 多名学员，培养了一大批农运干部。在他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县和 14 个区的农民协会、工会及学联等革命组织。

安定县的农运搞得尤其猛烈。广大贫苦农民、学生和士兵联合起来，在瓦窑堡、杨家园则、石曹寺等村镇宣传识字、禁烟、剪辫、放脚，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反对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不准官方放赌，禁止军队拉差。

当时，安定县地方上有两个放高利贷的人——王玉书、马子厚，谢子长派人将二人找到瓦窑堡的一个店内，痛斥他俩剥削百姓的不法行为。群众听说抓了王玉书、马子厚，纷纷跑来算账。王玉书、马子厚被群众的血泪控诉吓得浑身发抖，当场求饶。谢子长立即令王玉书、马子厚除把高利贷的原本收回，其余一律不究，并将文约账簿等全部当场焚烧，后将民愤最大的马子厚押进县监狱中。群众见王玉书、马子厚的文约账簿等全部被烧，无不欢欣鼓舞，当场高喊谢子长为“谢青天”。

除此，谢子长领导农民协会将人称“地方一害”的土豪劣绅宋运昌以及李耀辉、王伯阳抓起来审判，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将宋运昌押进县监狱中。

一次，县衙役到强家湾催粮要款。村里有个叫强龙光的青年出面质问：“有没有经过农协会允许？把同意征收的条子拿出来。”

差役说：“农协规定是纸上的东西，哪能当真？自古以来，皇粮国税，天经地义，官家粮款，岂能有假！”

强龙光据理力争，差役们恼羞成怒，大骂强龙光是刁民，抗款抗粮等同造反，气势汹汹地要抓捕他。强龙光抄起一把铁锨，把扑上来的一个衙役打得头破血流。县长张凤梧知道后，于次日派人把强龙光抓回县里。谢子长一听说抓了敢与官府抗争的强龙光，马上给张凤梧写了张条子，要求此案交由他处理。张凤梧不敢惹，无奈地把案子交给谢子长。

谢子长见到强龙光后，大笑着说：“你真是咱农民协会的一员猛将。要让农民翻身，就要这样干！”不久，谢子长介绍强龙光加入共产党。

对轰轰烈烈的学生和农民运动，安定县长张凤梧的态度由支持变为刁难，最后千方百计开始破坏。谢子长为了教训他，派出儿童团长李宗贵(李赤然)带领儿童团员找他说理斗争，使其威风扫地。

## 第十三章

### 四一二政变

#### 蒋介石“清党”反共



蒋介石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第六军、第二军占领南京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军舰炮轰了北伐军攻占的南京，打死打伤中国军民2000余人，制造了“南京惨案”。

3月底，蒋介石乘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起义、占领上海之机，带领北伐军人驻上海，并立即向帝国主义表示“密切合作”。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介石举行了反共秘密会议，积极制定反革命政变计划，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

4月12日，蒋介石悍然举起屠刀，在上海公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三天之内，竟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300多人，逮捕500多人，使5000多人流离失所；随之，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4月18日，蒋介石建立了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南京国民政府。这

时，在中国形成了北京张作霖、南京蒋介石、武汉汪精卫三个政府对峙的局面，当时，武汉政府汪精卫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暴露出来，中共中央迁到武汉，继续与武汉国民政府合作。

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中共举行了五大。出席大会的代表88人，代表全国共产党员57900多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1926年11月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决议案，强调夺取革命领导权、联合农民、发展土地革命，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有所批评。但是，未能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确的分析，导致了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使中共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没有确定正确的方向，无法遏制愈来愈恶化的局势。这次大会上，仍选举陈独秀为中共总书记。

4月28日，军阀张作霖在北京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将李大钊等20位共产党员绞杀。

顷刻间，满天阴云压顶，大地骤起腥风血雨。在中国时局突变中，中共陕甘区委负责人耿炳光、李子洲、魏野畴等领导陕西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讨蒋、讨张运动。

从4月底到5月上旬，李子洲、魏野畴、刘含初、赵葆华等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名义，向全国发出讨蒋通电，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恶事实，指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何异于万恶军阀”，号召陕西人民与全国各界共同声讨。同时，在西安组织各界群众数万人举行讨蒋游行示威大会，在《陕西国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陕人民打倒背叛革命、实行个人军事独裁、摧残工农运动、与帝国主义妥协的蒋介石，以挽救革命，拯救危难的中国。

5月1日，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在西安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按照中国共产党和武汉国民政府商定的军事计划，发布东征命令。大军先后集结潼关，待命东出，配合武汉国民政府北伐河南奉军。冯玉祥将全军编为六路，自任中路军总指挥，东路、南路、北路、左路、右路军，分别由刘镇华、岳维峻、宋哲元、孙连仲、徐永昌任总指挥，总兵力达30余万。

5月8日，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出师河南。马鸿逵率已改编为第四路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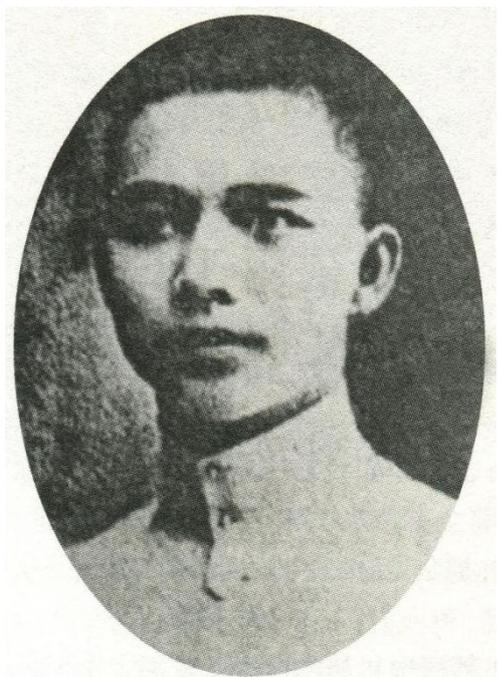
的部队奉命离开咸阳，随冯玉祥开赴河南。刘志丹、唐澍等共产党员随军出发。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与武汉国民政府唐生智任总指挥的北伐军第四军对驻河南的北洋奉系军阀进行南北夹击，准备会师中原。

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开入河南后，势如破竹，相继攻克陕州，占领洛阳。奉军被迫放弃郑州、开封，向山东、直隶退却。在南阳，吴佩孚被数路国民革命军打得惨败，只带残部逃往新野，又被农民武装包围，只身逃脱。

5月30日，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占领郑州，北伐军第三十六军也随之到达，与冯玉祥部会师。时隔两天又传捷报，贺龙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率先进入开封，和北伐军第四军、第十一军与冯玉祥部在开封地区会师。

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开到洛阳后，冯玉祥突然下令部队不准唱《国际歌》，并把一个向士兵宣传“倒蒋”的政治工作干部抓起来。经部队总政治部抗议，冯玉祥才又将人放出。

6月，冯玉祥与武汉北伐军会师郑州，同汪精卫等为首的武汉政府举行了郑州会议，随后又同蒋介石等为首的南京政府举行徐州会议。蒋介石在南京(宁)建立国民政府后，与在武汉(汉)控制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出现过暂时对立，这时在甘肃、宁夏、陕西、河南



汪精卫

拥有重兵的实力派冯玉祥成为蒋介石与汪精卫力争的主要对象。汪精卫很快撕下了革命伪装，决定“宁汉合作”。汪精卫由“联共反蒋”到“反共反蒋”再到“联蒋反共”，与蒋介石共同举起“反共清党”的屠刀。冯玉祥紧追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亦表示了决心反共的主张。

7月4日，中共举行了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五大后武汉国民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反共事件不断发生，而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仍企图

以让步来拉住汪精卫，使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还主张国民革命军各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党若“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被停职。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地准备政变，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共产党愿意

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了三件大事：一是将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二是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起义；三是立即召集中央会议，紧急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政策。

7月15日，汪精卫等在武汉召开了“分共”会议，公开背叛孙中山所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反革命口号，在武汉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冯玉祥参加徐州、郑州反共会议回到洛阳后，借口部队集训，把北方国民军的全体政治工作人员的武装解除，监押到开封宫驿街三道胡同第二中学，一个个进行审查。经审查，将刘志丹、唐澍等32名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另行关押。

过了十多天，冯玉祥用一节闷罐车厢将刘志丹、唐澍等32名共产党员押到郑州“礼送出境”。结果火车到郑州，闷罐车厢被甩下，停了一天一夜，车门加锁，无人过问。直到第二天，汪精卫派人摘了刘志丹、唐澍等人的臂章符号，又将闷罐车厢加锁，挂到普通货车上，开往武胜关。

刘志丹在马鸿逵第四路军期间，结交了许多国民革命军的军官朋友，甚至曾对马鸿逵进言，劝导其改变“清党”反共的立场。在第四路军内有一个营长叫韩练成，刘志丹见他本质好，通过宣传革命道理，很快将其发

展为共青团员。他对韩练成说：“不管在哪里，不管跟着谁，都不要忘记做革命的人，处处为民众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益着想，绝不做反对革命的事。”后来韩练成在国民党军队中升为中将，还始终记着刘志丹的教诲，利用自己的身份秘密为共产党传送情报，为解放军在华东几次重大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韩练成被授予中将军衔，直到1965年病逝之前，他仍深情地对汪锋说：“刘志丹将军为咱西北培养了大批人才，我是从他那里知道要走革命道路的。”

马鸿逵后来追随蒋介石逃到台湾，在阿富汗做国民党“大使”，客死国外。在临终之时，马鸿逵对身边的随从人员说：“我没有听刘志丹的话，落到这样的结果，一言难尽……”

## 中共陕西省委成立

1927年6月中旬，冯玉祥致电在陕西留守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参谋长石敬亭，提出反共“三原则”：①不准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②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的领袖一律解除职务开除党籍，遇必要时得加以严密监视；③在国民革命时期不准以共产党名义活动，亦不准假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

7月15日，西安警备司令部按照冯玉祥和国民党中央的指令，以石敬亭、岳维峻等人为主在陕西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石敬亭代理陕西省政府主席，成为冯玉祥在陕西“清党”反共的主要执行人。

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骨干为主组成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被迫解散；国民革命军各部的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被迫离开；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被迫解散；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等革命团体组织被勒令停止活动。同时，石敬亭、岳维峻等人还派出大批警察和特务，到处搜捕中共陕甘区委的领导同志，李子洲、魏野畴、杨明轩、刘天章等被通缉。

中共陕甘区委立即在西安市东大街中山学院召开紧急会议，迅速采取应急措施，并马上发出紧急通知，为保存革命实力，以利再战，要求中共各级组织及所领导的各革命群众团体尽快由半公开活动转入秘密活动状态。

身份已暴露的同志，尽快离开西安暂避，深入到基层去开展活动。为了转移特务的视线，中共陕甘区委的驻地移至红埠街9号，李子洲、耿炳光、魏野畴等领导人转入地下活动。不久，陕西国民日报社社长刘天章和编辑白超然因未及离开西安被逮捕，后被送往开封监狱。

7月11日，中共陕甘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对陕西党组织的指示，召开区委紧急会议。这次会上，将中共陕甘区委改组为中共陕西省委，确定省委由13名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组成，耿炳光任书记，李子洲任常委兼组织部长，魏野畴任军委书记，崔孟博任宣传部长，亢维恪任农运部长。在陕西省委成立后召开的会议上，决定根据共产党员在各地区的分布情况，将全省划为六路，分别由省委负责同志担任特派员，指导各路地方组织的工作，直接向省委负责，相机进行军事行动。

就在中共陕西省委开会的同时，冯玉祥一再电令史可轩和许权中部开往河南前线，妄图借部队调遣为名，乘机将这支军队消灭。史可轩和许权中领导的这支军队由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卫队和中山军事学校1000多人组成，是共产党掌握的一支革命武装。省委军委书记魏野畴和组织部长李子洲研究决定，拒绝执行冯玉祥的命令，指示史可轩、许权中乘部队离开西安的机会佯装向东开拔，以观形势变化。

这时，原驻陕总司令部副司令邓宝珊通过共产党员葛霁云与中共陕西省委联系，欲组织陕西左派军事力量联合反对冯玉祥。

邓宝珊，甘肃天水人，1910年加入同盟会，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了伊犁起义。1914年到陕西，与胡景翼等人策划了驱逐陕西军阀陆建章的斗争。1916年参加讨袁战争后参与发动三原起义，组织陕西靖国军，积极响应护法运动。1926年，参加冯玉祥组织的国民军，任国民军第二军第七师师长。刘镇华的镇嵩军入陕后，任国民军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率部驱逐刘镇华，使受困八个月的西安城得以解围。1927年春，出任国民



邓宝珊

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副总司令，6月间，因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反共主张不满，暂离陕西，避居上海。

中共陕西省委同意邓宝珊的这一行动计划，即决定将已经离开西安的史可轩和许权中部队与邓宝珊和甄寿山等左派军队会合，从南路入豫，与冯玉祥抗衡。为实行这一重大军事行动，中共陕西省委请示了设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但中共中央从武汉邮给陕西省委的几封密信，由于路途耽误，用药水显示不出来。史可轩、魏野畴、李子洲等主张应立即实施这一军事行动，以免时日一长，情况会有变化。时任省委书记的耿炳光未得到中央指示，不敢做主，决定派李子洲亲自前往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

此时，唐澍、白明善、冯文江等在各国民革命军“清党”后辗转返回西安。中共陕西省委对陕北的革命形势十分关注，决定在李子洲前往武汉的同时，派出省委军委书记魏野畴和唐澍、白明善、冯文江一道到陕北巡视工作，了解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党组织的状况。

## 部署武装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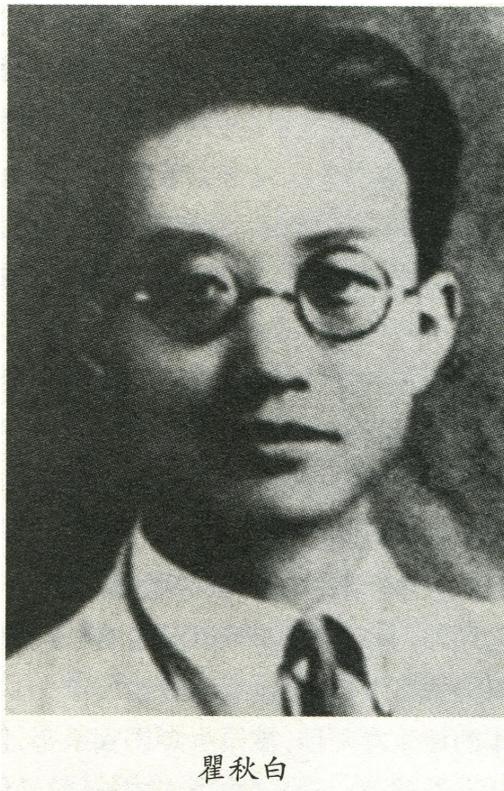
1927年7月中旬，李子洲以商人打扮，在交通员的护送下，通过国民党道道戒备森严的关卡，坐火车到达武汉，路途已花去十余天的时间。到武汉后，武汉汪精卫政府已公开叛变革命。在街市码头到处都有通缉共产党人的布告，警察和便衣特务四处出动搜查，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局势非常紧张，一片白色恐怖。这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转入地下活动，李子洲一时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8月初，李子洲好不容易与中共中央接上头，但又遇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正忙于筹备召开党的紧急中央会议，一时无暇顾及解决陕西问题，只好暂宿旅店等待。李子洲利用这段时间，代表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共中央写出《关于陕西工作开展问题向中央请示》的报告。这时，从陕西辗转到武汉的杨明轩、雷晋笙、邹均等人得知李子洲来到武汉，都来询问陕西局势及请示工作。李子洲鼓励这些同志在革命遭受到挫折的时候不能丧失信心，要继续前进，并拟就这些同志的工作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

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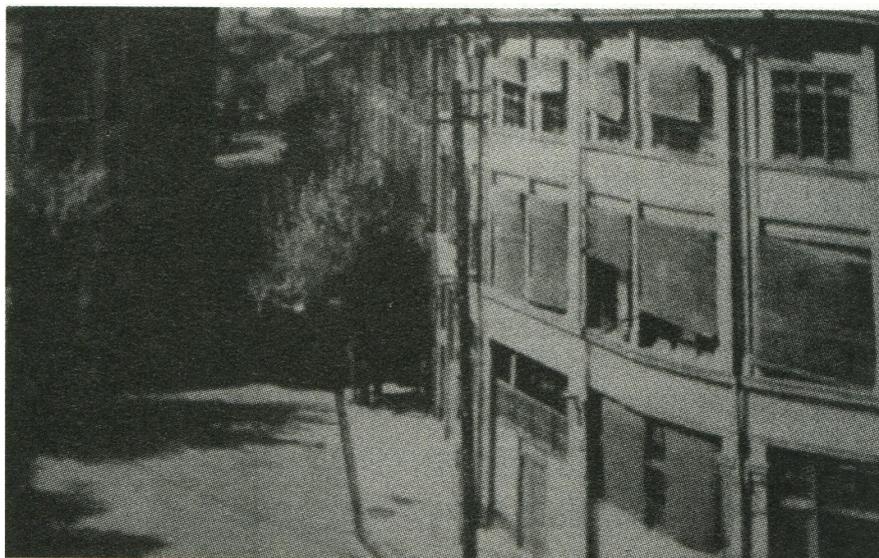
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北伐军 3 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批评了陈独秀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继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共产党的最主要任务。在讨论中，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今后“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伟大思想。会议撤销了陈独秀总书记职务，选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政治局。这次会议虽为促进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开创了新的革命道路，有着重要的历史功绩，但对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缺乏正确的估计，助长了“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共领导层的滋长和发展。



瞿秋白

会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与中共湖南省委领



汉口八七会议旧址

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当起义部队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向长沙进发受挫后，毛泽东审时度势，与总指挥卢德铭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带领部队向井冈山地区进军，并在永新县三湾村对起义部队进行了“三湾改编”。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8月下旬，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李子洲。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向李子洲传达了中共八七会议精神，看了李子洲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就陕西今后的工作布置和开展谈了许多意见，指示当前的工作任务是推翻冯玉祥的统治，号召民众，形成反冯势力，要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将农民有组织地打进军队中去，在主要县份组织武装暴力。

9月上旬，李子洲带着八七会议文件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精神，从武汉返回到西安。当他回到西安后，陕西的局势又发生了突变。

自李子洲离开西安去了武汉，时日已久，史可轩和许权中的军队即准备北上陕北，与石谦旅李象九营会合，发展革命武装力量。7月29日，部队离开西安到达富平后，为借道和筹措粮草，史可轩带十余随从到美原镇，与原国民二军的田生春交涉，被田生春诱骗杀害，使这支军队北上陕北的计划落空。部队北上受挫后，公推许权中为旅长，将队伍拉回，驻扎到临潼县的关山镇。

同在这时，刘含初在宜君被井岳秀的部下杨袞杀害。陕西局势的恶变，打乱了李子洲在武汉时对工作的周密设想，史可轩、许权中部队失去了与邓宝珊、甄寿山等左派军队会合的时机，中共陕西省委不得不重新考虑共产党在陕西活动的新计划。

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红埠街9号秘密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共陕西省委在大革命失败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史称“九二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耿炳光、李子洲、李子健、张金印(张慕陶)、张秉仁、蒲克敏、杜衡、何挺杰、张国藩(张资平)、陈嘉惠、潘自力、萧明及各路特派员、部分县委和青年团代表，共15人。这次会议连续开了三天，由李子洲代表省委作了党务报告，耿炳光作政治报告，并通过省委根

据八七会议精神形成的《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等九项决议案。会议提出党到农村去，在土地革命政纲之下，加紧农村阶级斗争，准备总起义，创立农协政权。

在会上，团省委书记张金印借清算右倾错误，抓住耿炳光的一言半语，说他是投降主义，否定陕西省委过去在工作上的成绩。李子洲对张金印的发言进行了反驳说：“省委工作中受到陈独秀右倾影响是事实，但成绩不能一笔抹杀。比如对冯玉祥的斗争不力，是有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耿炳光应负主要责任，但也不能由他一人承担。不要信口批评同志，以为过去的党等于没有，这是错误的。”

在这次会议上，李子洲及时地制止了中共陕西省委内部矛盾的激化。他要求同志们在革命暂受挫折和失败、处于低潮之时，要看到革命胜利的希望，勇于迎接严峻的斗争。

在会议的最后，耿炳光请求辞去省委书记职务，提议由李子洲担任省委书记，与会者也表示赞同。李子洲道：“作为一个党的干部，职务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则是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何况当前形势处于危急之时，耿炳光同志又没犯严重的错误，随便更换省委领导，恐于大局不利。”

李子洲说服了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最后仍选耿炳光任省委书记。李子洲继续担任常委兼组织部长，还负责军事工作。并选举李子健为宣传部长，亢维恪为农运部长，张金印为共青团书记，刘继曾为秘书长，张含辉、潘自力为省委候补委员。

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之后，李子洲直接领导许权中旅、石谦旅、甄寿山师和杨虎城留守三原部队李子高旅这四个部队中的中共军特支。当时，许权中旅军支书记为高克林，石谦旅军支书记为白明善，甄寿山师军支书记为刘味冬，李子高旅军支书记为张汉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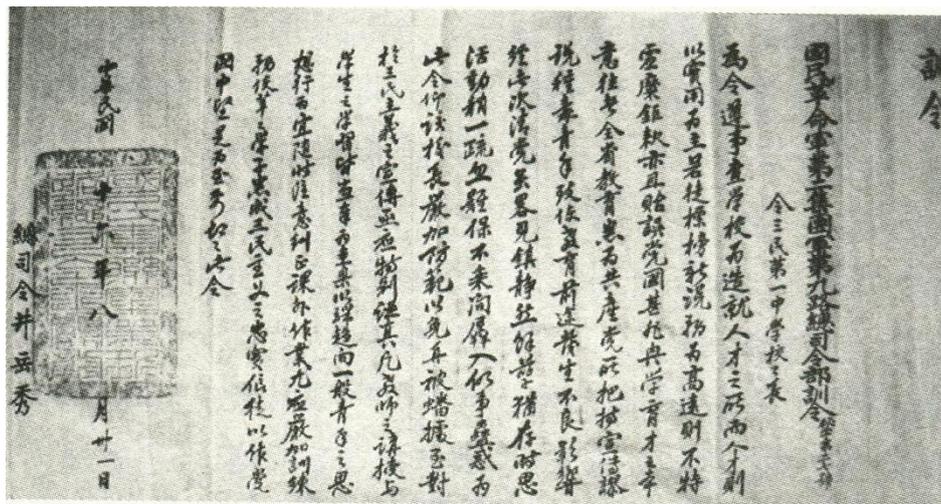
在这期间，李子洲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先将石谦旅作为陕西发起武装斗争的突破口。

## 第十四章

# 白色恐怖

### 井岳秀举起反共旗

随着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井岳秀紧跟冯玉祥“清党”步伐，在陕北也举起了反共旗，他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仇恨的狰狞面目完全暴露出来，在陕北地区开始大肆“清党”，明令各县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勒令各地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停止活动，发出通缉令捉拿中共榆林、绥德两地委的领导人。中共榆林地委的负责人马云程、周家干、刘景象、郭洪涛、杜聿德等人及中共绥德地委的负责人蔡南轩、何寓础、关中哲、李波涛等人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1927年8月井岳秀“清党”训令

井岳秀首先派兵强行封闭了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榆林县党部、县总工会、县商民协会，禁止榆林各学校学生会等进步组织的活动。接着

逮捕了工会负责人李文正、商民协会会长康治臣。郭洪涛、杜聿德、马云程等因遭通缉被迫先后离开陕北，辗转 to 山西、安徽、北京等地。

郭洪涛辗转 to 山西，被晋军特务逮捕，关入太原监狱，直到 1933 年经地下党组织营救出狱，调往中共北方局工作。

杜聿德辗转 to 安徽皖北地区，1928 年参加魏野畴领导发动的阜阳起义，在战斗中牺牲。

马云程先从榆林转到米脂县老家短暂停留，刚离开家，井岳秀派出的特务就闯进家搜捕。后辗转 to 北京，受中共北方区委的派遣，先后到山西、西安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在山西运城被晋军特务逮捕。1935 年 4 月在北京国民党第二十五师开展兵运活动时，被叛徒出卖，再次被捕，狱中受尽酷刑，后遭杀害，时年 36 岁。

1927 年 8 月 4 日，井岳秀派出旅长刘润民带着军队将绥德四师包围。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全被驱逐，学校被封闭，学校进步书籍全部被焚烧。

绥德四师校长常汉三被井岳秀软禁起来，并被责令三年之内不准任教、不准担任公职、不准离开绥德。中共绥德地委书记蔡南轩、宣传部长关中哲及雷五斋、赵少西四人，被刘润民带着的军队逮捕。

接着，中共葭县县委负责人杜嗣尧、高锡爵、高光祖等数十人被国民党县党部捏造罪名，报请榆林井岳秀秘密抓捕。县委机关被迫解散，农民协会和基层群众组织均遭破坏。

至此，中共绥德、榆林两地委在白色恐怖之下被迫解体，榆林中学、绥德四师及各县中共地方组织停止活动，陕北的大革命运动在井岳秀的疯狂破坏之下处于低潮。井岳秀的公开“清党”反共之举，史称“陕北事件”。

与此同时，井岳秀密令石谦在军队内立即开始“清党”，并对已经公开



常汉三

身份的李瑞阳、阎揆要予以逮捕。石谦拒绝执行井岳秀的命令，将阎揆要、李瑞阳礼送出部队；对李象九营和谢子长连的“清党”不予动作。

8月15日，西安《陕西国民日报》报道：

陕北讯：榆林自清党的消息传来，即积极从事搜捕共产党，一时大肆活跃于社会不忠实国民革命之共产党分子悉行潜踪逃窜，其煽惑人心、扰乱秩序、特党暴行之元恶大慝，井氏早已痛恶其阴险策略及卑劣行为，即行捕获者十余人，即予枪决……

## 魏野畴北上

阎揆要、李瑞阳离开石谦部，取道南下，暂到三原李瑞阳家躲避风险。此时，正好中共陕西省委派省委军委书记魏野畴与唐澍、白明善、冯文江一行，从西安出发北上陕北，了解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组织的状况，路经三原县，巧遇暂避三原的阎揆要和李瑞阳。魏野畴向阎揆要、李瑞阳详细询问陕北党组织的情况后，便命阎揆要、李瑞阳暂留三原开展党的工作，并要求对地方上一些共产党员秘密进行军事训练。随后，魏野畴一行继续北上。

魏野畴一行经宜君、中部(今黄陵)、洛川、郝县(富县)、甘泉，北上先到肤施。这时，中共延安地委(后改为中共肤施区委)在田伯荫、呼延震东、焦维炽、陈俞廷、易厚庵等的领导下，已在延安地区发展7个中共地下党支部、3个直属党支部，共产党员达0多人。延安中学党组织的负责人呼延震东告诉魏野畴：驻守肤施的高双城与石谦很有矛盾，石谦瞧不起高双城，不服高双城的指挥，而高双城对石谦又忌妒不满，在井岳秀的面前常说石谦的坏话，说石谦部中学生成分多、共产党活动猖狂；大革命失败后，井岳秀的便衣特务在肤施把主要目标集中在延安中学的师生身上，许多共产党员、团员受到盯梢和跟踪，学校的党团组织无法开展工作。

魏野畴根据肤施党组织还未被井岳秀破坏的局势，秘密召集中共延安地委书记田伯荫和团地委书记焦维炽及延安中学的党团干部，向他们讲述

了全国革命的形势和共产党在当前的任务，要求各级党团组织迅速改变过去那种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方法，把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团员干部很快转送到农村，其他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团员干部要转入地下斗争，以保存革命的力量，待机发动新的革命运动。

魏野畴一行离开肤施没几天，井岳秀即派出高双城带着军队将延安中学包围。延安中学校长田伯荫被软禁，多数教员被遣散回家。思想反动的冯楚锡当了学校校长，对学校进行改组，迫使延安中学多数党团员和进步学生离开学校。至此，肤施党组织遭到破坏。

魏野畴一行从肤施到了清涧县后，根据中共绥德、榆林两地委遭到严重破坏、陕北党组织的工作已陷入瘫痪状态的情况，派冯文江到绥德，任中共绥德县委书记，以重建被破坏的党团组织，并负责与榆林、神府、三边各县党团组织进行联系。魏野畴、唐澍、白明善三人留清涧，以加强石谦部李象九营中共军特支的工作。

魏野畴到清涧县不久，因他曾在榆林中学当过教员，陕北各界久闻其名，有许多人认识他，竟被井岳秀知晓。井岳秀获悉魏野畴是中共陕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即密电石谦速将潜入李象九营的魏野畴秘密逮捕。石谦不但又未从命，反而派人骑快马从宜川县赶到清涧县，立即通知李象九护送魏野畴离开部队，免遭井岳秀的毒手。李象九得讯后，迅速与魏野畴商量对策。魏野畴对石谦同情革命和深明大义之举甚为感激，在危急情况下，决定离开李象九部队，以暂避风险。

当时，由于西安形势恶化，中共陕西省委已转入地下工作，魏野畴等省委领导人在西安被国民党通缉。魏野畴命唐澍、白明善(军特支书记)留在李象九营继续开展兵运工作，自己离开清涧县，东渡黄河，辗转河南，投奔杨虎城部。

1927年秋，魏野畴离开清涧县。石谦放走魏野畴后，虽用种种借口搪塞，但井岳秀仍对石谦产生了怀疑。对于石谦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井岳秀早有耳闻。早在关中道驱逐镇嵩军、与刘镇华大战之时，石谦部南下与各路国民军参战，高双城派出许多密探到石谦部，发现共产党在石谦部活动频繁，就曾向井岳秀做过密报，但因当时在国共合作时期，且石谦部队

又在前线浴血奋战，井岳秀尽管对石谦不满，也知不宜细作追究，只好让高双城继续暗中监视。

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清党”反共大潮又起，井岳秀先密令石谦逮捕阎揆要、李瑞阳，石谦以礼送了之；又密令石谦逮捕魏野畴，石谦再次故意放走；且李象九营和谢子长连有一大批共产党员在若明若暗地活动，石谦无动于衷，不行“清党”之令，使得井岳秀怒不可遏，遂对跟随自己多年的石谦生出了剪除之心。但是，井岳秀思量再三，暂不敢对石谦有任何动作，因石谦最器重李象九、谢子长两个持有兵权的共产党分子，如轻举妄动，公开去逮捕这两个人，闹不好要出大乱子，怕到时酿成部队哗变，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井岳秀决计暂不打草惊蛇，先稳住石谦，伺机行事。

## 石谦之死

1927年9月5日，又到了井岳秀的寿辰。每年井岳秀寿辰，陕北军政各界都要大举庆祝，榆林城大街北至凯歌楼，连着钟楼、新明楼，南至万佛楼，连搭几座戏台子，大戏连唱几天，城内好一番热闹景象。

军政各界许多要人为巴结这个陕北“土皇帝”，图谋封官晋爵，平步青云，借庆寿之机非备厚礼不可。由于井岳秀的寿庆一年比一年隆重，参加庆寿的大小官吏和豪绅显贵们一年比一年增多，到后来竟生出一个惯例：每年只要井岳秀的寿辰一到，连陕北23县的平民百姓也必须要为井岳秀凑“庆寿钱”，名曰感激井岳秀的“恩德”。

这年，井岳秀以庆寿为名，特发电邀请石谦务必来榆林参加，一则想对石谦所受共产党的影响摸一个底儿，二则仍试图把石谦拉到反共的行列。

石谦对井岳秀的这种奢华的寿仪极为不满。前一年井岳秀的寿辰，石谦就借故没有去。此番石谦本来决意不去榆林，并写信给肤施的高双城，要派本旅部其他人代之，可高双城与井岳秀早已串通一气，即复信给石谦，非要他去榆林不可。石谦推辞不得，无奈将旅部军务之事暂托驻守宜川县的第二营营长康子祥，随即从宜川县城出发，北上榆林。

途经清涧县城，石谦在李象九营住宿一夜。李象九、唐澍、白明善等告诫石谦，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井岳秀在陕北公开举旗反共，到处抓捕共

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反革命的面目已彻底暴露，石谦作为军队中的左派激进军官，井岳秀对他倾向革命的思想早有不满意，建议石谦在这个时候不要离开部队，应找借口返回宜川，静待观察，以防不测。

石谦是井岳秀亲手栽培起来的，并心存报恩思想，不愿与井岳秀公开翻脸。石谦自信国共分裂是两个党派的事情，他与部队里李象九、谢子长等共产党人交朋友，是个人之间的情感问题，何况国共合作时把共产党拉到部队里，国共合作破裂了就把共产党当做敌手看待，要赶尽杀绝，这也不是他侠肝义胆的做人本色。石谦北上榆林的主意已定，李象九、唐澍、白明善等为他这次充满险情的行程甚感担忧。

次日，石谦离开清涧县城，带着护兵队向榆林方向出发。临别时，李象九、唐澍、白明善等将石谦送出清涧县城北门外，李象九再三对石谦叮嘱：此番北上榆林，给井岳秀祝寿完后速归，切不可多作逗留，以防节外生枝。石谦口里应诺，但心里却不以为然。

石谦到榆林后，住在城内一所寓馆。在寓馆稍作小憩，石谦急忙去拜见井岳秀（一说石谦之姐是井岳秀的大太太，未考证）。井岳秀见到石谦，几句寒暄，即攀谈起来。井岳秀向石谦提及拥蒋“清党”反共主张，要石谦在部队秘密逮捕李象九、谢子长，削整一切共产党分子，石谦极力反对，表示应暂缓动作，否则会酿成军心不稳，并对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有辩护之词。

井岳秀本想借其寿庆再给石谦一次悔过的机会，力争把石谦拉到“清党”反共的阵营，却见石谦受共产党的影响甚深，恐其返回宜川后部队生变，暗中下了最后的剪除之心。井岳秀表面少许责言，即打发石谦回寓馆休息。

井岳秀的寿辰大庆完毕后，石谦前来向井岳秀告别，要南下宜川县返回部队。井岳秀却挽留石谦在榆林再多住几日，说他在关中道驱逐镇嵩军刘镇华的大战中功绩卓著，劳苦功高，难得来榆林歇息散心。

井岳秀为稳住石谦，暗示手下人在榆林城选来一位名妓，要石谦纳为小妾。石谦开始不从，说自己家有妻室，且儿女皆大，此事不可草率。但经不住一些说客们执意要“成人美事”，推辞不得，只好答应下来。婚礼由

井岳秀亲自出面主办，办得十分排场阔气。榆林城军政各界为石谦受到井岳秀如此的宠爱，羡慕不已。

婚后的第七天，石谦在榆林城再也待不住了，决计次日启程南归部队。当天下午，井岳秀邀石谦到凯歌楼赴宴，并特邀来几位军政要员作陪。宴中请来榆林城内数名能歌善舞的女子，笙歌弦舞，直把石谦喝了个酩酊大醉，散宴始离开凯歌楼。石谦回到寓馆，已天黑多时。石谦醉意中吩咐随行的阎副官：次日五更起床，要收拾好行李，即动身南下宜川返回部队，不可有误。

不多时，井岳秀派人给石谦送来一盘红果一盘梨。正在这时，安定县长张凤梧门外求见。石谦眉头一皱，心中暗想：这个家伙确实可恶，就是他背着自己，跑到井岳秀跟前告了谢子长和李象九的状；不见吧，自己的一部分队伍还驻在这个家伙管辖的地盘里，常来常往。于是，只好请张凤梧进来。张凤梧一进门，就献着殷勤道：“听说旅长明天要走，卑职特来送行。榆林城的桃花水，吃了可养人呢。”

石谦冷冷一笑：这个家伙一肚子坏水，该不是想绊住我打官司吧？他觉得谢子长的分析对极了，就是由于他支持了革命，这些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都会拧起来对付他的。

张凤梧尴尬地笑着说：“我刚弄来一点好的烟土，陪旅长再过一次瘾吧。”张凤梧亲自动手，把烟灯点着，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白布包，掰出一块大烟土膏，装上烟枪烧好，双手把烟枪递到石谦面前，便在烟灯旁躺下来。石谦接过烟枪，连吸几口，顿觉神清气爽。这时，护卫兵来报说：“井大人让人送来一封密信。”

石谦道：“让他放下。”

护卫兵说：“我已经给说过了，可那个送信的人说，井大人吩咐一定要把信亲手交给你。”

石谦想，既然是井岳秀派人亲自面交，那就让来人进来吧。

这时，门里闪进一个彪形大汉，身着黄色军装，掀起门帘便喊：“石旅长！”

石谦应了一声，从烟灯旁坐立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个彪形

大汉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支手枪，“叭叭”两枪，石谦“哎呀”一声就倒在地上的血泊之中。

阎副官和护卫兵听到枪声，赶快跑进门来。送信的人和张凤梧早已不见了人影，大家在慌乱之中从地上扶起石谦，他已被枪弹击中致命部位断了气。

阎副官一见石谦遇刺身亡，心知其中大有隐情，不敢稍有怠慢，一面派一个护兵骑快马，连夜飞奔南下清涧县，给李象九、谢子长报告噩耗，一面打发人去报告井岳秀。

榆林城里，立即全城戒严。井岳秀发出命令，说要捉拿刺杀石谦旅长的凶手。可是抓来抓去声势倒不小，结果没有抓到凶手。其实，井岳秀是在演把戏遮人耳目。

刺杀石谦并不是意外事件，而是井岳秀精心设计的一个阴谋。当晚，井岳秀邀石谦到凯歌楼赴宴，为的是在榆林军政各界造舆论以掩盖其杀机；派张凤梧给送大烟土，是松懈石谦的防备；送信的凶手正是井岳秀手下的一个心腹警卫营长。

石谦遇刺身亡后，井岳秀按照已拟的诡计，立即给宜川县石谦旅部发电，委任驻宜川县石谦第六旅第二营营长康子祥为代旅长，主持全旅军务大事，以防部队有变。

同时，井岳秀又密电安定县骑兵队的种宝卿，诡称石谦在榆林暴病而亡，要种宝卿在清涧、安定两地对李象九第一营和谢子长第十二连严加防范，并电令李象九营从清涧县开往肤施改编，谢子长连从安定县开赴宜川县换防，阴谋将这两支已由共产党掌握的军队分而歼之。

## 第十五章

# 不能坐以待毙

### 筹划起义

石谦在榆林被井岳秀派刺客杀害的消息传到清涧县后，李象九、谢子长很快接到井岳秀命令：立即调李象九第一营开往肤施整编，谢子长第十二连开赴

宜川换防。李象九、唐澍、白明善分析后认为，这是井岳秀阴谋将共产党掌握的两支部队分而歼之的信号。李象九立即派人到安定县，通知谢子长火速赶来清涧县，共同商讨两支部队在今后的行动事宜。

谢子长一到清涧县城，部队中共军特支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上，大家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后，一致认为：在石谦旅长遇刺后，石谦第六旅的旧部官兵人心浮动，对井岳秀十分心寒，人人义愤填膺，个个充满复仇的情绪。康子祥被井岳秀任命为石谦第六旅代旅长，李象九营和谢子长连已处险境，随时都有被井岳秀吃掉的危险，必须把安定县的谢子长第十二连从速移驻清涧，与李象九第一营合兵一处，然后在清涧伺机举行起义。同时，会议认为部队举行起义的行动事关重大，决定石谦的灵柩从榆林送回清涧县后，暂不发丧送往石谦家乡白水县，同时火速派人到西安，将清涧起义的部署和准备工作汇报中共陕西省委，待省委指示后，即开始行动。

中共军特支紧急会议后，谢子长从清涧县城速返安定县，借第十二连执行井岳秀令开赴宜川县换防为幌子，把队伍移驻到清涧县城，与李象九第一营合兵一处。

不几天，石谦的灵柩从榆林运到清涧县。当灵柩运至县城北的岔口时，李象九、谢子长等亲率部队排着长队默哀，接人城内，安置在文庙殿堂之中，为石谦举行了祭奠仪式。

驻守安定县的骑兵队种宝卿也从安定赶到清涧县城。种宝卿来清涧之意有三：一是接到井岳秀的密电，到清涧观察石谦死后李象九部队的变化情况；二是来清涧给石谦吊唁；三是因与李象九是同乡，二人关系素好，要给李象九通个风。

种宝卿一到清涧县，听李象九说石谦身有两处致命的弹伤，是被人暗杀身亡，并非暴病而故，即气愤地把井岳秀发给他的一张电文摔到桌子上，大声嚷道：“井大人搞的是什么鬼？益斋是遇刺身亡，为何要编出一套谎话来骗我！”

李象九拿起电文看完，试探地问：“宝卿老兄，井岳秀在电文中说得清楚，要你骑兵队对我严加防范，你准备怎么对待？”

种宝卿毫不掩饰地说：“象九老弟，你我同乡，在一起共事多年，你也没有对不住我的地方。你真是共产党，我骑兵队能有几个人，能防得住你吗？我决不会落井下石干出对不起老弟的事，只要你在清涧一天，我就有一天的人情在，保证不动你一根汗毛。”

李象九对种宝卿的这种侠肝义胆非常感激，特地拿出几百块银洋相赠，种宝卿拒不收取而返回安定县。

## **中共陕北军事委员会成立**

种宝卿回到安定县不久，石谦部中共军特支派往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后，军特支隶属省委直接领导）汇报请示的人返回。此时负责省委军委工作的李子洲指示石谦部军特支：井岳秀企图借整编、换防之机消灭我李、谢部队，不能坐以待毙，应立即行动，准备起义。

同时，省委军委指示：绥德、延安的地方党组织应选派党员骨干，去李象九部加强共产党的力量。根据省委军委的指示，李象九营和谢子长连在清涧开始积极筹备起义。

几天后，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的“九二八”扩大会议精神传送到清涧县。

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国南方革命武装形势的发展形成的《军事运动决议案》指出：“本党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刻不容缓了，……我们在军事根据地，除去东南以西北为重要，所以培植革命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

按照省委决议案的指示，石谦部军特支立即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了领导这次部队起义的组织机构、预定起义的日期和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在清涧县城很快成立了中共陕北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共陕北军委），军委书记由唐澍担任并兼军特支书记，与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委员统一领导和指挥起义。



唐澍

唐澍，字东园，直隶易州（今属河北徐水）人。1903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22年，考入保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后加入共产党。1925年，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总教练，参加省港工人大罢工运动，后随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进两湖地区。1926年秋，冯玉祥在绥远省五原誓师，组成国民革命军联军，唐澍奉命去冯部，先在军官学校任教员兼队长，后任政治部主任。1927年初，随冯部到西安，任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兼教官。

同年5月，随冯军进军河南。7月初，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部队实行“清党”，唐澍与刘志丹等共产党员在开封被强行“礼送”出境，后返西安，参与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的领导工作。

唐澍与省委军委书记魏野畴一起到陕北巡视工作。8月被留在陕北，与李象九、谢子长等在石谦旅领导部队党的工作。他与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以延迟石谦的发丧日期为掩护，加紧进行部队起义的准备工作。经中共陕北军委会议充分讨论酝酿，决定以石谦的发丧日期为起义日期，并以“为石旅长报仇”作为口号，借部队换防之机在清涧发动起义。部队起义的日期确定后，在讨论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时，中共陕北军委内部对部队

起义后的行军路线和部署意见产生分歧。李象九与唐澍两人各执己见，争论十分激烈。

李象九认为，当前敌强我弱，部队起义后，首先应打击军阀井岳秀的弱点，才可出奇制胜。高双城师除石谦旅被党控制外，还有左协中和杨袞两个旅的兵力。左协中驻守在耀县、同官一带，虽能听从高双城的指挥，但一时难以调集北上；杨袞旅在宜君、洛川一带驻守，虽易于举兵北上，但此人桀骜不驯，高双城难以指挥得动他。高双城在肤施的师部空虚，是起义部队攻击的最佳目标。因此，李象九主张起义部队应借运送石谦灵柩回白水、路经肤施之机，由清涧出兵直捣高双城的老窝。起义部队可先派遣护送灵柩人员暗藏兵械，埋伏到城内，然后大军轻装袭取肤施。如肤施到手，部队即可回师北上，与驻守神府早有反井之心的高志清联合，对井岳秀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攻占绥德、榆林及其近属十余县，然后再图向南发展，与杨袞、左协中抗衡。

而唐澍则认为，正因为当前敌强我弱之不利，部队在起义后，首先应集结石谦旅其他几个分散在各县的起义连队，将起义部队退至宜川，再根据形势的变化情况，北上则能与高志清共击榆林井岳秀，南下则能与关中北道的高峰、许权中联合。因此，唐澍主张清涧起义后李象九和谢子长的部队应将分散在延川、延长、宜川等县的起义连队合兵一处，集中到宜川形成一股力量，再与井岳秀对抗。如不集中各县分散的起义连队，仅以清涧起义的部队孤军袭取肤施，事举未必成功，且分散在各县的起义连队有可能被康子祥乘机吃掉。康子祥是起义部队完全控制石谦第六旅的内患，此时应乘康子祥刚被委任代旅长，还未得军心之时，肃清石谦旅中异己，以掌握石谦旅的全部兵力，高双城及其左协中和杨袞两旅自不敢藐视作对，到起义部队南下北上运动皆可自主。

在这两种意见的激烈争论下，最后，中共陕北军委的多数人决定按照唐澍的意见，确定了起义部队的行军路线和部署。当时，在清涧县驻守的部队是李象九第一营白雪山、韩子丰、雷进财三个连，加上谢子长第十二连，共为四个连的兵力。中共陕北军委决定部队首先在清涧起义后，挥师南下，与驻守延川县的王有才一个连和驻守宜川县旅部的李瑞成、王振娃、

杨重远三个连，共八个连，在宜川会师。

为使延川、宜川两县参加起义的王有才、李瑞成、王振娃、杨重远四个连队按照中共陕北军委的既定方针如期策应，做好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李象九营部派出李维俊、吴锡昌二人骑快马，分别直奔延川县王有才连和宜川县李瑞成、王振娃、杨重远三个连，送去联络密信。同时，派人到绥德、肤施等地，与各地党组织联络，要求选送共产党员、团员骨干参加起义。

10月8日，清涧县城正逢集日，中共陕北军委为确保起义顺利进行，召开了军委紧急会议和排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向与会的共产党员和干部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清涧起义的批示和部队军委关于起义的各项规定，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者做好起义前的充分准备。

会后，部队决定利用当天集日的机会，把凡是进城的牲口和脚夫全部组织起来，以备在起义出发时驮运物资之用。同时，李象九派出代表北上联络驻神木县的高志清，约高志清旅在神木同时举行起义，共同夺取绥德、米脂，夹攻榆林，消灭井岳秀的反动武装。

### **清涧县城行动**

1927年10月11日下午，李象九派人割断县城所有电话线，突然实行全城戒严，一律不许城内人员出城。接着，李象九又派出随从护兵阎红彦和白锡龄，各带一个班，把县长张益和城内五家大商号的掌柜请到东大街营盘大院。张益和五家大商号的掌柜一到营盘大院，李象九就话不绕弯地对他们直言道：“部队要奉命行动，但因军情紧急，军用物资一时难以筹足，有求诸位长官和绅士，能借用些钱物暂用。今凡部队所借的钱物，均由我亲手打出借据，日后一定如数奉还，务请诸位体谅。”

五家大商号的掌柜在这几天见部队先聚集骡马、组织脚夫，后又全城实行戒严，满城岗哨林立，再看营盘大院里的许多士兵，荷枪实弹排列两行，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他们，料定钱物不借给部队，难得离开这个大院，说不定还有横祸临头，都苦在心里装笑脸，异口同声答道：“只要李营长不加伤害，钱物愿意借给部队。”

张益县长平素甚有些威风，此时，一张脸吓得苍白。他结结巴巴地对李象九说：“李营长，部队奉命行动，县里本应筹集款子鼎力相助，谁知事不凑巧，县里有一笔军款，刚被种宝卿派来的军需官高凌云取走。眼下我实在无款可筹了，万望李营长体谅卑职之难处，高抬贵手。”

高凌云的家就住在清涧县城内。李象九问清了高凌云家的地址，立即派出白锡龄带着一个班，到高凌云家去取款。

白锡龄带着一班士兵到了高凌云家。家里人称高凌云已离开县城去安定县了。白锡龄见不到高凌云，又讨不到军款，只好把高凌云的家人全都带到营盘大院。经李象九几句质问，高凌云的家人知道难以隐瞒下去，只好讲出实话，说高凌云携款仍躲藏在家。

李象九随即提笔写了一个字条道：“种、石两团(种宝卿骑兵队原亦属团建制)相交莫逆，岂能胡来!我处于进退两难之际，先将种团军款一借，待到宜川整理内部后再作道理。”

李象九将写好的字条交给高凌云的家人，让其带给高凌云。原来高凌云从张益手里提到军款后，察觉到李象九第一营和谢子长第十二连在清涧县有异变行动，想尽快离开县城返回安定县，不料全城突然戒严。他一看县城内如此紧张，心里担忧军款会被李象九索走，不好向种宝卿交差，只好躲藏在家里不敢露面。此时，高凌云看到李象九的手条，不敢抗命，只好将提到手的军款全部交了出来。

与此同时，李象九派出几个班，分别到城内五家大商号店铺搬运已查封的物资。在城内高双城开的一个商号店铺里，除所查封的物资之外，没收大烟土数万两。李象九有个随从护兵叫黄财富(又名黄中甫)，看见几家大商号店铺里搬出一箱箱的大烟土，还有那白花花的银洋，真傻了眼。他在人们搬运物资的混乱之中萌生邪念，以为有了大发横财的机会，便把大烟土和银洋大把大把地装进自己的怀里。其他搬运物资的士兵见李象九的随从护兵如此光景，大家都红了眼，你抢大烟土，他抢银洋，几个大商号店铺里顿时混乱一片。

李象九得知此情，甚为愤怒，立即命令将黄财富等人抓起来。黄财富一听说李象九要抓自己，见势不妙，带着劫到的烟土和银洋拔腿朝城东大

街窜去，想从城东门逃出城外。李象九听得黄财富向城东门逃去，便命人追捕，并令士兵：如黄财富拒捕，就地枪毙，以严军纪。黄财富逃至东城门下，未及窜出城外，就被乱枪击毙。

李象九的随从护兵黄财富被击毙后，几家大商号店铺的混乱状态很快得以控制。士兵们再没一个人敢在搬运物资中有拈针带线的不轨行为，顺利地在五家商号店铺筹集到大烟土、银洋等物资 200 余驮，解决了部队起义的军需供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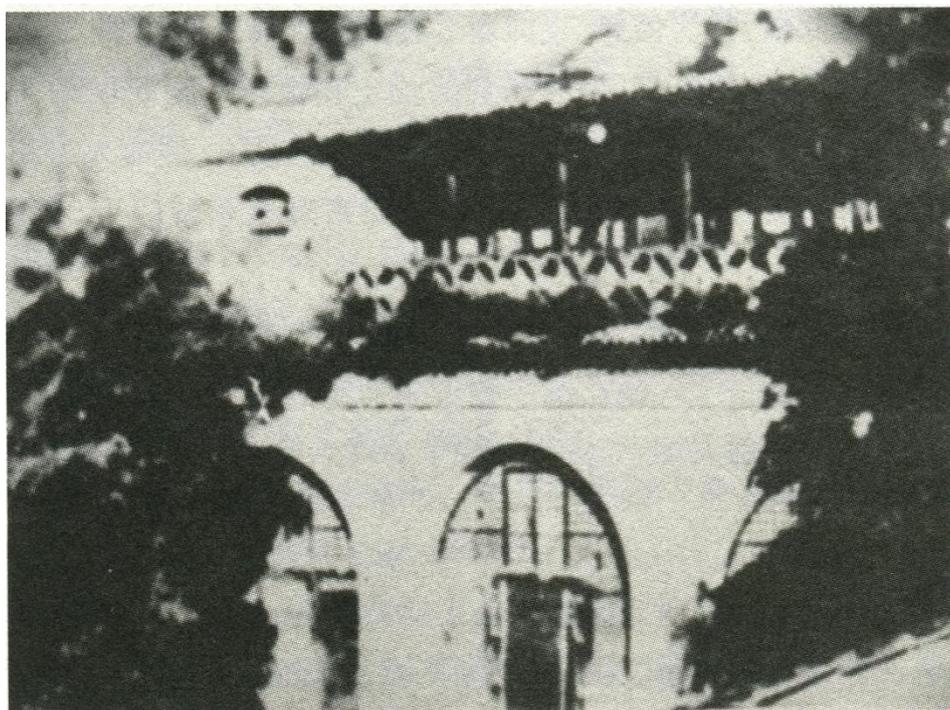
## 第十六章

### 挥师南下

#### 打响第一枪

1927年10月12日，中共陕北军委在李象九第一营和谢子长第十二连的一切起义准备工作就绪后，由唐澍、李象九、白明善、谢子长等组成了起义指挥部，领导这支清涧起义部队打响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武装起义的第一枪。

是日晚，起义指挥部先给各县地方组织选派来清涧参加这次起义的共产党员、团员和革命青年分发了枪支弹药。然后，将部队参加起义的全体



清涧起义指挥部旧址

官兵和各地派来人员一起整队集合到县城内的文庙大院内。由李象九主持，为石谦旅长举行发丧前的公祭仪式。全体官兵对井岳秀杀害石谦旅长群情激愤，士兵们举起枪高喊：“为石谦旅长报仇！”“打倒军阀井岳秀！”雷鸣般的口号声响彻这座山间小城的夜空。

在公祭大会上，中共陕北军委书记唐澍向全体官兵讲了话。他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罪行，并历数井岳秀的种种罪恶事实；介绍了朱德、周恩来、贺龙等领导南昌起义的情况。最后，李象九发布部队起义令，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这支部队从现在起由共产党领导，全体官兵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倒陕北军阀井岳秀，为石谦旅长报仇！”并宣布起义部队南下令：要求全体官兵铲除兵痞作风，严守革命纪律，秋毫无犯，在南下途中奋勇作战，与各县参加起义的部队在宜川大会师。

部队宣布起义后，起义指挥部将制好的红布袖条分发给每个参加者缠在臂部，作为起义军的标记，把准备好的标语张贴到县城的大街小巷。同时，派出起义部队的一个连，将清涧县城国民党警察局包围，收缴了警察局的全部枪支弹药。

起义部队的指挥部设在营盘大院。在繁忙的指挥部里，李象九、唐澍、谢子长、白明善将派往各起义连队检查各项准备工作的人员刚送出门，正要抓紧时间开会，研究起义部队行动的具体事宜时，突然，城内县第一高等小学的十几个学生吵吵嚷嚷地冲进指挥部。这十几个学生一进指挥部，抢着说他们都要报名参加起义军，兵募处的人都说他们年纪太小，不但不让他们当兵，还把他们的训斥了一顿。他们围住李象九，好说歹说要当兵。李象九见十几个学生年纪大的才十五六岁，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就劝他们回去好好读书，等长几年再来当兵。虽经耐心解释，好言劝说了半天，但这些学生依然缠着不肯离开指挥部。

这时，县第一高等小学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教员白志强和王怀德，闻得学生们跑到指挥部闹着要当兵，急忙赶到指挥部。经白志强、王怀德与李象九商量后，决定把几个年纪大点的学生留到部队。几个年纪大点的学生心愿已遂，剩下师学温、王守一、王震五几个年纪小的学生，被白志强、

王怀德连哄带拉劝离指挥部。

10月13日凌晨，起义指挥部率领李象九第一营和谢子长第十二连，组成1000余人的起义大军，辎重300多驮，浩浩荡荡开出清涧县城，挥师南下。一路上起义部队全体官兵人人英姿焕发，高唱着由白明善编写的起义军军歌：

陕北有个害民贼，  
名叫井岳秀，  
甘做军阀奴。  
纵杨衮，  
杀名流，  
罪属莫须有。  
先打高双城，  
活捉井岳秀，  
志愿不遂，  
目的不达，  
至死不回头。

起义部队开出清涧县城南五里地的赤土沟时，只见后边有几个孩童尾追而来。等几个孩童追上部队，李象九才认出是昨晚上没有当上兵的师学温、王守一、王震五等几个小学生。李象九、白明善再三给他们耐心做说服工作，他们只得流泪止步，泪眼遥望着起义部队扬尘远去。就此一斑，可见李象九部队在清涧县开展革命活动深受群众拥护之热情及群众踊跃报名参军之情景。

当天下午，起义部队从清涧出发到达延川县。在延川县城驻守的是王有才的一个连。起义部队与王有才连的起义队伍合兵一处后，在延川县城略作休息，乘夜继续向南挺进。

起义部队离开延川县城，在行军途中，碰到高双城部的一小队士兵赶着骡马，有40驮大烟土要运往肤施去。李象九命令将这些骡马和大烟土全

部缴获。

押运大烟土的士兵，自恃在高双城辖地，李象九仅是高双城部下的一个营长，无端截获上司的骡马和大烟土，真是在太岁爷头上动土，要与李象九论理，有个小头目还掏出高双城的手谕，展现给李象九看。

李象九接过手谕，撕个粉碎扔在地上，即命左右道：“把他们一个个捆起来，带上走！”

押运大烟土的士兵这才慌了手脚，连忙求饶，空手朝肤施方向逃去。

### 智取延长县城

1927年10月14日，起义部队南下抵达延长县。延长县城是由齐梅卿第三营营部和其所属两个连驻守。齐梅卿是康子祥的主力战斗营。在临近延长县城时，对如何攻克延长县城、吃掉康子祥的这支驻军，起义指挥部开会进行讨论。大家认为只宜智取，不能强攻。于是，决定由谢子长第十二连以连队受命调遣、由安定县移驻宜川县换防为幌子，骗得齐梅卿的信任，先开入城内，大军埋伏在城外，然后里应外合，将齐梅卿的军队一举歼灭。谢子长即带着连队大张旗鼓地直开到延长县城下，声称连队换防宜川路经此地，要在延川县城稍许休息。

驻守延长县城的齐梅卿并不知李象九营和谢子长连起义举事。他听得谢子长第十二连奉命到宜川县换防，路经城外，毫无防范，立即传话守城士兵，大开城门让谢子长连进入城内。

谢子长率领第十二连进得县城后，先命一个排的队伍把守住城东门，以备战斗开始后歼灭齐梅卿城东门的守军，迎接大部队入城。待谢子长的连队在城内一家骡马店刚驻下，齐梅卿出于礼貌，便带着两个护兵大摇大摆地前来看望。

齐梅卿走进谢子长的连部，谢子长正在洗脚。齐梅卿满脸堆笑地说：“齐某来迟，多有失礼。谢连长住在这样简陋的地方真是太委屈，请到我的营部去吃饭。”

谢子长抬起头说：“我们先在这里休息。”

齐梅卿还要说些主宾之礼的话时，只见谢子长朝门外摆了一下手。这

时，随谢子长一同入城的王有才带着几个士兵，随即从门外冲入，将齐梅卿和两个护兵围住，强行缴了他们三人身上的枪。

谢子长对齐梅卿道：“齐营长，井岳秀残忍无道，无故杀害我们石旅长，官兵上下义愤填膺。为给石旅长报仇，我和李营长已举义兵讨井。如今大军临城，延长城被包围，破城只在弹指之间。你是愿归顺义军反井还是要做拥井的鬼魂，两条路由你选择一条。”

齐梅卿顿时吓得浑身发抖，脸上豆大汗珠成串冒出，连连道：“既是你和李营长为石旅长报仇，大举义兵反井，我齐梅卿也不是不仁不义的人，愿随你们反井，绝无半句假话。”

谢子长笑着说：“齐营长既然深明大义，愿意联合反井，那就请你先下令，立即叫你的队伍赶快放下武器，缴枪投降。”

齐梅卿无可奈何，只好哭丧着脸接受了谢子长提出的投降条件。谢子长带着队伍，押着齐梅卿到营部，逼着齐梅卿下令将营部所属部队集合起来。待李象九率领起义大军冲入城内时，谢子长没费一枪一弹，已将齐梅卿营部 200 余人的枪支全部收缴。

此时，在县城的山上驻守着齐梅卿一个排的队伍。这个排居高临下，俯视可观全城，发现齐梅卿营部的队伍在城内有变，立即从山上越过城墙，向肤施方面逃窜而去。

当天，起义部队在延长县城未作停留，大军继续南下，向宜川县方向挺进。部队出城不远，指挥部在对齐梅卿的处理问题上发生分歧。唐澍认为，齐梅卿是康子祥的亲信，并非有投降起义军的诚意，日后必然为患，为保证部队的纯洁和健康，应将齐梅卿处决，以肃清部队隐患。李象九则认为，部队刚起义，石谦第六旅像齐梅卿这样的旧军官甚多，如对齐梅卿采取极端的镇压手段，恐影响军心，不利于石谦旅对共产党有好感的军官投降归顺，会导致起义军树敌太多。指挥部经过一番激烈争论，还是决定将齐梅卿就地枪毙。

当晚，起义军夜宿老朱河。次日，从老朱河出发，途经云岩镇，收拾了一股民团队伍。

## 宜川会师

1927年10月15日下午，起义部队赶到宜川县城外的白家塬时，听见县城里已是一片激烈的枪炮声。这时，在宜川县等待参加起义的李瑞成、王振娃、杨重远三个连队已经按约定时间提前起义，与康子祥旅部的队伍交战有一天一夜的时间了。

原来，康子祥早已怀疑李瑞成、王振娃、杨重远三个连长是共产党。白石谦在榆林遭井岳秀杀害、康子祥被委任为石谦旅代旅长后，军内上下人心惶惶，一片不宁。康子祥虽未能及时采取手段解除李瑞成、王振娃、杨重远的兵权，但防备之心日甚，表面上经常邀请李瑞成、王振娃、杨重远三人喝酒交朋友，暗中却派出密探一直盯梢。

10月14日夜，李瑞成抓到康子祥打发到连里盯梢的一个士兵，经讯问得知，康子祥已接到井岳秀的密电，得知李象九第一营和谢子长第十二连在清涧兵变举事，并由清涧县率军南下，要他严加防范，阻截叛军。康子祥得此电讯，怕李瑞成、王振娃、杨重远的三个连有变，决定采取应急措施，并准备于次日先行扣押三人，以防不测。

李瑞成在情急之下，怕事有泄露，也来不及与王振娃、杨重远取得联系，立即命令自己的连队连夜在宜川县城举行起义。

晚10时许，李瑞成把一连仅有的三个排分成三路，从三个方向朝康子祥旅部偷偷摸去，决定采取突袭方式对康子祥的部队发起攻击。康子祥的旅部驻守着三个连，李瑞成的兵力与之相比显然悬殊，只能以每路一个排的兵力来对付康子祥一个连的兵马。李瑞成命令带队的三个排长在行动中务必谨慎小心，脚步放轻，不准发出响动，以少胜敌，给康子祥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

李瑞成与一个排长所带的一路，刚摸到康子祥旅部的门口，一个哨兵枪栓“哗啦”一拉，问道：“什么人？”

李瑞成即应道：“自己人。”

李瑞成原是李象九的随从护兵，枪法极好，待哨兵刚拉开大门，他手举枪响，就把哨兵打了个脑袋大开花。接着，李瑞成带着全排战士冲进院子，直奔旅部前院。

旅部前院的窑洞里，住着旅部一个直属警卫连。李瑞成带着战士们扑到窑前窗沿下，几颗手榴弹顺着戳破的窗纸，一齐扔进一孔窑洞里。只听得一声轰响，把窑洞里的炕板都炸得乱飞，里边发出一片鬼哭狼嚎之声。

后院里正在睡梦中的康子祥，听到前院枪声大作，连衣服都顾不得穿上，急忙命令驻守在后院的一个警卫连拼死抵抗。此时，王振娃、杨重远听到旅部方向响起激烈的枪声，才知道是李瑞成与康子祥已经打起来，立即各带自己的连队朝着旅部赶来，配合李瑞成的连队向康子祥旅部发起进攻。由于是在晚上作战，李瑞成、王振娃、杨重远三个连的起义队伍，虽然把旅部包围起来，但不敢贸然向前推进。康子祥在县城内情况不明之时，也不敢轻举妄动地迈出旅部半步。双方在旅部内外相对峙，整整激战了一个通宵。

到天亮，李瑞成、王振娃、杨重远三个起义连队又与康子祥部展开巷道争夺战。

到下午时，经过激烈的战斗，李瑞成、王振娃、杨重远的三个起义连队步步推进，已把宜川的半个县城控制到手里。

南下起义大军在宜川县城外的白家塬，一时难以摸清县城内敌我战局和参加起义部队驻地位置，不敢挺军贸然前进。为侦察清楚敌我双方的准确位置，李象九命令司号兵，按照预先确定的与李瑞成、王振娃、杨重远三个连联络的信号向县城吹起号声联系。李瑞成、王振娃、杨重远听到城外的号声，得知李象九所率的起义大军南下，已抵宜川县城外，立即由司号兵吹号回应。通过双方号声的联络，李象九掌握了李瑞成、王振娃、杨重远三个起义连队的准确位置后，下令几十个司号兵一齐吹起冲锋号，向宜川县城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城外起义部队从西门向城内攻入。康子祥部的一个连驻守着西门，连长叫雷克让。雷克让企图拼死抵抗，用机枪集中火力将西门严密封锁。李象九指挥部队发起几次进攻，雷克让连虽伤亡惨重，但所带残部仍负隅顽抗，拒不缴枪投降。交战许久，直到雷克让和一个排长被起义部队击毙，县城西门战斗方息。

康子祥见西门失守，自料难以抵抗，便率旅部和三个连的残兵，突出

县城东门，顺着凤翅山朝肤施方向退去。清涧、延川、宜川三支起义部队，即在宜川城内胜利会师。

井岳秀闻报石谦第六旅李象九第一营和谢子长第十二连在清涧起义，并已率部一路南下，击毙齐梅卿，打败康子祥，与延川、宜川两县的起义部队汇集宜川县城时，大惊失色，慌乱不堪。他连忙向陕北各地驻军发出电令，紧急集结绥德、肤施、安定等地驻军，立即出兵堵击，伺机围歼。

## 第十七章

### 血战突围

#### 坐守孤城

在宜川县城，各路起义部队会师后，起义指挥部的领导人对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发生了重大分歧。

唐澍认为，在井岳秀尚未集中军队向起义部队行动之前，部队应趁此时士气高涨，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连打几个胜仗，可震慑敌人，使井岳秀部各军队不敢轻举妄动向起义军围击。同时，他主张肃清内部，纯洁起义部队的军官，把非党的军官干部清洗出去，部队公开打出革命的红旗。

而李象九则认为，起义部队刚到宜川县城，随军家属及行李很多，尚未休整之前，应继续沿用井岳秀部第六旅的旧番号，以地方武装割据，这样做有利生存，容易保存革命实力。同时，他主张对刚起义的旧军队不宜过苛要求，如大量清洗起义军的非党军官，容易造成部队分裂，动摇军心。

中共陕北军委几番激烈讨论均未果，李象九即按自己的主张，在起义部队进入宜川县城后，就在城外修筑工事，



李象九

派兵设防，命令王有才、雷进财两个连驻守虎头山，韩子丰连驻守凤翅山，谢子长第十二连和李象九营的第三连（即学生连）驻守七郎山。唐澍见李象九坚持己见，即建议部队应拉出一两个连，到宜川县城外 30 里地的交道塬设防，认为那里地形险要，如井岳秀军队前来围击宜川，便于部队进退，但李象九仍没有采纳唐澍的意见。

起义部队按照李象九的主张，在宜川进行了休整。在休整中，部队进行了重新整编。部队仍然以一个旅的建制进行整编，对外继续沿用旧的井岳秀部第六旅番号。由李象九任旅长，呼延震西为旅部副官，史唯然为旅部书记官，下辖三个营。第一营营长谢子长，党支部书记崔凤鸮；第二营营长韩子丰，党支部书记王怀德；第三营营长李瑞成，党支部书记马培梓。三个营下辖共编九个连，连长分别由谢子长、李瑞成、韩子丰、白雪山、王有才、杨重远、李贵荣、王振娃、雷进财等担任，另外还有一个学生队，队长由石谦之子石介担任。原旧军队的班排长仍然留用。

在委任旅参谋长的问题上，军委内部争论不休。李象九主张由原旅部参谋孟徽斋任参谋长，唐澍任参谋。而唐澍则认为孟徽斋不懂军事，只会写八股文，根本不能指挥部队打仗。最后，还是按照李象九的主张，任命孟徽斋为旅部参谋长，唐澍为旅部参谋。

在军委召开的多次会议上，对部队的好些重大决策问题，李象九未能尊重唐澍的建议，坚持己见，他与唐澍的认识终难统一。唐澍在呼延震西跟前说：“我不是为做官来这里的，要是为做官，在冯玉祥的部队里有的是官做。让我当参谋，不能带兵嘛！当参谋长能领部队打仗，打不成，可带辎重退到大南川。”并在谢子长、白明善跟前也说过些参谋长孟徽斋不称职的话。他决定离开部队，去西安请示中共陕西省委。临行前，部队给唐澍备好一骡驮银洋，让他带到西安，交省委以济活动经费。

唐澍一离开起义部队，李象九不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即主持中共陕北军委工作并作出决定，公开打出石谦第六旅的旧军队番号，并对部队重新进行改编，准备以地方武装割据，滞兵宜川县城不动，仍按照中共陕西省委原定计划，在宜川县城期待着史可轩和许权中旅北上会师。但因李象九尚不知此时史可轩在美原镇遇害、部队受挫，许权中已将部队移驻临潼

的实情，致使起义军在宜川县城处于四面空虚无援、坐守孤城的危局之中。

## 宜川城受困

井岳秀乘李象九在宜川县城按兵不动之机会，命高双城部倾其兵力，向宜川方向围攻而来。高双城为了赢得调兵遣将、集中兵力的时间，一面集结兵力向宜川县疾进，一面派出密探先行打入宜川县城内，并写信给起义军里的一些旧军官，煽动他们投降，以瓦解起义部队。

李象九在宜川滞兵 20 余天，高双城集结六个团的兵力，以充足的时间相继全部抵达宜川县境，由高双城亲自出马督率，将宜川县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即以优势兵力向县城发起猛烈进攻。

高双城首先指挥军队向驻守县城外虎头山的起义军发起攻击。

虎头山驻守着王有才、雷进财两个连，连长雷进财不是共产党员。他从清涧随李象九起义时就思想不纯，想借李象九起义举事升官发财，不料部队到宜川县后，与他同是连长的谢子长、韩子丰、李瑞成都升任了营长，而自己还是个连长，心里深为不满。在高双城向宜川县城发动进攻之前，打入起义部队的密探乘机煽动雷进财投降，并许以重金购买，他就在起义部队里暗中进行瓦解、破坏活动。

当高双城向虎头山发起进攻的枪炮声一响，雷进财立即和部分事先串通的班排长，与高双城军队内外勾结，全连不发一枪，主动放弃驻守宜川城外的前沿阵地虎头山，拉着队伍撤退到县城内的七郎山。王有才的一连队伍无法坚守阵地，也被迫撤回县城内。高双城的军队不费吹灰之力竟轻而易举地将虎头山攻克。

虎头山是宜川县城外的一个最高山头，是构成县城防线的主要外围军事要地。虎头山阵地一失守，不但县城外完全控制在高双城军队的手里，而且县城内也落入高双城军队的火力射程之内。

七郎山是宜川县城里的最高处。雷进财从城外的虎头山阵地撤退到县城里的七郎山阵地，见驻守在七郎山的李象九营第三连和谢子长第十二连的战士们向逼近城下的高双城军队奋勇射击时，便红着眼窝大声呼叫：“弟兄们，不要乱打枪，都听我的指挥！”

正在与高双城军队激战的战士们，听到雷进财的一阵呼叫，都觉得奇怪，大家都没听说雷进财就任了什么新官职，怎么驻守七郎山的两个连队都归他指挥呢？战士们没接到李象九的命令，谁都不理睬雷进财，仍然继续向城外开枪。

雷进财见驻守七郎山的两个连不肯听他的指挥，随即又大声呼喊：“弟兄们，王有才连的张排长在虎头山带着一排人投降到那边，虎头山失守了，这个山头也守不住了，快撤！”

在雷进财的煽动和瓦解下，驻守七郎山的两个连人心惶惶，与高双城军队交火的斗志顿时涣散，也被迫从七郎山撤了下去。由于第三连和第十二连失掉了七郎山阵地，致使其他城防阵地得不到火力的配合，也相继失守。

在凤翅山驻守的是韩子丰和其他一个连的部队，设置有两道防线阻敌。

这时，因县城内各处设防的制高点失守，高双城军队的火力全部集中到凤翅山，使得驻守凤翅山的两个连也未能发挥作用。

天近黄昏，宜川县城内外的制高点虎头山、七郎山、凤翅山相继失守，城内起义部队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李象九果断决定：起义部队乘夜突围，撤出县城，摆脱危境，全军退到宜川县西南面的大南川。

## 冲出县城

是夜，起义部队从宜川县城开始突围行动。李象九命令谢子长带领一营兵力为突击队，调集 300 多支手枪，首先突出城外，直捣离县城五里路的党家圪崂，抢占高双城部高玉金营的阵地，为起义大军向南突围扫清障碍。李象九亲自率领旅部和韩子丰、李瑞成两个营的兵力护卫随军家属和辎重，随后突围出城。

战斗一打响，谢子长按照突围计划，带领一营战士从县城南门冲出，在城外与围堵的高双城军队拼死奋战，左冲右击，杀出一条血路，直奔党家圪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高玉金的一个营击溃，抢占了高玉金营的部分阵地，以待后续部队突围。

这时，由李象九率领的突围大军紧跟在谢子长突击队后面。部队中驮运辎重的骡马多是民用牲口，突然受到猛烈枪炮声的惊吓，立即狂蹦乱跳，四处奔跑，不但冲乱了突围部队的队列秩序，而且使得骡马驮着的枪支弹药等物资大部分丢遗街道，尤其是许多箱子里装着的大烟土和银洋，在地上撒了一层。一些沾满旧军队陋习的贪财士兵，一见大烟土和银洋就红了眼，也不顾什么突围不突围，忙着到处乱抢横财，有的士兵甚至干脆用刺刀撬开驮子上封好的箱子，把大烟土和银洋装满一身溜之大吉。跟在辎重后面的是一大堆随军家属，她们没有出城就乱成一团，你挤我争，喊天叫地，全都乱了套。

在谢子长一营突击队冲出县城后，李象九不明城外前锋的战况，又见随军家属、辎重驮子及部队还未冲出县城就一片混乱，不敢贸然尾随谢子长的突击队冲出城去，又将县城内余部从南门折回，重新组织部队由县城西门突围。

县城西门正是高双城军队防守的火力重点。李象九率部队刚从西门冲出，城外的几挺重机枪一齐响起，许多战士纷纷倒在血泊之中。此时，高双城军队乘机向突围的起义部队喊话：“你们出不去啦，快点投降，缴枪不杀！”

在县城西门，由于高双城军队围堵严密，火力甚烈，李象九率领的部队无法突围出城，不但使部队战斗力锐减，而且有许多士兵缴枪投降。李象九见西门外的围堵火力密集，部队死伤惨重，叛投高双城军队的士兵甚多，便放弃从西门突围的计划，率部队又折回原路，仍从南门再次进行突围。

部队在县城内几经周折，除谢子长的一营兵力全部冲出重围外，李象九所率的旅部和韩子丰、李瑞成的两个营在突围战斗中均被高双城军队打散，冲出重围的人数甚少，多被高双城军队俘获。

当部队撤到预定的地点大南川集中时，李象九所率的旅部和韩子丰、李瑞成的两个营几乎全军覆没，战士所剩无几。在宜川县城会师时曾有 1000 余众的起义部队，突出宜川县城后仅剩 300 余人、十几匹骡马，枪弹物资丢失殆尽。

## 第十八章

### 率军北上

#### 接受收编

宜川县西边的大南川人烟稀少，靠近梢林。李象九率领从宜川县城突围出的 300 余人，退至孙家沟一带，暂作休整。这时，由于部队在突围战斗中损失惨重，部队领导对今后的行动茫然，士气十分低落。

随部队突围到孙家沟的雷进财，见部队挫败、军心动摇，趁此机会企图煽动士兵叛变，拉出他的连队去投降高双城。部队刚到孙家沟，雷进财



雷恩钧

就开始在他的连队里暗中串联班排长，密谋策划一场叛变。当时，雷进财连三排排长是雷恩钧。雷进财找到雷恩钧，偷偷对雷恩钧说：“宜川的杨袞从大南川开上来了，有人看见杨袞的队伍就在附近。现在咱们的部队死的死、散的散，很快就要散伙了。我们都是当兵吃粮，不管到哪里，你排长会有个连长当，我连长会有个营长当。这里再干下去就要脑袋搬家了！”

雷恩钧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陕西安定县人，原在安定县谢子长创办的民团当团丁，由谢子长介绍入党，后随谢子长领导的民团编入石谦部，在李象九的第三连当兵。关中道驱逐镇嵩军刘镇华的大战中，麻老九部下的雷进财见

刘镇华大势已去，难以在陕西立足，即摇身一变，带着一连队伍投降石谦部下。石谦部中共军特支为了改造雷进财这支旧军队，在雷进财连队派入一批共产党员，雷恩钧就是其中的一个。雷恩钧见雷进财在部队处境危急之时明目张胆地煽动士兵叛变，即采取将计就计的办法，摸清了雷进财的叛变计划，迅速将情况报告了谢子长。

雷进财阴谋叛变、企图拉走他的连队向高双城投降的情况被李象九掌握后，部队及时采取应急措施。当天上午，部队刚在大南川的孙家沟陆续集中，休息了没几个小时，从宜川县城突围出的人员未及整顿，李象九速令部队撤离孙家沟，全军转移。在行军途中，李象九为预防雷进财乘机拉走队伍，暗中派出几个共产党员骨干严密监视雷进财的行迹，致雷进财不敢轻举妄动，叛变阴谋未能得逞。

当天夜里，部队开到慕家村宿营。一到慕家村，谢子长奉命立即赶到雷进财连的驻地。谢子长带着几个随从护兵，借口检查各连宿营吃住情况，在连部缴了雷进财的枪。随即将雷进财的连队集合在一个空地，向全连战士宣布了雷进财煽动士兵、企图叛变投敌的罪行后，将雷进财拉到一个草滩上，当场枪毙。同时，谢子长向全连战士宣布，任命雷恩钧为雷进财连的代连长。

此时，陕北的天气已近寒冬，但由于部队没有补给，战士们还身着单衣。为解决部队的补给问题，李象九决定将部队拉到黄龙山区。不料高双城调集的军队在那里早有设防。部队刚到黄龙山区，还未立足，高双城军队就围袭过来。李象九率领部队只得撤离黄龙山区，朝韩城方向退却。

当部队退到韩城县的西庄镇时，由于战士们几经艰苦转战，补给难以得到解决，不但全军弹尽粮绝，士气低落已无斗志，且高双城军队在后面紧追不舍，李象九深感部队已处在绝境。

正在这时，李象九的同乡杨虎城部后方留守司令王保民闻得李象九兵退韩城县西庄镇，即派人前来联络，向李象九提出收编事宜。在如此险恶形势所迫之下，李象九经与谢子长、白明善等共同商量，为暂避高双城军队的锋芒，使部队能得到补给和休整的机会，以保存革命实力，决定接受王保民的收编。王保民将起义部队收编后，改编为独立旅，仍由李象九任

旅长，驻守韩城的西庄镇一带。

起义部队被王保民收编后，高双城遂率部回到肤施。高双城为向井岳秀邀功请赏，即拟文奏报：击溃李象九兵变，缴获枪支数百支，收复了宜川，叛军残部逃窜山外。井岳秀闻讯，随即正式委任康子祥为石谦第六旅的旅长，并命其驻守宜川、延川县，对残部进行整训。

起义部队被王保民收编不久，驻守在三边的王子元因素对井岳秀心怀不满，闻得李象九在清涧县兵变南下，欲图联络李象九共同反井，即从三边特地赶到宜川县。王子元到了宜川县，李象九已率部队从宜川县城突围。后打听到李象九兵退韩城县西庄镇，王子元又赶到西庄镇。王子元一见李象九从宜川县城突围仅带出部队 300 余人，且又被王保民收编，大失所望，快快而走。王子元离开西庄镇后，李象九自感部队寄人篱下，终非长久之策。他想脱离王保民的控制，希能重振旗鼓，策军北上，与高双城抗衡，怎奈部队势单力孤。于是，李象九派出呼延震西东渡黄河，先到山西绛州一带察看形势，准备一旦时机成熟，便率部队摆脱王保民的控制，到山西绛州另辟蹊径，壮大和发展这支军队。

李象九清涧县举兵起义后在宜川县城受困突围直到兵败韩城之事，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并不知情。

这时，马明方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清党”中被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队长姚丹峰撵出部队。省委派马明方回陕北，协助唐澍、白明善等在李象九、谢子长的起义部队工作。当马明方从西安出发北上行至肤施的甘谷驿时，得知李象九、谢子长的起义部队从清涧南下，在宜川县城兵败，退到韩城县西庄镇被王保民收编，不敢贸然前往，只得赶到绥德县，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

## 西庄镇整顿

1927 年 10 月下旬，唐澍从宜川县赶到西安，找到中共陕西省委，向省委负责军事工作的李子洲汇报了清涧起义后部队南下宜川县的情况以及部队领导人内部分歧情况。省委根据唐澍的汇报，对李象九、谢子长起义部队今后如何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及军事行动方向作出了新的部署和设想。

李子洲听取了唐澍的汇报后认为，清涧起义部队会师宜川县城后的行动问题直接关系到陕西开展武装斗争的成败。陕北因地处边远之地，未被卷入战争的漩涡，共产党在陕北又有相当的基础，如今起义取得了近一旅部队，而井岳秀的实力很弱，内部又派别对立、濒于崩溃，所以起义部队在陕北不仅易于图存，若运用得当，即取得全陕北亦有可能，至少可在宜川、延长一带占据，这样就有了发展的根基。因此，李子洲对唐澍说：“起义部队今后的行动问题以及部队的整顿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在部队的党的工作应该说是好的，但因过去工作上还比较虚浮，不少党员缺乏正确观点，所以在关键时表现出个人主义的思想 and 行动。主观的条件，太觉薄弱而不可靠了。若不积极地补充实力，改变成分，增加党的力量，以改正同志因袭的恶劣倾向，前途实堪危惧。这方面要做李象九同志的工作。”

李子洲与唐澍还谈了许多起义部队的武器装备情况，分析了陕西党组织的军事力量的发展趋向。最后，李子洲告诉唐澍，省委准备开会，对这支起义部队中党的领导工作及军事行动等方面作具体研究。

根据李子洲的提议，中共陕西省委当即召开会议。会议对李象九的这支起义部队作出指示：李象九旅在陕北，井岳秀难容其久存，应避免与高双城、杨袁冲突，使部队有整顿和改编的工夫，宜巩固宜川防地，可与神府高志清结盟，搅扰绥、清敌后方，一致进攻榆林；部队目前应注意联络韩城王保民、澄合高峻为外援，以防杨袁来袭；在李象九旅成立中共党团委员会，指定唐澍为书记，李象九、谢子长为委员，军事行动计划及重要干部任免，由党团委员会决定；在李象九旅设教导队，训练干部人才，由唐澍任李象九旅参谋长，阎揆要任教导队长；旅中一切皆受共产党的指挥，一切同志皆须改正个人意志；李旅应加强政治工作，与许权中旅有密切联合，如许权中在关中不能立足，即北退组成陕北革命军，许为总司令，李为副司令，仍编两旅，许、李各带一旅。

唐澍接受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后，即与省委派出的白志强、阎揆要一行，昼夜兼程赶往宜川。当他们赶到宜川县窑河镇，获悉起义部队在宜川县城遭到高双城部的重兵围击，因突围时损失惨重已被迫退到韩城县西庄镇一

带，又朝韩城县西庄镇赶来，到西庄镇时，部队已接受了王保民的收编。

唐澍一行到了西庄镇，在部队中共军委组织内传达了省委指示，总结了这次起义的经验教训，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唐澍根据省委指示，在部队成立了教导队，由阎揆要任队长，负责培训基层干部。同时，根据变化了的形势，部队重新组织了中共陕北军事委员会，由唐澍任书记，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阎揆要、白志强任委员，并由唐澍任李象九旅的参谋长，主持部队军务。

在部队的整顿中，唐澍与李象九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又产生意见分歧。首先在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上意见不一。

唐澍认为，部队应按照省委指示，立即脱离王保民的收编，摆脱控制，再举义旗，并应公开打出革命红旗，北上清涧、安定、肤施、宜川等县党组织和群众基础好的地方，开展游击战争。

而李象九则认为，部队刚严重受挫，士气尚未复原，省委虽指示明确，但在形势有变的情况下，脱离王保民的庇护，仓促北上，势必成为孤军一支，腹背受敌，难以立足，未有成功之把握，部队将可能陷入绝境。他主张部队如若北上，则不如东渡黄河，既可摆脱王保民的制约，又可另辟蹊径，养精蓄锐，待机而东山再起。

军委多数人赞同唐澍的主张，部队决定脱离王保民的收编，挥师北上。其次，在部队干部的任免问题上亦发生争执。

唐澍认为，省委指示要求旅中一切皆受共产党的指挥，在部队干部的任用上必须彻底清除旧军队的军官成分，加强共产党的干部力量，使部队完全改造成一支布尔什维克化的军队，并提议撤换过去由李象九亲自提拔起来的一批非共产党员的连排班干部，甚至认为李象九过去委任的营长共产党员韩子丰亦不称职。

李象九则认为，革命形势处于低潮，部队刚从旧军队中搞起，成分十分复杂，如不能从实际出发，用激进的办法过早地撤换非共产党员军官干部乃至一些共产党员军官干部，会造成军心不稳，使一些可能争取和团结的非共产党员军官干部产生对立思想，甚至影响到一些共产党员军官干部的情绪，不利于部队在今后的行动。诸如此类，虽然李象九的许多建议并

不是错误的，但唐澍自以为主持部队

军委工作是得到省委支持的，固执己见，使得李象九感到很灰心。

对部队任用干部的问题，经过军委几次会议讨论，对李象九的建议均未予采纳。部队中李象九的旧部对唐澍的不满情绪很大，少不了在李象九跟前嘀嘀咕咕。在一次军委会议上，李象九力争道：“如在部队改编上，我李象九的建议一文不值，这样的军队我带不了，愿意把队伍交出来，我外出游历倒也少操许多心！”

唐澍察觉到李象九的消极情绪，不但没有积极说服和团结，反而误认为李象九不愿革命、不愿合作，今后的局面势必无法维持，部队将要造成分裂。唐澍即采取了甩开李象九的错误做法，背着李象九召开军委会议，并向李象九封锁会议精神，决定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第一支队，由唐澍任总指挥，谢子长任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史唯然任大队长，率领被王保民收编的独立旅举行第二次起义，离开西庄镇北上。

军委会议一直开到次日的凌晨，唐澍为了甩开李象九，利用部队出操机会，宣布队伍立即出发北上反攻宜川的命令，并对出操部队谎称：“李旅长带着旅部直属部队已先行出发了。”

在率军北上之际，唐澍又召开军委紧急会议，主要讨论对李象九的处理以及是否可缴李象九旅部直属部队的枪械。军委多数人认为李象九并不会叛变革命，缴其部队的枪械未免太过分，故未形成决议。

此时，随唐澍北上的韩子丰，因他的队伍驻在李象九的旅部驻地，要去带队伍随军北上，恐惊动了李象九，且由于行动过于紧急，没带一兵一卒，只身随唐澍率领的部队出发。

## “分家”

李象九的旅部直属部队驻在西庄镇的一个店铺里。清早起来，李象九旅部直属部队的司务长白锡龄到镇上买菜，听得镇上的群众纷纷议论，说早晨有 200 余人的驻镇部队朝北开拔。白锡龄听了此番议论，尚不知其中情由，急忙跑回店铺向李象九报告情况。

李象九听后，苦笑着说：“唐澍自恃革命，不听我的告诫，带着队伍与

我‘分家’，已在预料之中。如此定局，我追他也没用了。”

白锡龄急着说：“那我们该怎么办？”

李象九痛苦地说：“唐澍拉走部队 200 余人，只剩下我们几十个人的队伍，在王保民的地盘也难以立足。你我等凡属共产党员的，应速离开这里，暂且回到各地活动，以避风险。”

白锡龄听后，伤心地痛哭起来，说道：“闹革命闹到了这般田地……”

李象九安慰了白锡龄几句后，即把旅部直属部队集合起来，向大家宣布队伍解散，愿意留的人，就到王保民部去当兵，愿意回家者，发给路费。然后，李象九、白锡龄、阎红彦等几个共产党员决定东渡黄河，辗转到山西的绛州。

李象九一行离开西庄镇，几人在黄河岸边找到一只渡船，刚渡过河东，回头远望河西，只见王保民带着部队已追到河岸边。李象九眺望着河西自己曾怀一腔热血战斗过的土地，不由得长叹一声……

## 第十九章

### 第二次起义

#### 再打宜川城

1927年12月底，唐澍甩开李象九旅部直属部队，带领被王保民收编为独立旅的白雪山、史唯然两个连为主的200余人，又发动了第二次起义。这次起义公开打出红旗，组成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第一支队（简称游击队），离开韩城县西庄镇，驱军北上。

在行军途中，唐澍把游击队编为五个大队，由谢子长、白明善、阎揆要、白志强等分别担任大队长，按照拟定的行军路线，向清涧、安定县方向进发。同时，唐澍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富济贫”等革命口号。但沿途所到之处，地方群众多因战事频繁、军队扰乱不安，都闻风逃避，有时部队连吃饭都有困难，唐澍所提出的这些口号都未能付诸实际行动。

一日，游击队向宜川县行进的途中，遇到两个从宜川县城里出来的脚夫。唐澍向脚夫询问宜川县城的驻军情况时，听脚夫说宜川县城里的高双城军队大部分已经开回肤施，县城里只驻有一个连。唐澍未作侦察，轻信了脚夫的话，贸然决定攻打宜川县城。唐澍命令部队连夜急行军80余里，于次日拂晓赶到宜川县城下。

游击队一到宜川县城下，唐澍立即命令部队兵分两路，一路由谢子长带领，一路他亲自带领，向宜川县城发起进攻。其实，宜川县城里驻守的并不是一个连的兵力，而是驻守着高双城的师部，还有一个直属连。那两

个脚夫所说只驻着一个连的兵力，纯属道听途说。

游击队初期发起攻击时，因天色未亮，高双城驻军又毫无防备，且摸不清游击队究竟有多少人，谢子长所带领的一路队伍乘县城内驻军混乱之机首先勇猛地攻上了城墙，一度占据了部分城头阵地。随着天色渐亮，县城内驻军的增兵赶上城头。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在城内驻军强大火力的袭击下，由于双方兵力悬殊，谢子长所带领的队伍被迫从城头退下，贾信之等牺牲。

此时，唐澍本该适时撤出战斗，但他仍然错误地低估了高双城在宜川县城守军的力量，命令部队继续进行强攻。部队从拂晓一直激战到下午，几经对县城发动攻击，犹如以卵击石，致使部队损失惨重。当唐澍察觉到驻军在县城内并非是一个连的兵力时，才命令部队撤出战斗。在这次战斗中，史唯然因视力不好，从城墙上跌落下去摔昏，后转入地方到群众家中养病；白雪山被县城内的驻军冲出城外时打散，与部队失去联系。

部队退到宜川县城 20 里外的一个村庄，唐澍整顿清点队伍时，才发现从西庄镇带出的 200 多人，这时只剩下几十个人了。

## 艰难西进

游击队攻打宜川县城惨遭挫败后，唐澍又错误地认为，部队虽失去与高双城军队主动作战的能力，但只要寻找到一个据点，修墙筑寨，养兵固守，仍可与高双城军队抗衡。部队在一个村庄里休息一夜，唐澍决定带着游击队到宜川县东北方向处，选择靠近黄河岸边一个叫狗头山的地方，试图立足割据。当部队向东行进数十里地时，经向群众详细打听，得悉狗头山虽然地势险要，旧时曾修筑过山寨以防匪患袭扰，但只可苟安一时，山上因缺水不能久住。唐澍随即改变主意，又决定部队折回，向西茫然进发。

游击队在西进途中，捉到一个地方豪绅，要他做向导随军带路，不料这个豪绅半路乘隙逃走。由于西进道路不熟悉，又无明确的军事行动目的，唐澍又命令部队转向北去，朝廷川县与延长县交界处的交口镇进发。

游击队刚到交口镇，突然与高双城部的一个连遭遇。唐澍在危急之中，指挥疲乏不堪的部队仓促应战。战斗打得很激烈，部队又伤亡不少，白明

善的腿部中弹负伤。因游击队撤退紧急，白明善腿部负伤行走困难，不能继续随军行动，只好到延川县当地群众家中养伤。

交口镇与高双城军队一战后，游击队顺着延川与延长两县之间的川道疲乏地向北继续前进。部队到了安定县瓦窑堡附近的杨家老庄，唐澍准备把部队开到洛河川的深山处休整。但部队刚到杨家老庄休息，正要生火做饭，驻守在瓦窑堡的种宝卿带着骑兵队又跟踪而至。战士们不得不饿着肚子，再次仓促应战。种宝卿的马队冲杀一阵，部队里又有不少人伤亡，且有不少人被冲散。

部队从西庄镇第二次举行起义后，与高双城军队交锋数次，几经挫败。在瓦窑堡的杨家老庄与种宝卿的骑兵队最后一战后，经安塞、保安等县，昼夜行军，历尽艰辛，向西赶到甘肃省合水县的豹子川时，部队只剩 20 余人了。

## 兵败豹子川

到达豹子川的当天晚上，游击队进驻一个村庄，唐澍派出阎揆要带着几个战士到村外侦察敌情。这时，唐澍看到队伍寥无几人，每个战士身上的子弹打光，子弹袋一个个成了空的，天气已入寒冬，战士们饥饿疲乏，都冻得浑身发抖，又眼看井岳秀的部队紧紧尾追将至，深感无法带部队坚持作战了。

面对此情此景，唐澍回想到清涧起义时 1000 余人的浩荡队伍，到如今仅剩 20 余人，自感有负中共陕西省委的重托，对不起同志们。他向谢子长很内疚地谈了自己的一些失误，并对当前游击队所处的危急形势进行商讨。谢子长表示，部队的挫折和失败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造成，自己作为部队的领导成员之一，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唐澍和谢子长研究后，决定立即召开部队的负责人紧急会议。在会议上，大家认为目前游击队处于困境中，环境生疏、补给无着、子弹殆尽，上不能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下没有群众基础的支持，井岳秀的军队又尾追，情况险恶，决定解散部队，化整为零，分头进入梢山，埋藏武器，暂时隐蔽到群众之中，以图后举。同时，决定由唐澍、谢子长两人到西安，

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部队的失败情况。

唐澍、谢子长等人作出决定后，由于形势危急，立即将游击队集合起来，向战士们宣布了部队军委的决定。谢子长对大家说：“革命没有一帆风顺的，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只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努力，相信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战士们听到部队要埋枪解散，大都抱头痛哭起来。

阎揆要带着几个战士在村庄外侦察敌情回到部队驻地，游击队已经宣布解散，唐澍和谢子长朝西安方向走了。在村庄里只留下齐天寿、谢有德和几个等待阎揆要的战士。阎揆要和齐天寿商量了一下，将部队的一切善后事宜处理完毕，在群众家里隐蔽一夜，于次日凌晨亦向西安方向赶去。

清涧起义部队历时数月，转战千里，于1928年1月在甘肃豹子川宣告失败。这次起义是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公开叛变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革命形势处于危急关头时举行的。清涧起义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南北呼应，震撼西北，影响全国，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使陕北武装革命获得首次尝试，鼓舞了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斗志，培养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分子，极大地动摇了井岳秀在陕北的统治，为陕北尔后的革命斗争树立了楷模，奠定了基础，激励着陕北无数英雄志士为中国的前途、为党的事业、为革命信念继续英勇奋斗。

WEIHUA  
QIYI

第三部 ★

## 第二十章

### 魏野畴血洒皖北

#### 太和整军

魏野畴离开清涧县石谦部李象九营后，东渡黄河先到山西，后辗转到河南归德附近的马牧集。在马牧集，魏野畴正好与杨虎城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十军相遇。

1927年夏杨虎城随冯玉祥部东出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他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同直鲁联军在陇海线徐州以西作战近半年，后因战事失利，率军退至归德一带。杨虎城和部队许多指战员都是魏野畴的老相识，和魏野畴不期而遇，都对他表示热烈欢迎。杨虎城恳切挽留魏野畴，委任他为第十军政治处处长。

在此期间，魏野畴随军转移到安徽皖北地区，在太和县帮助杨虎城整顿了部队。同时，魏野畴也整顿了杨部共产党的组织，并在杨部建立了中共军事委员会，亲任军委书记。

当时，在太和县驻有几支军队，有高桂滋的第四十七军，还有河南杂牌军萧之楚的第四十四军和皖北杂牌军王金韬的一个师。这些军队都是从陇海线先后撤退到这里的。在太和县境内，连同杨虎城的第十军在内，驻扎的四支军队一时都倾向革命，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合作。

根据这一形势，杨、萧、高、王四支军队领导人在太和县城召开了座谈会。中共皖北特委书记曾晓渊以高桂滋第四十七军政治部主任的公开身份参加了座谈，魏野畴以杨虎城第十军政治处处长的公开身份也应邀出席

了会议。在会上，四支军队领导人商讨了部队今后的出路和前途问题。

会后，魏野畴通过关系设法与中共皖北特委负责人曾晓渊取得了联系，并沟通了四支军队的中共地下组织关系。同时，魏野畴派人与中共陕西省委联系。

1927年冬，中共河南省委先后派南汉宸、高望东、昌绍先、刘仲华、谢祥荫等到太和、阜阳向四支驻军中的中共军支组织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八七会议文件，中共陕西省委也多次派陈云樵等与魏野畴联系，送来文件，传达省委的指示。魏野畴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文件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多次与杨虎城谈心。在魏野畴的促成下，杨虎城表示希望共产党能多派些共产党员到部队中来，以加强与共产党的合作，并特邀中共河南省委的南汉宸等留到第十军工作。

当时，除魏野畴外，在第十军还有不少共产党员在军队里担任要职，如蒋听松为军部秘书长，寇子严为第一师冯钦哉部参谋长，曹力如为第二师孙蔚如部政治处处长，吴岱峰为军事训练营第三大队长。

南汉宸到第十军后，为了改造部队，征得杨虎城的同意，与魏野畴从



南汉宸

部队基层干部中挑选了一批进步军官，又从地方上招收了一批革命知识青年，共400余人，在太和县城开办了革命军事干部学校，由魏野畴任政治指导员，南汉宸任校长。

1927年12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中共皖北第二届特别委员会（简称中共皖北特委）在太和县成立，由南汉宸任书记，魏野畴负责组织，蒋听松负责宣传。与此同时，中共太和县委相继成立。在中共皖北特委的指导下，杨、萧、高、王四支军队和皖北各县共产党的力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共产党员人数由原来的百余人很快发展到近千人，其中在第十军内发展共产党员达200多人。

1928年1月，从陕北辗转到太和县的杜聿德找到魏野畴。杜聿德，又名茂亭，陕西米脂县人，中共榆林地委的负责人之一，在大革命失败后，由于被军阀井岳秀通缉，被迫离开陕北。杜聿德先去杭州，试图说服当时正在国民党中央军政学校担任大队长的哥哥杜聿明改变政治态度，倾向革命，与共产党合作，但遭到杜聿明的一顿训斥，并被杜聿明强行安排到国民党第二十一师军训队受训。



高桂滋

杜聿德因与其兄杜聿明的政治见解不同，在军训队仅待了三个月，即不辞而别。从此，杜聿明、杜聿德兄弟二人各怀志向，分道扬镳。杜聿德一到太和县，即由魏野畴介绍到高桂滋部。

高桂滋，字培五，陕西定边县城东街人，生于1891年。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入陕西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回定边，任县保安队队长。1922年到胡景翼部先后任营长、团长、旅长，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1927年初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八师师长。5月，接受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宁汉合流后，该军被桂系打败，退至皖北，1928年2月被改编为第四十七军。

高桂滋得知杜聿德是杜聿明的弟弟，也不敢怠慢，委任其为本部高建白教导二团二营副营长。杜聿德一到高桂滋部，就参与了该部中共军委组织的领导工作，在中共皖北特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兵运活动。当时，李力果已在高桂滋部高建白教导二团任政训主任。

李力果，陕西米脂县人，李鼎铭次子，生于1907年。与杜聿德既是榆林中学同学，又是米脂同乡。1927年，随高桂滋部参加“二次北伐”，兵败河南。同年，在太和县加入共产党。1928年初，高部改为四十七军开始“清党”，经魏野畴介绍转到杨虎城部任政治部民运科长，兼任中共皖北临时特委委员。



李力果

杨虎城第十军与高桂滋第四十七军均为陕军，两军相处甚洽。当时，在颍州的驻军为秦庆林的地方部队约 1000 余人，与直鲁联军暗中勾结。杨虎城与高桂滋商量后，率部攻打颍州。第十军、第四十七军出兵先将颍州四面包围，派出李百朋进入颍州面见秦庆林，要他让出县城，移驻他处。秦庆林慑于陷入被歼之险境，表示愿率部从西门撤离县城。当秦庆林的一个连出城到谷口、大部队还滞留城内之时，设伏城外的第十军即缴了进入谷中一个连的枪。秦庆林见状，死守县

城不出。为麻痹秦庆林，第十军和第四十七军暂弃攻城，离城佯退。秦庆林见第十军和第四十七军的大部队退去，疏于防范，高桂滋率部乘势攻入城内，将秦庆林的部队击溃，颍州城遂被第四十七军占领。

与此同时，绰号张疯子的亳州地方民团头子勾结红枪会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民众推派代表，请求杨虎城惩办。杨虎城即领第一师师长冯钦哉率部进攻亳州，除张疯子化装逃跑外，残部缴械，亳州城遂被第十军占领。

此间，杨虎城曾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共河南省委(中共皖北特委归中共河南省委直接领导)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共中央虽函复同意接收，但因种种原因，阴差阳错，终使杨虎城与实现加入中共的愿望失之交臂。

1928 年农历腊月三十日，杨虎城与谢葆贞结婚。谢葆贞是杨虎城的第三任妻子。杨虎城的第一位妻子叫罗佩兰，死于肺病；第二位妻子叫张蕙兰，一直在家中照料杨的母亲和子女。

谢葆贞，陕西咸宁东耳窝坊(今属西安市碑林区)人，生于 1913 年。1923 年秋，入西安女子模范小学就读，后因家贫辍学。1927 年 2 月，参加西安中山学院妇女运动学习班。不久被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招收为女兵，编入总司令部政治部直辖的前线工作团，后加入共产党。1927 年夏调至杨虎城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在魏野畴任处长的政治处下属宣传队当队长。同年 10 月当选为新成立的太和县妇女联合会主任委员。

杨虎城对谢葆贞的革命热情赞叹不已，深深爱上这个淳朴豪爽的女子。

在简朴的婚宴上，有人问：“杨将军，你为什么爱上小谢？”杨虎城坦率地回答：“我知道她思想进步，结了婚她可以直接帮助我。谢葆贞说：“我不要你海誓山盟，只要你革命。杨虎城高兴地举杯说：“好！为了革命到底，白头到老，大家干杯！”

1928年2月初，皖北形势急骤恶化。蒋介石一面严令杨虎城在部队中立即“清党”，一面扬言威胁称：如果不“清党”，将以军事手段消灭第十军。同时，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韩振声以劳军为名，携银洋2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来皖北胁迫杨虎城“清党”。

韩振声到太和，正好杨虎城在亳州。中共皖北特委希望杨虎城把韩振声接到亳州后，好招好待地把他送走，不要让他到太和县第十军军部。韩振声到了亳州，赖在亳州不肯走，后到太和县，亲自去杨虎城府上，以拜访为辞，四处侦察。

韩振声是山西人，与南汉宸是同乡，并曾与南汉宸一起随冯玉祥去过苏联，深知南汉宸的底细，他指名要求杨虎城将南汉宸、魏野畴等共产党员逮捕，押解南京，向蒋介石邀功。杨虎城说：“你我和汉宸都是朋友，而你和他的朋友关系比我还早，尽管政治见解不同，但首先应顾到朋友间的道义，我不能这样办。”杨虎城没有执行这个命令，他对军部参谋长孙蔚如说：“这些朋友都是我们请来的，即使一时不能合作，也不要对不起朋友，要有道义，要留有他日见面的余地。”

杨虎城为摆脱困境，以避国民党政府的猜忌，准备暂时离开太和县出国考察。

在杨虎城携妻谢葆贞及随从米暂沉、王一山、李百朋、白志钧、刘子潜等一行，离开太和启程赴南京的当天，即让参谋长孙蔚如负责将南汉宸、魏野畴等200多名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武装护送出太和县。在送别时，



谢葆贞

杨虎城对南汉宸说：“我宁愿离开我的部队，也不愿把同你的关系搞坏。”

杨虎城离开太和后，先到南京。此时的北洋军阀中实力最强的奉系军阀还没有垮，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任务还是联合西北冯玉祥、山西阎锡山等北方军阀一同北伐。蒋介石出于拉拢和联合冯玉祥与奉系交战的主张，并没有太看重只有几千兵力的杨虎城。杨虎城到南京后，在南京停留 20 多天，没有见到蒋介石，而蒋介石仍令第十军归冯玉祥部方振武指挥。在南京期间，杨虎城看到蒋介石的中央军问鼎中原已成定局，随即把军务交给已任第二师代理师长的孙蔚如，于 4 月底与夫人谢葆贞带着随从秘书米暂沉由上海乘“长崎丸号”东渡日本，在日本住了半年的时间。

魏野畴离开第十军后，于 2 月 9 日晚，主持召开了有 70 多名共产党员、干部参加的中共皖北特委扩大会议。会议对特委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检讨了特委这段时间过分利用地方军阀发展革命力量的单纯军事观点；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提出武装反对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的精神，通过了皖北土地革命大暴动、建立豫皖平原根据地的决议案；最后宣布了中共皖北临时特委的组成人员，由魏野畴任书记，胡景陶任副书记，曹力如为特委委员兼秘书长，负责特委日常工作。

会后，皖北特委机关由太和迁到阜阳，创办了秘密刊物《皖北通讯》，并重组中共阜阳县委，由李端甫任书记，乔锦卿任副书记。一到阜阳县，魏野畴根据驻扎在阜阳县城的高桂滋第四十七军大部被蒋介石调往山东作战，留在阜阳仅有两个团（即高建白和梁文铁两个教导团）兵力的情况，认为高桂滋部阜阳留守部队的起义条件已经成熟，决定首先在高桂滋部的教导团发动武装起义。

此时，正值高桂滋部在地方招募新兵。魏野畴即指示高桂滋第四十七军内中共军委利用高桂滋部高建白教导二团招募新兵的机会，吸收地方共产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农民入伍，扩大党组织在这支军队中的革命力量，抓紧训练，准备伺机起义。阜阳县西乡一带的新兵招募由杜聿德负责。杜聿德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地方党组织和农协会将一大批共产党员、团员和农民积极分子招收入伍。

与此同时，杨虎城第十军和高桂滋第四十七军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被

“礼送”出部队后，都相继转入农村，在农村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阜阳市的周围行流集、王官集一带的农民运动兴起高潮。阜阳一带，在1925年春开始有中共组织的活动。第二年春，就有行流、插花、城关三个党小组，共产党员达30多人。1927年秋，中共阜阳临时县委成立，并成立了行流、插花、城关三个支部。1927年秋，杨虎城、高桂滋、萧之楚、王金韬部先后移驻阜阳、太和一带，中共阜阳支部根据魏野畴的指示，先后派出周伟业、周伟鼎、李端甫、乔锦卿等深入码头、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工会和农民协会。阜阳周围的农协势力很大，仅行流集的方圆50余里百十个村庄就有农协会会员6万多人，从中选拔5000多人成立了农民赤卫队。

## 阜阳起义

1928年2月中旬，曹力如由太和到阜阳，与魏野畴一起整顿了行流集地方党组织，介绍40名农民积极分子入党，成立了中共行流集区委。从太和迁到阜阳的特委机关设在县立高等小学，代号万德盛，曹力如积极协助魏野畴进行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2月20日夜，魏野畴在阜阳县城内主持召开了有中共皖北特委部分特委委员参加的会议，讨论了进一步贯彻特委扩大会议决议、即刻发动土地革命的问题。根据这次会议精神，李力果很快深入到阜阳市行流集一带发动农民，建立革命武装。在几天的时间里，就把行流集地区的数十支农民武装联为一体。

2月21日，魏野畴给中央写报告，分析了皖北政治、经济形势以及皖北各军阀之间的矛盾，指出“皖北党的组织迅速壮大，农村革命条件已经成熟”，“一致同意即刻发动土地革命，必须扩大到全皖北……引导五六万农民”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个报告由陈云樵送交到中共河南省委，然后由高原转报中共中央。

2月下旬，中共皖北特委为加强第四十七军留守阜阳两个教导团内中共组织的领导，让特委委员昌绍先脱离杨虎城第十军，通过私人关系打入高建白的教导二团。昌绍先与杜聿德一起在两个教导团中积极进行策反工作。他们先后在高桂滋部阜阳留守的两个教导团的九个连中建立了党支部和党

小组，并将六个连长发展为共产党员，发展党员 280 多人，并掌握了留守司令部的一个特务连。

3 月中旬，魏野畴接连在王官集、阜阳县城主持召开了中共皖北特委扩大会议和各县县委负责人会议，讨论武装起义的问题。在会议上，通过了举行皖北工农兵武装大起义、成立皖北工农红军、建立皖北苏维埃政府等决议。当时，阜阳地区党和群众工作的基础较好，会议计划于 4 月下旬或 5 月上旬在阜阳首先举行起义，各县随后响应。

4 月初，中共皖北特委接到中共中央 3 月 25 日写给中共皖北特委的指示信。信中说，现在的策略是“发动群众斗争，领导群众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皖北特委于 4 月 5 日在阜阳城内贡院后街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在会上，由杜聿德汇报了高桂滋部高建白教导团的起义准备工作情况。这次会议决定在 4 月底举行起义。

4 月 7 日晚，中共皖北特委在阜阳县城外的西湖“会尧堂”召开了地方党组织和军队中共军委的联席会议。会议由魏野畴主持，有胡景陶、昌绍先、杜聿德、李端甫等 20 多人参加。会上，魏野畴作了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这次会议，决定在阜阳成立武装起义的指挥机构，即中共皖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魏野畴任总指挥，胡景陶任副总指挥，昌绍先、杜聿德、乔锦卿、李端甫、李力果等任委员。同时决定在起义开始后，即由杜聿德与昌绍先拉出教导团的起义部队，向阜阳城发起进攻。

4 月 8 日，魏野畴指示刘贯一立即赶往界首，协助王铸九在萧之楚部发动起义，以响应阜阳起义。当晚，魏野畴在阜阳城内第六中学召集高建白教导团的共产党员干部开会，布置行动计划，与杜聿德等约定以文峰塔为各处起义部队和人员的集合点。

正当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加紧进行之际，阜阳地区连续发生两大事件。

第一，中共皖北特委突然获悉第十军中共军委代理书记宋树勋叛变。宋树勋通过国民党太和县县长李天午，将阜阳发动起义的计划和第十军军事干部学校的共产党员名单密报给第十军参谋长孙蔚如。孙蔚如立即带着执法队集合军事干部学校学员，收缴武器，但仍遵照杨虎城临行嘱托，由炮兵连连长将 110 多名共产党员武装“护送”出阜阳县境。

第二，几乎同时发现中共阜阳县委李象贤叛变，驻阜阳县高桂滋部两个教导团的共产党员名单落到阜阳县县长康欣之手中，又转高建白之手。高建白立即将教导团的几十名共产党员驱逐出部队，阜阳县共产党的力量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在这紧急时刻，中共皖北特委为了防止太和、阜阳两地驻军和国民党地方武装串通一气镇压革命，立即决定提前起义，时间定在4月9日，以火烧高桂滋阜阳留守司令部的厨房为起义信号。为了保证这次起义的成功，魏野畴作出起义前的紧急部署：派出王官集的赤卫队截断阜阳至太和的电话线，实行地区性戒严；令乔锦卿绘出阜阳城关地图，标明敌我力量分布情况和进攻路线；任命曾在杨虎城部工作的共产党员申明甫、胡怀西为敢死队队长，执行攻城时的点火任务。

同时，魏野畴命令行流集、王官集地区的赤卫队首先暴动。李端甫等在行流集策动20多名士兵哗变，缴枪19支，并解除税警局的武装，占领了行流集，又将全县组织的农协会会员3000多人编成五个赤卫大队，成立宣传大队和给养总处，决定由赤卫队负责协助农民斗争地主、分财产。一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即将在城内外爆发。

4月8日晚，滂沱大雨彻夜不停，阜阳县城内一片黑暗。

4月9日凌晨，敢死队队长申明甫按预定的时间、地点，给棉被浇上煤油，点燃了武装起义的信号。但因天雨太大，火焰未炽，即被附近的驻军发现。申明甫带着敢死队遂采取果断措施，强行解除了门岗武装，夺得长枪4支。

这时，由于天雨阻碍视线，在城内外各处集结的起义人员没有看到火光信号，未能按时攻城。守卫东城门的教导二团第六连排长吉超（共产党员）和祝永会虽然打死了反动连长苗霞飞，占领了东门，但遭到了驻军的反扑，使原计划各路起义部队在城东南文峰塔集结的计划未能实现。

一小时后，驻守东门外三里湾师范学校的教导二团在杜聿德的领导下开始起义。在“活捉高建白”的喊叫声中，击毙了驻军军需官朱士秀以下官兵二三十人，团长高建白负伤逃走。当杜聿德乘胜带领起义部队赶到原定各起义部队的集合地文峰塔时，其余各部都还未到达。

此时，总指挥魏野畴尚在东门。他听到三里湾学校的枪声，才知道杜聿德起事，即派出六连前去接应，不料驻军梁文铁从城内全力扑来。由于敌众我寡，魏野畴只得率领队伍向三里湾方向撤退。

杜聿德的起义部队赶到文峰塔，闻得东门枪声甚为激烈，急忙带领队伍向东门冲去。当杜聿德赶到东门时，东门早被梁文铁占据，高建白又集结所部尾随追来，杜聿德腹背受敌，攻城计划失败。

由于种种误会，待各路起义人员搞清楚时，天色快亮了。在此紧要关头，起义总指挥部少数领导人又思想动摇，顾虑重重。为摆脱驻军的追击，改变不利态势，魏野畴当即改变计划，决定将参加起义的五个半连的队伍分为两路向外线转移。一路由魏野畴、胡景陶率领 150 余人，向阜阳县城西南转移；一路由昌绍先、杜聿德率领 350 余人，渡颍河向阜阳县城以北挺进。

9日凌晨，魏野畴、胡景陶率领的队伍冲出阜阳县城西部驻军的伏击圈，向西迂回转移。当队伍行至新村集时，被国民党第十二军收编的土匪部队发现。该部团长谈万国、副官周建中、副营长刘永太率部尾追而来，一面派人以要求谈判来麻痹起义队伍，一面到老集串通该军营长李成祥及“红学”师爷刘明桂调动地主武装“红学”，企图截击起义部队。

这时，经过连续作战行军，起义部队已经十分疲劳。当魏野畴、胡景陶率领队伍转移到老集，部队正准备开饭的时候，叛徒勾结谈万国部将部队的流动哨兵缴了械。老集镇四面被包围，大街上也出现了谈部士兵和“红学”分子。魏野畴感到敌情严重，遂决定部队立即从老集镇撤离，向行流集、王官集一带转移。

此时即发现谈部士兵和“红学”分子有千人之众，其中一股士兵骑马打旗，高喊：“谈团长来啦！”并要起义队伍派代表接洽。由于情况尚未全面掌握，魏野畴决定一面由胡景陶和连长蔡澄波前去交涉，一面整理部队做应急准备。胡景陶和蔡澄波见到谈万国，向谈万国阐明了部队的政策，希望他们弃暗投明，参加起义。谈万国要起义部队交出武装，接受改编，并欺骗说：如接受改编，起义部队的领导人可以担任副团长和营长。

胡景陶、蔡澄波二人返回，向魏野畴作了汇报。魏野畴严肃地指出：

起义部队是革命的军队，决不能交出武器和土匪混在一起干坏事。这时，逼近起义部队的谈部士兵和“红学”分子狂喊：“缴枪！”

魏野畴立即命令起义部队集中在两个院子里，准备突围。同时向谈万国声明：谈判可以，若强行缴械，起义部队将坚决还击。谈万国一面虚伪地表示要继续谈判，一面又鸣枪要挟，并利用起义部队尚未来得及还击之机，将魏野畴、胡景陶(后脱党)、蔡澄波、胡怀西等六人先行逮捕，随后解除了全体起义人员的武装。

当晚，魏野畴、胡怀西被押到老集镇东头一个被称为“陕西会馆”的房子里看管起来。魏野畴、胡怀西乘看守人员懈怠之机，决定出逃。他俩用牙齿咬断身上捆绑的绳索，魏野畴考虑到两个人同时脱逃目标太大，便令胡怀西立即逃走。魏野畴用绳子系住胡怀西，用尽全身气力将胡怀西拉到房梁上，胡怀西跳出天窗脱险。

看守发现房子里已经逃走一人，立即报告。谈万国、周建中等恼羞成怒，命令刘永太等三名刽子手将魏野畴带到老集东边的凹地里杀害。魏野畴时年 31 岁。

这位陕西党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虽然长眠于皖北平原的土地上，但被他唤醒的陕西人民不负他的英勇牺牲，把对他的思念变成了推动革命的力量，竭尽全力继续着他未竟的事业。在革命取得胜利的今天，中共陕西历史应给他写上重重的一笔，让后人永久缅怀。

## 王官集突围

1928 年 4 月 9 日拂晓前，昌绍先、杜聿德率领的一路起义部队，击破驻军在三里湾的伏击圈后，渡过颍河。当天上午，部队到达距阜阳县城 30 余里的王官集，与李端甫、李力果等率领的行流集农民起义武装会师。

会师后的当天下午，经中共皖北特委部分特委委员商量决定，在王官集大寺庙前召开了有 2 万人参加的皖北工农兵起义大会。会上宣布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由昌绍先任工农红军总指挥，杜聿德任副总指挥。大会通过了事先由魏野畴主持起草的《农民协会组织章程》《临时土地法》《临时工会法》等三个文件。李力果、昌绍先、杜聿德先后在会上

讲话，号召全体军民团结起来，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从大会结束后的当天傍晚开始，昌绍先、杜聿德、李端甫、李力果、曹力如等人率领军民按照皖北苏维埃政府部署，在王官集一带开展了打土豪、分财产、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斗争了地主劣绅 20 余人，将没收的大批粮食、物资分给了贫苦农民，受到农民群众热烈拥护。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和游击队。仅仅两天时间，红军就扩充到 2000 余人，游击队发展到近万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

4 月 11 日拂晓，皖北工农红军正准备向西挺进，高桂滋第四十七军留守司令部的王守义纠集梁文铁教导团和高建白教导二团余部，加上阜阳县县长康欣之的地方武装，共 3000 余人，从三面突袭而来，起义部队仓促应战。王守义等纠集一股军队首先直抵颍河西岸，杜聿德立即率领部队依河东岸堤抗击。

此时，国民党太和县县长李天午也派出武装前来“协剿”。红军虽给予王守义等军队以重大杀伤，但陷入四面包围之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昌绍先、杜聿德、李力果、曹力如等决定，让家住当地的红军战士就地疏散。同时，组织外地战士奋力突围。

在突围中昌绍先牺牲，杜聿德不幸负伤被俘，后遭杀害。起义部队终因缺乏战斗经验、敌我力量悬殊，且又处平原地区，掩护困难，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起义遂告失败。只有李力果、李端甫、曹力如等在群众的掩护下带着少数人员冲出重围。

李力果、李端甫、曹力如等冲出重围脱险后，隐蔽于皖北的寿州、霍邱等县，进行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作。历经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皖北地区的多数党组织很快又得到发展，并重新组建了中共皖北临时特委。后曹力如返回陕北。

不久，中共皖北临时特委派李力果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阜阳起义失败的情况。李力果到上海后，因一片白色恐怖，无法找到党中央，即转往北平。

到北平后，李力果找到时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的杜润滋，通过杜润滋的介绍参加市委工作，后担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

1929年春，中共北平市委决定派李力果返回陕北。李力果回到陕北，同中共陕北特委取得联系，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应聘于母校榆林中学，参与了中共陕北特委的工作。后又返回北平，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委员。

1962年，毛泽东在和孔从洲的一次谈话中，对魏野畴以及他所领导的阜阳起义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点燃了皖北革命的烈火，胜利真是来之不易，中国革命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啊！”

## 第二十一章

### 许权中旅的抉择

#### 刘志丹返西安

1928年1月，唐澍、谢子长从甘肃豹子川辗转回到西安。在西安红埠街9号找到中共陕西省委。唐、谢二人向省委主持军委工作的李子洲汇报了清涧起义失败的情况。李子洲见唐澍、谢子长心情十分沉重，即鼓励他们要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振作起精神，继续战斗。

李子洲认为这次清涧起义失败的原因很多，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不足，加之起义领导人决策失误；另一方面是起义后，没有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取得他们的支持，使起义部队失去了可靠的群众基础。李子洲要唐澍、谢子长暂留在西安，待省委开会研究后，给他俩分配新的工作任务。

此时，刘志丹离开冯玉祥的国民军，历尽艰难，先辗转上海去找中共中央汇报情况。到了上海，因已是一片白色恐怖，一时无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当他与联络人员接上头时，始知中共中央机关迁往武汉，即又折到武汉。在武汉，刘志丹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中央负责同志根据陕西的形势决定派他回陕西工作。

临行，中共中央负责人罗章龙题诗一首，赠给刘志丹：

## 寄语李子洲并中共陕西省委诸贤

——送刘志丹同志回关中

极目九边烽火惊，  
川原四塞渭河横。  
七盘鸟道通天府，  
百二雄关壮帝京。  
紫气东临延策士，  
凿空西向启先行。  
而今四海纷争亟，  
可有男儿意未平。

后来，罗章龙回忆当年在武汉送刘志丹回陕西工作的情景时，解释说：诗中“九边”指长城线上张家口、古北口、居庸关、大同、雁门关、肤施等九个要塞；“七盘”指七盘石；古代有个讲法，说关中有102个关卡，“百二雄关”句极言地势之雄壮；“紫气东临”句，引老子出函谷关典故，“策士”本指关东说客苏秦、张仪等，这里指北方区委给陕北派遣了许多有胆有识之士；“凿空”句，用汉时张骞之事指陕西历史上有过许多豪侠勇士，希望刘志丹及在陕西的李子洲等党的领导同志学习这些大智大勇之士，在革命暂处低潮的时候挺起腰杆，无所畏惧，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刘志丹离开武汉后，因战事影响，陇海铁路无通往西安的火车，只好骑马朝西安赶路。一到西安，刘志丹首先碰见从陕北刚回到西安的唐澍。唐澍告诉刘志丹，清涧县石谦旅的起义失败了，中共陕西省委正在讨论新的武装起义问题。

李子洲听说刘志丹从武汉回到西安，急忙将刘志丹找来，询问是否从



罗章龙

中共中央带回指示。刘志丹把中共中央写给中共陕西省委的一封指示信交给李子洲。中央指示陕西省委应立即注意到尽可能地发动农民，以抗捐、抗税、抗粮为口号，引导农民群众发动一个广大的农民起义；要求在党的农民起义政策之下，党所领导的军队帮助发动土地革命；要在军阀混战中尽量扩大共产党的武装力量。

李子洲看完信后，深感中共中央的指示及时。因为中共陕西省委正对发动新的农民武装起义问题意见分歧，难以决策。

## 改组陕西省委

1928年1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了第三次省委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给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信，讨论了如何组织农民及进行武装起义的问题。会议断断续续开了三四天（一说1月4日召开的是第三次省委全体会议，1月5日召开的是第四次省委全体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耿炳光、李子洲、张金印、李子健、刘继曾、亢维恪、潘自力、苏士杰。



潘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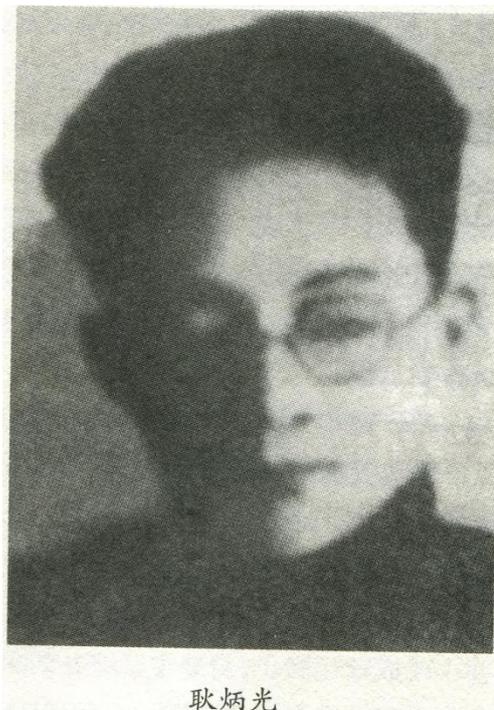
在会议上，大家讨论得十分激烈。省委书记耿炳光认为，陕西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都决定了无法立即发动起义，主张先在工作上准备起义的条件，反对勉强的直接行动。而省委常委兼团省委书记的张金印则主张在全省各地无条件地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成立苏维埃。

李子洲向与会同志讲述了全国形势，分析了当前陕西敌我情况及进行武装起义的有利因素和客观条件，对耿炳光、张金印两种极端的主张提出了批评。李子洲认为，武装起义既不可采取保守态度，也不可“左”倾盲动；提议可在党组织和群众的力量较强的渭南、华县一带准备起义。同时提议省委要做周密的安排和部署，军事力量可以确定许权中旅为基础，派唐澍、刘志丹、廉益民、吴浩然、谢子长等到许权中旅工作，为起义作准

备；并提议，这次起义既不可长期等待，亦不能操之过急，应放在军阀力量相对削弱的时候组织发动；还提出打入国民党省党部的共产党员、团员，要迅速建立起地下党团组织，利用矛盾，分化和打击敌人。

李子洲的一番发言博得了参会同志的一致赞同，并形成了决议。决议内容主要是在渭华地区迅速着手准备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实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政权。

为保证这次会议形成的决议付诸落实和执行，会议依据中央文件精神，经过讨论认为，因原省委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机会主义的指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决定对中共陕西省委进行改组，撤销了耿炳光的省委书记职务，选举潘自力、李子洲、徐梦周、刘继曾、张金印、王松年六



人为省委常委，潘自力任省委书记，李子洲为军事部长，徐梦周为组织部长，李子健为宣传部长，亢维恪为农民部长，胡宪之为职工部长，张金印主管团委工作。并确定由李子洲亲自负责安排和部署在渭华等地举行武装起义的工作。李子洲接受省委的重托，很快拟出《关于发动渭华暴动的决议案》。

## 宣化事件

1928年2月14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潘自力、李子洲、张金印、刘继曾、徐梦周、胡宪之、亢维恪七人出席。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及中共中央致陕西省委的第九号公函，通过了《陕西 CP 目前工作方针》。会议认为陕西党组织目前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动从经济到政治的群众斗争，使农民群众自发的起义尽快高涨，由局部起义汇合成全省的大规模起义，造成陕西割据局面，以至建立全省的

苏维埃政权。会议提出自上而下改组各级领导机关，“提拔勇敢的工农分子”的口号。

2月18日至19日，中共陕西省委紧接着在西安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潘自力、李子洲、张金印、刘继曾、徐梦周、胡宪之、亢维恪、苏士杰、王松年及长安、三原、蓝田三县和西安市的代表13人参加。会上传达了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精神，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执行。会议提出，在政策上打破不信任群众力量和侧重利用原国民军二、三军反冯玉祥的错误观念；同时，决定潘自力、张金印、王松年三人作为陕西省委代表，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潘自力、张金印、王松年前往上海参加中共六大，并带了陕西省关于渭南等地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向中央请示。陕西省委由李子洲代理省委书记，主持省委工作。

2月下旬，中共渭南区委机关所在地——宣化高小发生了“宣化事件”。

渭南县槐树村的西南，有一座古庙叫宣化观，当地农民利用这座庙办了一所宣化初小。后来地主豪绅也在这里办了一所乐育高小。大革命失败后，地方地主豪绅猖狂起来，把隐蔽在乐育高小当教职员的共产党员全部辞退了。被辞退的共产党员都到宣化初小任教，推选共产党员李维屏为校长，并把宣化初小改成宣化高小，与地主豪绅办的乐育高小唱起了对台戏。地主豪绅对宣化高小里共产党的活动恨得要命，勾结国民党县党部对宣化高小发起进攻，先采取诱降和软化的办法，声称谁是共产党就赶快自首，接着以无赖伎俩谩骂“共产党快滚出学校去”。

2月28日下午，国民党县党部纠合警察和地方流氓以及乐育高小一些反动教员，突然出动捣毁了宣化高小。他们疯狂地砸毁了校牌，打碎了门窗，把师生全部撵出学校，并将数名师生打伤。当夜，中共渭南县委决定立即发动全县学生和当地农民与这伙暴徒展开一场斗争。

次日，天刚亮时，渭南县立中学和东关县立高小的全体学生及当地农民都高举旗子，喊着口号，声势浩大地一齐赶来声援。情绪激动的群众打死肇事的反动豪绅刘铭初、薛明璋，惊动了反动当局，县长亲自带着军警，立即包围渭南县立中学进行镇压。中共渭南县委机关秘密设立在渭南县立

中学。反动当局先后查封了渭南县立中学、东关小学及华县成林中学等共产党活动的据点，逮捕共产党员、团员和先进分子 40 余人，并将渭南县立中学校长王文宗、教师冀月亭押送到西安，后残忍杀害。

3 月 13 日拂晓，国民党渭南县党部调来一支冯玉祥的武装部队，把高塘镇围了个水泄不通，妄图将设在高塘镇的中共华县县委一网打尽。幸亏华县县委早有准备，在冯军赶来之前已提前转移。据此，中共渭华地方党组织建立了陕东赤卫大队，由张汉俊(李大德)任大队长，薛自爽任副队长，冯养浩为党代表。陕东赤卫大队成立后，先后出击大王村、算王村、王家崖等十多个地方民团据点，没几天就发展成为一支 100 余人、60 余支长短枪的革命武装。

有一次，薛自爽告假回家探亲，被渭南县保安团发现，将村子团团包围。薛自爽背着老母，沉着勇敢地突出保安团的包围。老母因负伤过重牺牲，他安然无恙返回赤卫队。自此，薛自爽背母突围成了一段佳话，大家都称薛自爽是革命队伍中的“李逵”。

由于“宣化事件”的突然发生，李子洲担心再拖延时日，渭华地区党组织会遭到破坏，省委在此处举行起义的目标会暴露。经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决定渭华地区提前举行起义。

这时，许权中的军队驻守在商洛山区，一部分还在河南卢氏一带。刘志丹、唐澍、廉益民、吴浩然、谢子长等受省委的派遣，相继到许权中旅分别担任重要工作，唐澍任旅参谋长，刘志丹任参谋主任，谢子长任副营长兼政治教导员。他们与许旅的共产党员带领士兵，分散到驻地各乡村，抓紧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组织群众打土豪斗地主，积极培养赤卫队骨干。

在群众发动起来后，刘志丹经常因势利导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耐心地给群众宣讲：世上没有神仙，要过上好日子，只有靠自己；中国人口中劳苦大众占百分之八九十，只要劳动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不愁打不倒少数的地主豪绅。这些浅显的革命道理，群众一听就懂，思想觉悟很快得到提高，革命的热情像火山一样地喷发出来了。

3 月，潘自力等从上海返回陕西，带回中共中央批准的陕西省委关于在

渭华等地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

3月22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会议通过了由李子洲起草的《目前行动大纲》，将临潼、渭南、华县、华阴、固市划定为陕东起义区，并成立由刘继曾、李大章、萧明等组成的起义领导机关——中共陕东特派委员会（简称中共陕东特委）。

## 离冯归李

1928年4月，冯玉祥主力出陕赴豫，同奉系军阀在河南中原发生混战。冯玉祥命令驻陕部队东渡黄河集结。西北各省军阀乘机开始为自己扩充势力，并在西北各省形成一股反冯势力。陕军李虎臣素对冯玉祥不满，乘冯玉祥主力离陕之机，发动了反冯战争，除出动大部分兵力围攻西安的宋哲元外，又调动驻守商洛的许权中旅立即进攻潼关。这时，许权中旅正在商洛等待起义。



许权中

许权中，陕西临潼县人，生于1894年。广东韶关讲武堂学生，毕业回陕后，先后任国民军第二军营长、团长、旅长。1925年加入共产党。1926年，随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军，任援陕国民军联军第三路司令。1927年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后，任政治保卫部委员兼卫队师旅长、代师长。中山军事学校成立后，调任学校学员纵队队长。大革命失败后，与史可轩将政治保卫部的保卫队和中山军事学校的学员组成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对外番号为政治保卫队。冯玉祥命这支部队开赴

河南洛阳，妄图伺机消灭。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史可轩、许权中率这支部队北上，与石谦旅李象九营和谢子长连在陕北会师。部队离开西安，北上途经富平美原镇时，史可轩遭地方军阀田生春诱杀。史可轩遇害后，许权中被公推为旅长，带着部队暂退回关中临潼。

许权中带着部队到临潼后，当时的岳西峰和原国民军第二军冯子明的部队矛盾很深，双方明争暗斗，各不相让。许权中决定去“投奔”冯子明，被收编为补充旅，许权中任旅长，驻守关山镇。部队取得合法地位后，就开始秘密收容正被追捕和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并在部队建立了党委，由高克林任书记，委员为许权中、杨晓初、高致凯、张汉俊。

不久，部队移驻高陵县，冯子明即派出赵杰三旅和行营主任包国才来监视许权中旅的行动。许权中与赵杰三是拜把子弟兄关系。一天夜里，许权中与杨晓初一起到赵杰三的房间内，闲谈到深夜。赵杰三命令侍卫人员离开，低声说：“冯子明要我暗地里收拾你们！”

许权中听了一怔，转而摆手：“别开玩笑，一没冤，二没仇的……”

“人家说你们是共产党，要小心啊！”赵杰三额前暴起了一条条青筋，神情显得非常紧张。

1927年11月间，部队移驻蓝田县许家庙一带。冯子明令许权中旅开赴河南，许权中未从命。一天晚上，经冯子明的暗中唆使，部队中一个叫惠介如的参谋主任策动徐裴威、杨锡民两个连长搞暴乱。杨锡民是部队党委专门派去监视惠介如的共产党员，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许权中、高克林等。当晚，许权中将惠介如叫到旅部，当着连以上的军官下了惠介如的佩枪。

惠介如装作镇静地说：“这是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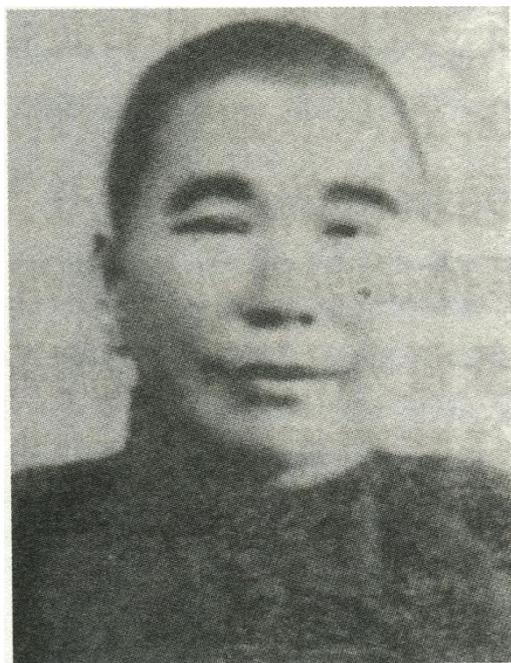
“你做的事，你自己知道。”许权中又大声对连以上军官说：“弟兄们，我们为史师长报仇才守住这个摊子，才搞工农革命。可是，现在有人想把我们的摊子搞垮……”

“我们愿听旅长的命令！”旅部全部军官齐声高喊。惠介如当即被拖出门外枪毙。

冯子明见安插在许权中旅的内奸惠介如被铲掉，便凶相毕露，立即派出一支部队直奔黑龙口，占领了通往秦岭以南的要道隘口，从四面将许权中旅形成包围之势，企图以武力吞并这支革命武装。许权中果断抽出两个排的兵力，一个排摆在蓝田县东，由辋峪经牧护关抢占黑龙口，阻击冯子明部的进攻；另一个排夜渡灞河支流，偷袭其前卫司令部。

在寒风呼啸的深夜，冯子明部的士兵正在酣睡，许权中的一个排像一把尖刀一样直插前卫司令部。冯子明部全军大乱，连夜溃退十余里之外。另一排成功抢占黑龙口，粉碎了冯子明的重兵围击。

部队度过这一危机后，许权中毅然脱离冯子明的控制，接受国民革命军南路军李虎臣的整编，被编为新编第三旅，时有 1200 余人，装备齐全，武器精良，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



李虎臣

当许权中接到李虎臣的命令，调部队开拔潼关参与反冯战争时，党内意见不一。时任许权中旅参谋长的唐澍认为，省委指示已成定案，应该坚决贯彻执行；主张脱离李虎臣的控制，直接将部队拉到渭华地区参加农民起义。而许权中则认为，冯玉祥的部队东出赴豫与直系军阀混战的时机，对渭华地区农民起义有利，与李虎臣一起打下潼关，不但可以扩大部队，增加部队战斗实力，同时可以扩大起义区域；并主张这次起义不能局限于渭华地区，而应向渭北一带发展。

由于党内负责人意见不一，旅党委决定一面假意“执行”李虎臣的命令，部队向潼关前线移动；一面派许维善、雷天祥两个共产党员率领教导营（由中山军事学校的学员组成）近百人先去渭华地区，由许权中、唐澍等率大部队集中灵口，出蒿岔峪去潼关。当时，许旅共产党的活动十分活跃，李虎臣一直在密切关注。李虎臣本想在许旅早点动手，一则鉴于冯玉祥的驻陕部队与自己不和，自己需要笼络势力，二则怕引出许旅反水，只好把许权中旅派到商洛三要镇驻扎，并派出自己一个亲信团驻扎到许旅的西边洛南一带，监视许权中的动静。

当许权中、唐澍等率部队一到潼关，狡猾的李虎臣就把许旅夹在他的大军中间，在攻打潼关的激战中，又把许旅推到最前线与冯军交战，一则削弱共产党的这支武装力量，二则可阻击冯军人陕，来个一箭双雕。由此，

许旅在潼关反冯战争中伤亡甚大。

## 瓜坡镇起义

在许权中、唐澍等率部队开向潼关的同时，派往中共陕西省委请示的刘志丹、高克林已到了西安。

1928年5月上旬，刘志丹、高克林返许旅，向许权中等传达了省委指示，命令部队设法摆脱李虎臣部，举行起义。当许权中接到命令时，正值据守潼关的马鸿逵为拖延时间，调孙连仲的军队增援潼关作战，马装出一副投降的样子，表示愿意弃冯投李。李虎臣信以为真，停止了对潼关的进攻，静等马鸿逵投降。

唐澍认为，这正是许权中旅撤离潼关的好时机，应立即执行省委的指示，开赴渭华地区。许权中对部队的行动问题，十分慎重地提出原本就持有的不同意见，并认为渭华地处西安附近，敌强我弱，起义很难成功，建议把部队拉到白水、韩城山区一带，先保存力量，以后待机再行起义。但这次渭华起义是省委决定的，而且部队行动命令已下，已不可能改变。显然，许权中与唐澍、刘志丹在执行省委决定的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

5月10日，李虎臣部与冯玉祥部激战于潼关以南的十二连城。下午，许权中带着杨晓初到潼关城附近去侦察地形。唐澍马上找来刘志丹、高克林商量，决定趁许权中、杨晓初外出侦察地形之机，甩掉许、杨，立即组织部队起义，奔赴渭华。

当晚，唐澍、刘志丹在未告知旅长许权中和杨晓初的情况下，率部队撤出战斗向渭华地区进发。许权中和杨晓初侦察地形回到驻地后，才发现人都走光了。许权中看了唐澍放在桌上的一张便条后，得知他们已经带着部队奔向渭华了。陷人痛苦中的许权中没有任何犹豫，立即跨蹬上马，狠抽几鞭，带着杨晓初和仅剩的十几名随从，朝渭华方向疾驰追去。追了一夜，他们终于在太阳出山的时候赶到华县瓜坡镇，与自己的部队会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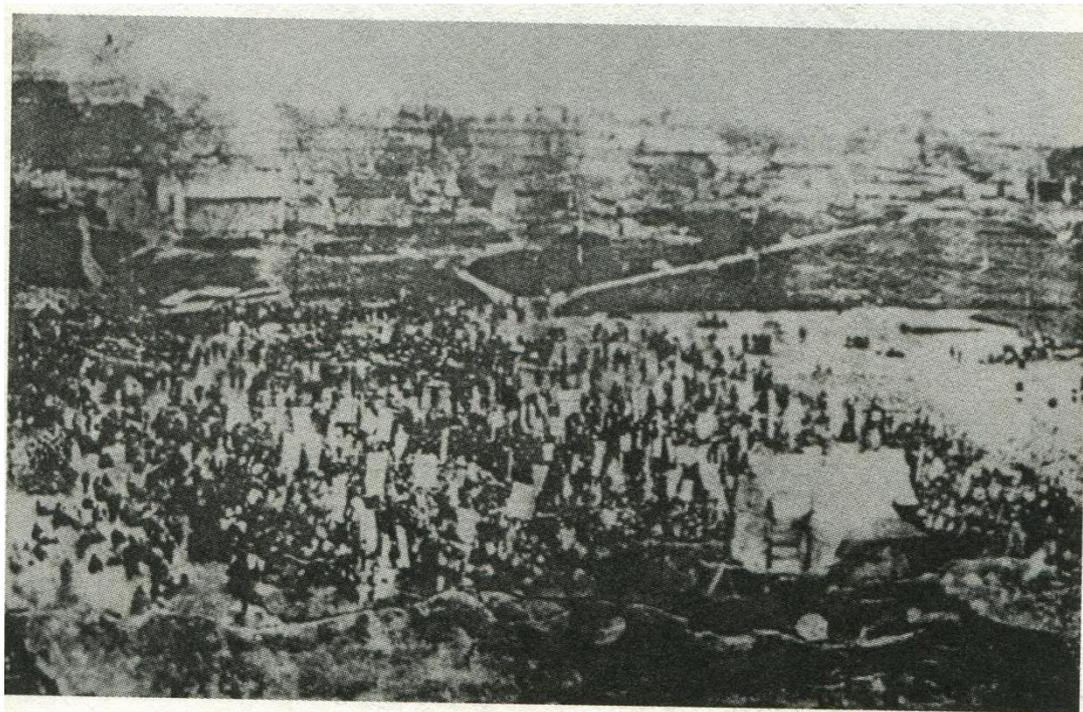
在华县瓜坡镇，部队宣布起义，举起了工农革命军的红旗，摘去了国民革命军的帽徽，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部队又连夜向华县高塘镇进发，抵达高塘镇后与已起义的农民武装陕东赤卫队会合。

渭华起义失败后，证明了许权中当时的意见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后来，刘志丹每提及此事总是说：“权中年长，长期指挥打仗，有经验。我当时也考虑到他的意见，但更多的是从政治上考虑，盲目成分大，还要服从上级决定，就这样我做错了。事后我要向权中同志道歉，但在冯军的追赶下，我们分散了，没有机会了，真遗憾。”

## 第二十二章

# 建立苏维埃政权

### 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



渭华起义群众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场

许权中旅开到高塘镇时，渭华地区各县农民武装起义已是风起云涌。以华县高塘镇、渭南南塔山为中心，东至少华山，西到临潼，北接渭河，南连秦岭，约 2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有华县、渭南、五一（今属西安市临潼区）三个县 48 个区、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里群情激昂，变成了沸腾的海洋。

1928 年 5 月 14 日，唐澍、刘志丹等随许旅到高塘镇，中共陕西省委书

记潘自力已在那里，亲自主持农民武装起义的工作。高塘镇是渭华地区农民武装起义的重点。



渭华起义中召开的群众大会

5月16日，在省委书记潘自力的主持下，召开了盛大的联欢大会。在会上，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军委主席刘志丹、政委刘继曾、参谋长王泰吉、军党委书记吴浩然、总顾问许权中、政治部主任廉益民。下设四个大队和骑兵队、陕东赤卫队。四个大队由赵雅生、武丕谟、谢子长、雷天祥分任大队长，骑兵队由许权中兼任队长，陕东赤卫队由张汉俊任队长，集结起义队伍达千余人。

在联欢大会上，中共华县县委书记陈述善致词。接着是刘志丹讲话，他慷慨激昂地讲述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要想不穷只有团结起来闹革命的革命道理。刘志丹的声音一落，全场军民举臂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陕东赤卫队队员和扛着长矛大刀的地方自卫队、赤卫队队员以及四乡农民敲锣打鼓地赶来。他们围着许旅这支装备有机枪和迫击炮的部队，仰望着绣有镰刀斧头和“西北工农革命军”字样迎风招展的红旗，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

西北工农革命军一成立，军事委员会发出第一个命令：军队和农民一起迅速消灭地方反动势力，打土豪斗地主，分粮分财，分配土地。烧毁地

主的文约，没收了地主的粮食和财产，打击民团，惩治劣绅，如同疾风扫落叶，并在高塘镇等地召开群众大会，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刚一成立，人们只知道这个政府是领着老百姓翻身闹革命的，却对从俄国引进中国的“苏维埃”这个词不懂。有一位老大娘听说穷人有了自己的政府，见杨晓初穿着军装走过，急忙追上拦住，拿出三个热鸡蛋说：“老总，你跟苏主席住一块儿吧？请你把这几个鸡蛋捎给他。”

杨晓初一愣，纳闷地想：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来了，但他不姓苏呀！老大娘看出杨晓初的不解神情，忙补充道：“现时咱中国不是有两个政府嘛，一个是蒋介石政府，一个是苏维埃政府。咱们的政府主席不是姓苏嘛。”

当天，在高塘镇小学大门外的墙上，醒目地出现了一幅白纸黑字的文告：

#### 西北工农革命军布告

土豪劣绅和财东，剥削穷人真是凶，加一放账驴打滚，卖儿卖女还不清，如今穷人要翻身，大家团结来求生。西北工农革命军，他是咱的子弟兵，大家同心一协力，铲除土豪和财东，贪官污吏都打倒，我们要做主人翁，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过上好光景。

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主席刘景桂(刘志丹)

前敌总指挥 唐澍

政治委员 刘继曾

中华民国十七年

在起义的当天夜里，高塘镇的赤卫队与农民群众袭击了高塘镇最大的民团，缴了民团的枪，杀了民团头子孙敬福，并分了孙家的财产。当地郭、王、刘、庞四大地主都被打倒。农民群众高喊口号“火化文约”，烧光陈账，并把地主窖藏了几十年的陈粮挖出来分了。平素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豪绅，此时吓破了胆，有的地主豪绅偷溜到西安，跑去向陕西省主席宋

哲元告状，有的地主豪绅跪到地上磕头如捣蒜，求农民群众饶命。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仅在高塘镇一个地区的 300 多个自然村中，就有 117 个村子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渭华地区出现了一个积极报名参军、参加赤卫队的高潮。农民高兴地唱着：

不爱银子不爱财，  
光爱工农苏维埃；  
不爱金子不爱钱，  
光爱人民新政权。

### 高塘镇突围

渭华起义的浩荡声势使正在河南中原作战的冯玉祥极为震惊。冯玉祥立即从河南前线调集了三个师的兵力，迅速回师陕西。

此时，李虎臣本来想趁冯玉祥西安后方空虚，一面派部队围困西安，一面派部队攻打潼关，一听到冯玉祥调集三个师的兵力回师陕西，又相继闻报围攻西安的两个师长何经纬、赤亚武反水，被宋哲元诱杀，自知不是冯玉祥的对手，即摇身一变，与冯玉祥言和。李虎臣与冯玉祥勾结起来，配合地方民团，向渭华起义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形成大兵压境之势。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军委决定把工农革命军分成东西两路，由唐澍、许权中两个有作战经验的同志分别指挥，唐澍指挥东路，许权中指挥西路，陕东赤卫队单独编制，居中策应，以粉碎冯军的“围剿”。

1928年6月8日，冯军分几路向高塘镇包围而来。先到高塘镇的冯军一部刚到东塬上，就被埋伏的工农革命军和农民击败。

夜里，距高塘镇3里的大明寺又发现冯军骑兵。这是田金凯师的骑兵，来势很猛，但大明寺只有30多个赤卫队员防守。在紧要关头，幸好谢子长带领的第三大队赤卫队和王泰吉带领的赤卫队相继赶到。谢子长、王泰吉兵分两路夹击，将进攻大明寺的田金凯骑兵队击溃。

6月9日天亮后，从太平寺进攻的一路冯军不打自退。西边魏家塬的一

路冯军朝高塘镇扑来，被许权中带领的骑兵队和陕东赤卫队拦截。到渭华的几股冯军部队被工农革命军击败后，退到高塘镇较远的塬上驻扎，等待援兵，再不敢轻举妄动。

经一天一夜的战斗后，军委立即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当前的形势和起义部队的去向问题。刘志丹分析敌情后认为，渭华是豫陕两省的咽喉之地，冯玉祥势必增兵相争，且高塘镇地处平原，起义部队目前兵力薄弱，冯军易于进攻，与冯军硬打硬拼必然要吃大亏。他认为陕北是井岳秀的地盘，那里山高沟险，国民党的统治力量薄弱，虽然当前的陕北比不得这里群众基础好，但基础可以靠共产党去建立。所以，他建议把起义部队先撤到渭北，以后再拉到陕北去，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方保存革命武装实力。

会议酝酿许久，众说纷纭。有的说打阵地战，死守、？渭华好；有的说可到陕北暂避敌锋芒；当然还有的说去留事关重要，要请示省委后再定。正在争论之际，来人报告冯军的增兵即至，会议未果而结束。

6月13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在西安召开，省委委员和各地主要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全陕总起义计划决议案》，要求各地配合渭华地区的起义继续组织新的起义。同时，会上改组了省委，由潘自力、李子洲、蒲克敏、杜衡、曹趾仁五人组成新的常委会，潘自力任省委书记，李子洲任组织部长，蒲克敏任宣传部长，杜衡任纪委书记，曹趾仁任团省委书记。张振海、王松年、徐梦周、萧明为省委委员。



渭华起义总指挥部旧址

6月19日，冯军向高塘镇发起总攻。这次由宋哲元亲自出马指挥，率领孙连仲一个师、魏凤楼一个师，还有一个炮兵师，兵分三路向渭华地区合围而来。

刘志丹、许权中、唐澍、谢子长等立即商量对策。大家认为目前冯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起义军坚守高塘镇已不可能，必须迅速从高塘镇撤兵，否则只能坐以待毙。但是这时北上陕北的路已被冯军截断。经过一番激烈讨论，决定起义军从高塘镇突围，撤进秦岭山，暂避敌锋芒。

6月20日晨，冯军全线向高塘镇发起猛攻。冯军从东边扑来的一个师，经瓜坡镇向乔峪进攻，企图切断起义军的退路。冯军刚从东塬到乔峪河，前边引路的孔献文民团还摇摇摆摆得意之时，未料到这里早已埋伏了起义军。由唐澍带领的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枪声四起，还有数千农民高举大刀长矛蜂拥而来。冯军虽来势汹汹，但未及防范，摸不清有多少起义军，慌忙扭头撤退。唐澍带领的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及数千农民，把冯军一直追到乔峪河东的蕴空山才停下。

蕴空山是乔峪口的大门，山势险要，易守难攻，是起义军突围的重要缺口。只有守住蕴空山，才能保证起义军主力部队从高塘镇冲出重围，安全撤到秦岭山。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将冯军拦在乔峪河东后，唐澍命令陕东赤卫队的一个中队在蕴空山把守，等待起义军主力部队撤出。

蕴空山成了冯军的主要攻击目标。熟悉地形的逃亡地主薛良臣带路，领着冯军炮兵师到蕴空山西边，用迫击炮对准蕴空山疯狂轰炸赤卫队的山上阵地。由于冯军长达数小时的狂轰滥炸，赤卫队被迫放弃蕴空山阵地。

与此同时，宋哲元亲自指挥一个师，兵分两路，从赤水东川和西川朝高塘镇包围过来。从赤水东川来的冯军到了大明寺，刘志丹带领两个赤卫大队迎击；从赤水西川来的冯军到了魏家塬，唐澍早已布置工事，凭着明壕暗道，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密集的子弹打得冯军上不了塬。

一整天，冯军发起数次冲锋，刘志丹、唐澍的两个阵地都未能被冯军突破，但工农革命军、赤卫队、自卫队和参战农民伤亡惨重。战斗持续到深夜，刘志丹、唐澍才把大明寺和魏家塬两处的兵力撤出。

6月22日拂晓，起义军主力撤到箭峪口，将要进入秦岭山时，冯军的

一个旅尾追而来，企图封锁箭峪口，切断起义军退路。为掩护起义军主力速撤进山，唐澍急令薛自爽带领赤卫队抢占箭峪口西侧的铁家岭，阻击尾追之敌。经过一场激战，赤卫队队长薛自爽英勇牺牲，起义军先后从箭峪口、乔峪口两个口子撤进秦岭山的终南山。此时，部队只余三四百人。

## 撤入终南山

1928年6月25日，起义部队陆续进入终南山，退至两河岔休整。革命军司令部设在洛源，派赵雅生带领第一大队进驻保安镇。此时，中共陕西省委派人到两河岔，通知刘志丹到西安向省委汇报渭华起义的情况。刘志丹与唐澍就起义部队的未来去向问题交换了看法，两人一致认为，起义部队在渭华一带活动的时机尚不成熟，终南山也不是久留之地。刘志丹特别提出，如果起义部队在终南山难以落脚时，可分散化装，向陕北转移。

7月1日，刘志丹未及离开两河岔，李虎臣的军队随即开进终南山。李虎臣用四个旅的兵力将保安镇包围。唐澍闻讯速带100人的起义军前去增援，赵雅生带领的第一大队虽然撤出李虎臣军队的重兵包围圈，但唐澍所带的部队却陷入重围。战斗从早晨直打到中午，由于敌我悬殊，起义军除少数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分战死或被俘。唐澍骑着枣红马，仅带着六个警卫人员，从碾子沟撤退，那里是唯一的退路，别处都是悬崖断壁。唐澍刚退到岭上，不料当地地主武装头目陈彦策带着一股民团迎面爬上岭来，拦住了去路。

唐澍绕着民房与李虎臣军队激烈战斗，因敌众我寡，警卫人员全部战死。唐澍单枪匹马，直到把子弹打光，还没有突出重围。此时，李虎臣军队把唐澍团团围住，喊道：“捉活的！”唐澍终因腹部多次中弹，在一个小池旁倒了下去。唐澍牺牲后，李虎臣部一个叫方少海的团长残忍地将唐澍的头颅割下，送到洛南县城，在城楼悬挂示众数日。

在这次战斗中，还有廉益民、吴浩然等人牺牲，唯刘志丹、谢子长率第三大队奋力冲出重围。渭华起义遂告失败。

7月15日，许权中、杨晓初与刘志丹、谢子长分别率领的两支部队在蓝田县张家坪会师，此时，全军不足200人。

在蓝田县张家庙，部队又集中了些溃散的人员。在这里，由刘志丹主持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与会者有许权中、杨晓初、谢子长、刘继曾、赵葆华、雷天祥等。会议决定：一、取消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及军事委员会，党在军队中的组织秘密隐蔽起来；二、不再开展苏维埃活动；三、通过许权中的私人关系搞统一战线，争取暂归李虎臣部的刘文伯师。

刘志丹认为渭华起义失败的原因有四点：一是光杆斗争；二是军事冒险；三是脱离群众；四是烧杀政策。并明确指出这次起义中政策上一些“左”的错误。

会后，刘继曾以军党代表身份，召开大会宣布了上述决定。许权中根据会议决定，率部编为刘文伯第九旅，任旅长。8月，许权中旅行至河南邓县时，被地方地主武装“红枪会”打散，许权中也在战斗中负伤。之后，许权中辗转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渭华起义的情况，由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于1933年派到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任抗日同盟军副军长兼第十八师师长。1936年参加西安事变，先后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独立旅旅长、第一七七师参谋长、第四集团军高级参议兼眉县万家塬垦区主任。1943年12月9日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 李子洲被捕

渭华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对渭华地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镇压。渭华地区数以千计的赤卫队员、农协会干部和农民群众被国民党屠杀和活埋。在西安街头，国民党组织的“铲共团”和大批特务密探到处侦察中共陕西省委机关，破坏中共组织和团组织，捕杀共产党人。由于西安形势紧张，李子洲派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回到陕北，指示他们回到陕北地区积蓄革命力量，等待时机。

1928年11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到西安太阳庙门参加长安县的一个扩大会议。因有叛徒告密，中共长安县委书记张鼎安等七名同志在27日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潘自力不明情况，并不知道特务已将会场控制，他刚到开会地点，即遭特务逮捕。

李子洲闻此消息，立即将中共陕西省委机关由红埠街转移到东羊市一

带，并接替了省委书记潘自力的工作，继续与国民党特务周旋斗争。这段时间，李子洲由于劳累过度，胃病越来越严重，但他仍然废寝忘食地拖着病体处理渭华起义失败后一系列需要立即处理的问题。

在形势十分险恶的境况中，李子洲泰然自若，沉着冷静，坚持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工作。1929年1月下旬，他同蒲克敏等先后到富平美原小学，与曹趾仁、刘继曾、徐梦周、马云藩等召开了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和团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会上，李子洲传达了中共六大决议，并检查了省委在领导组织各地武装起义中的失误，总结了经验教训。在省委书记潘自力被捕的情况下，会议选举曹趾仁为省委书记，并增补张国藩、薛永寿、王林(王芾南)为省委委员。会议指示各地党组织在艰险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以稳定基层每个共产党员的情绪，使他们感到省委还存在，还在正常工作。

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以后，陕西团省委书记马云藩被捕叛变。马云藩供出了李子洲和其他陕西省委领导人及省委机关地址。获悉这一情况后，李子洲立即和省委其他同志将党的文件埋入地下。

2月2日深夜2时左右，李子洲正在灯前起草一份省委文件。突然，后院响起一阵杂乱的枪声。李子洲立刻意识到院子已被国民党特务包围，转移是不可能了。他立即把早有准备的省委重要文件塞进灶里，划支火柴烧着，然后熄灭了油灯，抓起桌子上子弹上膛的手枪离开。刚走近门口，一群军特破门而入。当李子洲被押出院子，借着夜色一看，只见住在省委临时驻地的刘继曾、女交通员任青云等都落人军特手中。

国民党特务把李子洲等人带到西华门国民党军事裁判处，关在监狱南边小院的囚室里。与李子洲关在一个牢房里的还有刘继曾、曹趾仁、王友章等。中共陕西省委遭受严重破坏后，全省原有共产党员近3000名，一时锐减到1300多名。西安和关中地区的共产党员仅留下200多名，且都秘密转入地下。

3月1日，幸免被捕的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张国藩、王林、薛永寿等人，以“现存之省委”的名义，在渭南龙背乡白家庄召集渭南、华县、蒲城、富平、长安等地中共地方组织开会，成立新的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负责人

王林，委员张国藩、薛永寿、张蔚森、徐振化、李凌云等。这次会议，史称“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也称“渭南紧急会议”。

3月23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渭南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由原省委常委杜衡主持，王林、焦维炽、薛永寿、李凌云、徐振化、张蔚森等人出席。会议重新调整了临时省委成员，由杜衡任书记，常触歙州篇

## 第二十三章

### 李子洲在狱中

#### 笑对酷刑

李子洲被捕的第二天，国民党就迫不及待地对这位中共陕西重要领导人进行了审讯。国民党特务急切地要从李子洲的嘴里掏出共产党在西安的秘密活动乃至整个陕西省各县中共地下组织的情况，企图将各级党组织一网打尽。

第一次审讯李子洲，主持审讯的人是国民党军事裁判处最高长官萧振瀛。当时，李子洲的胃病非常严重，由于极度的积劳和胃病的折磨，他的身体十分消瘦。萧振瀛以为李子洲一定是高大魁伟、容貌非凡的人物，一见李子洲满脸憔悴、蓄着八字胡、消瘦得弱不禁风时，原有的怯意变成得意，他轻狂地认为经不得一番审讯就会有满意的结果。

李子洲一进审讯室，萧振瀛就迫不及待问道：“快交代，你是什么人？”

李子洲神情泰然，平静地回答：“生意人。”

“别做戏！”萧振瀛拍着桌子站起来，满脸杀气，“你是李子洲，代理过共产党的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策划清涧兵变的是你，筹谋渭华暴动的还是你！”

李子洲坦然一笑，轻蔑地说：“既然你都知道，何必再问！”

萧振瀛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他还要逼着李子洲供出中共陕西省委的人员名单、潜入地下活动的情况和共产党今后的行动计划、各地党组织的情况时，李子洲拒绝回答。

萧振瀛顿时恼羞成怒，命执庭军警给李子洲用刑，他把突破的一线希

望放在摧残李子洲身体的酷刑上。站立在两旁的几个执庭军警像恶狼似的一齐扑上来，把李子洲连拉带推地拖进昏暗血腥的刑室。李子洲未及站稳，军警的皮鞭劈头盖脸地抽打在他的身上……

当李子洲苏醒过来时，他已经躺在了牢房。刘继曾正伏在他身边，一边流泪，一边轻轻擦着他伤口上的血迹。

李子洲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强忍着疼痛不呻吟。他躺在牢房的地上，思考着萧振瀛审讯时的情形，认为这次因叛徒出卖，中共陕西省委遭到新的严重破坏，国民党特务对党内许多情况已经有所掌握。为保存已经潜人地下的中共陕西省委其他同志及西安各级地方组织，保护好转移出去的同志的安全，李子洲与刘继曾在牢房里认真地分析了面临的敌情。为防止一些同志经不起国民党的酷刑折磨和金钱高官的诱惑，再次出现变节分子，使陕西党的狱外革命力量重遭挫折，李子洲决定在狱中加强对被捕共产党员的教育工作。他和刘继曾一起商量，发动那些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利用放风时间，一边密切注意狱中每个被捕人员的表现，一边对那些有动摇迹象的同志进行耐心的党性教育。同时，要求被捕的每个共产党员对狱中来路不明和形迹可疑的人密切观察，时刻提高革命的警惕性。

## 妙语智斗

萧振瀛几经提审李子洲，用尽酷刑，不但未能从李子洲的嘴里得到任何有关中共陕西省委的情况，就连在新捕的共产党员中也没找到突破口，从他们身上收获不到有价值的东西。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对萧振瀛的审讯效果大为不满，认为他太无能，决定亲自出马，到狱中劝降李子洲等一批中共重要人物。

没几天，宋哲元在警卫队荷枪实弹的保护下，由军事裁判处处长萧振瀛及一群法官陪同，前呼后拥地来到了监狱。

监狱的东院关押的是 100 多名政治犯。狱警打开各个牢房，政治犯们都拖着沉重的脚镣手铐，被狱警赶到院子里集中。李子洲刑伤遍体，在刘继曾的搀扶下艰难地走出牢房。许多熟悉李子洲的共产党员都把敬重的目光投到他的身上。大家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但一看到李子洲，就感到像

身后靠着一座大山，心里镇静了不少。

宋哲元一走进监狱东院，先把囚犯们扫视一番，然后在萧振瀛的带领下，走到李子洲跟前站住。宋哲元一见李子洲，就想压垮对方，妄图瓦解他的斗志。宋哲元拉着嗓门，首先大讲一番拥护蒋介石、拥护三民主义的大道理，作出一副关心囚犯的姿态。接着，宋哲元指着李子洲问道：“你信仰什么主义？”

“我信仰马列主义！”李子洲直言对答。

宋哲元沉思片刻说：“我如果把你放了，你还干不干共产党的事？”宋哲元话音一落，李子洲轻蔑一笑：“我知道你不会放我的！”面对李子洲的回答，宋哲元措手不及，被弄得狼狈不堪，十分恼怒，终于拿出最后的招数：“你就不怕死吗？”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李子洲淡然一笑，引出一句古语。求生是人类的本能，尤其在朝着死的路上走去的时候。然而，当需要一个共产党员献身的时候，对死已不恐惧，因为从李大钊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起，李子洲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李子洲的回答又使宋哲元始料不及。宋哲元竟被这位中共领导人的才智和气魄所折服，怕在众目睽睽之下再出丑，便匆忙离开。

李子洲这种视死如归的胆识和革命气节，感染了难友们，使他们从中获得了战胜磨难去追求希望的力量，给狱中的共产党员进行了一次革命气节教育。

同时，也赢得了狱中被关押的不少非党政治犯的敬佩。张效直先生是一位非党政治犯，他在狱中对其他难友评价李子洲：“李先生真是不卑不亢，高风亮节。”

## **领导狱中斗争**

宋哲元走后不久，狱警给李子洲的牢房送来纸笔，说宋主席要每个政治犯写一份详细自传。李子洲一眼看穿了国民党的阴谋伎俩，显然是要搞共产党员的自首，准备登报。为了揭露国民党的这一险恶的阴谋，以防狱中的共产党员上当受骗，李子洲通过狱中内线通知全体党员予以拒绝。

宋哲元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接着，狱警又给每个政治犯发一本《三民主义》小册子。宋哲元授意萧振瀛指定李子洲给众政治犯讲解，妄图用三民主义训化狱中逮捕的共产党员。李子洲明白他们的意图是什么，但这次他没有拒绝，竟然痛快地答应下来。李子洲利用宋、萧提供的狱中合法讲坛，在教诲室里借讲三民主义的条文大力赞扬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先生创建国民党的革命宗旨、肆意屠杀革命人民的罪行。通过李子洲深入浅出的讲解，国民党想要宣传的受到批判、想要侮蔑的得到宣传。

宋哲元巡视监狱之后，萧振瀛又有了新花样，采取软化手段，在监狱的管理上也有了新变化。原来给李子洲、刘继曾、潘自力、李大章、杜松寿等十多名重要政治犯所戴的沉重脚镣手铐被卸掉了。狱内囚犯的生活待遇也有了改善，李子洲与其他政治要犯有时甚至有特殊的招待。用萧振瀛的话说，这种新监狱管理办法是内宽外严，因为在狱内限制囚犯们人身自由的镣铐被卸掉了，生活待遇有了改善，但狱外的岗哨增加了。

在监狱中，李子洲凭着大智大勇、修养有素的革命风范成为全体政治犯和非政治犯心目中的领导者。许多人利用放风时间找他商量狱中共产党的组织生活和对敌斗争，大家都以他为核心，听从他的指示和安排。

## 壮志未酬

由于萧振瀛始终未能征服李子洲等政治要犯，宋哲元十分不满意。不长时间，萧振瀛被调离，接替他的是个野蛮无知的军人范处长。

范处长一到监狱，立即取消了对政治犯的软化政策。因为软化政策在李子洲等政治要犯身上无丝毫效力。没几天，李子洲等十多名政治要犯的脚镣手铐又给加上，黑面窝头、霉米饭又成了每日的饭食。

初夏来临，因牢房里太潮湿，加上粪便的腥臭，苍蝇、跳蚤、臭虫到处皆是。这时，李子洲的胃病更加严重，又患了伤寒，继而转发肺病，身体急骤消瘦。狱中的同志心里非常难受，多次想用狱外党组织救济狱内同志的秘密组织——济难会的经费买些药品给他治疗，都被李子洲谢绝了。

有一次，李子洲的友人李耀卿探监时给他带来100块钱，希望能买点

药物为他治病，使身体康复，但李子洲却拿出救助了狱中难友。

李子洲明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自己的病已没有治好的希望，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李子洲在病危之际，给陕北绥德老家的妹妹登岳写了一封信，托牢房狱警寄出。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不要为我伤心掉泪……

李子洲的友人李耀卿第二次来探监时，见李子洲的病情已急剧恶化，心里十分难过。李耀卿要请医生来给他看病，被李子洲婉言谢绝。

李耀卿不忍李子洲就这样受着病魔折磨，还是通过韩兆鸮请来李子洲熟悉的名医王志蔚。王志蔚见到李子洲时，他已病人膏肓，无法医治了。李耀卿和王志蔚商议为李子洲具保出狱就医，被李子洲再次谢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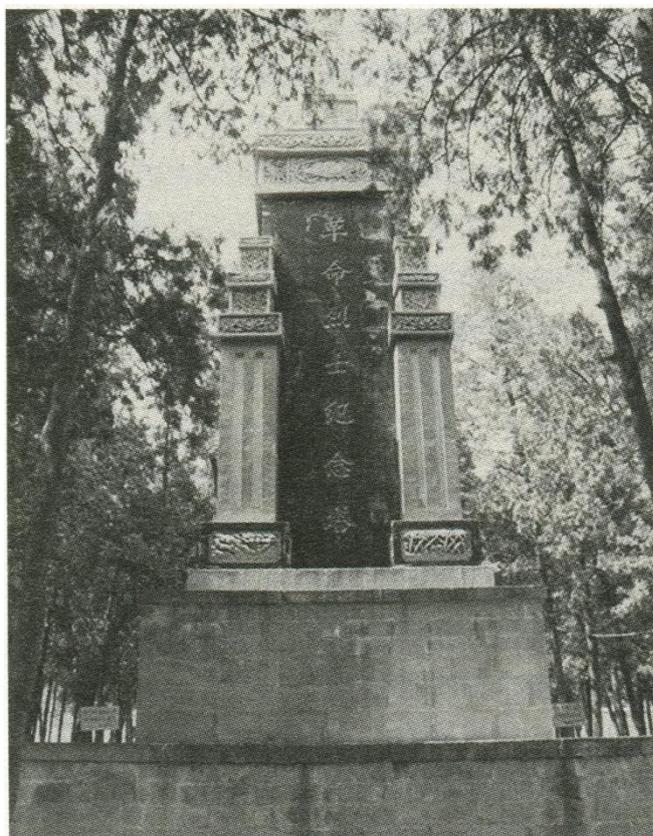
正在北平上学的李登云闻知哥哥李子洲病危，即从北平赶到西安。李登云赶到狱中时，李子洲已处昏迷之中。李登云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哭声惊醒李子洲，他用衰弱的目光

望着弟弟李登云，示意其抽出自己身下铺着的一块毛毯，拿去做个纪念。

这时，李耀卿又来探监，要请人为李子洲拍一张相片留作纪念，李子洲依然谢绝。

同牢房的刘继曾和邻牢房的杜松寿等难友们曾联名上书国民党当局，要求给病危的李子洲将镣铐卸去，但裁判处一直未予理睬。当裁判处派来狱警要卸镣铐时，生命垂危的李子洲愤怒地摇头拒绝。

1929年6月18日深夜，这



绥德县李子洲烈士纪念塔

位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奠基人和中共

陕西省委的主要领导人在狱中戴着镣铐病逝，时年 37 岁。

好友李耀卿、韩兆鹗等人为李子洲备办了棺木寿衣。狱中百十名难友戴着镣铐悲恸地排成长队扶着灵床，在监狱后院将李子洲遗体入殓。友人先将李子洲的灵柩寄于西安东关弘福寺，后设法运回陕北绥德县安葬。

当李子洲病逝的噩耗传回陕北，榆林中学和绥德四师两校师生秘密为这位传播火种的陕北党组织创始人举行了追悼会。噩耗传到国外，正在苏联的屈武等人悲痛至极，望着茫茫南天，遥寄悲伤和哀思。

1941 年 5 月 4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李子洲在绥德县城建起一座纪念碑。1942 年 2 月，为表彰李子洲的丰功伟绩，激发后人继承其遗志，将他未竟的革命事业进行下去，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将绥德西川及邻近几县的部分乡镇组成子洲县，以示永久的缅怀。

NONGMIN  
YUNDONG

第四部 ★

## 第二十四章

# 恢复建立各级地方组织

### 中共陕北特委成立

清涧起义失败后，陕北地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陕北军阀井岳秀对清涧起义的领导组织者和共产党员及流散各地参与起义的群众大肆捕杀。在各县的城门和乡镇的大路口，到处都贴满了悬赏捉拿通缉公告。

由于白明善是被通缉的要犯，他隐蔽在延川县高家圪台村的农户家养伤。一天，正好有同乡人白金章到此处来做生意，意外地遇到白明善。白金章见白明善腿部伤势严重，行走艰难，且外边村头路口贴满布告，到处在通缉他，觉得白明善身处他乡人地两生，对其安危非常担心，当即雇了一乘架窝子，将白明善秘密从延川县抬回老家清涧县东区高杰村。

白明善回到家乡后，地方上缺医少药，伤口化脓溃烂，日趋恶化。这时，井岳秀闻知白明善负伤后已回家中，即派出便衣特务来村侦察，企图秘密抓捕。

清涧县东区党组织获悉白明善处境危险，决定将他转移外地寻求良医治疗。乡亲们得知白明善要外出治病，纷纷主动济捐钱款，有的几角，有的几块甚至几十块，很快筹集到百余块银洋。同时，乡亲们又选出几个健壮青年，抬着架窝子将白明善秘密转移到绥德县义合镇。

到了义合镇，白明善在中共地下党员霍维德家小住几日。霍维德的家境并不富裕，他只读过三年冬书，从小爱憎分明，同情穷人，1925年经霍学光介绍加入共产党，后到绥德四师以打铃工的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

工作，为中共绥德地委的秘密接头人，大革命时期曾担任绥德县农民协会副主席。大革命失败后，井岳秀派军队查封了绥德四师，因霍维德的身份已暴露，一股士兵持枪拥入学校搜查抓捕。当时，他正在学校灶房，情知不妙，急中生智，立即披上一件灶工的工作服，刚跨出门槛，就被几个士兵拦住，喝问道：“霍维德在里？”他神态自若地朝里面指一下，不慌不忙地说：“那驴日的正在灶房里洗家什哩。”几个士兵信以为真，一拥扑进灶房，他趁机跑出校外。



霍维德

白明善到霍维德家后，霍维德为凑足白明善外出治疗的费用，将家中土地作抵押，借到300块银洋，后为清还此笔债务，他不惜把养家糊口的五垧土地和一孔窑、一头毛驴出卖。白明善从义合镇动身，转移到吴堡县宋家川，然后东渡黄河，通过山西省党组织的联系，住进汾阳教会医院。

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组织并没被井岳秀大肆“清党”反共、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所冲垮，经过转入地下的各地共产党员、团员和革命骨干坚持不懈的斗争，被国民党破坏的中共党团组织很快恢复，并得到发展，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此时，国民党省教育厅委任柳砚琛为绥德四师校长。柳砚琛思想保守，任职后不愿得罪井岳秀，解聘了学校许多进步教职员工，并取消了学校原开设课程使用的进步教材。同时，根据井岳秀的旨意，明令严禁学生参加一切社会活动。柳砚琛的这种高压手段激起学生的强烈反对，给学校中共党团组织的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绥德四师正聚集了一批有志的革命青年，如张德生、乔鼎铭、朱侠夫、贾拓夫、刘澜涛、常黎夫、张达志、吴志渊等学生共产党员，在他们积极活动下，首先恢复了学生会。不久，又恢复了绥德四师的中共地下党团组织。

同时，共青团陕西省委派出特派员焦维炽到榆林，恢复了榆林中学团

的组织。随之，绥德县党组织派赵通儒等到榆林，在榆林城南门外猪羊店与榆林中学的共产党员李文芳、白树堂接头，召集榆林各学校中共党团活动分子秘密召开会议，恢复了榆林中学及各学校的中共地下党团组织。当时，共产党员马济川是榆林中学校长，担任中共榆林中学党支部书记。

1928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组织的整顿、恢复和发展情况，为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决定在陕北成立中共陕北特别委员会(简称中共陕北特委)，并派出省委特派员杜衡到陕北巡视工作，着手进行组织建设。不久，杜衡来榆林，秘密召开党员大会，先成立了中共榆林县委，指定李文芳为县委书记。选举产生了县委成员，组织委员白树堂、宣传委员叶贤英、青年委员赵严农(兼榆林团县委书记)、妇女委员雷云祥、街道支部书记张德生、候补委员为乔乃文。

4月中旬，白明善刚从山西汾阳回到陕北，即接到陕北党组织交通员的通知，要他到绥德县参加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会议。当时，白明善的腿伤还未痊愈，骑着毛驴赶到绥德，接头人告诉他，会议地址在城西40里处的苗家坪。

这次会议在苗家坪南丰寨的一座古庙里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杜衡、冯文江、焦维炽、李文芳、张蜀卿、柴培桂、赵通儒、景仰山、师应山、苗仰实、白明善等十余人。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委，并选举杜衡任书记，冯文江负责农运兼组织，杨国栋负责军事，马瑞生负责宣传，焦维炽负责共青团，白明善、赵通儒为委员，并任命白明善为中共绥德县委书记。



赵通儒

这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和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扩大会议精神，主要讨论了中共陕北组织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的恶劣形势下如何开展革命斗争及恢复、建立、扩大各级地方组织的问题，决定把今后党的建设重点放到农村，并通过了政治、组织、农运、青运以及陕北政治形势与

当前工作决议案。

中共陕北特委成立后，下辖榆林、府谷、米脂、绥德、清涧、肤施、延长 7 个县委，安定、保安、镇川 3 个直属区委，安边 1 个直属支部，时有党团员 800 余人，特委机关设在米脂县城内。

## 绥德农民斗争

苗家坪南丰寨会议后，白明善受命主持中共绥德县委，带病积极投入领导和发动农民运动的工作中。当时，绥德县西川的马蹄沟、三皇峁一带是盛产食盐的川道，盐业工人和煤炭工人集中。白明善认为只要深入到他们中间去，就可以发展和壮大共产党的力量。于是，他亲自到马蹄沟、三皇峁等几个盐场，与李景林、张宗贤、张建材等很快在工人中秘密建立了地下党团组织，并组织了 2000 多名盐业工人向盐场主进行斗争，要求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工资待遇，举行了盐业工人罢工。

盐场主见工人们起来罢工，十分恐惧，慌忙跑到绥德县城叫来警察镇压。警察刚到盐场，工人们立即黑压压地将警察围起来，愤怒的叫骂声响成一片。警察见工人人多势众，自知不能对付，只得灰溜溜地跑回县城。

1928 年春夏，陕北大旱，灾民四起。中共绥德县委以求神祈雨为名，指派共青团员马仰西、高承恩等人发动灾民群众，在绥德县城内的二郎庙、三官庙、娘娘庙、关爷庙抬起四座龙王楼。经白明善的周密安排，灾民成群结队抬着龙王楼，先到大劣绅马炽庵所开的永泰祥商号等处示威游行，要求当局惩办劣绅，灾年减租减税，富户出钱放粮，赈济灾民。

三天后，抬龙王楼运动发展到高潮，四乡灾民汇集绥德县城。驻军看见四五千群众背着口袋，拿着镢头，声势如此浩大，吓得急忙关闭县城四门。士兵荷枪实弹，排列城头，如临大敌。愤怒的灾民们不畏强暴，冲破城门蜂拥而入。军警朝天鸣枪，仍然阻拦不住潮水般的人群。灾民们抬着龙王楼浩浩荡荡直奔县衙门，冲入三堂。

这时，国民党县长艾崇德和绅士们正在开会，闻知灾民冲入县衙，顿时一片惊慌。艾崇德和几个绅士从后门跑出，用绳子拴着腰吊下城墙，逃出城外。灾民在县衙里没有找到县长艾崇德，就团团围住他的住宅。许多

灾民冲入几家地主家里去挖藏粮。

驻军的两个营长田润民、杨向岐及县长艾崇德慑于群众斗争的威力，纷纷跪倒在龙王楼前焚香磕头。艾崇德被迫答应惩办劣绅马炽庵、灾年减租减税、富户出钱出粮赈济灾民的条件。

接着，中共绥德县委经过周密策划，在北区四十里铺、赵家砭一带发动了一场以反对顾家杂税局为主的抗杂税运动。顾家杂税局是国民党北区的区长顾士明一手经办、专门征收牲畜交易和屠宰税的劣绅组织。大旱之年，顾士明任用本家侄子顾七等恶少私抬税率，随意强征滥罚，中饱私囊。

6月下旬，四十里铺逢集日这天，北区党组织负责人马明方及共产党员耿光清、崔天增、高继武等以四十里铺小学教员的身份，串联数千名农民群众，在崔正武、贺加昌等人带领下，拥入顾家杂税局，砸了招牌，赶走爪牙。

国民党绥德县城驻军急忙派出一连军队，赶到四十里铺进行弹压，将崔正武、贺汉祖等人绑押。这一暴行更激起灾民的愤怒，3000多群众将一连军队层层包围在四十里铺小学院内，严正提出“废包税”“审判顾七”等正义要求。带队的营长和县衙来人在群众的愤怒之下，被迫释放被押人员，答应了群众提出的全部要求，顾家杂税局被废止。

同时，中共绥德县委还领导和发动了打蛋厂的群众运动。在绥德县城，一个外省资本家开办了一处鸡蛋厂，廉价收回鸡蛋，焙制蛋粉，运往京津等地倒卖，牟取暴利。大旱之年，灾民求神祈雨，以期挽救枯焦的禾苗，而蛋厂老板却唯恐天下雨影响蛋厂生产，经常焚香磕头，祈祷赤日无雨。

蛋厂老板的行为激怒了农民群众。白明善因势利导，在城区、北区、南区党组织负责人马明方、马文瑞、崔田夫的发动下，在绥德城集日，绥德四师李光白、党永亮、许金河、白寿康、贺晋年、吴志渊、白如冰等党团员学生，带领数千农民冲到蛋厂，冲开国民党军警的阻拦，将蛋厂的蛋具、蛋粉摧毁殆尽。

接着，在马明方、马文瑞、崔田夫的带领下，群众从蛋厂出发，声势浩荡地冲进县城，拥入县衙，要求国民党县衙开仓赈灾，发放银洋。县长艾崇德闻风逃匿，不敢露面。国民党驻军营长和众绅士商量后，不得不答

应农民群众的条件，并在南城搭起一个台子，给进城的农民群众每人发放银洋一块。

正当陕北各县党组织逐步恢复和发展扩大、群众革命情绪高涨之际，由于渭华起义失败，中共陕西省委相继遭到严重破坏，白色恐怖又笼罩全陕境内。陕北的革命形势再处低潮。

70年后，马文瑞回顾这段农民运动时说：“这次绥德农民斗争是我们在陕北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斗争，组织严密，斗争的结果也令人满意”，但“当时斗争经验不够，没有能够进一步发动群众，将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引向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

## 中秋节事件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代表共产党员4万多人（一说69000多人）。这次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在新的革命浪潮还没到时，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大会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大会选举苏兆征、向



常黎夫

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于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这次会议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

9月28日是中秋节。中共陕北特委接到中共陕西省委《关于陕西暴动行动计划》，准备在米脂县城召开特委第二次代表会议。国民党特务发现城内突然出现许多外地青年和不同口音的陌生人，即密切注意并跟踪。当各地党组织代表陆续到齐，会议尚未开始，米脂县国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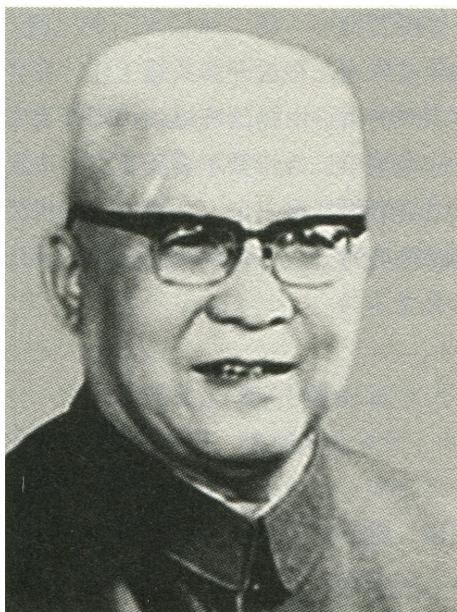
党特务秘密报告绥德县城驻军，调来一营军队将县城包围，开始到处搜捕共产党人。

这时，常黎夫和窦增荣等多次催促参加会议人员立即分散出城，均未能引起杜衡的重视和警觉。在情况万分危急下，窦增荣和特委委员冯文江出南门，渡过无定河脱身。特委委员杨国栋被国民党军队追出城外数里路，始得绕道脱身。中共陕北特委书记杜衡、共青团特委书记焦维炽、团特委委员贾拓夫、中共榆林县委书记李文芳等四人被国民党逮捕。

不几天，井岳秀又派国民党特警到米脂县三民中学，焚烧进步书籍，训斥威胁师生，搜捕学校共产党员、团员。三民中学的许多共产党员、团员被迫转移他乡或潜入农村。



贾拓夫



刘澜涛

李文芳、贾拓夫被捕后，因无证据，关押半个月具保释放。杜衡、焦维炽因从身上搜出写有代号的笔记本，被押到榆林，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到年底才获释放。杜衡出狱后，即离开陕北去了西安。

在米脂“中秋节事件”后的10月初，中共陕北特委委员杨国栋、冯文江、赵通儒等人在绥德县西川苗家坪小学(中共苗家坪区委所在地)召开临时特委会议，共商特委遭受破坏后的应急事宜。会议决定由杨国栋代理特委书记，调白明善、霍世杰参加特委工作。

会后，将特委机关由米脂县城迁往清涧县折家坪村。

1929年2月下旬，在绥德县张家岔召开了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杜衡、杨国栋、冯文江、刘澜涛、贾拓夫、赵通儒、

白明善、常立德、谢子长、马文瑞、周发源等 20 多人。杜衡由西安返回陕北，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大和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冯文江代表特委作了工作报告。会议确定特委的工作方针为深入群众，争取群众，积蓄力量，准备条件，等待时机进行苏维埃运动。

在这次会上，大家批判了杨国栋生活腐化、主观武断和单纯结交白军军官的错误。

杨国栋，陕西安定县人，1925 年在榆林中学上学期间加入共产党，后受中共绥德地委派遣，与刘志丹、霍世杰等一起赴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军事。

大革命失败后，回到陕北，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自米脂“中秋节事件”发生、担任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以来，与国民党政府要员和白军军官来往频繁，思想逐渐右倾，工作作风粗暴，整天陶醉于灯红酒绿之中，贪图享受，玩弄女人，还曾为一个女人在米脂县城闹出过一场“凤仪亭”的丑剧。

这次会议决定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在会上，大家虽然对杨国栋提出尖锐的批评，但仍决定由杨国栋继续代理特委书记，增补白明善、霍世杰为特委常委，选举谢子长为特委军委委员，并决定白明善任中共米脂县委书记，周发源任中共绥德县委书记。会后，特委机关由清涧县折家坪迁到榆林城内。白明善以教员的公开身份到米脂三民中学任教。

## 第二十五章

### 与右倾错误作斗争

#### 米脂反饥饿群众运动

1929年春天，陕北地区各县闹饥荒。当时，有一段悲凄的民间歌谣：

民国进得十八年，  
先闹饥荒后瘟疫。  
天上不见麻雀飞，  
村村烟筒断炊烟。  
老少离家逃劫难，  
饥汉割爱卖“活妻”。  
人吃人来狗吃狗，  
鸦儿老鹰啄石头。

这段歌谣是当年饥荒的真实写照。据有关县志记载，民国十七年(1928)陕北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到民国十八年(1929)春，青黄不接的春荒，不仅使饥民饿死无数，而且因死尸太多引发地方瘟疫，有的全家甚至整个村庄绝了人烟。饥民挖草根、啃树皮充饥者甚多，成群结队的饥民逃荒讨饭，卖儿卖女卖妻子，流落他乡。在这场饥荒中，陕甘豫有3500万饥民，仅陕甘饿死人数就达350万之多。

白明善一到米脂县城，只见成群结队的饥民拖儿带女，满街皆是，甚

至随处可见饿死者的尸体，无人敢去掩埋，害怕染上瘟疫，任其腐臭。白明善路过一家饭馆，看见一个饥民抢喝了店老板的面汤，竟被店老板打得躺倒地上，无力挣扎爬起来，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他在米脂县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领导和组织了一次饥民抗粮、抗税、抗租、抗息、抗摊派的反饥饿群众运动。

这时，刚在米脂县三民中学召开了共青团陕北特委扩大会议，选举贾拓夫为书记，李文芳为组织委员，刘秉钧为宣传委员，常黎夫、赵颀龙为委员。经过学校中共地下党团组织的秘密串联与李郁华、崔凌汉等的发动，各乡村饥民一呼百应，很快在米脂县城聚集了数千人。这天正逢米脂县城集日，共青团陕北特委决定由米脂县共青团负责人李秀峰、张雄飞等出面，组织三民中学、东校、女校学生，在城北门集中后，带着数千饥民像潮水一样地涌向县衙门请愿。

请愿的队伍路经豪绅艾丕发的发盛银炉店，学生在银炉店大门贴了几张标语，被艾丕发的儿子艾畅园和侄子艾绳庆当场撕掉。抗粮纠察队长刘澜涛一声令下，数十名纠察队员冲进发盛银炉店，店外顿时人声鼎沸。艾丕发吓得躲入地藏庵，大家一气之下，把艾畅园、艾绳庆捆绑起来。

请愿的饥民经过基督教堂，教士邢怀仁把学生贴在教堂门前的标语撕个精光，纠察队员们把邢怀仁也五花大绑起来。

请愿的饥民队伍押着艾畅园、艾绳庆、邢怀仁三人，浩浩荡荡冲入县衙，要求国民党县长张仲喻将艾畅园、艾绳庆、邢怀仁监禁起来，并强烈要求县长张仲喻向全县发出告示：官府减粮、减税、减摊派，地主豪绅减租、减息，以减轻饥民沉重负荷。县长张仲喻见群众来势迅猛，心里极为恐慌。

他一面用好言应付，暂将艾畅园、艾绳庆、邢怀仁一齐收管监禁；一面暗中派人骑快马，到井岳秀部驻守镇川堡的军队告急求援，称米脂三民中学有共产党分子煽动学生和饥民闹事。镇川堡驻守着刘润民的旅部，旅长刘润民亲带驻军赶到米脂县弹压。刘润民一到米脂县，就鸣枪放炮，强行驱散米脂县城云集的请愿饥民，并根据井岳秀的旨意，立即将米脂县三民中学封闭，到处抓捕这次群众运动中已暴露身份的三民中学学生领袖，

李秀峰、刘澜涛、常黎夫等闻风转移出米脂县城。

白明善在米脂县领导和发动的这场群众运动受挫，中共陕北特委代书记杨国栋一得到情况，很快从榆林赶到米脂县，强令白明善等立即放弃对饥民运动和学生运动的领导。当白明善和其他特委委员对杨国栋的主张提出不同意见时，杨国栋气得扬起自己的鞋子，要向持反对意见的委员们动武。

杨国栋认为，当前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期，所有政治性的活动一律要停止，绝不能因共产党内的个人盲动主义使党组织再次受到破坏，让同志们做无谓的牺牲。在杨国栋的强行命令下，米脂县的反饥饿群众运动被迫停止了。

在米脂县反饥饿群众运动中，杨国栋显得情绪急躁专横粗暴，但当人们走过这段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的历史，可看出杨国栋当时的主张并不是完全错误的。

### 榆、葭、横、吴、清反饥饿群众运动

1929年春，虽然米脂县的反饥饿群众运动被井岳秀的军队压制下去，但陕北其他各县的反饥饿群众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风起云涌，又起高潮。

在中共镇川堡区委领导下，朱侠夫、朱子休组织起500多饥民，聚集到镇川堡，将国民党榆林县长王季斌及一帮收税衙役团团围住，把企图逃脱的王季斌赶到一座破庙里，扣在庙里的一口大钟之下，四周堆上干柴，强迫王季斌答应向饥民免征捐税。群众在大钟外燃起火把，威胁王季斌：“如不免，就放火烧人！”王季斌吓得浑身颤抖，百依百顺，签字画押同意免除当年的一切捐税。同时，朱侠夫、朱子休还组织饥民吃大户，领着饥民到地主豪绅家逐户要求义捐粮食，赈济饭粥，如有不从者，就进行斗争。



朱侠夫

葭县党组织在农村成立了“农民之友会”，由牛营清、常在全、张书信等共产党员利用饥民求神祈雨的机会，在凌水寺、陈家岔、高庙山等 20 多个村庄聚集 2000 多饥民，形成浩荡声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吃大户运动，与地主豪绅进行斗争，要求减租免息，持续两个月之久，影响遍及南区。

横山县党组织发动青坪的数百饥民及黑木头川、响水、油房头等地的千余饥民，由共产党员高岗、李树林、李坤润、曹动之、郝振秀、杨文耀等带领，到县城聚集请愿，围堵了县衙，逼迫国民党县长张斗山免除了当年的粮款捐税。

吴堡县在薛尚英、慕嘉绩、张毅忱等共产党员的领导下，首先组织岔上镇数十个村庄近 500 饥民，与岔上镇区长薛有年和劣绅薛时忠进行斗争，后又带着饥民一路南下，汇集上千人众冲到吴堡县衙，向国民党县长请愿，要求减除私增地亩税，取得了胜利。

在清涧县东区党组织负责人唐洪澄、白如冰等的秘密串联之下，上万饥民组成抗粮大军，将县城包围数日，逼迫国民党县长答应了饥民的请愿条件。自此，县里衙役们吓得长时间不敢出城到农村催粮收款。后国民党突然派兵到东区，对参加抗粮的群众进行镇压，并到处缉拿唐洪澄、白如冰等抗粮运动的领导人。唐洪澄、白如冰闻讯转移，唐洪澄的族兄贺生荣（共产党员）被抓走。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唐洪澄变卖了家中的土地和牲口，凑足 1400 块银洋，才将贺生荣赎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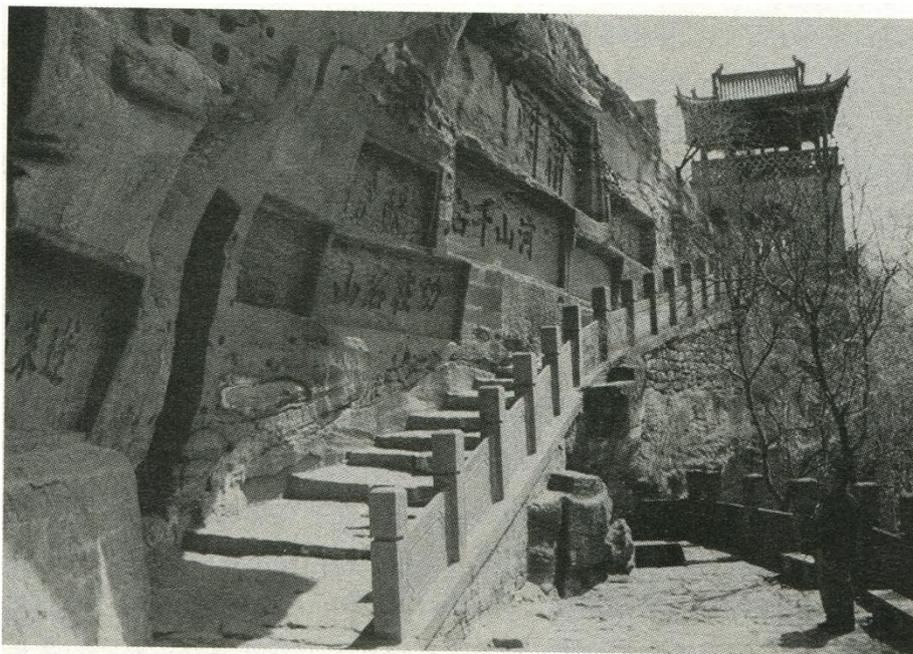
## 红石峡会议

1929 年 4 月，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了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杨国栋、白明善、刘志丹、李力果、贾拓夫、常立德、刘秉钧、韩俊杰、刘澜涛、冯文江、霍世杰、胡颖民等十多人。会议一开始，推选白明善为这次会议的执行主席并主持会议。

在会上，杨国栋首先发了言。他认为，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在清涧组织起义和在渭华发动起义的尝试均失败，中共陕西省委、中共榆林地委、中共绥德地委相继被破坏，全陕一片白色恐怖，这种严峻现实足以证实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太小，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他主张在

敌强我弱的历史条件下，陕北党组织应暂时处于隐蔽状态，不要搞白白流血牺牲的武装斗争，只应搞一些舆论宣传，待唤醒民众的觉悟，等时机成熟，再一举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红石峡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会址

杨国栋的发言刚完，与会者都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尤其是刘志丹的反驳最为激烈。刘志丹认为蒋介石叛变革命，背弃孙中山先生生前之革命主张，甚为不得国人之心，在其统治尚未稳固之时，军阀之间矛盾重重，相互争夺不休，共产党应乘其隙实行武装斗争，切不可放弃革命良机，若待国民党的统治牢固，再搞革命谈何容易！当前革命的低潮绝不意味着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太小，也不意味着中国革命没有成功的希望，要革命就要斗争，要斗争岂有不流血牺牲的道理？挫折和失败只能是暂时的，向国民党妥协和投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他主张根据陕北有利的地理环境、共产党在各县普遍发展的良好基础，应把党的武装斗争深入到农村，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并可利用陕北军阀之间的矛盾，把共产党员、团员和革命的积极分子打入军阀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拉出国民党的武装变为自己的武装；同时，可以利用地方山大王的一些势力，与国民党抗衡，有利于中共陕北组织的生存。

刘志丹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大家均对杨国栋消极保守的右倾思想进行了批判。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后作出决议：目前陕北党组织应

加强对武装斗争和饥民斗争的领导，而且在武装斗争方面可以有“白色的”“灰色的”和“红色的”三种形式（“白色”即是把党团员打入各军阀的军队中去工作，“灰色”即是把党团员打入土匪、山大王队伍中去工作，“红色”即是党搞自己的武装力量红军），决定以开展兵运和武装农民为主，发展党的革命武装力量。同时，在会上撤销了杨国栋的特委代书记之职，由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

这次会议在中共陕北组织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标志着党内经过与右倾思想的激烈斗争，确定了大革命失败后开展兵运和依靠农民武装斗争的初期建军路线，史称“红石峡会议”。

红石峡会议以后，中共陕北特委决定派出特委委员以特派员的身份分别下到葭县、米脂、吴堡、绥德、清涧、安定、保安各县，巡视各地农村党的活动情况。白明善被派到府谷任县委书记，赵通儒被派到清涧任县委书记。

这时的府谷县已有柴培桂、严念祖、孙计一、孙钟慧、张子栋、李来宾、刘子安、郭天锡等从绥德、榆林、太原和上海各地学校毕业回到家乡，秘密发展了不少中共党员，在县城成立了中共府谷县委，由严念祖任书记。

白明善到府谷县后，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与严念祖、柴培桂等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财物分给贫苦农民，深得群众拥护。白明善、严念祖、柴培桂等组织学生和运输工人向国民党县政府提出停收斗捐税，痛打民政科长苏德和，并将其拉到街上让群众斗争，迫使政府宣布停止征收斗捐税。同时，白明善、刘子安、刘世英、张子栋、柴东阳等又发动学生、运输工人、农民，聚集起数百人，包围县厘金局局长的住宅，冲入县盐厘局宣布：一不准再私立税目，勒索百姓；二不准再以偷税、漏税等名目滥罚百姓；三是当面向百姓赔情道歉。在这次斗争中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打击了反动当局的气焰。

在白明善的领导下，还发动教师进行了一次索薪斗争，迫使当局撤了反动守旧的县教育局长杨琛和尤天乙等几个高小校长的职务，改由共产党员及思想进步人士担任县教育局长和几所高小的校长。白明善等在府谷县领导和发动的多次群众运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惧，当局即下令逮捕白明

善、严念祖等。白明善被迫离开府谷转到榆林，严念祖未及转移被国民党抓捕。

杨国栋因在红石峡会议上受到批判，并被撤销特委代书记一职，甚感孤立，竟一气之下回到安定县老家，装起病来。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这一阶段的工作实际上落在了刘志丹的肩上。不久，中共陕北特委将红石峡会议形成的工作报告上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省委来信同意了特委多数人的意见，否定了杨国栋的意见，并提出改组中共陕北特委。

7月中旬，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渭南辛市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调整了省委成员，常委由杜衡、王林、张蔚森三人组成，杜衡任书记，徐振化、刘志丹当选为常委候补委员。会议讨论决定今后工作主要是恢复组织，抓紧做下层士兵中的宣传工作和救济难民的工作。

8月23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召开第二次常委会议，增补薛永寿为省委常委，张蔚森改任候补常委，刘志丹不再担任候补常委。会议决定新增的

省委委员吉国祯接替杨国栋的中共陕北特委代书记职务，张文华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

吉国祯、张文华到陕北后不久，省委派出苏士杰任特委军委书记。刘志丹、谢子长及一批共产党员、团员先后打人各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

## 第二十六章

# 神木手枪连起义

### 杜斌丞联络“倒井”

红石峡会议后，谢子长、刘志丹、高岗、杨重远、张东蛟、高鹏飞等一大批共产党员根据红石峡会议的精神，先后打入陕北、宁夏、甘肃、山西、河北等地的军阀部队，积极投入兵运活动。中共陕北特委把驻守神木县的高志清部作为重点，在高志清部陆续由各县中共地方组织安排一批共产党员、团员和青年农民积极分子，酝酿、策划一场起义。

神府一带是陕北的北塞门户，驻守神木县的是井岳秀的骑兵旅。骑兵旅旅长高志清，字世秀，祖籍陕西定边县盐城堡，1876年生于宁夏银川。早年加入哥老会，在董福祥部下当亲兵。1902年在董福祥部策动哗变未成，被董福祥发觉，即杀了告密的军官，潜入平罗、石嘴山、贺兰山一带活动，创立“贺兰山堂”（亦称“兴隆堂”）当了堂主。辛亥革命初，积极拥护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多次组织领导民军起义，并联合定边民军首领一起增援西安民军，在礼泉、乾州参加了同清军的激战。1914年，参加了反袁护国和反北洋军阀政府的护法斗争，在陕北、甘肃、绥远等地首树反袁护国旗帜，同陕北会党人士通电拥护孙中山，坚决反对袁世凯改元称帝。辛亥革命失败后，率孤军退往陕北，投靠了井岳秀，1921年春，任骑兵团团长，驻防三边。1928年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九路军骑兵第一师，任中将师长。后缩编为陕西警备骑兵旅，任旅长，驻防神府，司令部设神木县城。这支军队长期受井岳秀的节制和排挤，虽然部队由井岳秀直

接管辖，但高志清对井岳秀的怨恨甚深，表面看平平静静，其实相互之间矛盾逐渐激烈化。李象九在清涧发动起义之前，曾利用高志清与井岳秀的矛盾，联络他同时在神木县起义，以对榆林井岳秀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欲图一起“倒井”。在李象九起义时，他又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不敢举兵响应。

1928年夏，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共陕北特委针对高志清与井岳秀的矛盾，及时提出“反蒋必先倒井”的口号，并邀请陕北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先生与曹又参，一起北上神木县说服高志清再次“倒井”。经杜斌丞的敦劝和引导，高志清表示愿意“倒井”。同时，按照杜斌丞的建议，同意在神木县的旅部驻地首先成立一个教导队，以培训军队干部。中共陕北特委乘此机会，先派出黄埔军校毕业的杜斌丞之子杜鸿范及共产党员高岗、谷玉山、高直之等人，打入高志清部，与该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张慕时一起做中层军官的工作。

为了迅速发展和壮大高志清部共产党的力量，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绥德、米脂、葭县等县的党组织选送30余名共产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加入高志清的教导队。中共米脂县委选派高学孔、高仰观、常翔锋、杨春兰、高文昭、刘德禄、高照璧、郭秉金、高振汉、高应汉、高培、申长雄、申长敦、薛富华、常福、常焕文等；中共绥德县委选派刘尊山、高云亭等；中共葭县区委选派张俊贤、贺大增、刘均原、马增前、刘国昌、刘国梁、乔鼎铭、马子骥等。他们在教导队培训后分别到高志清的补充营手枪连和其他连队当兵。

11月，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将打入高志清部补充营及各连队的团员和进步青年全部转为共产党员，并决定在共产党员较多的手枪连建立中共特别支部，由刘尊山任书记，刘德禄、高学孔任委员。中共特别支部受特委直接领导，与中共神木县城区委为平级关系。在其他连队建立的党小组，统由手枪连中共特别支部领导。中共特别支部与中共陕北特委的秘密联络站设在贾拓夫母亲在神木县城街上开的一个小烟酒铺子里。手枪连中共特别支部建立后，发动共产党员在士兵中广泛交朋友、拜把子，先后又发展姬占昌、袁福张俊贤任书记。

高志清的“倒井”不是出于自觉，又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虽经杜斌丞、曹又参在神木县先后半年余的说服，口头上答应“倒井”，而实际上整天只顾抽大烟、打麻将，并听信井岳秀早就派来监视他的补充营营长兼旅部副官长刘鸣铎的谗言，对“倒井”的其他准备工作再不行动了。

杜斌丞见高志清“倒井”未见成效，于1929年春即愤然离开神木县到西安，后又转北京。接着，曹又参和杜斌丞的助手崔焕九也相继离开神木县。这年陕北饥荒严重，杜斌丞专程到东北为陕北灾民募集赈济粮，并派曹又参到绥远负责把赈济粮运入陕北。

1930年9月，杜斌丞应杨虎城之邀南下西安。此前，时任河北省主席的徐永昌也曾邀杜斌丞出任职务，他以“道不同，不相为谋”婉言谢绝，而选择了志同道合的杨虎城，从此成为杨虎城身边的重要决策人物之一。杜斌丞到西安就任第十七路军高级参议后，认为一个杨虎城、一个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促进西北大联合、西南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于是，向杨虎城、邓宝珊提出“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的24字主张。用他形象的话说，叫“打开后门(联合苏联)和关住前门(拒蒋介石于潼关之外)”。

1931年7月，杜斌丞赴甘肃各地考察。11月，吴佩孚从四川窜入兰州，甘肃保安司令雷中田拥吴。蒋介石迫于形势，命杨虎城的部队入甘平乱，杜斌丞随孙蔚如的第十七师进军甘肃。攻克兰州，赶走吴佩孚、雷中田后，孙蔚如出任甘肃宣慰使，杜斌丞任秘书长，襄理省政。

杜斌丞、曹又参、崔焕九离开神木县后，因高志清是哥老会的“龙头大爷”，中共陕北特委为使打人高志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便于开展兵运活动，即指示全部党员参加哥老会。

## 开办军官教育团

1929年春，高志清部手枪连的中共特别支部与中共陕北特委曾一度中断联系。中共特别支部负责人刘尊山准备“开小差”南下榆林寻找特委，但刚离开神木县城就被高志清发现。刘尊山行至半途，高志清派出的追兵即至，被抓回关押四个多月。在此情况下，手枪连中共特别支部即改由刘

德禄负责。

在此期间，打入高志清部的高岗通过关系给高志清当了护兵。他一到高志清部，就在补充营手枪连策划起义，仅几个月后，因其过于激进，被高志清发现，准备将他抓捕。高志清部的党组织及时通知高岗，高岗即只身离开神木县。

同年秋，井岳秀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九军被蒋介石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十六师，在榆林新开办了一个军官教育团，下设步兵、炮工两科，专门训练部队各连、排、班下级军官。高志清部中共特别支部派出补充营手枪连刘德禄、高仰观、高照璧，二连马耀先、贺大增，四连高云亭等前往榆林军官教育团学习受训。此时，高志清部中共特别支部由高学孔负责。

9月，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吉国祯，由中共陕西省委派到陕北，接替杨国栋任特委书记。

11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张文华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苏士杰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

张文华、苏士杰到职后，根据军队秘密工作的特殊要求，征得时任特委书记的吉国祯同意后，将打入第八十六师军官教育团的40多名团员青年全部转为共产党员，并很快在军官教育团建立了中共军特支，由姜海龙任书记。当时，在军官教育团炮工科的共产党员有何格兰、杨德厚、赵经昌、孙英俊、邱维汉、陶自录、许先志、李玉田、张秀星、任贯一、孙师策、边临雍、魏志仁、李文赤，步兵科的共产党员有张耀文、魏俊德、李承德、张俊英、任怀义、刘德禄、高仰观、高照璧、贺大增、高云亭、刘尊山等人。在第八十六师刘润民旅部当书记官的共产党员王贵宾担任各中共军特支与中共陕北特委之间的秘密交通员和情报员。

1930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来陕北巡视工作，决定将中共陕北特委机关由绥德县再次迁往榆林，并派特委委员李文芳上榆林先行筹备，兼做军官教育团的工作。李文芳通过王贵宾与各营中共军特支取得联系，利用军人放假外出的机会，在榆林城内的平民学校和城外的东山药王庙等处与中共军特支负责人碰头，传达上级指示，听取了中共军特支组织发展

的汇报。

同年秋，榆林军官教育团第一期学员结业，大部分学员回到原部队，只留炮工科工兵专业的40名学员做骨干，组建成井岳秀第八十六师直属工兵连。当时，工兵连的共产党员有何格兰、杨德厚、赵经昌、邱维汉、孙师策等，分别在工兵连担任班排长，并在工兵连建立中共支部，由何格兰任书记。

## 仓促举事

1930年冬，在高志清部补充营手枪连的中共特别支部开展了近两年的兵运活动已初见成效。手枪连的常翔锋、高学孔、袁福禄等分别担任了班长，高宜之担任了高志清部的掌旗官。同时，党员利用参加哥老会的名义、采取拜把子的方式团结了一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整个手枪连已经基本具备武装起义的条件。

11月中旬，高志清派高宜之前往定边县，名曰调查该部二团连长高光福在葫芦素脑和蒙人的一桩纠纷案，实则是暗中调查郑思诚派来的人的行动。趁此机会，手枪连中共特别支部拟让高宜之去保安县找刘志丹，研究策动高志清部起义及起义之后起义部队到保安县一带打游击等问题。

12月，手枪连三排排长王凤城(哥老会成员)因一桩刑事案发，被国民党神木县政府关押，并在县长过堂审讯时遭严刑拷打，被判以重刑。

12月21日晚，与王凤城关系甚密的手枪连王自强等几个班长邀请常翔锋、高学孔一起喝酒，商议武装劫狱、救出王凤城和在手枪连起义的有关事宜。常翔锋、高学孔未接到上级指示，都认为时间太仓促，不同意蛮干。常翔锋借口第二天要带几个士兵执行任务，护送杨虎城委任的一个新县长到府谷县赴任，答应从府谷县返回神木县城后再行酌定。几人商量到半夜时分，终因意见不一，便各自回去睡觉。

常翔锋、高学孔离开王自强等人后，二人商量，认为这次行动并非上级组织筹划的一次行动，但事关重大，决定立即写信将手枪连的紧急情况火速汇报并请示中共陕北特委。

当晚，王自强等人回到各班后，怕筹谋起义的消息一旦走漏，各自性

命难保，不敢等到天亮，仓促决定于次日凌晨在手枪连行动。

12月22日凌晨3时许，王自强等几个班长趁着大家沉睡之时，迅速缴了连排长的枪。这时，王自强才通知常翔锋、高学孔、郭秉金、袁福禄等共产党员和教练员李秉仁，速带全体士兵起义。因事发突然，手枪连的中共特别支部毫无准备，不仅一部分手枪连士兵因住在别的地方未能参加行动，也未及通知高照璧、常文焕等人，只有高学子、常翔锋、郭秉金、袁福禄四名共产党员临时决定参加这次手枪连的起义，以掌握这支部队。

起义部队由王自强带领，首先从驻地冲到县衙门，打开监狱营救王凤城。王凤城被打得遍体鳞伤，不能行动，只好向营救他的人表示谢意，不愿连累大家。接着，起义部队直奔司令部的军需库和弹药库。王自强联络守卫司令部军需库的四连一班班长李文彬和弹药库的三班班长何海明，冲入军需库和弹药库取出军械，又从马棚里每人牵出一匹战马。

凌晨5时许，起义部队从城内开到了县城的北门口。驻守北城门的士兵看到起义的部队全副武装，还以为是要外出执行任务，打开城门放行。这次手枪连起义，拉走全连90余人，每人一枪一马，弹药充足，武器精良，连同旅长高志清最心爱的坐骑“草上飞”也被带走。

手枪连起义时，高志清正在公馆里睡觉。高志清闻报后，惊恐万状，紧闭大门不敢外出半步，急命随身护卫队在公馆四周架好枪炮，唯恐起义部队冲到公馆里来。直待起义部队出了县城后，高志清才壮起胆子，命令五团团长金虎臣带兵追剿。金虎臣带领200多步兵，受命出城追赶了一天，也害怕与起义部队接触，损失了自己的部队，便转身返回神木县城。

起义部队开出神木县城，骑马疾行数十里地小歇。在短暂的休息中，仍采用连的建制，大家公推王自强任连长，下辖三个排，李秉仁任一排长，李文彬任二排长，常翔锋任三排长，袁福禄任司务长，高学孔为文书。然后，部队确定行军方向，沿长城一线的沙漠地带向西前进。

第一天，部队行走200多里路，经水磨河、吕万有伙场西北、公普、尔林兔、金鸡滩至甘村。行军途中与蒙匪遭遇，袁福禄被蒙匪暗枪打死，由高学孔继任司务长。

第三天，部队行军途中又与蒙兵小战，杨芝林阵亡。后经白雪庙、元

大滩，行至横山县境内的纳泥河白万富村，休整 20 余天。

在纳泥河时，部队遇到曾在高志清部当过副官的谷占峰，谷占峰也参加了这支部队。在纳泥河休整期间，经共产党员常翔锋、高学孔、郭秉金等人倡议，连排干部研究决定，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共产党陕北独立营，并由谷占峰的妹子谷凤莲帮做了一面红旗，公开打出红旗。部队的红旗没打几天，在王自强的反对下，被迫取下。

此时，高志清派往定边县的掌旗官高宜之从定边县返回途经安边，听驻安边城的张鸿儒说，高志清旅驻神木县城的手枪连起义，正向西开来。高宜之听后，急忙从安边城启程，迅速赶到靖边县张家畔。到张家畔一打听，部队已开到靖边县境的史家洼，又连忙朝史家洼追来。

高宜之到史家洼与部队相遇后，经研究认为，甘肃陇东的庆阳、合水等县与陕北的吴起、保安交界，是个三不管的地区，决定把部队拉到那里去。

于是，部队从史家洼出发，经张家畔、庙湾、南湾、五里湾到达丁家岔。丁家岔地处保安县的顺宁川。部队在丁家岔期间，根据高宜之的建议，决定派人去找刘志丹，但找了几天没有找到，终又返回。

## **彭岐周被害**

1931 年 1 月，郑思诚部派出彭岐周、郝启云两人骑马到丁家岔。二人一到丁家岔，就向部队声称郑思诚已和张鸿儒结盟“倒井”，要他们一起携手“倒井”，并建议部队首先奔袭定边县城，只要攻下定边县城，驻安边城的张鸿儒就会相机而起。

部队经研究后，接受了彭岐周、郝启云的建议，决定奔袭定边县城，并派郝启云给定边县城内的赵文选送信，约赵文选在部队攻打定边县城时做好内应，以图一举攻克县城，作为部队的立足点。几天以后，赵文选派人回信，同意做内应，并约好进攻定边县城的时间。

根据攻打定边县城的预定日期，部队从保安县丁家岔出发，向定边县方向开拔。第一天，部队赶到安边城南山的二里湾宿营。第二天早晨，部队刚要从二里湾出发时，突然发现东面有部队向二里湾运动。

当时，连长王自强以为是驻守肤施县的高双城部派兵赶来追剿，即派常翔锋、郭秉金带少数队伍抗击。王自强自己带多数队伍向西转移而去。其实，王自强也是虚惊一场，向二里湾运动的并不是高双城派出的追兵，而是张鸿儒之侄张廷祥的一股队伍。

常翔锋、郭秉金带着队伍与张廷祥的队伍接火，交战一小时许。跟随常翔锋、郭秉金队伍的彭岐周，在慌乱中将张鸿儒赠给他的一件皮大衣丢到战场上，正好被张廷祥捡起。张廷祥一见这件大衣，就知道是其伯父张鸿儒赠给彭岐周的皮大衣。因彭岐周与张鸿儒是换帖的拜把子弟兄，张廷祥遂主动停止战斗，并派人找彭岐周联络。

张廷祥找到彭岐周后，见这支部队都是好枪好马，羡慕得两眼直放光。张廷祥口口声声地叫彭岐周“干爸”，要彭岐周送给他几匹好马和好枪。彭岐周顾及与张家共谋“倒井”大业，经与常翔锋、郭秉金商量，送给张廷祥5匹战马和4支枪。

正在这时，部队的一个叫马宗祥的班长说要到沟里去饮马。谁料马宗祥趁饮马的机会竟带着全班12个人和12匹马脱离部队，向定边县城方向而去。马宗祥叛逃后，奔袭定边县城的计划暴露。此时，谷占峰素知张鸿儒、张廷芝父子阴险毒辣，诡计多端，不愿与张家父子共谋“倒井”，也离开部队，使得部队士气锐减。由于情况发生变化，部队决定放弃攻打定边县城的原有计划，返回到丁家岔休整。

部队在丁家岔休整期间，高宜之、彭岐周、郭秉金三人认为，王自强没有领导能力和指挥能力，加上他用人不慎，对部队受到的损失负有责任，即缴了王自强的枪，并把部队改编为营建制，推选彭岐周为营长，下设一、三两个连，一连长郭秉金，三连长高宜之。部队改编后，决定再派高宜之去找刘志丹，以指示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

高宜之离开丁家岔，到保安县的金鼎山，终于找到刘志丹。高宜之向刘志丹汇报了起义部队的情况后，刘志丹指示：因起义部队成分复杂，共产党员少，且目前环境恶劣，暂时不宜公开打出红旗。刘志丹建议部队先和郑思

诚联合，共谋“倒井”，并告诫高宜之要加强联系，注意提防驻安边城

的张鸿儒、张廷芝父子吞并这支部队的阴谋。

高宜之从保安县返到丁家岔，向部队负责人汇报了会见刘志丹的情况及刘志丹的意见，大家听后很受感动。不久，果不出刘志丹的所料，张鸿儒、张廷芝父子策动部队一些人枪杀了彭岐周，将这支部队吞并收编，常翔锋、高宜之、高学孔、郭秉金几个共产党员被张家父子一个个清洗出去。

这次神木手枪连的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对高志清震动很大。不久，这支骑兵旅脱离井岳秀，转入甘肃境内投靠了甘肃军阀。

## 第二十七章

### 榆林起义

#### 榆林中学事件

自井岳秀在第八十六师组建师部直属工兵连后，工兵连中共支部负责人何格兰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即开始从思想上、组织上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何格兰与第八十六师驻榆林炮兵营中共支部负责人张怀树以结拜把子弟兄为名，用吃喝谈心的方式先后在榆林城内莲花池、文庙、东山老爷庙等处多次秘密集会，宣传发动士兵，发展和壮大共产党在工兵连和炮兵营中的组织力量，积极为起义创造条件。

1930年6月11日，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李立三等定出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先后命令南方的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二军团攻打长沙，红一军出兵武汉，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挺进柳州，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时间虽然不长，却使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9月下旬，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瞿秋白主持在上海召开，始纠正了李立三等对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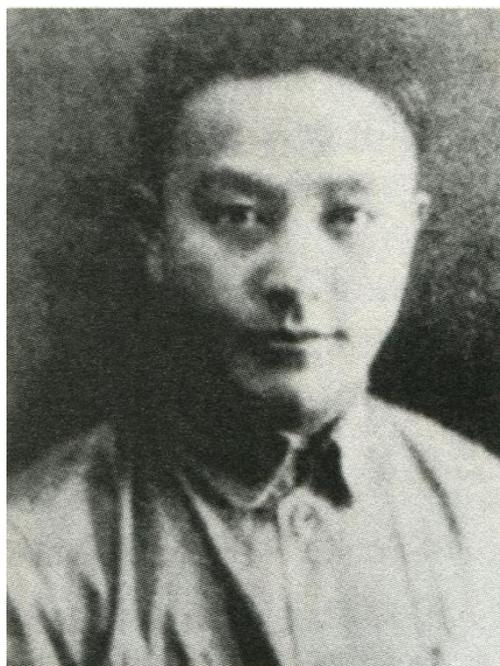
7月1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蓝田县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

贯彻执行立三路线，决定建立游击队和红军部队，集中人力准备武装起义，创建西北苏维埃政权，并把陕北划为重要区域。会议决定把临时省委改为正式省委，由杜衡、王林、吉国祯为常委，杜衡任书记。不久，省委通过《陕北秋收斗争的策略路线》决议，分析了陕北政治、军事、农民和工人等斗争形势，号召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发动秋收斗争。

9月5日是井岳秀的寿辰。何格兰、张怀树经请示中共陕北特委，拟在这一天发动起义。但此时由于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吉国祯已去西安参加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的第三次常委会议和中共陕西省委全体会议，当选为省委常委并兼任西安市委书记，省委新派任的特委书记赵伯平还未到任，特委工作暂由苏士杰、刘澜涛、常黎夫主持，这一事关重大的起义行动必须等待特委领导决策。因时间仓促，准备不周，起义未能按原计划行动。

10月18日，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在绥德县刚结束，中共北方局通知陕北特委，中共陕北特委直属中共北方局领导，与中共陕西省委为平级关系；要求张文华(已离陕北)、赵伯平、杨璞(又名杨玉峰)于11月11日前到北方局汇报工作。

10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写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这时，党内留苏回国后的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央先获知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指责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王明散发自己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为理论装饰来吓唬人，夸大中国革命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些比李立三“左”倾错误更“左”的主



王 明

张，形成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造成中共组织内严重的思想混乱，有许多人失去识别和抵制的能力，使中央难以正常工作。

12月21日，中共河北省委又发出通知，宣布中共北方局改为中共河北省委，辖顺直、晋、陕、甘及河南北部各省党组织；中共陕西省委改为陕西特委；中共陕北特委划归中共河北省委领导。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使下，以王明、博古为代表，以批判六届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使党内形成更为极“左”的冒险主义思潮。会上，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严厉指责。在这次会议上，米夫极力夸赞刚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的王明，说“王明在中山大学的斗争中已经是一个天才的领导者，搞中国革命没有他是不行的”。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不仅被增补为中央委员，而且进入政治局，从此，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被王明所操纵，这时王明只有20多岁。从这时起，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开始在党内长达四年的统治。

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由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王明要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即将前往中央苏区根据地，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到半数。

9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成立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的责任。

1931年1月29日，中共陕西省委在渭南辛市召开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杜衡、李杰夫(高维翰)、吉国祯、张文华、张国藩、黄平、李艮、刘映胜等。会议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的来信指令，讨论清算立三错误等问题。

会议决定选派李杰夫为参加中共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的代表。在讨论时，杜衡、李杰夫认为陕西革命的运动是高涨的；李艮、张文华则认为是低落的，同时反对省委参加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张文华由于坚持正确的意见，结果被取消省委委员职务，由黄平递补。

3月，中共陕北特委和团陕北特委向各地党团组织发出纪念“红五月”的通知，要求组织各种集会进行活动。当时，井岳秀对榆林中学中共组织的活动深感不安，为达到破坏之目的，将榆林中学校长马济川调往绥德四师，把绥德四师校长柳砚琛调到榆林中学。

柳砚琛一到榆林中学，首先解散了由杜斌丞、王森然、刘志丹等办起的平民学校，把平民学校变成国民党县党部的机关驻地，对榆林中学中共组织开展活动造成了极大威胁。一天，榆林中学党支部的冯治安、冯锦江、王再兴三人起草《五卅告民众书》，准备发动榆林中学学生上街张贴散发。当三人正在房子里草拟文稿时，被井岳秀派入学校监视学生运动的训育主任孙士英发现，立即报告给柳砚琛。

当夜，根据榆林中学学生袁芬提供的进步学生名单，井岳秀派出一营军队和警察，由孙士英带路，将榆林中学团团包围。军队和警察把全校学生集合到操场上点名，抓捕了石作琦、杜鸿章、窦绍庭、李士纲、刘英、高步嵩、张子明、乔乃武、谢永福、朱开俊等11名共产党员、团员学生，并押送到法院军法会审处进行审讯。

次日，井岳秀派兵全城戒严，继续抓捕从学校跑出的共产党员、团员学生，在城内将常昆山、冯锦江及职中学生赵玉珍三人拘捕。榆林中学党支部仅余两名负责人高景春、王再兴，他们化装成上坟的模样，头戴孝帽，手提纸钱，才得出城。

对于被抓捕的学生，在法院军法会审处审讯中，因审不出口供，亦找不到证据，最后草草以所谓“危害民国”“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等罪名判处石作琦、冯锦江每人有期徒刑10年，杜鸿章、窦绍庭、刘英、李士纲每人有期徒刑5年，其他人关押四个月后，先后具保释放。

在榆林中学大逮捕事件发生之前，杨璞白明善两人从河北回到陕北，分别代表中共



马济川

河北省委和中共河北省委急会议筹备处宣传各自主张的政治观点。中共陕北特委一致反对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支持罗章龙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的错误主张，为了进一步搞清楚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特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后，决定派人向中共河北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

中共陕北特委由赵伯平、常黎夫及王芾南组成陕北代表团，于3月间前往河北。刘澜涛也随代表团离开陕北，后由中共河北省委派遣外地工作。赵伯平离开陕北后，中共陕北特委工作由孔祥祯主持。

7月，当赵伯平、常黎夫与随行的张资平返到陕北时，由于发生榆林中学大逮捕事件，致使中共榆林县委和榆林中学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榆林县委解体，李文芳、常立德等中共党团负责人和一大批共产党员、团员被迫离开榆林；设在榆林城的中共陕北特委机关也由此而无法在榆林立足，孔祥祯等特委负责人被迫全部疏散，特委工作陷入瘫痪。

至此，由于井岳秀对陕北党组织施行残酷镇压，致使榆林城内中共党团组织在较长时期未能恢复起来。这次榆林中学学生大逮捕引发了榆林中学和榆林县中共党团组织被破坏以及中共陕北特委一度瘫痪的严重后果，史称“榆林中学事件”。

赵伯平等回到榆林，对榆林各级党组织进行整顿，总结经验教训。根据形势之变化，为避开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和搜捕，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迁往米脂县姜兴庄。

## 马明方被迫离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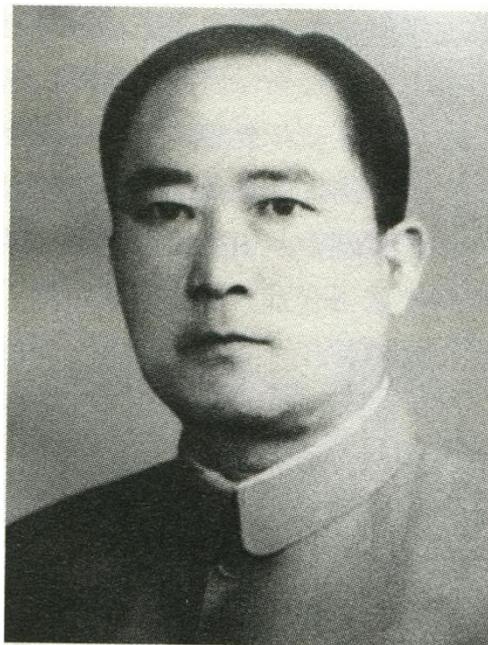
1931年3月“榆林中学事件”发生后，因设在榆林城的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被严重破坏，一些特委负责人的身份已经暴露，受到国民党的通缉。时任特委委员的马明方就是其中之一。

马明方，号济民，曾用名马汝舟，陕西米脂人，生于1905年。

1925年春考入绥德四师。同年秋，经马瑞生介绍加入共产党。1926年春，先后任绥德四师党小组组长、支部书记。同年10月，奉派国民军联军史可轩部做兵运工作，随史部南下。西安解围后，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二营任政治指导员。大革命失败后，回陕北从事党的地下

工作，先后任中共米(脂)葭(县)镇(川)中心县委书记、中共陕北特委委员。

马明方先回到米脂县叶家岔的家里暂时躲避，谁知国民党派出的密探早已守候在村周围。马明方刚一进家，就有几个化装的密探闯了进来。几个密探一齐上前把马明方拦在窑里，一个家伙扑上来双手抓住马明方的头发，用尽气力欲把马明方按倒。马明方奋力挣脱，被那个家伙生生地揪去一大撮头发。接着，马明方甩开另外几个密探的阻拦，拼命冲出门外。



马明方

这时，村里有不少群众拥入院内，马明方在村民的保护下，趁着混乱才得以摆脱密探的抓捕。马明方脱险后，密探们把

马明方的父亲和几个村民五花大绑押走，并威胁马明方的母亲说：“要想让你们的人回来，就用马明方来换，否则通通枪毙！”后经李鼎铭先生营救，马明方的父亲和几个村民才得以获释。

马明方逃出叶家岔，在村人李禄喜的护送下，东渡黄河，辗转到山西太原。一到太原，马明方通过关系找到时任中共山西特委书记的刘天章，向刘天章报告了脱险经过以及陕北党组织的一些工作情况，要求中共山西特委将他被迫离开陕西的情况报告中共陕北特委，并要求山西特委给他分配工作。刘天章要马明方暂且等一等，待陕北特委复信后，再决定他是返回陕北还是留在太原工作。马明方在太原住了30多天后，被派至太原市摊贩中开展互济会的工作。

这期间，马明方住在一个会馆里。一天，他从外返回，正要走进会馆，发现里面有许多军特，到处翻箱倒柜，在各个房间里搜查，叫嚷着要抓捕共产党人。马明方意识到出了事，立即扭头离开会馆。这时，大街上站了岗哨，过往行人正逐个被盘查。马明方身上有个小本子，里面记着简单的工作要点，他急忙将其撕毁，后来也被抓捕。

国民党对被捕的人一一审讯，马明方自称叫赵得胜，山西碛口人，父

亲在北平做生意，是去北平看望父亲、路经会馆门口时被抓的。国民党在马明方身上没搜查任何可疑东西，也不掌握任何把柄，将他释放。

马明方被释放后，中共山西特委任命他为巡视员，派往晋北的崞县、大同等地工作。他在大同和周边的煤矿中工作一段时间，即返太原汇报工作情况，才发现中共山西特委已遭到国民党的严重破坏，无法找到刘天章并与山西特委取得联系。在山西太原待了近半年，马明方又返回陕北，通过党组织在下盐湾村找到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在特委专职做党的工作。

8月，中共三边区委书记田作勤和团区委副书记高尚信等四人，因组织起义失败，惨遭国民党杀害。由于叛徒出卖，中共府谷县委遭破坏，县委领导人鲁贲等无法立足，被迫离开。中共陕北特委通知各县党团组织全部迅速转入农村，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农村工作上。

## 碧血染古城

1931年9月9日，何格兰、张怀树准备组织工兵连、炮兵营在榆林二次举行起义，不幸起义计划被叛徒告密。井岳秀根据叛徒告密的线索，在第八十六师内部进行全面清查，把在这次武装起义准备工作中担任联络的中共地下交通员王贵宾以“嫌疑分子”清除出刘润民的二五八旅，并责令立即离开榆林。

王贵宾，陕西米脂县人，生于1909年。早年就读于榆林单级师范学校。1925年底加入青年团。1926年夏转入共产党。1927年初，到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大革命失败后，以国民党榆林盐务征收局巡丁的职务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到米脂县任小学教员，担任中共党组织的地下交通员。1929年夏，奉中共陕北特委指示，打入井岳秀第八十六师二五八旅开展兵运工作，历任班长、排长和旅部文书、录事等职，利用职务在该部发展党团员，建立党的地下支部，数次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曾掩护和解救刘志丹、刘澜涛、张东皎、常黎夫等共产党员安全出入和脱险。

王贵宾离开二五八旅后，又两次潜入榆林城内，继续进行秘密活动，终因身份暴露，被井岳秀逮捕入狱。在狱中，王贵宾与王子宜、曹力如等

六名共产党员关押在一起。王子宜、曹力如等是因在保安县秘密购买武器准备组建游击武装而被叛徒告发被捕的。

王贵宾被捕后，井岳秀从西安调来以屠杀共产党人而臭名昭著的国民党省党部宋志先，专审王贵宾一案，企图一网打尽潜入第八十六师直属炮兵营和工兵连的中共组织。宋志先对王贵宾施以酷刑拷打，但王贵宾始终守口如瓶，坚贞不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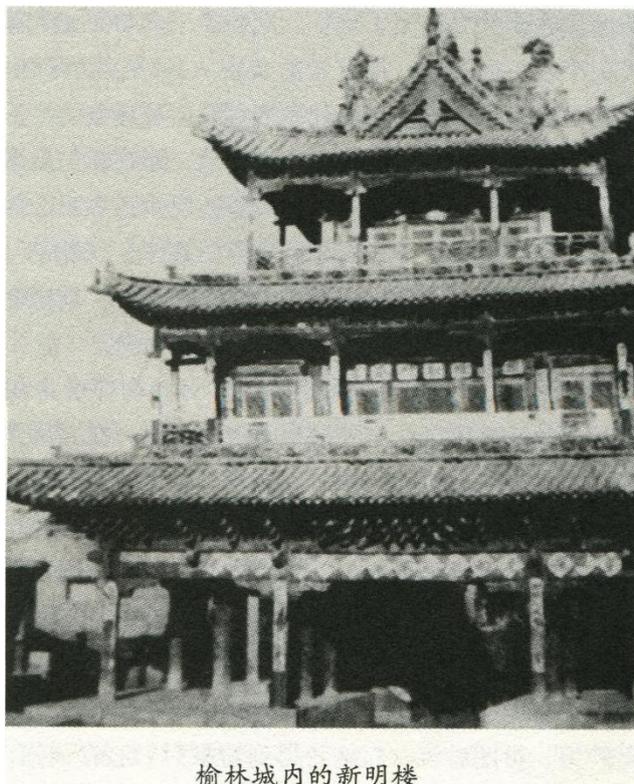
次年3月19日夜，井岳秀派特务将王贵宾秘密押出榆林西门外，剥光衣服，强令跪下。王贵宾大骂刽子手：“老子没犯下死罪！”几个特务一拥而上，挥刀朝王贵宾的背上、头上砍下，王贵宾悲壮就义，时年24岁。

1932年秋，何格兰、张怀树再次请示中共陕北特委，准备在9月13日举行起义。

这次武装起义的具体方案和部署是：组织工兵连、炮兵营举行起义，由何格兰担任这次起义的统一指挥。计划在拂晓前，由孙师策、边临雍带三个排的兵力，在师部特务连及师部东院机枪连未起床前攻入师部井岳秀的住所，然后用一个排的兵力收缴特务连的枪，用一个排的兵力突入井岳秀内院，歼灭东院机枪连，另外用一个排的兵力，由魏志仁、赵经昌带领，突袭新明楼和警察局，占领军械库。同时制定出破坏计划和歼击井岳秀援兵计划。在起义成功后，起义部队准备沿咸榆公路南下黄龙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9月13日，因工兵连参加起义的排长邱维汉以追逃兵为名赴神府联系与起义有关的事宜未归，何格兰、张怀树等为等待邱维汉，将起义日期推迟。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秘密进行之际，不幸被叛徒武福祥告密。

武福祥原是谷雄一、窦时寻、蒲子华等在山西平定高桂滋部起义后随



榆林城内的新明楼

红二十四军转战到陕北的一个士兵。部队在榆林以北两河岔兵败后，被井岳秀收容留在炮兵二连当了班长。武福祥平素好外出打麻将、抽大烟、嫖女人，有时半夜不回驻地。他与党的负责人何格兰、张怀树有所接触，并在莲花池、文庙、东山老爷庙等处参加过几次秘密集会。8月间，武福祥的行动受到井岳秀派出特务的监视，经炮兵营二连连长何启泰的盘问，武福祥当即将中共组织秘密集会的地点和人员等情况全盘供出。何启泰随即向炮兵营营长井继先作了汇报。井继先是井岳秀的侄子，又报告了井岳秀。井岳秀闻报，密谋将炮兵营、工兵连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即密令井继先不露声色，继续让武福祥参与中共组织活动，刺探中共机密。

9月间，武福祥了解到何格兰、张怀树等准备在工兵连和炮兵营组织武装起义的计划后，即向井岳秀密报。于是，在井岳秀的密令下，赵辑五、杨袞对工兵连、炮兵营的共产党员进行了大搜捕。

9月14日早饭后，师部将工兵连连长冯喜让(非党员)叫去，询问连内是否有共产党分子活动，冯喜让矢口否认。冯喜让从师部返回工兵连驻地时，发现工兵连驻地的新明楼制高点上增设了杨袞部一个排的岗哨。冯喜让一回到连部，立即找到孙师策商量，认为井岳秀对何格兰已有怀疑，并有可能采取行动，建议何格兰赶快离开工兵连，逃往三边或宁夏，先避险情，再图后策。何格兰得到情报后，心存侥幸，不但不同意离开连队，而且对提前举事也未果断决策。

9月15日下午，工兵连的边临雍、孙师策正在谈论新明楼井岳秀加强戒备一事和如何应对的问题，忽听得一阵急促的哨声，工兵连紧急集合。

边临雍、孙师策从营房走出一看，只见杨袞站在大门口，腰间挎着手枪，带着卫士已将大门封堵。师部中校参谋赵辑五站在院内西边的大树下，指手画脚，说要把工兵连集合起来带到西院看枪刺。

工兵连集合好后，由赵辑五亲自带到西院一个篮球场地，只见四面房顶上、墙头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新明楼上高架着几挺机关枪，将篮球场严严实实地包围。接着，赵辑五命令将工兵连的何格兰、赵经昌、杨德厚、边临雍、魏志仁、孙师策、孙静山等七人逮捕。然后，由赵辑五押送何格兰到师部，杨袞押送其他六人到东山青云寺。

与此同时，炮兵营营长井继先根据井岳秀的密令，与副营长鱼跃兰、一连连长李俊卿、二连连长何启泰、营部书记官侯子清商量后，将张怀树传到土地庙炮兵营营部。在营部由井继先、鱼跃兰、侯子清三人对张怀树进行了审讯。张怀树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井继先等对张怀树连续几次提审，都毫无收获。几天以后，接井岳秀的密令，由井继先、鱼跃兰、李俊卿及三连排长渊象奇等人将张怀树秘密带到东山朝阳观炮兵营四连的驻地，四连连长孙万林指挥刽子手将张怀树一刀杀死，脚镣手铐未取，推人事先准备好的一口枯井里掩埋。

何格兰被捕后，赵辑五、杨袞对何格兰反复进行审讯，并施以各种酷刑：坐老虎凳、十指插竹签、灌辣椒水、红铁烙身。但何格兰英武不屈，终无只字口供。

9月19日夜，受井岳秀的密令，由罗新团机枪连连长孙永成带领排长王茂林、勤务兵张井成及刽子手马云亭四人，将何格兰秘密押赴东门附近的水渠畔。王茂林喝令何格兰跪下。何格兰大义凛然，昂首挺胸，站立不动。

王茂林即将何格兰一脚踢倒，马云亭一刀将何格兰杀死。马云亭、张井成两人将何格兰的尸体草草掩埋，上盖一层枣刺离去。

在何格兰就义的同一天晚上，工兵连被捕的赵经昌、杨德厚、边临雍、魏志仁四人，经赵辑五、杨袞反复审讯，均用酷刑拷打，也一无所获。井岳秀又密令将四人从青云寺补充营营部押赴香云寺南边的洪水沟，全部用刀砍死，草草掩埋。孙师策、孙静山两人在香云寺补充营营部关押月余，后具保释放。此后，井岳秀视叛徒武福祥为其效劳有功，赏银洋2000块。

## 第二十八章

# 打出红旗的革命武装

### 延川游击小组

在红石峡会议后，陕北的绥德、安定、横山、清涧、延川等县一带，党组织迅速在农村秘密成立农民协会，相继建立了数十个中共组织的秘密联络站点，并积极筹措资金，购买枪支，组织革命武装，建立游击小组。



刘善忠

在所建立的游击小组中，由刘善忠领导的延川县游击小组首举红旗，发展成为一支初具规模的游击队武装，轰动一时，为尔后创建陕北红军起到举足轻重的奠基作用，在中共陕北历史中很值得一提。

刘善忠，陕西清涧县人。1925年，考入省立延安中学，由呼延震东介绍加入共产党。在延安中学读书期间，曾因革命思想激进被高双城逮捕关押，后经党组织营救被释放。1926年，南方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他受组织的派遣，到毛泽东创办的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被组织派往冯玉祥部二六四团任党代表。后因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叛

变革命，实行“清党”反共政策，刘善忠被“清洗”出部队，遂辗转于武汉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7年9月，回到陕北投身于反对陕北军阀井岳秀的斗争中，被叛徒范慧德告密出卖，第二次被国民党逮捕，但因抓不到证据，只好关押两月余释放。

1930年12月，刘善忠在延川县结识了青年团员高朗亭，两人志同道合，决定筹建一支红军游击武装。此时，正值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刚在绥德结束，刘善忠请示特委书记赵伯平，取得特委的支持，他和高朗亭发动农村贫苦农民，在延川、清涧两县交界一带一边组织人员一边筹款购买枪支武器。

刘善忠、高朗亭第一次筹措到一笔银洋，就到山西境内从各军阀中原大战中的逃落散兵手里购买到了两支长枪。在返回陕北的途中，由于所带枪支隐藏不严，被把守黄河渡口的晋军查获，两人脱身，空手返回。

刘善忠、高朗亭没有气馁，决定再筹措3000块银洋，重返山西购买枪支武器。这次，二人在山西土客队伍里购买到三支短枪，吸取了第一次的教训，把枪支裹在装有棉花的麻袋里，装扮成购运棉花的小商贩，躲过黄河渡口晋军的检查，安全地将枪支运回陕北。

在延川县，刘善忠、高朗亭组建起一个四五人的游击小组，受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的单线领导。游击小组一经成立，刘善忠、高朗亭通过组织先后在延川县田家川建立了游击第五号联络站，联络员为田得雨；在绥德县沐沟峪建立了游击联络站，联络员为康自盛；在安定县井尔湾建立了游击联络站，联络员为王生祥和王世民。同时，游击小组向农民群众提出“打土豪，抗税减租”的革命口号。

1932年春，刘善忠、高朗亭准备带领游击小组到清涧县折家坪寨子夺取民团的枪支，即由高朗亭向中共陕北特委请示。当时，留守在特委机关



高朗亭

的常黎夫听了高朗亭汇报后，认为游击小组虽发展战士不少，但枪支却太少，行动未必能成功，提出待见到谢子长或刘志丹商量后再作决定。常黎夫向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汇报了这一情况。赵伯平要求听取高朗亭的亲自汇报。当常黎夫再去找高朗亭时，才知高朗亭因常黎夫表示不同意这次军事行动早已负气离开。

赵伯平认为游击队的这次军事行动事关重大，立即召开特委常委会议进行研究，并决定通过中共延川县委帮助游击小组，做好夺取折家坪民团枪支的准备。

### 淮宁湾寨子夺枪

1932年2月底，刘善忠、高朗亭、杨秉权、高文清在中共延川县委的积极配合下，经周密研究，放弃了夺取折家坪寨子民团枪支的计划，决定智夺清涧县淮宁湾寨子邱树凯民团的枪支。

3月12日，乘民团团总邱树凯离寨子外出之机，刘善忠、高朗亭、杨秉权、高文清以访友为名，带着好烟好酒来到淮宁湾。刘善忠化装成一个团总身份的小豪绅，高朗亭、高文清化装为阔秀才，自称是邱团总的老朋友，特意来拜访。到了淮宁湾寨子，高文清敲响寨门，门楼上走出一个团丁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刘善忠沉着地说：“我们是邱团总的朋友，特意来拜访他。”那个团丁说：“团总不在，明天才能回来。”

刘善忠说：“那么请你打开寨门，我们有要事等邱团总回来商量。”

团丁一听有要事，连忙回去报告。不一会儿，团丁陪着队长出现在寨门上，说：“这是我们队长，你们有话说吧。”

刘善忠把事先编好的一套言辞对队长说了一遍，那队长信以为真，立即命团丁把寨门打开。刘善忠等人进了寨门，被请进一个窑洞里，凭着机智、勇敢骗取了队长的信任，利用吃饭的机会把民团团丁全部集中到厨房。趁团丁们猜拳行令、酒酣耳热之际，刘善忠、高朗亭提前退席，快速回到团丁们住的窑洞里，将墙上挂的四支长枪和子弹取走，随即冲入厨房，大声喊：“不许动，缴枪不杀！”

众团丁被吓得目瞪口呆。高朗亭一个箭步冲上去，将民团剩余的两支长枪缴获。然后，打开民团的钱柜，缴获银洋 100 多块，并将寨子里的账簿契约全部烧掉，带着六支枪凯旋。

3 月 13 日，刘善忠、高朗亭带着游击小组赶到延川县，找到中共延川县委书记曹必明。是夜，在曹必明的主持下，正式宣布将游击小组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简称延川游击队），任命刘善忠为队长，高朗亭为政委（当时还未转为党员）。这时，延川游击队共计九人。延川游击队成立后，流动区域扩大到延川、清涧、安定、绥德等县，打土豪、焚契约、烧账簿、武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并积极筹款，通过关系又购买一挺冲锋枪和一支步枪。

3 月 14 日，延川游击队北上绥德县。3 月 22 日，延川游击队化装成慕家沟的民团，夜间开进留仙嘴大地主白登高的石堡寨，活捉白登高的独生子白小山、女婿苏正文，缴获银洋 2400 块，将部分钱分给当地贫苦农民群众，又派人给中共陕北特委送去 500 块经费。接着处决了白小山、苏正文，张贴出了延川游击队的第一号布告，以扩大红军游击队的影响。

## 永坪镇战斗

1932 年 4 月 18 日拂晓，延川游击队由绥德县出发，经清涧县转移到延川县。到延川县后，在中共延川县委的组织和当地农会的配合下，决定袭击延川县的永坪镇，参加游击队行动的群众有 200 余人。刘善忠、高朗亭分兵四路，刘善忠带领一路攻打国民党区公所；杨秉权带领一路包围圪土达寨堡；党思慕带领一路去抓民团队长蔡兴周；高朗亭带一路押解着两个土豪人质，伺机行动。

天刚发亮，战斗打响。经过半小时的战斗，就歼灭了驻在永坪镇上的小股民团，捣毁了国民党区公所，活捉了区长兼民团团总刘广汉，缴获长枪 17 支。游击队进入镇子后，焚烧了区公所的税捐档案，没收了基督教堂的高利贷者刘光明的财产、粮食，分给农民群众。接着，四处张贴标语，在镇子中心的戏台召开群众大会，以扩大红军声势，宣传革命。

在永坪镇，刘善忠代表中共延川县委宣布，将延川游击队改名为中国

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简称先锋队),推选刘善忠为司令员,高朗亭为政委,杨作栋为参谋长,高中岳、杨森茂为经济员。在先锋队还建立了中共党团总支委员会,由党思慕任书记。先锋队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长杨秉权,第二中队长党克明,第三中队长康作桂,游击队发展到70余人、长短枪30余支。

傍晚,先锋队正准备集合部队出发,突然,东门楼枪声大作,紧接着四面枪声都响起来。原来是距永坪镇40里的井岳秀第八十六师骑兵团驻瓦窑堡的两个连赶来偷袭。先锋队因麻痹大意,毫无防备,又没作战经验,刚一接火,队伍即被冲得四散。

当晚,被冲散的刘善忠、高朗亭、杨作栋、杨秉权、刘益三、张士勋、霍德胜、杨森茂、高文俊等通过与田家川第五号联络站的田得雨联系,决定在距永坪镇15里地的姐姐圪堆山真武庙集合。

4月22日下午,先锋队的军旗插到了姐姐圪堆山真武庙顶上。被冲散的先锋队战士一看到红旗,陆续赶来集合。当刘善忠在队前点名时,只有战士杨桐一人牺牲,其余先锋队战士全部到齐,还增加了三名新战士。刘善忠、高朗亭先后在队前作了自我批评,总结了经验教训。部队遂向绥德县田庄方向进发。

## 刘善忠遇害

1932年4月23日,刘善忠、高朗亭带领先锋队北进。先锋队行走一夜,于次日早晨在安定县东区好岔峪宿营。下午,高双城二五六旅一个步兵营尾追赶到,企图包围先锋队。先锋队发觉后,迅速撤到好岔峪的北山。

4月25日拂晓,先锋队到达距绥德县城50里地的沐沟峪联络站。联络员康自盛、康成厚等立即动员全村男女老少腾房做饭、站岗放哨、封锁消息,以保证先锋队的安全。此时,高双城部的一个步兵营仍紧紧尾追先锋队。先锋队住在沐沟峪后,为迷惑尾追之兵,派出一个班佯装向清涧县北区淮宁湾镇以北的小理河进军,沿途张贴标语、设置路标等,制造假象,把追兵引向歧途。

中午,步兵营尾追至距沐沟峪只有5里路的淮宁湾镇,派出一个排长

带着一个班，到田庄镇侦察先锋队的行迹。路经沐沟峪联络站时，一个排在村边盘问村民道：“昨晚有没有赤匪来你们村？路过多少？”

村民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看见，不知道。”

这个步兵营信以为真，即向小理河以北追去。就这样，先锋队始甩开追兵，在沐沟峪休整了三天。在沐沟峪休整期间，中共陕北特委派人送来中共中央有关会议文件，在先锋队中作了传达。

4月28日，联络站派出的侦察人员回报：清涧县店则沟镇李成善民团没有修工事，毫无戒备，可以利用拂晓时间一举歼灭。刘善忠、高朗亭当即决定赶往店则沟消灭这个民团。是夜，先锋队从沐沟峪联络站出发，向店则沟镇方向行进。在前进途中，因向导在黑夜里带错了路，当先锋队赶到距店则沟镇10里的地方时，天已大亮。店则沟镇民团哨兵一发现先锋队，团总李成善带着民团立即全部逃跑了。

4月30日，刘善忠、高朗亭带领先锋队回兵西进，返回延川县青坪川、永坪川一带。这时，先锋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队伍已有100余人、50余支枪。

井岳秀闻得刘善忠、高朗亭领导的先锋队在绥德、延川、清涧、安定等县四出奔袭，声威大震，急令各县加紧防范，并令驻守肤施的高双城部限期“剿歼”。国民党延川县政府悉知游击队进入县境活动，立即在各个路口设卡布兵，到处张贴布告：凡捉拿到刘善忠、高朗亭者，赏银洋500块。同时，调集全县民团寻找战机，欲图歼灭先锋队。刘善忠看到悬赏捉拿自己的通缉布告，风趣地说：“咱们的命，县长给定了价。要好好干，抬高定价到五万、十万才证明把敌人打得更痛快。”

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在陕北的《上郡日报》上，井岳秀惊呼：“陕北绥德、清涧南部发现百余赤匪。”

这时，肤施高双城部又增派一个步兵营，到延川县境到处寻找先锋队作战。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刘善忠、高朗亭决定避敌锋芒，分兵两路分散活动。由刘善忠带领一个分队北上清涧、绥德两县打土豪，筹集游击活动经费；由高朗亭带领一个分队在肤施、延川两县西南发动群众，开辟游击根据地。

刘善忠带领的分队由延川县北上，到绥德县田庄镇准备捉大地主田子厚的孙子做人质，逼田子厚缴出赎金，筹集一些活动经费，不料被田子厚知晓，全家逃走。游击分队即经清涧县境返往延川。

5月20日，刘善忠带领的分队从清涧县出发，绕道到延川县东北的华家洼宿营。此时，有混进先锋队的哥老会分子董凤青等三人，受国民党贿赂，是夜乘刘善忠熟睡之机将刘善忠杀害，连夜逃回清涧县城。清涧县民团立即赶到华家洼，击溃刘善忠所带领的分队，并将刘善忠的头颅割下，运往清涧县城，挂在城南门高竿上示众数日。

高朗亭闻知刘善忠遇害，急忙赶到距华家洼不远的铸珠塬收归了刘善忠溃散的分队，与自己所带领的分队合兵一处。这时，清涧县民团尾追而来。

高朗亭与民团稍有接触，即很快撤出战斗，摆脱民团向东撤退。

当晚，先锋队撤退到延川县城东的育龙塬村，高朗亭对先锋队进行了整顿，被全体队员推选为司令员兼政委。在部队整顿中，高朗亭为纯洁队伍，劝说革命意志不坚定者离队，然后集合队伍讲了话。他动员大家要继续干革命，团结一致，打土豪、斗地主、分粮食、分财产、抗租抗捐，争取国民党军队士兵和民团团丁带枪过来参加游击队。同时，召开了先锋队党团会议及各分队会议，动员大家献计献策，为部队今后的作战行动提供意见。

## 寻找刘志丹

高朗亭带领的先锋队在育龙塬整顿刚结束，延长县北区农民已集合千人，正欲进县城抗粮、抗税，联络先锋队配合行动。于是，高朗亭决定带领先锋队，绕过延长县城进军北区，准备先与聚集在北区的农民会合。

先锋队从育龙塬出发，日夜兼程，当赶到延长县的育福里村时，得知农民群众已经进了县城，又急转向延长县城进发。当先锋队赶到张有村，悉闻农民群众撤出了县城，未能配合农民群众这一行动。随之，高朗亭决定带领先锋队先南渡延河，然后避开高双城军队所设据点，绕道延川县南的麻洞川，再经肤施、延长两县交界的王良寺、甘谷驿回兵延川、安定、

清涧等县一带活动。

1932年6月3日夜，先锋队宿营延长县安沟镇附近的二圪台村。

次日凌晨，哨兵报告：距二圪台村40里地的临真镇方向响起机关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高朗亭命令一个中队在通往延长县城的路上加强岗哨，以防高双城军队突然袭击。

果不出所料，拂晓前，由延长县城开来高双城部一个连和民团百余人，企图偷袭先锋队宿营的二圪台村。先锋队虽有准备，但因敌众我寡，经一场激烈的战斗后失利，高自立、高中宾等人牺牲，四人被俘，还失散了一些战士和枪支。这次战斗中，高朗亭和经济员杨森茂亦负了重伤。

6月4日傍晚，先锋队退到延长县的梢沟村。先锋队正在村里宿营，高岗、党益三带着部分游击队员与先锋队相遇。原来6月3日凌晨临真镇方向传来枪声，正是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奔袭临真镇战斗进入最激烈的时刻。后因战斗失利，临真镇未克，高岗、党益三等人被国民党临真镇守军冲散，与陕甘游击队失去联系。

高岗一到梢沟村，即动员高朗亭带领先锋队同他一道去寻找刘志丹率领的红军部队。高朗亭同意了高岗的主张，并把先锋队80余人

和50支枪缩编为两个中队，高岗、党益三带着的游击队编为一个中队，三个中队合兵一处，由高岗、高朗亭二人指挥。根据高岗的分析，陕甘游击队在临真镇战斗失利后，刘志丹率领红军很有可能西折甘肃方向而去，所以，高岗、高朗亭决定带领部队向西进发。当部队行至肤施县城南川35里的红市村，高朗亭因身负重伤不能随队行进，只好留下养伤，由高岗和先锋队参谋长杨作栋带领部队继续向甘肃盘克塬方向开去。一路上打击地主民团武装、抓土豪劣绅、开仓放粮，并缴获了一些枪支和七八十匹骡马。

肤施高双城部得知先锋队的行动，即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尾追而来。同时，保安县也集中了150余人的民团，在安条岭布设了埋伏。当高岗、杨作栋带领部队行进到安条岭的深山时，山岭上埋伏的民团突然向先锋队发起攻击，一时枪声大作。尾追的高双城部一个营亦正好赶到，先锋队陷入腹背受敌的危局。

就在这时，部队带着的七八十匹骡马突然被山上民团的枪声惊吓，一

起扭转头，成群结队地从山上向山下的大沟狂奔，直冲入尾追的高双城一营军队之中。顿时，高双城的一营人马不战自乱，高岗、杨作栋带领的部队乘隙四散躲进右侧梢林里隐蔽起来。

在安条岭，先锋队西进遭到保安民团伏击后，不但高岗在战斗中失散，而且先锋队寻找陕甘游击队的原有计划也被打破。先锋队撤出安条岭，旋即西折东进，绕安塞县的侯家河湾、真武洞，从肤施县蟠龙镇再返回延川、安定、清涧等县一带活动。高岗、党益三带领的游击队被冲散后，被迫分散行动，后陆续返回甘肃盘克塬一带。

## 红九支队成立

先锋队在东进途中，行至肤施县蟠龙镇时，抓住国民党蟠龙镇区长兼民团团总宋永昌，缴获步枪一支，并以宋永昌做人质，向他要款要枪。宋永昌的家里派人来找先锋队，愿意出钱出枪赎回宋永昌。先锋队经商定，向宋家提出交来银洋 2000 块为赎回宋永昌的条件，但因看押宋永昌的战士没有经验，狡猾的宋永昌乘隙逃跑。宋永昌逃跑的事件在先锋队中引起相互猜疑，使指战员思想混乱，一些战士被迫离开队伍，还有几个不良分子叛变投敌。至此，先锋队蒙受很大损失，队伍一下子锐减到十余人。

1932 年 7 月中旬，高朗亭伤愈归队。他目睹先锋队如此混乱的状况，立即报告中共延川县委和有关联络站，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在田家川第五号联络站联络员田得雨和田霖霖、田汝霖、高文秀、高之亭及先锋队掌旗员高文俊、第一中队中队长杨秉权等的协助下，于 7 月 26 日晚设计将逃脱的一批坏分子诱人先锋队，缴了他们的枪。经审讯核实后，处决了为首的杨作栋和高文清，开除了几个坏分子。

先锋队经过这次整顿后，很快召回一些离队的战士，使队伍重新振作和活动起来。但在此时，由于与中共陕北特委中断关系，先锋队对队伍的今后行动又感到茫然。高朗亭决定派人去寻找中共陕北特委，以解决部队如何行动的问题。高朗亭把先锋队开到井尔湾联络站，派经济员王保民完成这一联络任务。

王保民接受任务后，先到清涧县，在清涧县城与中共地下党员惠金瑞

接洽后，化装成收皮毛小贩到小岔则村找到中共城区负责人马万里及杨国梁、霍建德，让他们协助寻找中共陕北特委。马万里带着王保民在绥德县南区找到中共南区区委书记崔田夫，才与中共陕北特委取得联系。不久，中共陕北特委通过联络站通知先锋队负责人到米脂县向特委汇报工作。

9月25日，高朗亭与王保民经化装从延川县田家川第五号联络站动身，经绥德县沐沟峪联络站，到达镇子湾联络站，通过接头人杜世宏、高庆恩，在叶家岔村见到特委书记赵伯平和特委委员马明方、崔逢运等，向他们汇报了先锋队的情况。特委向高朗亭、王保民介绍了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的内容，并为加强党对先锋队的领导、改变先锋队中的成分，由特委派张承忠、马万里、崔正冉、雷合、韩生杰等到先锋队工作。

10月1日，中共陕北特委开会讨论了先锋队新的整顿问题，决定将先锋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任命高朗亭为队长，艾龙飞为政委，王保民为副队长，张承忠为经济员，并在红九支队设立了中共支队委员会，由马万里任书记。

同时，为扩大红军队伍，中共陕北特委决定由安定、清涧、米脂、绥德等县党组织选送一批共产党员、团员青年到红九支队。当时，中共安定县委书记是马文瑞(公开身份是靳家坪小学教员)，选派贺吉祥、栾新春等；中共清涧县委选派高加德、张进明等；中共米脂县委选派杜修铁、高庆恩等共十余名共产党员、团员青年，先后充实到红九支队。与此同时，中共陕北特委还指定延川县田家川第五号联络站为特委与红九支队的专门联络点，指定延川、安定、清涧、绥德、肤施、延长等县为红九支队的活动地区。

10月12日，中共陕北特委派出特委委员毕维周到延川县，在高家圪土达正式宣布将先锋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简称红九支队)。红九支队建立后，根据清涧县党组织的建议，决定抓捕清涧县城地主兼商业资本家、第二高小教导主任白明杨。

12月9日，高朗亭、艾龙飞带领红九支队到清涧县，在高杰村第二高小将白明杨抓捕。红九支队带着白明杨，绕过清涧县城南石太寺，把他关

押到延川县王家圪崂一个土崖窑里，写信给其家人，限期筹款赎人。第一封信发出后，因白明杨的家人拒绝交款赎人，游击队将白明杨的一只耳朵割下，连同第二封信送到白家。白家再不敢怠慢，筹得银洋 3400 块、毛衣 60 套、细布 20 匹、棉花 100 斤，将白明杨

赎回。红九支队将这笔款中的 2000 块银洋派人交送给特委机关，剩余作为游击队活动经费。之后，红九支队又相继缴获民团、土匪十余支枪。

## 冲破“围剿”

1933 年 1 月上旬，陕甘边红二十六军骑兵队长强世清和史法秩先后请假回安定县家乡探亲。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巡视员的毕维周通过安定县党组织的动员劝说将强世清、史法秩留在红九支队，并由特委任命强世清为支队副队长。

1 月下旬，高双城部驻安定县的张建南调集兵力与地方民团向红九支队发动“围剿”。此时旧历新年临近，高朗亭、艾龙飞为暂时避敌锋芒，决定把大部分战士疏散回家过年，只留高朗亭、艾龙飞、参谋长呼振安、经济员张承忠、战士马大牛五人在游击队里。

1 月 25 日，正值除夕。高朗亭、艾龙飞分别住在秀延河以南的杨家河和杨家沟。将近半夜，张建南带着军队突然出动，抓获了红九支队疏散回家的战士马占发。张建南用锥子扎通马占发的耳垂，用麻绳穿过，拉着他到处找寻游击队的留守人员。

这时高朗亭的手枪走火打伤指头，张建南循着枪声闯进杨家河杨凤岐的家里，抓走地下党员杨凤岐。红九支队存放在杨家的三支手枪未来得及藏好，全被张建南搜走。高朗亭从杨家河跑出，赶到艾龙飞住的杨家沟山上，等到黎明未见有张建南的军队追来，即转移到砚瓦沟。

1 月 26 日晚，红九支队留守人员从砚瓦沟转移到安定县杨家庄。在杨家庄刚住下，因马大牛背着冲锋枪走火，怕暴露目标，高朗亭、艾龙飞、呼振安、张承忠、马大牛五人又转移到贺雨家湾。

在贺雨家湾，呼振安正好碰到从前有旧谊的民团团总吕生海，私自将红九支队的两支短枪的枪弓送给了吕生海。为此事，艾龙飞认为在游击队

武器弹药十分匮乏的情况下随便将枪支配件送给民团头目，是敌我界限不清的严重问题，在会上批评了呼振安，引起呼振安的极大不满。

红九支队转移到马鞍山，艾龙飞护送高朗亭到绥德县养伤。当艾龙飞从绥德县返回马鞍山时，已是半夜。此时，呼振安便捏造事实，串通游击队里一些对艾龙飞有不满情绪的人强行缴了艾龙飞、张承忠、马大牛等人的枪，并扬言要把艾龙飞撵回中共陕北特委去。

这时，正好中共陕北特委巡视员毕维周在附近的任家砭，闻讯赶到马鞍山，一场风波才得以平息。毕维周为缓和矛盾，稳定队伍，让艾龙飞和张承忠带600块银洋，以给特委送交经费为名，写信请特委调离艾龙飞，另行分配工作。但是，事后呼振安叛变投敌，还带走游击队的两支短枪。

2月25日，中共陕北特委巡视员毕维周获得情报：国民党安定县长刘述明将由安定县出发去瓦窑堡。毕维周与强世清研究，决定从红九支队派出几个精干的战士，选定在安定县城去瓦窑堡必经的栾家坪桥上将刘述明除掉。于是，毕维周、强世清带着史法秩和栾新春事先埋伏在栾家坪附近的秀延河左侧，等候刘述明一行。

上午10时许，只见刘述明骑着一匹白马，后面跟着两个护兵，一个背着一支自来得枪，一个背着一支步枪，缓缓朝桥上走来。

刘述明骑马刚走上桥头，毕维周、强世清等装作行路人，与刘述明迎面相逢。这时，只见强世清撩起长袍，端出冲锋枪，扣动扳机，一夹子弹射击出去。刘述明在马背上身子一歪，一头栽到桥下沙滩丧命。

刘述明身后跟着的一个护兵一见不妙，慌忙丢下手里的枪，仓皇之中趁势骑上刘述明的马向瓦窑堡没命地逃去。另一个护兵来不及逃跑，被史法秩、栾新春一齐扑上去扭住缴了枪。接着，他们把预先写好的布告张贴到大路旁和栾家坪的显眼地方，然后四人爬上山梁离开。

张建南在瓦窑堡闻讯，急忙派出一个骑兵排，飞驰而至栾家坪桥时，这里早已没有人影了。

## 第二十九章

### 神府南区红旗飘

#### 成立中共地方组织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绥德四师上学的共产党员王兆卿从绥德返回神木县。当时，在神府地区的中共府谷县委转入地下活动，神木县的中共城区党支部负责人杨和春、白仲英取得联系后，以南乡教育助理员的公开



王兆卿

身份，到农村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先发展贾令德等为共产党员，并由贾怀光、贾令德、刘北垣等在贾家沟成立第一个中共支部，贾怀光任第一书记。

这年冬天，王兆卿与贾令德在南乡的贾家沟办起一所冬学，利用冬学成立了抗捐抗租委员会。抗捐抗租委员会一成立，就遭到地主的强烈反对，他们故意刁难，声称不给抗租的农民租种土地。为了减少地主的反感，又把抗捐抗租委员会改为抗捐减租会。贾令德家是当地的一户地主，他率先与家庭展开斗争，

说服和动员其大哥贾忠德带头开始减租减息，带动了贾家沟一带兴起减租减息的农民运动。

1928年3月，神木县成立中共神木县城区委。到春夏之季，国民党在

全县进行“清党”，由于中共神木县城区区委位处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区委主要领导和部分党员身份暴露受到通缉，先后被迫离开神木县，县城区委的工作再次陷于停滞状态。后来神木县城虽又建立了中共组织，但一直发展缓慢，力量十分薄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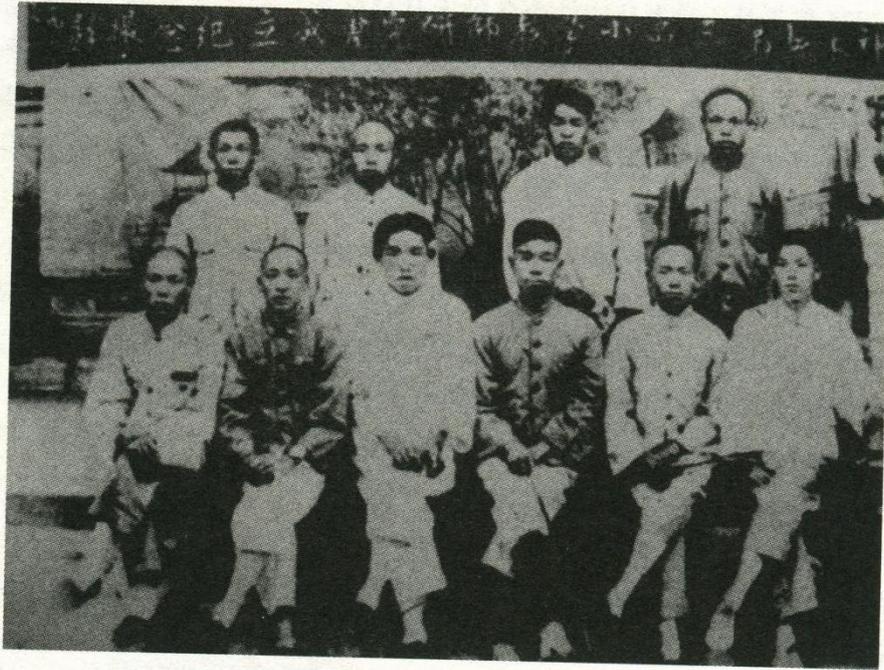
9月间，榆林职业中学毕业的共产党员乔钟灵回到神木县南乡。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晚，根据王兆卿从中共陕北特委带回的指示，南乡贾家沟党支部在龙王庙召开会议，对党支部的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并将贾家沟支部改建为南乡党支部，贾怀光任书记，贾令德任组织委员，乔钟灵任宣传委员，刘北垣为委员。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党支部的成员利用在农村教书和当雇工的机会秘密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农民进行减租减息斗争，以发展农村党的力量。

南乡党支部成立后，在刘家坡、贺家川、王家洼等十多个村庄相继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到1929年秋，南乡党团员发展到200多人。

1929年春，由于国民党神木县政府加重对农民的苛捐杂税，再加上县城豪绅办事处从中盘剥贪污，县里的农民自发组织起300余人，先后到国民党县衙状告县城豪绅办事处的贪污罪行，却无人过问。南乡党支部因势利导，利用群众的激愤情绪，派出乔钟灵到县城，配合中共神木县城区委领导农民群众进行了一场反贪污的斗争。

这场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是北京大学学生李德言和乔钟灵等，斗争矛头直指县城豪绅办事处。经与国民党县政府交涉，由张君彦、白仲英、李德言、乔钟灵主要负责清查县城豪绅办事处的账簿。经清算查对，发现县城豪绅办事处通过办理支应过往军队粮草之事，从中竟侵吞贪污公款10万之巨。这笔公款后虽未能退出，但这场斗争打击了反动豪绅的气焰。这年秋，榆林中学毕业的共产党员贾怀智、刘荣党回到神木县，贾怀智以县教育局委员身份和刘荣党参与了南乡党支部的工作。

1930年1月，中共陕北特委派毕维周、王兆卿到神府南区，在王家洼王兆卿家召开了南乡党组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贾怀光、乔钟灵、刘北垣、杨文谟、王善继、贾令德等。会议由王兆卿主持，传达了上级党组织关于秘密开展地下工作的精神，并听取了南乡党支部的工作汇报。



1930年7月神木县沙峁镇第三高小由贾怀光组织教师研究会成员合影  
(前排左起：贾令德、贾正经、贾怀礼、贾怀智、乔钟灵、路茂怀，后排左起：贾怀耀、刘长健、刘文蔚、刘凯南)

夏天，特委根据神木县与府谷县交界南区一带革命快速发展的形势，在沙峁镇县立第三高小成立了神府中共南乡区委，由贾怀智任书记，贾怀光任组织委员，刘北垣任宣传委员，杨文谟任军事委员。同时，将府谷县盘塘镇县立第三高小党支部所辖的农村党组织和高家堡镇党支部归属中共南乡区委领导。不久，又成立了神府共青团南乡区委，由王恩惠任书记。

中共南乡区委成立后，沙峁镇县立第三高小一时成了神府地区的革命活动中心。在南乡区委的领导下，第三高小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即学生会)，多数进步学生以自治会的名义公开进行革命活动。贾怀智自筹资金从外地买回一台油印机，刻印宣传马列主义的有关文章，散发到各地乡镇、庙会和农村。在暑假期间，贾怀智等在贾家沟以举办进修班为名，集中培养地方党团员骨干。由于第三高小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迅速高涨，地方上的地主豪绅惊恐不安，纷纷到神木县城向国民党神木县衙告状，扬言“三高自治会赤化神木地区，颠覆国民党政权”。

国民党县政府立即派出刘长秀到第三高小，以任教为名暗中侦探共产党在学校的活动情况。不久，为了铲掉国民党安置在第三高小的这个反动

耳目，中共南乡区委发动全校学生罢课，撵走了刘长秀。刘长秀跑回神木县城，向国民党县政府报告称沙峁镇第三高小是“一窝子共产党”。国民党县政府封闭了第三高小，但没有得到中共南乡区委组织的任何线索。

## 王兆卿死里逃生

1931年夏秋之交，中共陕北特委为了支援中共山西省委在高桂滋的部队中发动起义，从陕北派出王兆卿等一大批共产党员打入高桂滋部。在高桂滋部发动起义的时机即将成熟时，有个神木籍叫李维忻的反动分子向高桂滋告密，王兆卿的身份暴露，未能待到部队起义之时，他被迫从山西平定县返回陕北。

深秋，神府中共南乡区委得知山西平定县高桂滋部起义后的红二十四军转战到陕北府谷县的喜讯后，立即派人前往府谷县境内联络寻找。当派出的联络人员赶到府谷县的木瓜一带时，获悉部队在榆林以北的两河岔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经一场激烈血战，全军覆没。两河岔兵败后，随红二十四军转战到陕北的红军干部牛清明、梁子修带着失散的几个战士辗转回到神木县境，遇井岳秀的军队，牛清明、梁子修被捕入狱。

在狱中，与牛清明、梁子修同室关押着一个叫王璞的青年，他因在红二十四军进入陕北的神府地区后有宣传红二十四军的言论被国民党关押。王璞在狱中经梁子修介绍加入共产党。

不久，牛清明、梁子修和王璞出狱，由王璞带着进入神府南区。牛清明、梁子修在中共南乡区委工作约半年余，为神府南区开展武装斗争出谋献策，并向南乡区委提出创建游击武装的建议。梁子修根据神府地区的政治形势写出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小册子，提出神府南区已具备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他有预见地说：“明年让神木红旗飘。”

梁子修提出的创建游击武装的建议得到中共南乡区委的一致同意。南乡区委在沙峁镇召开区委扩大会议，讨论了神府地区如何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在会上，决定以杨文谟、王善继为首，由农村各党支部抽调党团骨干和进步青年，组织一个临时特务队。

组建起的临时特务队手中只有长矛、大刀。国民党黄家山盐务税卡子

上有步枪两三支。王继善提出渡过黄河到山西境内夺取黄家山盐务税卡子枪支的建议，决定由采林村党支部协助行动。由于临时特务队准备不周又没斗争经验，刚到黄家山盐务税卡子，行迹就已暴露，夺枪计划未获成功。

农历腊月初，王兆卿从特委回到神木县，中共南乡区委在王家洼王兆卿家召开会议。会上，大家总结了临时特务队在黄家山盐务税卡子夺枪没有成功的教训，讨论了今后应采取何种斗争方式来武装队伍的问题。在会上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提出利用元宵节到王桑塌村去夺沙峁区助理员王雨亭家里的两支枪；另一种意见提议筹款到山西购买枪支。最后会议决定，由王兆卿带领临时特务队的杨文谟、王宝珊、刘文郁、王大(刘满南)、刘斗威等先打土豪筹款，再考虑到王雨亭家夺枪。

农历腊月二十三日，王兆卿听说曾在高桂滋部告密的反动分子李维忻回到了神木县的老家，便带领临时特务队去抓李维忻。临时特务队赶到李维忻家扑了个空。原来李维忻事先闻讯，已逃往神木县城去了。

李维忻没抓到，王兆卿决定由王宝珊带着临时特务队到孟家塌打土豪，去抓大地主孟国栋，但又无功而返。此后，牛清明、梁子修和王兆卿相继离开神木县。

1932年春，中共陕北特委派时任特委军委书记的王兆卿打人甘肃靖远县王子元部开展兵运工作。10月间，谢子长、焦维炽等在王子元部领导发动起义失败，王兆卿从甘肃靖远县返回陕北。

不久，中共陕北特委又派王兆卿南下，联系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与王兆卿同行的是他的一个族兄。行至安定县的瓦窑堡，王兆卿与时任中共安定县委书记的马文瑞接上关系。

当时，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在陕甘地区正处于国民党军队重兵追击的危难之时。马文瑞分析了陕北地区的革命形势，劝说王兆卿暂且不要南下，建议在神府一带适时创建一支红军武装队伍。王兆卿听了马文瑞的话，改变主意从瓦窑堡返回。临行，马文瑞把两包大烟土交给王兆卿，托他转交特委。

中共陕北特委机关当时设在米脂县姜兴庄。随行的族兄见王兆卿携带大烟土，生出歹意，当王兆卿赶到米脂县斑家沟，走在无定河畔的一片乱

石滩处时，趁王兆卿不备，他的族兄手持木棒猛击王兆卿头部，使其当即倒地。族兄唯恐他不死，又捡起河滩石头，在王兆卿的全身乱砸一通，并拖入河水中，抢走他身上的大烟土后逃回神木县王家洼老家。

不料，王兆卿并没有断气，却在冰冷的河水刺激下苏醒了过来，他忍着浑身的疼痛爬上河岸，艰难地坚持走到姜兴庄的特委驻地。由于王兆卿伤势过重，特委先后安排他到米脂县姜兴庄的姜好学家、葭县乌镇的张书信家、店镇的刘光显家和刘家棚村的张达志家养伤半年多。

王兆卿伤愈后，由中共陕北特委派回神府地区巡视地方组织情况。一月后，王兆卿到特委汇报了神府一带党团组织的发展状况。特委根据王兆卿的汇报，决定派出一批党团骨干进入神府地区，整顿地方党的组织，建立游击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 **马旺全匪性不改**

1932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与神府中共南乡区委的交通员在返回特委的途中路经西豆峪村时，遭遇国民党的巡逻队伍，被押到盘塘镇，暴露了南乡区委贾怀智等领导同志。盘塘镇驻军为了领功受赏，准备将交通员押送到神木县城继续审讯。

南乡区委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急措施。会议决定，一面由王宝珊带领临时特务队的李登万、王三格旦、王碰碰、刘斗威、刘二、贺万德、乔六十等快速赶到菜园沟，在必经要道通天山处救出交通员；一面派人赶赴神木县城，通知在县城参加全县教育工作会议的贾怀智。

临时特务队赶到通天山，发现盘塘镇驻军派出一个排押送着交通员，王宝珊自知徒劳，未敢下令让临时特务队动手，后交通员被押到县城杀害。在县城开会的贾怀智得到特委交通员被捕的消息后，立即在县城地下党员的掩护下迅速离开会场，化装从南门安全脱身。当国民党派军队包围会场、兴师动众来抓人时，早没了贾怀智的影子。贾怀智从神木县城脱险后，东渡黄河，后到北京。

国民党在神木县城没有抓到贾怀智，又派出一个排开到神府南区搜捕

中共南乡区委的其他负责人。刘北垣先到外地，后通过社会关系返回，以县绅士的公开身份作掩护转入地下活动。杨文谟南下陕甘边，转入陕甘游击队。至此，中共南乡区委遭到严重破坏，神府地区的革命活动一时处于低潮，临时特务队进入隐蔽状态。

7月，由贾怀光主持在贾家沟召开了神府南区党代会。参加会议的有20多人，代表神木、府谷两县30多个党支部。这次会议上，选举出新的中共南乡区委领导成员，由贾怀光任书记，组织委员杨恩本，宣传委员王继善，军事委员贾怀忠，青年委员李登万。会上，恢复后的新的南乡区委提出今后党的工作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同时，要求各个党支部要千方百计筹集枪支，物色搞武装斗争的人员，积极建立游击武装组织。

9月，在采林村召开了神府南乡区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府谷县盘塘镇党支部汇报，已买到晋造手榴弹一颗，还收集了刀、矛、土炮等武器。有人提出，可利用山西兴县罗峪口的土匪马旺全来打击南区绅士贾怀德和榆林派来南区收款的李委员。这个建议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决定派王善继前往兴县罗峪口，与马旺全商谈联合行动事宜。

几天后，马旺全带着两个人，随带长枪和驳壳枪各一支，如约来到采林。马旺全一到采林，满口称革命，还宣誓要坚决革命到底。于是，南乡区委派出贺家川党支部书记贺万生带领临时特务队的王聚英、王六十三、王老五、王六十二、贾如胜等，与马旺全等三人一起行动，联合去打贾怀德和李委员在贺家川的住所。

9月22日晚，临时特务队赶到贺家川，包围了贾怀德和李委员的住处。在李委员的住处一举缴获了步枪3支、手枪1支，还有银洋1000多块和大烟土800多两。不巧这天贾怀德和李委员到别的村庄收款去了，夜未归宿，没有被抓住。

马旺全为匪成性，无有信义可言。他在李委员住处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的银洋和枪支，就生了歹心，嘴里说要贺万生带着银洋和枪支到山西境内先躲一阵子风险，实则将贺万生强行劫持过黄河，一切战利品全归自己。

马旺全渡过黄河到了山西，把贺万生软禁在兴县的黄家坨，自己整天

嫖女人、进赌场，胡作非为，大肆挥霍得到的钱物。不几天，马旺全的暴富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很快东窗事发。山西兴县驻守的晋军逮捕了在黄家飒遭软禁的贺万生后，押送回原籍神木县，关入县城大狱。在监狱中，贺万生只承认是土匪，是他接马旺全一伙人抢劫了贺家川李委员的住处，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称此事与共产党没有任何瓜葛。

同时，贺万生为了保护被国民党县政府抓捕的一些临时特务队人员，面对酷刑否认他们是同案犯，说不是共产党员，全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贺万生守口如瓶，保护了中共南乡区委组织以及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群众，后在神木县城英勇就义。

12月底，刘家棚党支部的共产党员白浩义带领当地百余群众，在马镇杀了一个从府谷县派来的收款员，缴获手枪一支。从此，中共南乡区委有了唯一的一支手枪。

## 第三十章

# 抗粮抗税斗争

### 裘洁忱响水镇丧胆

1931年，由于“榆林中学事件”，井岳秀加紧了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残酷镇压，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再处低潮。这时，中共陕北特委在各个军阀军队抓兵运工作，同时适时调整工作重心，把各县的共产党员、团员



鲁贲

的力量转入农村，大力开展农民运动。从1931年开始，在各县党组织的宣传、发动下，陕北广大农村农民运动此起彼伏，成为陕北革命斗争的主流。

1932年春，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和毕维周、鲁贲、张毅忱等特委党团负责人到横山巡查工作。在听取横山县党组织的汇报后，针对当地国民党县政府和地方军阀及贪官污吏给农村任意摊派粮款、当地农民生活极度贫苦交不出粮款、有不少农民被关押、到处民怨载道的境况，决定在横山县响水、波罗一带发动和领导一次规模较大的群众抗粮抗税斗争。在特委的部署和鲁贲、张毅忱的直接组织下，一场抗粮抗税的农民运动在响水、波罗一带迅速掀起，这场农民运动直接震慑了国民党政府在横山的统治。

6月，响水一带的农民纷纷聚集响水镇，公开提出“抗粮抗税”的口号。

他们首先向国民党横山县政府递交为民请愿书，要求县长裘洁忱减去“顶粮”赋。裘洁忱接到后大怒，企图将抗粮抗税的农民镇压下去。

6月8日，县长裘洁忱亲自带着一个连，从县城出发，前往响水镇。裘洁忱一行刚走到响水镇西门外的花虎滩时，就被姜玉银、杨增荣等带领的300多请愿农民拦住，陈述请愿事由。裘洁忱根本没把这些请愿农民放在眼里，不容群众分辩，立即命令一连士兵把请愿农民围住，并将姜玉银、杨增荣等五花大绑押到响水镇区公所关押起来。请愿农民见状不服，一些农民进行抗争，裘洁忱又命士兵殴打抗争的农民。

响水镇抗粮抗税的农民请愿受挫后，党组织迅速派人向四邻乡村传递鸡毛信，发动各乡各村农民立即组织起来，解救被关押的群众，一致抗粮。

一夜之间，响水、波罗、韩岔、殿市、五龙山、南塔、白界、武镇、党岔等地的农民在共产党员带领下带着连枷、铁叉、铁锹、镢头、长矛等从四面八方像潮水一样向响水镇涌来。参加抗粮抗税的农民从东、南、北城门直入响水城，堵死西门，并包围了区公所。在响水党组织负责人曹培芳等的组织领导下，大家一致要求县长裘洁忱减粮免款、释放因欠粮欠款被关押的农民、撤回镇压抗粮抗税群众的军队、承诺以后不再随便抓人。区公所大门紧闭，裘洁忱龟缩在窑里，不肯与群众对话。

县长裘洁忱带来的一连军队在响水城西门外听说裘洁忱被农民围困在城内的区公所，急着要进响水城解围，但西门被农民群众关上并堵死，不得进去。

连长命令士兵先用斧砍城门，企图破门入城，怎奈城门坚实，无法砍开。于是，又在城门上洒上老麻油，放火焚门，但一时又不能奏效。无奈之下，连长命令士兵绑起柳树杆做成云梯，架着云梯妄图登上城墙，结果被站满城墙的农民举起石头、砖块一阵乱砸。士兵利用云梯登城的行动也不能成功，只好站在城墙下，朝天鸣枪示威，更激怒了城里的群众。站立在城墙上的农民坚守西门，高喊起“打死秋(裘)瓜蛋子”“打死吮吸农民血汗的狗官”等口号。

响水城里城外聚集了约四五千人的农民队伍。城里的农民包围在区公所大门外，齐声高喊要见裘洁忱，否则就冲进区公所，打死县长裘洁忱。

区公所的区长害怕群众冲入区公所院内，命令 30 多个区丁爬上房顶，向大门外开枪，打伤了几个农民。这下子更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情绪，顿时喊声震天，农民齐举石头、砖头，朝区公所的房上、院内雨点般地砸来。爬上房顶的区丁吓得急忙躲在窑里。

裘洁忱慑于群众的巨大威力，不敢在区公所里久待，乘着夜晚天黑化装成农民模样，在混乱中溜出区公所，沿着后墙准备逃跑。由于慌不择路，裘洁忱跌进一个猪圈里，粘了一身猪屎猪尿，狼狈不堪。群众发现裘洁忱出逃，紧跟在后面追打。裘洁忱在农民的围追堵截之下，县长的威风尽扫，只得答应了群众提出的全部条件，释放了扣押人员，撤走了镇压抗粮群众的军队。

裘洁忱离开区公所，不敢返回横山县城，惊慌失措地从响水城的东水门洞钻出，蹬水涉过无定河，逃往榆林向井岳秀告状。不久，国民党横山县政府将鲁贲、张毅忱关入横山县大牢。鲁、张二人商定：不论遭受什么酷刑，坚决否认是共产党人。在大牢关押四天后，由于毫无人证物证，县政府准备将二人送往榆林审讯，此时经鲁贲的舅舅曹雨山极力营救，鲁、张得以获释。

### **请愿不胜不罢休**

在 1932 年 10 月前，中共陕北特委由于直属领导机关的频繁改变，一度与上级组织失掉联系。10 月，为了搞清陕北党组织与上级组织的隶属关系，并得到上级的指示，陕北特委决定由特委书记赵伯平、特委秘书长崔逢运、团特委书记鲁贲三人组成代表团去西安，请示中共陕西省委；由马明方任特委代理书记，主持特委工作。

12 月，赵伯平、崔逢运、鲁贲一行赶到西安，找到中共陕西省委。中共陕西省委答复：中共陕北特委的直属管辖改变，已归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不属中共陕西省委的管辖区域。三人因虑及途中安全和路途经费等问题，遂临时改变计划，决定崔逢运一人离开西安，经风陵渡过黄河，北上河北，向中共河北省委请示工作。赵伯平、鲁贲暂留西安，等待崔逢运返回。

次年 3 月，中共陕西省委调赵伯平去渭北工作，后任中共三原中心县

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代理军事(部长)；5月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8月，因叛徒出卖被捕，直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获释。

1933年3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孔原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到天津主持北方地区工作。此时，中共北方局明确了中共陕北党团特委脱离中共河北省委的领导，归其直接领导。鲁贲在西安一直等到5月间，才与崔逢运北上返回陕北。

1933年7月，中共陕北特委在葭县高起家洼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后，在特委派往清涧县的巡视员张达志、崔田民与清涧东区党组织负责人唐洪澄、张家修等的领导下，清涧县东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群众抗粮抗税斗争。

8月上旬，在清涧县东区苏家渠石庙召开了中共绥清县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达志、崔田民、崔文运、李景林、唐洪澄、张家修、张绍修、苏耀亮、康润民、苏保全、李向海、王尚业等50多人。会上，张达志、



李景林

崔田民传达了特委高起家洼扩大会议精神，张家修汇报了清涧东区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和农民运动的开展情况。当时，国民党清涧县政府和高双城部驻守的一个营肆意向农民增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致使当地物价飞涨，粮价涨到每斗20多块银洋，农民生活苦不堪言。会议根据中共清涧东区区委在农村开展农民运动情况，决定组织发动农民进行一场抗粮抗税的群众运动，并就如何组织领导这场斗争在会上进行了研究部署。

会议之后，崔田民被特委调到王家山，与崔田夫、高朗亭等筹建红二支队。在张达志的直接领导下，由唐洪澄和张家修等串联各个乡村，组织共产党员、团员和青年农民积极分子，很快在东区发动起1000多人的请愿队伍，向清涧县城进发。

东区到县城有170余里，农民群众带上窝头干粮，带着锄杖镢头、铁锨铁叉、长矛木棍，在解家沟镇遇集之日聚集起来，跨过无定河，经店则

沟、李家塔一路向清涧县城行进。沿途村镇的农民闻声响应，纷纷参加到请愿队伍中，赶到县城时，请愿队伍发展到数千之众。



唐洪澄

请愿队伍一到清涧县城外，欲由东城门冲入县城内时，守在东城门的驻军慌忙将城门关上，并将南、北城门紧闭上锁。群众进不了县城内，就将县城各城门团团围住，高喊口号，吼声震天，强烈要求国民党县政府减轻苛捐杂税和粮款重负。

国民党县长见城外群众人多势众，被迫答应农民每斗粮款减少一块银洋，其他待后议定。围城群众仍不答应，堵住县城四门不散。

围城斗争坚持到第三天，国民党县长称，可由城外农民派出代表，进城与政府和谈。于是，请愿群众推选出刘福祥(刘聋子)、张惠山、张维忠、刘忠华四人为代表进城。四代表行至城南门外的新桥，只见南门打开，正准备进城时，突然从城门内涌出一股军队将他们逮捕，并鸣枪将南门外围堵的群众驱散。

国民党县政府的突然举动使请愿群众猝不及防。在没有丝毫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东、北城门外围堵的农民一听说城内驻军抓走了谈判代表，并在城南门开枪放炮，即四散回家。这次抗粮抗税斗争就此告败。

此后，白如冰、唐洪澄、李景林、刘玉春、黄石山等和特委巡视员张达志、崔田民在大马家山唐洪澄家召开会议，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在东区组织发动第二次抗粮抗税群众运动。

8月14日，由张达志任总指挥，首先在东区的白草寺聚集了600多名农民骨干，推选出颇有威望的贺仲清、黄石山、李合邦等为群众代表，近百名精通武术的青年农民每人手持棍棒，组成先行带队开路的“棒子队”。在东区有一个具有武术传统的村庄叫辛家山，这个村庄虽然不足30户人家，但村里群众基础好，农民共产党员多，有李广华、李广业、李广志、李广

植、李贵丁(曾当过黄石山随身保镖)、李瑞章等十多个青年农民参加到“棒子队”里。

当天下午，群众代表贺仲清向白草寺的农民骨干讲话，要大家鼓起勇气，拧成一股绳，再次组织起来，开进县城向国民党县政府请愿，救出被捕的农民，并杀猪祭誓，同吃“齐心饭”，以表把这次抗粮抗税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同时，派出许多共产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连夜到石盘、二郎山、寨沟、解家沟、高杰村、店则沟各个乡镇的农村，挨家逐户发动农民。

8月15日，一夜间，白草寺塬上就汇集数千农民。在张达志、唐洪澄等带领下，新组成的请愿队伍浩浩荡荡地从白草寺出发，排成十余里的长队，向清涧县城方向开去。经花岩寺、呼家山、自家川，跨过无定河，当行至距县城70里地的店则沟镇时，遭到国民党县长派出的县城驻军两个连的拦截。请愿队伍中的“棒子队”表现勇敢，高举棍棒，站在最前列，高喊抗粮抗税口号，毫不惧退。双方形成对峙局势，一直持续到天黑。

由于请愿队伍组织严密，群情激昂，县城驻军的两个连答应：只要请愿群众不开进县城，政府可以跟抗粮群众谈判。当晚，请愿队伍从店则沟镇暂退到离镇子二里地的惠家园则。

8月16日，抗粮队伍派出代表与赶到惠家园则的国民党县长正式谈判。国民党县长看到请愿队伍严阵以待，慑于农民群众的强大威力，被迫答应了请愿农民提出的21个条件，释放了第一次抗粮抗税中逮捕的刘福祥等四名代表，并减免了农民当年的粮款税捐，使抗粮抗税运动最终取得胜利。

通过连续两次抗粮的斗争，清涧县东区党组织充分认识到农民潜在的斗争力量，同时，农民群众对国民党政府的反抗意识也提高了。这年人冬时节，清涧县东区在两次抗粮斗争的影响下，黄河沿岸的上坪、黄沙岭、马花坪、大舍古等数十个村庄自发成立一个群众性的“神兵”组织。这个组织成员都是贫苦农民子弟，胸贴神符，睡到寒冷的地上苦练“神功”，声称天神护体，刀枪不入，他们的对头就是恶霸地主、土豪劣绅。所以，“神兵”所到之处，那些地主豪绅就得焚香叩敬、接济粥饭，如有不周即以触怒天神为名，闯人家室劫杀一空。这个组织沿绥德县的黄河西岸北上吴堡县境，沿途许多农民闻风响应，一时发展为百余人的一支武装。但这支武

装在进入吴堡县境后不久就遭到井岳秀派出军队的歼杀。历时不长的“神兵”组织在血腥的枪炮声中就此销声。

在清涧县东区“神兵”组织失败后，唐洪澄、白如冰、黄石山等因势利导，破除迷信，村串村、户连户，在农村大力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将一大批农民活跃分子发展为共产党员，并很快使东区这块土地“红”了起来，成为陕北最早发展的一块红色根据地，涌现出一大批为革命前仆后继的英雄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清涧县的革命干部遍及全国各地，仅东区袁家沟一个村庄，就有白如冰、白栋材、白治民等担任过山东、江西、福建、陕西等省的省委书记，并当选中央委员。

BINGYUN  
DOUZHENG

第五部 ★

## 第三十一章

# 掌保安民团之权

### 兵运新思路

1929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红石峡第二次扩大会后，根据会议确定的在武装斗争方面的初期建军路线，陕北特委先后派出一大批共产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打入井岳秀、高志清、高双城、高桂滋、石子俊、王子元、苏雨生等军阀队伍中，相继秘密建立起共产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兵运活动，以待时机成熟，掌握枪杆子，拉出队伍建立革命武装。

谢子长受命到宜川县，打入凤凰山梁占魁的土匪部队；刘志丹受命到三边（定边、安边、靖边），打入安边城张鸿儒的骑兵团；张东皎、高鹏飞受命到宁夏盐池，打入苏雨生的骑兵第四师；杜鸿范、高宜之受命到神木，打入高志清的警备骑兵旅；杨重远受命到河北遵化，打入高桂滋的第四十七军；高岗、王世泰、吴鸿宾、高崇义、杜守智等受命到肤施，打入高双城的二五六旅，并秘密组建起中共肤施区委。同时，还派出一些共产党员在陕晋交界打入黄河沿岸的土客队伍里。

谢子长受命到宜川县，打入凤凰山梁占魁的土匪部队后，由于梁占魁为人诡诈、匪气十足，虽然满嘴与谢子长称兄道弟，暗中却处处盯梢监视，限制自由给予刁难。谢子长经过一番分析，认为这支土匪部队里成分复杂，共产党的兵运活动在这里暂时难以开展，短时间里很难拉出人马。当谢子长在梁占魁部队去留两难时，中共陕北特委派来马云泽协助他工作。

谢子长向马云泽反映了梁占魁部队的情况，两人商量决定，谢子长在

未确定打入其他军阀部队之前，暂留凤凰山，再观察一段梁占魁的情况；由马云泽先行北上三边一带，去摸一下三边几个县的民团底细，分头相机行事。

马云泽离开宜川县凤凰山不久，谢子长在梁占魁部队里终因兵运未获成功，决定离开宜川县，到宁夏盐池一带打入苏雨生部队。在苏雨生部队里，谢子长有不少熟人，他认为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谢子长离开宜川县的凤凰山，一路北上。行至途中，听到苏雨生正在宁夏扩编。原来苏雨生趁着冯玉祥驻守在宁夏的兵力都调往河南中原地区联合山西军阀阎锡山与蒋介石开战、他的部队留守后方的机会，想脱离冯玉祥的收编，另立门户，与冯玉祥的军队抗衡。

苏雨生在宁夏的扩编，使谢子长有了新的设想：利用苏雨生急于扩军的机会，陕北党组织应适时派遣一大批共产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打入苏雨生部队里去开展兵运活动。此一设想事关重大，谢子长和刘志丹虽然都是中共陕北特委委员，但刘志丹兼特委军委书记一职，所以，谢子长决定返到保安县，与刘志丹共同细细磋商。

## 刘志丹当选团总



崔焕九

红石峡会议后，刘志丹回到保安县，曹力如参加魏野畴领导的阜阳起义失败也刚辗转回到保安。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派出杜衡化名为曹继之，已打入国民党保安县党部，在县党部当了书记，并通过国民党保安县长崔焕九的关系，当上了县教育局局长。

崔焕九曾在榆林中学任教，是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的老师，也是一个同情革命的国民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崔焕九与杜斌丞曾一起到神府，做驻神木警备骑兵旅旅长高志清的工作，欲联络高志清一起“倒井”，未能成功。之后，杜斌丞应邀做了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高级参议，崔焕九

随杜斌丞当秘书，后经杜斌丞的举荐当了保安县长。

崔焕九一见到刘志丹，非常高兴，很想把刘志丹留到他的身边，但刘志丹却主动要求到教育局去。崔焕九便按刘志丹的要求，让他到教育局里当了督学员，让曹力如到县高小当了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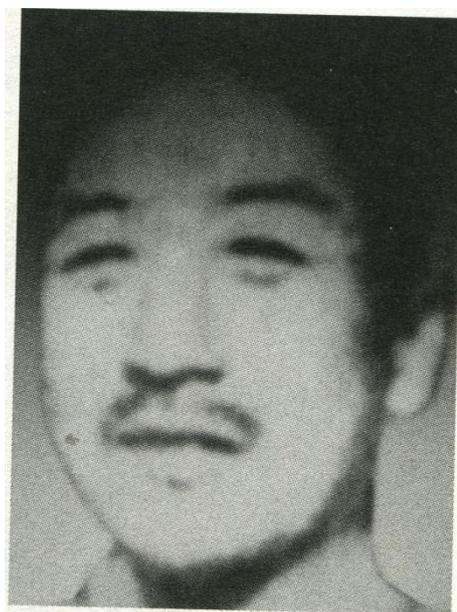
刘志丹在保安县有了个公开合法的身份后，与曹力如、王子宜等建立了中共永宁山支部，刘志丹任书记，曹力如、王子宜为委员。中共永宁山支部建立后，刘志丹把党支部的工作交给曹力如主持，他按照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到安边城去投张鸿儒，准备打入张鸿儒部开展兵运活动。

保安县与安边接壤。当时，在安边城驻的是张鸿儒的一个骑兵团。刘志丹对张鸿儒及其子张廷芝的情况了如指掌，说起来两家还有些亲戚关系。刘志丹一到安边城，刘志丹的老相识、张鸿儒手下的两个营长就极力举荐刘志丹留到骑兵团。可张鸿儒为人阴险诡诈、老奸巨猾，却有自己的主张。

张鸿儒知道刘志丹能文能武，是个有出息的人才，但也知道刘志丹是共产党员，不会真心实意地为自己效力，如果一时碍于情面把刘志丹留下来，恐怕迟早是个麻烦。于是，张鸿儒找了一些借口，拒绝了刘志丹。

刘志丹返回保安县，正值县里的民团团总路仰之因贪污公款、私种大烟、逼死人命等事发，激起群众公愤，八里四乡的绅士和民众联名上书给县衙，要求严惩路仰之。当时，县民团是保安县唯一的地方武装，一直被操持在路仰之手中。县长崔焕九在如何处理路仰之的事情上有所担心，恐稍有不慎会闹出乱子，危及地方治安，于是与县里绅士和民众代表商谈，决定由公众推选出一个新的民团团总来，以平息事态。

保安县中共组织负责人曹力如、王子宜与刘志丹及杜衡商量，决定利用县里公众推选新的民团团总的机会，把县民团武装的枪杆子通过合法斗争掌握到共产党的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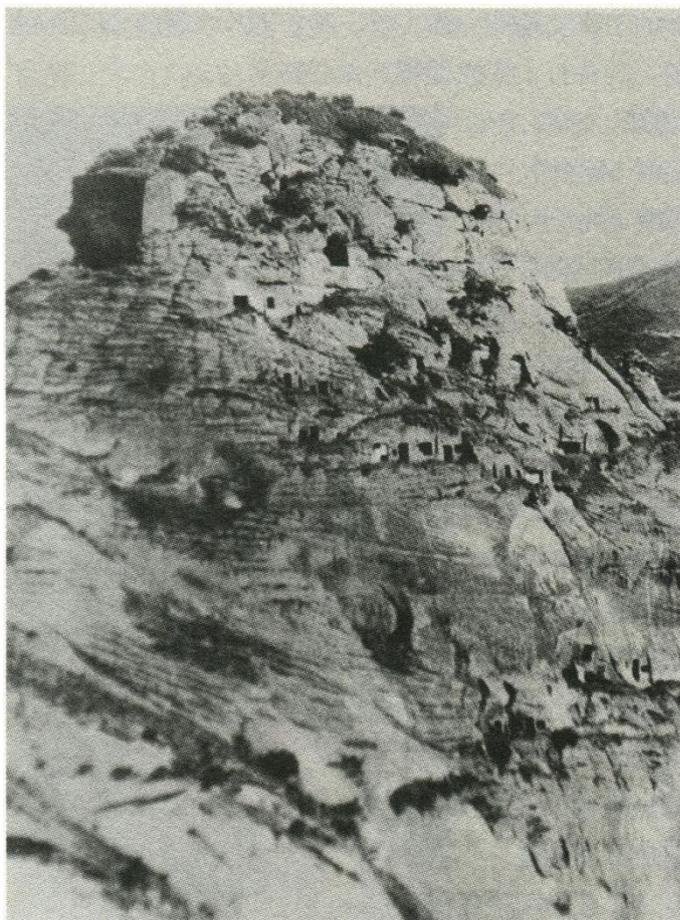


曹力如

保安县城最早设在县川，依山面河。清政府倒台后的民国初年，陕甘宁三省交界官匪合流，并有几股大的土匪经常出没骚扰，使这一带再无宁日。

保安县城的旧城墙坍塌低矮，易攻不易守，为防匪患，便把县城搬迁到洛河川永宁山的寨子里。

永宁山是洛河环绕下的一座大石山，四周全是悬崖断壁，只有通过搭



永宁山寨旧址

起吊桥的一条路可以出入山城。此时，县里的民团有几十个本县子弟、十几条枪。团总路仰之是本县的一个大地主，没念过书，略懂点武术，平素不是抽大烟就是打麻将，一副骨瘦如柴的身子，很少管民团的事，但因他与县里大户多有联系，又有一些地痞流氓逢迎拍马，经常以势欺人，连县长也得让他几分，群众深为不满。

路仰之根本就没把县里推选新民团团总的事放到心上，认为凭借自己在永宁山的势力，严惩无非是做个样子给人们看，谁敢动他姓路的一根毫毛！而

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杜衡等根据路仰之的劣迹，正在酝酿着一场民团夺权斗争。他们通过秘密串联活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做工作，许多绅士极力推荐刘志丹为新的民团团总候选人，并到处夸说刘志丹文武全才，是保安县里有胆有识的年轻人，民团团总的交椅非他莫属。当然，也有不少绅士持有异议，说刘志丹是共产党，反对他竞选民团团总一职。

县长崔焕九对路仰之平时的骄横劣迹素有不满意，一听说一些绅士要推荐刘志丹参加竞选民团团总，心里暗暗赞同，非常希望自己的学生能胜选，

也省得县里遇事受人挟制。

选举民团团总的会场设在县高小。学堂内外张贴了许多“尊重选举”“请选刘志丹”的标语。当县长崔焕九和参加竞选的刘志丹、路仰之坐到台子上，会场的气氛立刻严肃起来。路仰之跷着二郎腿坐在一条板凳上，两只眼窝还不以为然地瞟着台下坐着的满堂绅士代表们，不时地朝门外观望。

这时，学堂门外来了十几个人，只见有一个人鬼头鬼脑走到路仰之跟前咬了几句耳朵，路仰之便得意地对崔焕九说：“外边又来了一批选民，请县长做主让他们进来。”

崔焕九不好拒绝，只得让这些人进来参加选举投票。这十几个人都是路仰之事先花钱贿赂的路家的亲戚和一些社会地痞等，专来为他助选的。刘志丹见事出突然，连忙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学生”二字，将字条递给王子宜。

不多时，王子宜、杜衡带着几十个学生围上学堂门，嚷着也要参加选举投票。崔焕九对路仰之说：“刚才你让进来的人，景桂没反对，如今这些学生，我看也可以让进来。”

路仰之无话可辩，几十个学生一拥而进参加投票。选举结果一揭晓，刘志丹、曹力如的票数最多，路仰之落选。崔焕九当场宣布刘志丹任民团团总，曹力如任民团副团总。

路仰之一看见自己落选，顿时气得满脸铁青，扬起一脚把一条板凳踢翻在地，嘴里连声嚷着：“选举不民主，肯定有人捣鬼了，这不能算数！”说着，高一脚低一脚地朝会场外走去。

路仰之花钱贿赂的那帮人和一些顽固的绅士跟在路仰之的屁股后直喊：“我们都同意路团总，为什么只有这点票？这里头一定有人捣鬼！”

在民团里有个队长是紧跟路仰之的红人，听说路仰之落选，马上带一帮团丁冲到街上，沿街大喊大叫，替路仰之喊冤叫屈，嚷着要到县衙门去找县长评个公道。曹力如和王子宜急忙找到与这个民团队长要好的几个拜把子弟兄，好不容易才将他说服。跟在那个队长后面的团丁，见带头的队长缩回了闹事的架势，也从街上散去。

这时，路仰之正带着一帮拥护他的绅士和地痞无赖在县衙门里打着“为

民请愿”的幌子，公开声称“刘志丹是共产党”，反对刘志丹当民团团总，缠着县长不肯离开。曹力如、王子宜、杜衡等和民众及民团里拥护刘志丹的人们敲锣打鼓，一路高呼着“拥护新团总”的口号，已经前呼后拥地围着刘志丹走进民团团部。刘志丹坐上了保安县民团团总的交椅。



王子宜

民团的权力被刘志丹掌握后，原紧跟路仰之的一些团丁都见风使舵，又急忙献媚讨好新的团总。刘志丹从来是个十分宽容大度的人，为了把民团中紧跟过路仰之的一些人尽一切可能团结到自己的身边，稳定民团内的人心，他特意做出姿态，首先对曾最反对他并带头闹事的那个队长予以重用，把那个队长提拔到身边做了贴身副官。从此，民团完全被共产党所掌握，变成了一支地方革命武装。

刘志丹利用有利的公开身份，安插多名共产党员，由曹力如抓整顿民团工作，王子宜抓教育系统工作和全县农村工作，杜衡抓统战工作，很快在保安县境内，从军事到教育、从县城到农村，到处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到处都有共产党员和进步农民在开展革命活动。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在全县先后发展的共产党员和团员有赵耀先、王国祯、王庭光、周玉洁、赵光前、曹世英、康从周、胡彦年、曹成业等。

当时，除了县民团外，刘志丹还在县里新增五个分团，分别设在各区。刘志丹、曹力如为了加强民团内共产党的力量，经与中共肤施区委联系，由区委抽调来一批共产党员、团员，分别安插到各区民团分团中，以改变民团成分，并在县民团和各区分团秘密建立起党支部和党小组。一时间永宁山变成了共产党的“红色堡垒”。

快入冬的一天，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等正在窑洞里召开保安县城的党支部会议。突然，县衙里来人传刘志丹，说县长有要事，叫他去一趟。

刘志丹大步流星走进县衙，县长崔焕九一见面没有说话，随手从桌子上的公文夹里拿出一份公文，递到刘志丹面前。刘志丹接过一看，原来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给保安县寄来的一份通缉令，通令缉拿“渭华起义的共党分子”刘志丹。

刘志丹镇静地对崔焕九说：“崔老师，这分明是路仰之暗箭伤人。”

因为刘志丹当选县民团团总后，路仰之一直叫嚷刘志丹是共产党，而且到处写状子告发刘志丹，这正好成为刘志丹为自己辩解的理由。

崔县长不是个糊涂人，虽然他胆小怕事、小心谨慎，但他不愿意得罪自己的学生刘志丹，早就替刘志丹想出了搪塞上司的办法，便摆手要刘志丹亲自去拟个“查无此人”的回文不了了之。这可谓一举两得，既推了官府的公事，又保护了自己的学生。

刘志丹刚从县衙里回到民团团部，地下交通员早已等在他的窑里。交通员告诉刘志丹：“李先生来了。”

“李先生”是谢子长的代号。刘志丹忙问谢子长现在何处。交通员悄悄说，谢子长已经在城外楼子沟几天了。刘志丹连忙带着曹力如、王子宜到楼子沟去找谢子长。

### **张廷芝送“金兰谱”**

楼子沟在金汤镇，是刘志丹的家乡。刘志丹一到楼子沟，只见谢子长穿着一件破羊皮袄正等着他。两人几句寒暄后，谢子长先向刘志丹汇报了在宜川凤凰山梁占魁土匪队伍的兵运情况，接着把这次专程到保安县的来意向刘志丹说了一遍。刘志丹也告诉谢子长，自己到安边城找张鸿儒也碰了一鼻子灰，但保安县民团已掌握到共产党的手中。

刘志丹一听说宁夏苏雨生要扩编，精神马上振作起来。刘志丹根据谢子长的建议，当即与保安县党组织负责人曹力如、王子宜等对党在这支军阀队伍里如何开展兵运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经研究决定由中共榆林中学、绥德四师、延安中学三校的党组织和各县党组织速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团员学生和进步青年农民打入苏雨生的部队，并将这一决定立即派人汇报中共陕北特委。

说也巧，这时驻在安边城的张鸿儒突然让他的儿子张廷芝派人来到保安县，给刘志丹送上一张大红帖子的“金兰谱”，张廷芝要与刘志丹结成生死之交的拜把子弟兄，并许诺给刘志丹一个团附当。

前些日子，刘志丹想投到张鸿儒的部下，却被张鸿儒想方设法地拒绝了。而今张鸿儒的儿子张廷芝一反常态主动找上门来，并送来“金兰谱”，要与刘志丹做朋友，显得太奇怪了。

说怪也不为怪，因为张家父子是见泡狗屎想生蛆、专爱不掏本钱占别人便宜的人。原来张鸿儒一听说苏雨生在宁夏要扩编，也想把自己的手伸到苏雨生的部队里，就通过关系极力活动苏雨生，要让其儿子张廷芝在新扩编的部队里当个团长，抓住一股子队伍，借鸡下蛋，扩充自己的势力。苏雨生满口答应，但给张鸿儒的条件就是张廷芝要当个团长可以，但不拨一兵一卒，还要张廷芝自己凑集人马。苏雨生只给了一个骑兵团的番号，张廷芝名义上是一个团长，其实还只是个光杆司令。

这时，张鸿儒、张廷芝父子灵机一动，一眼瞅准了刘志丹在保安县的民团武装。父子俩想借刘志丹在保安县当民团团总的威名把这个民团拉过来，给自己新编队伍凑些兵员，才“恭请”刘志丹来当团附。张廷芝和其父张鸿儒一样阴险诡诈，一肚子鬼心眼，他许诺刘志丹当团附，又怕刘志丹日后生出二心，拉走自己的民团队伍，便装出要与刘志丹结为拜把子弟兄，是想紧紧把刘志丹拉住。

根据这一新的情况，谢子长、刘志丹决定：刘志丹乘张廷芝邀请之机打入张廷芝在苏雨生部的的新编第十六骑兵团；谢子长直接到宁夏，通过关系打入苏雨生部。两人计划在苏雨生的军队积蓄共产党的力量，后图策动起义，拉出一支革命武装队伍。于是，保安县的民团暂交由曹力如负责，作为后方留守。

## 第三十二章

### 苏雨生部扩编

#### 谢子长到平罗

苏雨生，土匪出身，所带的是一支游荡在陕宁交界的土匪队伍。冯玉祥把这支队伍收编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骑兵第四师，苏雨生是该师的师长，师部设在平罗县城。这个雄心勃勃的小军阀，在宁夏一次就准备扩编两个旅，各下辖三个团，共达六个团的新军，这真还不是一件纸上画瓢的容易事。所以，不管是地方民团，还是山里的小股土匪武装，只要肯投到他的名下，就统统收编进来。

谢子长从保安动身，到宁夏的平罗县后，没有直接进城去见苏雨生，先住到城外五里地的一个旅店里，托人给苏雨生捎了个话。苏雨生一听说谢子长远道来到平罗县，一下子高兴得不知如何款待是好，他连忙叫第九旅的旅长石子俊立刻带上几个护兵，出县城赶到城外旅店，把谢子长迎回城内见面。

石子俊带着一队护兵，骑马飞奔出城，到了谢子长住的旅店时，旅店主人告诉石子俊，说谢子长刚离开旅店，走了不多时辰。石子俊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谢子长难道就这样不辞而别又走了？石子俊不敢懈怠，带着护兵掉转马头，急忙返回城内，他真不知该怎么向苏雨生报告。当石子俊回到师部，不料谢子长早到师部了。

原来谢子长住在县城外旅店，本想等待苏雨生派人来和自己先接个头，然后再进城面见苏雨生，后一想觉得不妥，因自己毕竟是客，苏雨生是主，

且自己又是主动投奔找上门来的，一定要给苏雨生一个光彩面子。于是，谢子长不等苏雨生派的接头人到来，就离开县城外旅店，朝城里徒步而来。

谢子长和随行的几个人既不骑马又是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而石子俊骑着高头大马，出城一路风驰电掣，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迎面走过的谢子长一行。石子俊一见谢子长，便惊奇地说：“我到南门外接你没接到，没想到你先到了。”

苏雨生对谢子长的到来显得格外殷勤。因为谢子长在清涧、渭华地区参加和领导过起义，又在安定县办过民团，其赫赫大名，苏雨生久已仰慕。现在正当部队急于用人之际，谢子长能适时而至，又亲赴宁夏助其一臂之力，更使得苏雨生心里乐得开了花。苏雨生的身边有一个叫任均的参谋，对谢子长的到来表示担忧，在苏雨生面前悄悄地进谏道：“谢浩如是陕北有名的共产党，师座呀，可不能用啊！”

苏雨生急于扩编，到处招兵买马，根本听不进去任均这样的话，他不以为然地回答：“我不管他是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只要他能给我带来人马，把兵给我带好就行。”

苏雨生十分器重谢子长。没几天，苏雨生就对谢子长委以重任，任命为新编第十一旅的旅长，并命谢子长驻守平罗县以北的李家堡。第十一旅号称为一个旅，其实是个空架子。

## 张东皎陕北募兵

苏雨生部谷莲舫第八旅第十五团的团长叫王子元，陕西定边县人，是谢子长和刘志丹的同学，又是拜把子弟兄。谢子长让谷莲舫把早已投到苏雨生部队的共产党员张东皎安排到王子元的第十五团，并委以中校团附的身份，在这个团里秘密开展兵运活动。

张东皎，又名张长发，字伯英，陕西横山县人，生于1903年。曾先后去保定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求学。1924年加入共产党，后从黄埔军校毕业回到陕北，经由中共陕北特委派遣打入宁夏苏雨生的军队。

张东皎还未及到王子元的第十五团任职，谢子长就建议苏雨生让张东皎先到陕北去给第十一旅招募一些兵马。谢子长说陕北有好多清涧起义失

败后流落到地方的官兵，这些官兵如能招募到部队里来，可扩大兵员和增强队伍的战斗力的；还说陕北有榆林中学、绥德四师和延安中学三所知名的学校，在这些学校还能招募大量的青年学生到队伍里来，可提高部队的文化素质。谢子长的这番建议正中苏雨生下怀。

苏雨生要摆脱冯玉祥的控制，自感势单力孤，心中无底，早有心与陕北军阀井岳秀取得联系，拉拢井岳秀联手起来共同反冯，但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当差，迟迟未决。听了谢子长的建议，苏雨生当即表示，速派出张东皎奔赴陕北，交给的要差有二：其一是联络井岳秀，商讨共同反冯事宜；其二是在陕北的几所学校和农村招募新兵，并收容清涧起义后流散到社会的官兵。



张东皎

张东皎以苏雨生委派的代表身份，从平罗县出发，骑马直奔陕北的塞北重镇榆林。临行，谢子长要张东皎回陕北后向中共陕北特委汇报苏部兵运工作，并带回特委新的指示。张东皎一到榆林，即先去找坐镇榆林的军阀井岳秀。张东皎见到井岳秀，当向井岳秀提出苏雨生意欲与其联手反冯一事时，井岳秀虽然表面满口答应，但再去交涉、商谈如何相互策应的具体事宜之时，却没有了下文。

张东皎通过关系找到中共陕北特委，汇报了谢子长和刘志丹在苏雨生军队的兵运情况。特委十分重视谢子长和刘志丹在苏雨生军队的兵运活动，按照谢子长、刘志丹的策划，特委立即派人积极协助张东皎，到榆林中学、绥德四师、延安中学几所学校和各县农村，通过各县党组织，给谢子长第十一旅招募了一大批新兵。

张东皎通过关系找到中共陕北特委，汇报了谢子长和刘志丹在苏雨生军队的兵运情况。特委十分重视谢子长和刘志丹在苏雨生军队的兵运活动，按照谢子长、刘志丹的策划，特委立即派人积极协助张东皎，到榆林中学、绥德四师、延安中学几所学校和各县农村，通过各县党组织，给谢子长第十一旅招募了一大批新兵。

在榆林期间，张东皎的许多活动一直被井岳秀派的特务人员盯梢，并引起了井岳秀的怀疑，密令刘润民旅长将张东皎秘密抓捕。此时，在井岳秀部务刘润民旅里任书记官的王贵宾是中共情报人员，事先获悉消息后，

急忙报告了中共陕北特委。特委立即帮助张东皎采取应变措施，这才使得张东皎平安返回宁夏平罗。

张东皎这次陕北之行，虽未能说服井岳秀与苏雨生联合反冯，但通过中共陕北特委从几所学校和农村选送了牛化东、杨森、贺晋年、曹盛荣、张秀山、黄培中、李向明、李树林、李培清、史法秩、薛应昌等 300 多名共产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农民，充实到苏雨生新编第十一旅和王子元第十五团的队伍里，迅速壮大了共产党在苏雨生军队中的革命力量，为尔后中共陕甘宁组织在甘宁两省境内先后发动大小 70 多次起义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 未举事的肤施起义

在这期间，高岗受中共陕北特委的派遣到肤施，打人高双城部。与王世泰、吴鸿宾、杜守智等一起，积极协助肤施县党组织负责人李馥华，很快组建起中共肤施区委，由李馥华任区委书记。当时，肤施地区的革命势力还非常薄弱，共产党员甚少，广大农村仍处封闭之中，农民对共产党的认识十分模糊。

这时，高岗的革命斗争经历已颇艰辛。高岗原名崇德，字硕卿，出生于农民起义领袖李白成的故乡横山县武镇高家沟村，生于 1905 年。从小家庭贫苦，给人打工。因小时爱玩乐打斗，争强好胜，不肯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且排行老二，村人叫他二愣。高岗的父亲曾是武镇一带民间“硬肚”组织的成员。高岗早年加入哥老会组织，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先后在武镇私塾、龙镇小学读书，到 17 岁时考入县城高级小学。1921 年与杨芝芳结婚。1924 年加入青年团，成了县城高小的学生会头头，小有名气。1925 年在县城带领学生闹学潮，组织学生痛打盐务局长，又带头冲入县衙大堂，殴打衙役。县知事刘智堂下令学校开除高岗等 5 名学生，并密谋武力解决学潮。这一消息被高岗等得知，即发动了全校 100 多学生游行，并准备集体上访榆林，要求榆林道尹景志傅罢免刘智堂的官职。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获悉情况后，亲自写信派人送到横山县，以防学生上访的行动遭榆林军警迫害，要上访学生队伍派出代表来榆林。大家推选出高岗等 5 人，连夜

赶赴榆林。高岗等到榆林，在杜斌丞、刘志丹的大力活动下，通过杜斌丞与井岳秀、道尹公署周旋，答应免去横山县高小校长曹雨山的职务，调离县知事刘智堂，撤销学校对高岗等人开除学籍的处罚，使横山县高小的学潮运动取得胜利。同年秋，高岗考入榆林中学，至此，他与刘志丹结为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对刘志丹言听计从，倍加尊重。但在榆林中学上学不久，因井岳秀的儿子井文龙指使护兵殴打了学生苗存权，引起榆林中学学潮，高岗在学潮中怒打了井文龙。榆林中学党组织对高岗的安危非常关注，恐其遭井岳秀的迫害，劝其辍学。

1927年3月，杜斌丞带领陕北各界人士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西安解围庆祝活动，高岗随团到西安，进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后因蒋介石叛变革命，在西安的石敬亭等遥相呼应进行“清党”反共，解散中山军事学校，西安街头一片白色恐怖，到处腥风血雨，高岗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在时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保卫部长史可轩的通知下，高岗速离西安，潜回陕北横山县，才幸免牢狱之灾。

回到横山，高岗先后三次组织农民群众发动抗粮抗税斗争，县政府被迫给农民减免粮税，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被激怒的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密谋策划捉拿高岗。高岗随即离开横山县，受中共陕北特委派遣打人驻神木县高志清警备骑兵旅，并通过关系给高志清当了护兵。

高岗在高志清部准备与其他中共党员秘密策划手枪连起义，被高志清发现，被迫离开神木县，只身逃到安定县，后又辗转葭县、吴堡等县宣传武装革命。

中共肤施区委一经成立，高岗就以国民党员身份当选为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当时，县党部委员中还有焦维炽、陈俞廷、易厚庵等是共产党员。门口挂的牌子是“中国国民党肤施县党部”，实际这里是共产党的联络站。



杨芝芳

中共肤施区委很快在延长、洛川、甘泉、黄龙等县秘密发展了党的组织，由冯世光负责延长县党的发展工作，王世泰负责洛川县党的发展工作，薛太来负责甘泉县党的发展工作，李象九负责黄龙县党的发展工作。

不久，高岗的妻子杨芝芳带着儿子虎子，离开横山县老家逃亡到安定县。母子到安定后托人给高岗捎信，说当地国民党政府以高岗是“土匪”为由将家里劫抄查封，其长兄高崇义被抓到榆林。高岗接信后，赶到安定将杨芝芳母子接到延安县。途中路过安塞县，高岗看见成群结队的饥民，个个骨瘦如柴、流离失所，到处尸横遍地，心里难受得撕肝裂胆。

高岗与冯世光等在安塞地区以哥老会名义发动了斗争富豪、开仓放粮、赈灾救民的饥民运动。高岗暗中指挥高善祥、阎树华等带领饥民把安塞县政府围得水泄不通，又以高双城的副官身份给县长做工作，向县长提出开仓放粮、赈济饥民以平息这场饥民运动。国民党安塞县长被迫办起施舍饭点，给这时，高双城部有许多共产党员在活动。高岗、李含芳、李妙斋、刘明景等在高双城部成立了党的军事组织，秘密酝酿着一场起义。

1929年冬，高岗认为在高双城部组织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发动之际，突然出了叛徒，说高岗是共产党员，要在部队哗变。

高双城立即下令逮捕高岗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使这场起义胎死腹中。时已升任营长的李含芳因身份暴露，蜕变为井岳秀在陕北镇压革命的帮凶。

当时，高双城到处通缉高岗。肤施县城三个城门关闭，只留一个城门允许行人出入，悬赏捉拿“高麻子”。高岗因从小得过天花，落了一脸的麻子点，特征明显，容易暴露身份，无法逃出城去，经他的好友姚吉安的保护，暂时躲藏在城内共产党员刘胜华的家里。

到夜深时，姚吉安偷偷把高岗从刘胜华家领出，用铁条把城墙根通向延河畔的一个污水洞的石头撬开，高岗从污水洞爬出城外，才避过了这一劫难。

由于叛徒出卖，不但在高双城部的起义未举，而且也使得中共肤施区委和一些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少暴露的共产党员能逃跑的逃跑，来不及逃跑的或被捕牺牲或自首，陕北南部地区已建立起来的党组织处于瘫痪

状态。

高岗在肤施县城脱险后，一路北上宁夏平罗县，去寻找谢子长和刘志丹。到平罗县后，正值张东皎在王子元的第十五团筹建学兵大队，谢子长、刘志丹派高岗协助张东皎组建学兵大队。在张东皎、高岗等人的具体组织下，学兵大队很快组建起来，由第十五团团附张东皎兼任大队长，高岗任副大队长，李友竹(又名李树林)任司务长，黄育华任秘书。同时，在学兵大队秘密建立了中共军委，由张东皎任书记，高岗任副书记，黄育华、薛应昌为委员。这支学兵大队完全控制在共产党的手里，党的活动活跃一时。

## 第三十三章

### 三道川受挫

#### 宁安堡溃败

1930年春，在宁夏驻守的苏雨生与西北军阀“五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青、马步芳、马青宛）之间矛盾激化，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五马”一直长期盘踞在这块土地上，冯玉祥的大军在宁夏驻守时，“五马”不敢轻举妄动。冯玉祥中原大战开始，所属嫡系部队调到河南去作战，留下苏雨生这支杂牌队伍，“五马”恨不得立即将苏雨生的队伍赶出去，因此，与苏雨生队伍的摩擦不断发生。

苏雨生队伍里的党组织已料到苏、马开战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因此，请示中共陕北特委，特委指示：苏、马一旦开战，共产党在苏部控制的各支队伍应立即发动起义。计划在这次起义成功后，把起义队伍拉到陕北、陇东一带，脱离苏雨生的领导，并以扩兵为名形成地方割据态势，发展共产党的武装。根据局势的发展，谢子长、刘志丹决定派马云泽返回陕北的绥德、米脂等县，通过党组织再动员一批共产党员、团员青年，充实到王子元第十五团的学兵大队，为起义作准备。

张廷芝新编骑兵团属苏雨生部谷莲舫第八旅所辖。刘志丹在新编骑兵团当了团附后，为了在张廷芝部队中扩充共产党的实力，从保安县民团里拉出一部分队伍，并通过中共陕北特委由各县党组织选送一批共产党员骨干分子和青年农民先后编入新编骑兵团。当时，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在这个团里已当了班、排、连长，掌握了一定的兵权，如王殿之是四连副连长，

刘景范是四连三排排长，张克润是四连二排排长。

刘志丹刚到张廷芝新编骑兵团时，张廷芝为利用刘志丹的威望给新编骑兵团拉人马，表面对刘志丹招待得非常殷勤。当时，所谓的张姓九大家族挨家挨户轮流请刘志丹吃饭，但处处派人盯梢，想办法控制刘志丹的行动，不让他与士兵有密切接触。一天，刘志丹要到一个士兵家里去吃饭，想了解团部下属士兵的情况，结果被张家人知道，硬邀其到张家六太爷张廷栋家去吃饭。

有一次，刘志丹要外出，张廷芝带着 20 多个骑兵，送刘志丹到寨外。张廷芝看了眼刘志丹的衣服说：“你穿的军服怎么带红色，我穿的都是灰白色？”

刘志丹借题发挥地说：“穿衣随心所欲。我心是红的。据说，狼心是灰白色。”

张廷芝哭笑不得，只好红着脸说：“你这话不能上话谱(方言，意思是说得离谱)。”

这预示了刘志丹与张廷芝水火不容、难以长久联合的结果。

3 月间，冯玉祥调苏雨生率部移防甘肃平凉一带。“五马”乘机向苏雨生的部队开战。苏雨生的部队本属乌合之众，根本就没有战斗力，经不得“五马”的打击，各旅团就乱成一团，纷纷败退，有的向吴起洛河川撤去，有的向三道川一带撤去，有的跑得不知去向。苏雨生只好仓皇地向甘肃平凉县奔去。

苏雨生准备固守平凉县城，负隅抵抗。但苏雨生一到平凉城下，县城早被甘肃军阀陈畦璋部抢占。此时，苏雨生身处逆境，腹背受敌，北有“五马”军队追击，南有陈畦璋的阻截。苏雨生决定返回宁夏老巢与“五马”抗衡。驻宁夏的马鸿宾得知苏雨生要返宁夏的消息，即在宁安堡布兵堵击。宁安堡马鸿宾部冶成章的一个团与苏雨生部展开一场激战。半夜时分，苏雨生部的士兵抬着云梯，光着膀子，气势汹汹地向宁安堡的城下冲来。顷刻间，枪炮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冶成章的守军纷纷逃下城墙。

苏雨生部冲入城内，大肆杀戮，抢劫、烧杀、奸淫，暴行三日。冶成章团退出宁安堡后，马鸿宾急调张自箴的护路队增援。两天后，在马开基、

马振川等部的配合下，将宁安堡包围 20 多天。此时，由冯玉祥派谈判代表到宁安堡，与马鸿宾达成协议，停止战斗。苏雨生率残部撤出宁安堡，退至韦州下马关，投归杨虎城部，被收编为陕军警备骑兵旅。石子俊第九旅和谷莲舫第八旅的王子元第十五团不愿归顺杨虎城，脱离苏雨生部，向定西方向开去。

这一场乱哄哄的地方军阀混战中，谢子长第十一旅被“五马”军队打散，刘志丹所在的张廷芝骑兵团溃退时，一部被“五马”打散，一部被苏雨生卷走，张廷芝所带部队已所剩无几。刘志丹、谢子长在苏雨生军队里筹划的一场起义由于地方军阀的混战，就此流产。

### **打入谭世麟部**

苏雨生平凉兵败后，谢子长、刘志丹经报请中共陕北特委同意后，脱离苏雨生的队伍，受命打入甘肃庆阳警备司令部谭世麟部，准备再次积蓄革命力量，策划新的起义。在谢子长、刘志丹离开苏雨生部时，这支军阀部队里秘密隐蔽了一批共产党员，继续开展兵运工作。被决定留在王子元第十五团的牛化东要求脱离王子元第十五团，跟随谢子长、刘志丹一起走。他对刘志丹说：“正人披上狼皮，太不光彩了。”

刘志丹劝说道：“你在那边军队中有关系，有条件为党工作。这是在敌人营垒中闹革命，外白内红，同志们最后会理解你，会对你艰苦的工作给以加倍的欢迎。”

根据谢子长、刘志丹的指示，牛化东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军队中，忍辱负重，曾任国民党邓宝珊部新编第十一旅团长，到 1945 年与曹又参领导了该旅起义，任该旅副旅长，1964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牛化东常对人说：“我在敌人军队中隐蔽了 20 多年，这是刘志丹给我做的工作，也是他给我教的工作方法。”

谢子长、刘志丹离开苏雨生军队时，中共陕北特委通过各县党组织选派出的一批共产党员、团员青年已由马云泽亲自带领从陕北出发，朝着宁夏盐池县王子元第十五团驻地赶来。路经定边县，才闻知苏雨生和平凉兵败，部队被“五马”和甘军陈畦璋打散，谢子长、刘志丹去向不明。在情

况没有弄清楚之前，马云泽不敢贸然行动，一行人员只好在定边县暂住下来。在定边县住了20多天，查访到谢子长、刘志丹到了甘肃庆阳县的三道川一带，马云泽等才离开定边县向三道川赶来。

这时，张廷芝所率残部也被迫接受了谭世麟的整编，改编为陇东民团军直属二团。张廷芝的团名为一个团的建制，其实张廷芝变成了个有名无实的“光杆司令”。

谭世麟占据平凉后，将苏雨生所部散落到陇东一带的小股队伍收编为庆阳五属乡(庆阳、环县、宁县、合水、镇远五县)清乡司令部陇东民团军第三骑兵团。在选任第三骑兵团团长时，谭世麟问刘志丹：“你说谁当团长好，张廷芝还是谢浩如？”

刘志丹说：“张廷芝靠不住，吃谁的饭砸谁的锅。”他极力举荐谢子长当团长。

谭世麟接受了刘志丹的举荐，委任谢子长为第三骑兵团团长，马云泽、杨树荣(又名姜兆莹)为团附；委任刘志丹为第三骑兵团第六营营长，周维琪为该团第二营营长，阎红彦为周维琪营的连长。由刘志丹的第六营随团部驻守三道川张沟门一带，周维琪营驻守齐家桥一带，张廷芝的直属二团驻守蔺家砭一带。

周维琪，陕西安定县人，原是杨庚武部队的一个连长，随杨庚武驻守在宜川、延长两县交界的后九殿山寨。

杨庚武，陕西安定县人，原是石谦的部下，大革命期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清涧起义，在起义失败后与党组织失掉关系，即带着一部分起义失散队伍进入宜川县后九殿，割据一方，蜕变成了占山为王的“山大王”，招兵买马，想自成体系，与陕北其他地方武装抗衡。杨庚武部队的成分十分复杂，纪律非常涣散，军风败坏不堪，虽说人马近千，有五六百支长短枪，但没有什么战斗力。周



杨庚武

维琪在杨庚武手下混得日子一长，也就沾染了许多浪荡的毛病。周维琪在谢子长团里把持的一营队伍，与其他营相比，兵力充实，枪炮精良，算得上是他骄傲的本钱。

周维琪脱离杨庚武投到谢子长第三骑兵团，是在阎红彦秘密策动下拉出来的。在清涧起义失败后，阎红彦先随李象九东渡黄河，到山西暂避井岳秀的通缉，后回到陕北与中共陕北特委接上关系。陕北特委认为，阎红彦与杨庚武在石谦部时曾有交往，同是清涧起义部队中的骨干分子，杨庚武部下的周维琪又是阎红彦同母异父的长兄，阎红彦前往宜川县后九殿山寨做杨庚武部队的兵运工作有诸多有利条件。

周维琪与杨庚武是拜把子弟兄，阎红彦先打通周维琪。后与周维琪做杨庚武的工作时，杨庚武不但不愿恢复中共党籍，更不愿叫自己掌控的这支部队听从什么“红的”“白的”摆布。周维琪在阎红彦的活动下，表示愿意摆脱杨庚武，拉出自己的队伍。谢子长、刘志丹在争取周维琪一连队伍并努力改造这个连的同时，仍对争取杨庚武不放弃。不但在杨庚武部和周维琪连里打进许多共产党员骨干，而且还让阎红彦、雷恩钧在未拉出周维琪之前，到榆林县镇川堡给周维琪的队伍购买武器弹药，以扩充这支队伍的實力。阎红彦、雷恩钧在北上镇川堡的途中，行至延长县境时，被高双城队伍扣留，押解到肤施。高双城的参谋张采芹亲自会见阎红彦，要阎红彦说服周维琪、杨庚武拉出部队归附高双城。

阎红彦从肤施一到安定县就连忙写封急信，让雷恩钧、李力果送到后九殿，告知周维琪要当机立断，赶快拉出自己的一连队伍，摆脱杨庚武的控制。周维琪接受了阎红彦的意见，偷偷把自己的一连队伍拉出。

周维琪的一个连从后九殿拉出后，中共陕北特委指示阎红彦不能放弃杨庚武的部队，对杨庚武还要继续做争取工作。当阎红彦再次来到后九殿时，谁知高双城派去的人早到了一步，杨庚武又官迷心窍，受高双城的拉拢蒙骗，竟带着自己的两营人马，接受了高双城的改编（后来杨庚武及陕北党组织打入杨庚武部的一批共产党员均被高双城杀害）。

杨庚武部队被高双城收编后，周维琪的思想曾产生动摇，想再离开谢子长的第三骑兵团，一时举棋不定。经谢子长的一番开导劝说，最终才稳

下心来。

## 周维琪中计

周维琪毕竟是土匪出身，长期混在杨庚武的部队里，唯名利是图。在谢子长骑兵团当营长后，受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人的影响，周维琪虽对共产党有了一些了解，但还缺乏政治根基。周维琪一到三道川，就很快和张廷芝混得火热。张廷芝看到周维琪二营的武器装备精良，便垂涎三尺，经常用金钱、物质迷惑周维琪，对周维琪显出一副亲热的样子。

有一次，张廷芝给周维琪送去高头骏马两匹、大烟土两大包，还有银洋 300 块，周维琪一见真是喜出望外。张廷芝的东西可不是白给人的，早有了一番不可告人的阴谋。

一天，张廷芝又殷勤邀请周维琪到自己的营地寨子，备设酒宴招待。临行时，周维琪要阎红彦陪他一起去赴宴。在宴席中，张廷芝备的是好烟好酒好茶饭，施的是“美人计”。周维琪一入席，张廷芝就让擦脂抹粉、梳洗打扮得妖艳的妹妹张够够坐到周维琪的身边。

张够够年方十八，两条长辫子直达大腿，与周维琪猜拳碰杯，并给周维琪暗送秋波，弄得周维琪浑身发软、神魂颠倒。周维琪本来就是见了漂亮女人走不动的色狼，此时早把一切军务大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张廷芝见周维琪果真中了圈套，便乘机提亲，说要把妹妹张够够许配给周维琪。

阎红彦见此情景，怕周维琪酒醉失态误了大事，先后几次拉周维琪离席。周维琪红眼涨脸，硬是坐着不肯走。张廷芝趁着周维琪酒醉提出一个条件，要周维琪向团长谢子长通融，借谢子长团百余骑兵、百余条枪，帮助他到下马关走一趟，把苏雨生兵败时卷走的旧部 200 余人，重新拉回三道川归队。周维琪一口答应。

谢子长看出张廷芝的破绽，料到张廷芝拉拢周维琪必有不可告人的阴谋。当周维琪亲自恳求谢子长给张廷芝借兵时，谢子长本不想借给，但碍于周维琪已答应张廷芝，只好同意周维琪在第二营中借骑兵 30 余人，随张廷芝去下马关。

谢子长为了使周维琪不受张廷芝的摆布，揭穿其阴谋，让马云泽亲自

找周维琪谈话，陈述利害。周维琪向马云泽表示，绝不会受张廷芝的摆布，并愿意与共产党长期合作。为了表达自己没有二心，还把张廷芝送给他的几十条破旧枪支，让马云泽带给谢子长。但是，谢子长对周维琪还是放心不下，为防不测，决定将安塞县薛应昌、胡立亭(均是共产党员)组织的 20 多人的游击队连人带枪全部充实到周维琪营，以改造周维琪营的队伍成分。当谢子长派马云泽把薛应昌、胡立亭所带的人与枪支交给周维琪时，周维琪感激不已，当即就给薛应昌、胡立亭每人送了一支驳壳手枪。

与此同时，谢子长嘱咐阎红彦，千万要做好周维琪的思想工作，谨防张廷芝对周维琪的暗算。阎红彦多次对周维琪进行劝诫，要他时刻提高警惕。

但周维琪深陷在张廷芝设下的圈套中，已经昏昏不能自拔了，整天吃喝玩乐，甚至和张廷芝的妹妹张够够睡到了一起。到后来只要阎红彦一提及张廷芝，周维琪总是满不在乎地说：“放心，我经过的事太多啦，决不会上当的。”

1930 年 7 月间，周维琪派阎红彦带轻骑 30 余人，随张廷芝去了下马关。阎红彦跟着张廷芝一到下马关，苏雨生特地摆了一桌酒席款待，以表旧日部属之情。到了半夜时分，张廷芝乘苏雨生毫无戒备，先将苏雨生手枪队的枪缴了，然后带着早已联络好的旧部 200 余人乘夜逃走。

返回的路上，张廷芝假装万分感激的样子，对阎红彦表示：这次到下马关接回人马，又缴了苏雨生手枪队的枪，真是双喜临门，回去后一定要为诸位出力的弟兄们设宴庆功洗尘，怎奈三道川地方窄狭，诸多不便，为了请谢子长、刘志丹等同来赴宴，搞得排排场场，还是把队伍先带到安边城，找个大的酒店摆几桌丰盛的酒菜，以表感激之情。于是，阎红彦带着轻骑 30 余人跟随张廷芝一同进了安边城。

一进安边城，张廷芝的父亲张鸿儒果然摆好几桌好酒好饭好菜在等着，但并未请谢子长、刘志丹和周维琪过来。张鸿儒、张廷芝父子忙着给阎红彦等人轮番敬酒，直到人们都喝得酩酊大醉，才各自睡觉去了。

阎红彦等人正在酣睡之际，张鸿儒和张廷芝父子便露出狰狞的面目，乘机缴了阎红彦所带 30 余人的枪。阎红彦在混乱中连夜跑出安边城。

次日，张廷芝又向其父张鸿儒借了百余骑人马，直奔三道川周维琪的营地齐家桥而来。周维琪满以为自己很快就要当张家的女婿了，又在张廷芝去下马关往回拉队伍的事情上说服谢子长，给张廷芝借人借马立了大功，傍上张家的这门亲事一定会大走红运。

谁知张廷芝一见到周维琪，还没等周维琪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一声令下，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周维琪，逼其召集队伍立即缴枪。这时，周维琪正做着娶到张廷芝的妹妹张够够的好梦，便命令全营 200 多人将枪全部缴出，并投归张廷芝。

### 张廷芝夜袭三道川

张廷芝不费吹灰之力接连缴了阎红彦、周维琪队伍的枪械，又连夜出兵攻打驻三道川张沟门谢子长团部和刘志丹第六营的队伍，并大声叫嚷：“要跟共产党拼啦，谁放走谢子长、刘志丹，就提了谁的人头。”

谢子长团部和刘志丹第六营的队伍因事先毫无防备，很快就被张廷芝的突袭击溃。谢子长在张廷芝的突袭中只身脱险。马锡五、陶尔曼在白豹川被张廷芝的追兵抓去，被关押三个月后，通过关系始得释放。

当时，刘志丹正好不在部队，在返回途中至白豹川，碰上溃散的几个士兵，才得知自己的部队被张廷芝吃掉。刘志丹掉转马头，带着几个士兵朝保安县城方向奔去。刘志丹进了保安县永宁城寨，已天黑多时。守城团丁们拉上吊桥，刚关了寨门，张廷芝派出的蔺士殿带着一营骑兵已追到城寨之下。

蔺士殿的一营骑兵高举松明火把，喊叫着要进城寨里抓刘志丹、谢子长。县长崔焕九没了主意，急得团团转。曹力如、王子宜等站立寨墙上，以蔺士殿的骑兵团属甘肃陇东民团军、永宁城寨属陕西管辖，各守两省地盘，越界不得进入城寨为由拒绝，但蔺士殿围着城寨不肯退走。有人提出干脆固守城寨，与蔺士殿硬拼一场。刘志丹认为不妥，因城寨里只有县民团的武装，要与蔺士殿一营的兵力抵抗，只能是以卵击石。刘志丹决定放蔺士殿进到城寨来谈判。

蔺士殿依仗一营骑兵围着城寨的嚣张气势，带着几个护兵大摇大摆进

了城寨。蔺士殿一进城寨，只见路两旁排了两队团丁，个个荷枪实弹，有些心虚。当快走到县政府的窑洞前时，突然听得一声猛喝：“把枪放下！”几个团丁一拥而上，将蔺士殿和几个护兵的枪缴了。蔺士殿正要发作，一抬头看见刘志丹从窑洞走出，已站立在他的面前。蔺士殿顿感两腿发软，头上冒出豆大汗珠，一副苦脸连声说：“张团长请你回去。”

刘志丹盯着蔺士殿的长葫芦脸怒斥道：“谢子长和我哪一点得罪了张廷芝？下手这么狠，不但把我们的队伍吃掉，还要把谢子长和我斩尽杀绝。怪不得人们都说你是张家的一条忠实的狗，派你前来捉拿我俩！你回去给张廷芝说，我和谢子长也不是好惹的，叫他小心着，一条独木桥就没他走的！他今天挖下坑，明天就叫他自己往进跳！”

蔺士殿直点头应诺道：“好好，一准把话带到，我总算见到你，也好回去交差。”并答应立即撤走队伍，离开永宁山。

蔺士殿被刘志丹怒斥一顿后，灰溜溜地带着几个护兵出了城寨。一出得城寨，蔺士殿又翻脸不认人，气焰嚣张起来，带着一营骑兵围在城寨下不肯离开。刘志丹觉得一直躲在城寨终不是办法，也让县长崔焕九太为难了。

正在这时，刘景范派人向城寨送信，说谢子长已到川口，在等着刘志丹。刘志丹决定离开永宁城寨，去找谢子长，但从城寨的寨门是出不去的，只得将骑着的马匹和第六营军旗留给曹力如和王子宜，从城寨的后山处找了个偏僻地方，被大家用绳子吊下城寨，趁夜离开永宁山。

张廷芝的突袭使谢子长、刘志丹在谭世麟部刚拉起的队伍受到严重损失，组织策划的又一次起义无法实施，后人称此为“三道川事件”。

## 第三十四章

### 再拉武装

#### 太白镇夺枪

1930年10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县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后，谢子长任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继续打陕甘边的军阀中进行兵运活动。

不久，谢子长被派往上海中央局特科受训。刘志丹在保安县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先搞到十余支枪，并在三道川溃散后的原属部士兵中召集到十几个人，与刘景范、马锡五、刘约三等一起组成20多人的一支游击武装。后又从保安县民团里选出十几个共产党员、团员，队伍很快发展到四五十人，算起来长短枪有20余支，武器仍十分匮乏。

这时，正逢打人谭世麟陇东民团军司令部的共产党员杨树荣（原任第三骑兵团团附）回到保安永宁山。杨树荣是刘志丹安插在谭世麟身边的情报人员。当刘志丹向杨树荣谈及张廷芝三道川突袭、吃掉第三骑兵团的事后，杨树荣十分吃惊，因为谭世麟还一直不知道三道川发生了这桩事。刘志丹一听，灵机一动，决定将计就计地把自己拉起的这支游击武装化装成原陇东民团军第三骑兵团第六营，奔袭太白镇的驻军。

太白镇在陕甘两省交界处，与保安永宁山相隔100多里路，属甘肃合水县管辖。陕西与甘肃的驻军以省界为线，从来是各管辖各的地盘，双方很少协作通气。刘志丹利用两省军阀之间分割势力的空子，筹划把拉起的

队伍开到甘肃境内，对太白镇驻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入陕西境内躲起来。于是，刘志丹派出侦察人员先到太白镇侦察驻军的情况。

太白镇上有两条东西交叉的斜街，中间隔一条河。这里驻的是甘军第二十四营，营长叫黄毓麟，绰号黄二子，是个坏得透顶的坏蛋。刘志丹曾与他有过一面之交。这个营下辖三个连，一连随营部驻守在镇子里，二连驻守在镇子以东的黄家砭，三连驻守在离镇子几十里外的林锦庙。刘志丹先打发杨树荣到太白镇去见黄二子，佯称刘志丹率陇东民团军骑兵团第六营前往甘肃，不日路过太白镇，要黄二子准备好粮草、号好房子。

深夜，刘志丹让曹力如到县警察局调来20多匹马，连夜带着游击队从永宁山出发，赶到离太白镇不远的烧坊住下。待杨树荣报来实讯，得知黄二子并无猜疑，正忙碌准备迎接，刘志丹立即让队伍公开打起陇东民团军骑兵团第六营的旗号卜，排着长队向太白镇开去。

刘志丹带着游击队一进太白镇，黄二子就把刘志丹请到营部屋里去抽大烟。马锡五、刘景范、刘约三等很快分头带人把住营部各个出口。一切安排就绪后，把守在黄二子门前的马锡五首先举枪“叭、叭”两枪，将黄二子的两个护兵打倒在房门前。

屋里的黄二子听得门外枪响，刚要翻身下炕，刘志丹手起枪响，黄二子一头栽倒地下毙命。有一个副营长想从屋里跑出，被刘志丹身边的杨树荣一枪打得横躺在门槛上。

在别的屋里，有的士兵喝酒猜拳，有的士兵赌牌耍钱，正在兴致高时，只见各个门口伸进黑洞洞的枪口，门外喊道：“缴枪不杀，谁敢动弹打死谁！”士兵们惊慌一片，纷纷把屋里的枪支全部扔出门外，有的士兵在惊慌中甚至连大烟枪都扔了出来。

游击队很快就收缴了镇上黄二子营部和一连的全部枪支。驻在镇子以东黄家砭的二连，听逃出的士兵说镇上黄二子的人马全部让刘志丹的队伍吃掉，闻风丧胆，立即逃离。

游击队撤出太白镇，又迅速朝黄二子营驻守在林锦庙的三连的方向开去。快到林锦庙时，在枣刺砭碰到两个背枪的士兵，正在大路上遛马。刘志丹把两个遛马的士兵抓来一问，才知道是三连长马建有的随从护兵。

刘志丹问：“马连长在哪里？”

两个随从护兵指着旁边的一个院子说：“在里边逛‘破鞋’。”刘志丹带着人马立即冲进院里，将连长马建有五花大绑，带回到林锦庙，挟持马建有收缴了全连的枪支和马匹。

经清点战果，这一仗缴获长短枪 60 余支、骡马数十匹，游击队很快扩大到 140 多人，这就是有名的“太白缴枪”。从此，刘志丹在陕甘边界建立起第一支工农革命军，在这一带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游击战争。

太白镇一仗后，刘志丹回兵永宁山。县长崔焕九一见刘志丹，就连连要求他快把拉起的队伍带出永宁山，害怕张廷芝再派兵到这里来，丢掉自己的性命倒无所谓，关键会连累百姓。

刘志丹也考虑陕甘两省军阀一旦派军队前来“剿歼”，刚拉起的这支游击队随时有被吃掉的危险。刘志丹与曹力如、王子宜研究后认为，在目前敌我力量绝对悬殊的形势下，要保存和发展这支刚拉起的队伍，还不宜公开打起红旗。经商量后决定：曹力如、王子宜暂不公开暴露身份，仍利用原来的合法地位和身份继续留在永宁山，便于给游击队后勤供需和消息传递，由刘志丹带着队伍开到距永宁山 20 多里地的葡萄沟安营扎寨。

葡萄沟在洛河川的一个拐沟里，方圆十几里全是梢山，山梁上有座古寨子，寨子里有几排破烂不堪的窑洞。刘志丹带着游击队就在这里安营，有了第一个武装割据之地。

不久，刘志丹带着游击队离开葡萄沟，在肤施、安塞两县一带打了几家土豪地主，辗转瓦子川、康家沟、蔡家砭、刘家老庄、定边集、旦八寨子。所到之处，当地的老百姓还根本不知道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都跑到山林深处去“藏反”（陕北方言，即躲避兵匪骚扰）。

游击队战士按照刘志丹的命令，为宣传游击队与军阀队伍的区别，凡在老百姓的家里吃了粮和菜，就把钱放在老百姓的饭锅里，并写个字条留下：“我们是人民革命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游击队走到哪里就到处张贴“打倒旧政权”“打倒土豪劣绅”“穷人要翻身”等标语。经过宣传，老百姓对刘志丹所带的游击队渐渐有了认识，有许多青年农民积极踊跃地要求参加。后游击队在真武洞、镰刀湾一带连打几个胜仗，又有 200

多农民子弟参加了游击队。一时间，刘志丹的这支队伍在保安、安塞几个县里威名大震。

## 王世泰取枪

1930年秋，延安中学因学潮被高双城派兵封闭，学校党组织遭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迫离开学校。王世泰是学校中共支部的负责人，因身份暴露回到家乡。

王世泰，陕西洛川县人，生于1910年。1927年秋考入延安中学。1929年3月加入共产党。他在离校前将自己保存的党组织文件和搞到的驳壳枪、六转子、独角龙手枪各一支及一些子弹藏在同学姚安基家。一月多后，王世泰经中共肤施区委书记刘明景派遣带着几个青年学生，赶往保安县一带找到刘志丹，参加游击队。

刘志丹第一次见到王世泰，看完刘明景的信后笑着说：“好，投笔从戎，有志气，欢迎，欢迎，我们队伍中就是缺少有文化的人。”

当时，由于游击队的枪支太少，许多人扛着长矛，背着大刀，还有不少根据王世泰提供的情况，决定让他返回肤施取回这些埋藏的枪支和子弹。



王世泰

王世泰返回肤施，一进县城就直奔姚安基家。姚安基也是共产党员，他告诉王世泰，县城已是一片白色恐怖，区委机关从县城转移到甘谷驿以东一带，一时无法取得联系。王世泰心中烦躁起来，问姚安基：“咱们那支驳壳枪还在吗？”

姚安基说：“让区委拿走了。”“还有什么枪？”王世泰急问。

姚安基说：“只剩一支六转子、一支独角龙。”

没有了驳壳枪，怎么办？在返回肤施取枪时，王世泰曾向刘志丹保证过，一定要把藏的枪带回去，尤其是那支驳壳枪。第一次执行任务就放了空炮，无颜向刘志丹交代，年轻气盛的王

世泰暗下决心，一定要搞到枪再回去。他问：“学校的同学中有谁在高双城部队做事？”姚安基说：“李树禄(又名李伯林)在学兵连当文书。”

第三天晚上，李树禄来了。王世泰告诉李树禄他这次来的任务，要李树禄设法搞一支枪，最好是驳壳枪，搞不到驳壳枪，搞到短枪也行。

几天后，李树禄回话，无法搞到枪。王世泰不死心，让李树禄继续打听，看谁藏有私枪，用钱买。一天，李树禄跑来告诉王世泰：“有门了，学兵连二排长私藏了一支德国造的马步枪，要卖 60 块银洋。”

王世泰高兴地说：“60 块就 60 块，我们买。”

李树禄是个非常忠厚老实的共产党员，担心王世泰没钱，问：“人家要现钱，钱从哪里找？”

“钱你不要管。你就说买枪的人要先看枪后给钱，枪不好人家还不要哩！”其实，王世泰身上分文没有，只想尽快拿到枪。

当晚，李树禄果真把枪拿来了。确实是支好枪。有了枪，王世泰不提钱的事。李树禄问王世泰：“钱怎么办？”

“没钱。”王世泰说。

这一下，李树禄急了：“没有那咋行，人家会找我算账的。”

“他的枪来路不明，不敢大吵大闹地要钱。他硬要，你就说你上当啦，枪叫人拐跑了。他要耍横，你就硬顶起来叫着拉他去连部，告他私藏枪支的罪名。万一顶不住，你先用自己的薪水去慢慢还，这还不行吗？”王世泰见李树禄不吭声，又接着说，“革命连牺牲都不怕，还怕他要钱？你搞到一条枪，就是为革命增添了一份力量，游击队不会忘记你的。”

李树禄走后，王世泰准备立即回游击队去，但现在身上有了枪，可不是想走就能走的，城门盘查太严，把枪带出肤施城是件大事。王世泰先让姚安基去查看城东墙根的一个污水洞，准备从污水洞爬出城外。姚安基去一看，污水洞被封死。王世泰又想了一个办法，准备在夜间带枪从城墙上用绳子吊下去。姚安基一了解，夜间城墙上流动哨，也行不通。

姚安基的媳妇徐少兰对王世泰说：“你不是穿着长袍，不能把枪斜背在袍子下吗？”

徐少兰的一句话，点拨了王世泰的思路。王世泰身材魁梧，马步枪的

枪身短，把枪带放长，背在右肩上，把袍子衣领敞开，右肩上背个褡裢一盖，再把六转子、独角龙两支小枪和子弹装在褡裢里，完全可以掩人耳目，看不出一点破绽。

带枪出城的办法有了，但如何躲避城门口哨兵的检查，又是一关。王世泰又把李树禄找来，经商量决定以李树禄的军人身份作掩护送出城外。如果城门哨兵不检查，大吉大利；一旦哨兵要搜查，万一不能脱身，就开枪冲出去。同时，让姚安基提前出城，在杨家岭对面的石砭等候，只要王世泰顺利出城，就由姚安基再护送一段路程。

第二天，王世泰和李树禄到了城门口，哨兵一见李树禄一身军人打扮，不但对二人未加盘查，还向李树禄敬礼致意。

离开肤施城，王世泰第一天到达安塞县的高家沟门。这里有个同学叫高如华，打算在他家住一宿。高如华刚结婚不几日，碰巧不在家。

傍晚，高如华回来了，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很进步。二人寒暄几句后，王世泰向高如华示意一同走出大门，将自己身带枪支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他。高如华说：“在我家绝对不会出事的，但要让爷爷知道了不好，还是把枪藏起来。”趁天黑，高如华帮着王世泰把枪支藏到一间堆放柴草的破屋里。

第二天是农历大年三十，一夜飞雪。早饭后，王世泰踏雪向保安县方向匆匆赶去。当天行走七八十里路，在一条沟里找到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只住一个年轻女人，一见王世泰背着枪走进窑洞，瞪着惊恐不安的眼睛，把他当成了土匪。

“老乡，你不要怕，我是过路人，天黑了，路上又不好走，我想在你家住一夜，明天一大早就走。”王世泰说。

女主人一听说要借宿，急得抓住炕沿直往后退，怯声细语地说：“我男人出去躲账，后半夜才能回来，你……不能……”

王世泰见状，问：“附近还有人家吗？”

“有，离这儿七八里地有个大庄子。”说着她走出窑洞门，给王世泰指了指方向。

王世泰沿着那个女人指的方向，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继续朝前走去。

摸黑走了十多里地，果真是一个有八九户人家的村子。王世泰刚走到村口，就被一群狗凶猛地围起来。狗叫声惊动了村子里的老乡，人们询问王世泰是干什么的，王世泰按早已编好的话说：“我是崔登第的同学，找崔登第的舅舅。”

有一位老人走出人群拉住王世泰的手说：“我就是崔登第的舅舅，你就到我家住吧。”晚上，自称是崔登第舅舅的老人做了顿丰盛的年饭。王世泰酒足饭饱后，香甜地睡去。

次日早饭后，王世泰告别了这位善良的老人，继续赶路。中午，到了保安县川。为了躲避哨卡，径直通过大川，登上一座大山。直到天黑一阵，才摸着下山，到达洛河边。洛河已经冰封，过了河，到半夜时分才走到一个村庄。

这天是农历大年初一，村庄里家家门前挂着红灯。王世泰走到一户人家的窑洞门前，未叩门即走了进去。说也巧，这家男主人正是崔登第的亲舅舅。

崔登第的家离这里只有五里地。第二天上午，崔登第就被他舅舅打发人叫来，两人见面高兴得连蹦带跳，因为他们不仅是同学，而且是党内同志。

崔登第告诉王世泰，刘志丹带领的游击队近日活动在王庄一带，离这里只有40多里。王世泰当即写了封信，让崔登第找人送去。

刘志丹接到信后，立即派中队长魏佑民、警卫员郭立本和一个绥德籍战士骑马赶来。当天下午，王世泰从杨坪动身，回到游击队驻地。

刘志丹听说王世泰回来了，忙走出窑洞，满面笑容地说：“辛苦了，辛苦了！快进窑洞暖和暖和。”

王世泰很内疚。因原说要取回的是驳壳枪，结果变成了马步枪，低声说道：“我没有完成任务。”

刘志丹哈哈大笑说：“你不仅完成任务好，表现更好。区委把枪拿走也是革命的需要。你能用计搞来这支德国造马步枪，可真不容易，你为革命立了一功。”

刘志丹把王世泰交回的两支小枪交给别人，把马步枪递给王世泰说：

“这支枪今后归你用，希望你勇敢、顽强地战斗。”

## 败走芦保梁

闻知刘志丹从陕北西部地区拉起的游击队在保安、安塞、肤施几县活动，打土豪斗地主，杀恶霸抗官府，分粮食拉牛羊，许多穷苦农民纷纷响应，踊跃加入，已大成气候，驻守榆林的军阀井岳秀惊恐不安。井岳秀命驻肤施的高双城旅出兵“讨匪”，限期三个月肃清。高双城速派高玉亭营进驻保安县永宁山。

为摆脱高双城军队的“围剿”，刘志丹决定带领队伍从陕西境内转移到甘肃境内活动。这时，天气已进寒冬季节。刘志丹带着游击队经平定川、葫芦河、连家砭、曹家寺进入甘肃合水县的古城镇一带。

古城镇位于合水县以东，沟壑纵横，森林茂密，交通不便。高双城的军队在满山满川冰雪茫茫的深山密林里根本找不到游击队的一丝踪迹，搜索一个多月只得收兵回营。

游击队进入深山密林，活动在石峁一带。在这一带，哥老会组织的成员很多，活动很广，是一支很大的潜在力量，他们多为保护生命财产而入伙，成了占山为匪的“山大王”。“山大王”中有一定势力的是苍沟马大爷(马海旺)、东坪冯大爷、小石崖罗大爷(罗礼臣)，还有为人正气豪爽的李大爷(李仲英)。为了争取这些哥老会组织走上革命道路，以利用他们的地盘作联络站和隐蔽所，夺取武器，扩大力量，刘志丹经苍沟哥老会龙头大爷马海旺介绍加入哥老会，号称为“西北堂老大爷”。刘志丹有了哥老会“西北堂老大爷”的公开身份，又结识了龙头大爷李仲英。

在这个冬天，这些哥老会的“龙头大爷”和“山大王”联合给游击队献枪、捐粮，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当侦察员，并帮助游击队斗土豪、分田地、出外购买武器弹药，使刘志丹带领的游击队安全地度过高双城派兵“围剿”的第一个冬天。马海旺家成了游击队的兵站和联络站。陕北民歌传唱的“刘志丹练兵石峁湾……”正是反映了刘志丹带领游击队初创红军的这段艰难岁月。

这里还有赵二娃、唐青山、贾生财为“山大王”的三股非法武装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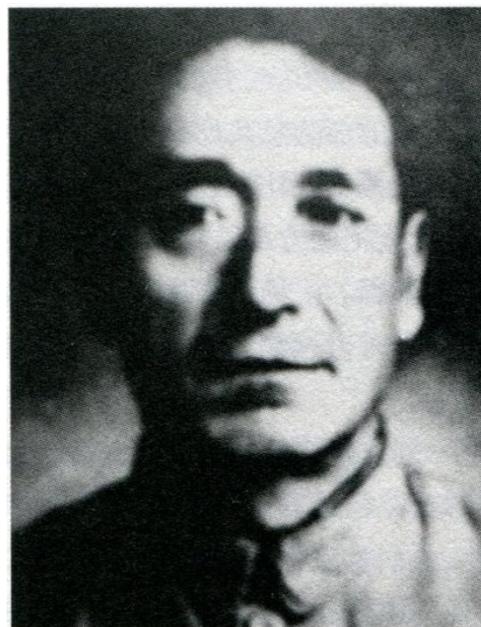
赵二娃(又名赵连璧)，陕西保安县人，因生活所迫占山为王，手下有七八十人、30多支枪，较有战斗力。唐青山，甘肃合水县人，手下有200多人，绝大多数是当地农民，只有十几支枪，其余是大刀长矛。贾生财，陕西神木县人，早年逃荒流落到这一带，手下有三四十人、十几支枪。

赵二娃、唐青山、贾生财三人早知刘志丹的人品和才华，久存仰慕之心，特别是赵二娃与刘志丹早有过接触，关系尤深，一直有投靠刘志丹之意。当刘志丹带着游击队到了古城镇，赵二娃联络唐青山、贾生财闻讯而来，提出要与游击队联合。

刘志丹综观局势，分析敌情，认为这三支队伍大多是穷苦百姓，可通过教育改造成革命者，为我所用，决定联合这三股队伍扩大游击队，形成一股武装力量，以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之势。

1931年1月，在古城镇汇集刘志丹的游击队100余人，赵二娃、唐青山、贾生财的队伍300余人，还有马锡五带出的哥老会部分成员也从保安县赶到这里，队伍一下子发展扩大到400多人。志丹决定对队伍进行改编。

在古城镇的麻义村，游击队召开干部会研究队伍改编问题，正式推选刘志丹为游击队的总指挥。刘志丹根据队伍的实际情况，决定暂不命名番号，对赵部、唐部、贾部不打乱原有编制，仍由三人分别带领。部队分为两部分，下辖四个连。以刘志丹带领的游击队为一部分，枪好马好，共产党员、团员多，编为两个连，一个连由魏佑民任连长，一个连由卢钟铎任连长。赵二娃、贾生财、唐青山等组成的队伍为一部分，编为两个连。赵二娃、贾生财为连长，由他们带领活动。



马锡五

马锡五，祖籍陕西延川县，早年随父逃荒到保安县，是永宁山哥老会的“龙头这时，由于队伍的成分十分复杂，刘大爷”，曾在乡里当过私塾先生，为人正直。当时，哥老会在陕甘交界处的势力很大，其成员大都是农民，多是为了在乱世保家保命，口号是“有

福同享，有难同当”。刘志丹认为把这些人团结过来，对革命事业很有利，在保安县就去找马锡五，向他讲革命道理。马锡五听后，对刘志丹十分敬佩地说：“你是做大事的，我虽比你年长，但你是我的先生。”后来，马锡五在刘志丹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马锡五入党后勤奋学习，努力为党工作，后曾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人称“马青天”。

部队在古城镇的麻义村改编后，刘志丹召开大会，提出：一是这支部队大部分人是穷苦出身，都是因为生活所迫或是痛恶官府而拉起队伍的，大家要团结一心，同地主反动武装和国民党军队斗争到底；二是因这支部队中绝大多数是农民，今后绝不能再干祸害老百姓的事；三是这支部队在这深山密林里无法解决给养，要把部队拉出去，并要继续发展壮大。

这天，天地灰暗，寒风凛冽，空中纷纷扬扬飘着大雪。刘志丹率领 400 多人浩浩荡荡地向宁县盘克塬进发。此时，刘志丹想通过陇东军阀陈畦璋部下刘保堂的关系将队伍暂挂在陈畦璋部下以图求存发展。不料队伍刚开到距张皮塬不足 30 里的一个地方，即与陈畦璋部主力第五旅谢牛旋的骑兵队遭遇，打破了刘志丹原有的筹划。

谢牛旋 1000 多人的骑兵队突然向着刘志丹率领的这支部队猛扑过来。刚组建的部队总共加起来不过 150 多支枪，绝大多数人拿的都是大刀、长矛，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战斗力。谢牛旋的骑兵队人喊马嘶，刀光闪闪，一阵子左冲右杀，就把联合部队截成几段。还没有作战经验的部队顿时人挤人、马踏马地乱了阵脚。一场恶战从上午一直打到天黑结束。待刘志丹把部队集合到一个山头上时，只剩下 200 多人了，有近半人马被打散，卢钟铎牺牲，队伍情绪十分低落。

刘志丹整顿一下队伍，连夜撤到麻子掌。到麻子掌时，村里的老百姓听见枪响，早已逃得一空。部队没吃的没住处，好不容易找到点粮食把饭做得半生，人们就狼吞虎咽地吃了个精光。

次日天刚发亮，村外又响起激烈的枪声，谢牛旋的骑兵队又向麻子掌扑来。在这处境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部队仓皇应战，赵二娃、唐青山、贾生财的人马大部分被冲散。刘志丹决定迅速摆脱谢牛旋的骑兵队，指挥仅剩百余人的部队边打边退，直至钻入芦保梁大森林。

## 联络罗礼臣

芦保梁是桥山山脉的大森林，一眼望去枝丫交错，葛藤盘绕，阴阴森森，周围几百里荒无人烟。桥山山脉贯穿 20 多个县，北至定边，南至淳化、耀县，包括华池、庆阳、合水、宁县、同官、宜君、洛川、邠县、保安、甘泉、安塞等县。

在这样的大森林里，部队虽然摆脱了甘肃陇东陈畦璋部和陕北肤施高双城部两支军队的围追堵截，但是诸多困难摆在面前：兵员得不到补充、作战得不到掩护、伤员得不到照料医治、打听不到外界消息，纵然陈畦璋、高双城的军队不打来，没有群众、没有粮食，部队也无法生存下去。

要去找中共陕北特委取得联系，路途十分遥远。这里距西安相对较近。于是，刘志丹决定派人直接到西安去找中共陕西省委，请示游击队今后的行动安排。派往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请示的人一去十多天，不见回音，部队带着的粮食全部吃光了，只能点着火堆蹲在大森林里忍饥挨饿地等待。实在饿得不行时，就杀战马充饥，在大森林里找些野核桃填肚子。

在芦保梁大森林百里之外有个叫小石崖的地方，那里有个叫罗礼臣的哥老会“龙头大爷”，他年轻时候受豪绅的压迫，出来搞枪，在此处成了“山大王”。由于小石崖的地势险要，官兵难得进来，国民党怕他造反，为了安抚，给了个民团团总头衔，手下有三个连的队伍。刘志丹决定以自己是哥老会“西北堂老大爷”的身份，带着部队与罗礼臣有条件地暂时联合，使队伍能渡过这一难关。于是，刘志丹先派出马锡五、车衡福带着 200 两大烟土作为见面礼，前往与罗礼臣联系。随后，刘志丹带着部队朝小石崖开去。

当刘志丹带着部队开至距小石崖还有 30 里处时，罗礼臣早已派出一个副官前来迎接。副官告知刘志丹，部队先不能去小石崖，罗礼臣在上畛子已经安排好了食宿，要部队到那里安营扎寨。

其实，罗礼臣是心存疑虑，虽然听哥老会的许多“龙头”“大爷”和“山大王”都说刘志丹人好、够朋友，但因刘志丹手下还有 100 余人的队伍，如轻易接纳到小石崖，一旦有个翻脸，自己岂不落个太白镇第二个黄二子的下场。刘志丹理解罗礼臣的心理活动，便带着游击队开到上畛子。一到

上畛子，只见驻守在这里的士兵们早已杀好猪羊，满桌子摆好了酒茶饭食等待刘志丹队伍的到来。

游击队驻到上畛子后，刘志丹为了表达对罗礼臣的谢意，拿上好烟好酒好礼物，亲自带着几个随从护兵，到小石崖拜见罗礼臣。

刘志丹一到小石崖，只见在高壁石崖上有个石洞，洞口垒着石头墙的工事，里边还流着一股清泉，并存放了许多粮食。要上石崖处的石洞，先得爬上崖下垒起的石阶台子，然后用吊梯把人吊上去，当地人叫“石窰子”。

罗礼臣长得高大魁伟，留着八字胡，热情地把刘志丹接到“石窰子”里。当时，罗礼臣虽然把刘志丹的队伍接纳到上畛子一带，但还是对刘志丹放心不下。罗礼臣听说刘志丹要亲自来小石崖，真还不敢大意，悄悄地给手下几个连长叮咛：刘志丹来后，大家要看眼色行事。

刘志丹一见到罗礼臣，坦然地告诉罗礼臣：红军游击队歼灭太白镇民团后，接连行军打仗，当前受陕甘两省陈畦璋和高双城军队的前堵后截，原一支 400 多人的部队已垮去多半，因在大森林里弹尽粮绝，战士们的伤病得不到治养，才来投奔求助。

罗礼臣一听刘志丹说话坦诚，说的都是他所知的实情，并无任何虚假之语，顿时心里的一层疑云散去，倒对刘志丹产生了敬佩之心。经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二人甚为情投意合。罗礼臣立即置办了一桌酒席，表示愿意尽力给刘志丹的部队提供弹药和粮食，枪支由他出钱来给游击队购买，把伤病员接到小石崖来治养。从此，刘志丹与罗礼臣建立了互不侵犯的合作关系。

刘志丹对罗礼臣这个哥老会“龙头大爷”的义举感激不尽。在最困难的时刻，有这样的朋友出面慷慨救助游击队，真让刘志丹终生难忘。后来毛泽东在 1936 年 7 月向全国哥老会发出的宣言中高度评价说：“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的模范。”

## 第三十五章

# 刘志丹彬县落难

### 南下职田镇

刘志丹在小石崖得到罗礼臣的援助，游击队的精神面貌大为振作。随之，为了打土豪，筹措钱粮，扩大队伍，暂时找到一个稳定的立足地，他决定把部队开到旬邑县职田镇活动。

职田镇一带是当年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组织发动群众、举行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的地方。在这里，许才升、程永盛、吕凤岐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曾打开旬邑县城张洪镇，杀了国民党县长李克宣，建立了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权，推选许才升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次农民起义运动虽然持续时不长，很快就被冯玉祥的军队镇压下去，但这一壮举长期影响着当地的农民，播下了随时可燃的革命火种。

职田镇上未驻军队，只在镇子不远处驻有苏雨生的小部分队伍。苏雨生自平凉兵败后，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下，投在杨虎城部被改编为警备骑兵团，旅部设在彬县县城。刘志丹原在苏雨生部谷莲舫旅张廷芝骑兵团当过团附，与苏雨生虽无深交，关系尚好。在上畛子时，刘志丹曾派马锡五、陈鸿宾去过彬县，试探过苏雨生的态度。苏雨生表示愿意与刘志丹联合，并派出一营队伍准备随马锡五、陈鸿宾前往上畛子接刘志丹的队伍，但行至宜君县转角镇时因带队的营长不愿前往而返回，使联合之事暂搁起来。刘志丹分析认为，基于苏雨生目前的处境，部队到职田镇活动，他还一时不会做出为难之事。

1931年1月，刘志丹带领部队从上畛子出发，一路南下到了职田镇上的镇长和商会会长等地方绅士一听说刘志丹带着队伍进镇子了，都不敢怠慢。

部队到镇上的第二天，正是一个逢集的日子。刘志丹乘着中午镇上人多之际，带了几个护卫兵走到镇子中心的一个戏台子上，给赶集的群众讲话。他大声说：“我们这支军队是老百姓的军队，不扰民，不害民，公买公卖，望工农商学各界稳定镇上的社会秩序，各安本业。……”

刘志丹又向赶集的四乡群众宣布了部队的几条禁令：不准赌博，不准抽大烟，不准偷盗，不准嫖娼奸淫。赶集的群众从来没见过军队的长官会这样体察民情、亲自讲话安民，纷纷传说刘志丹带的是“一支好军队”。

为了抓紧机会扩大队伍影响，一方面给游击队筹措活动经费，另一方面给当地贫苦农民分些粮食，帮着他们度过春荒，刘志丹决定在职田镇三里地外的马家堡一带斗争一些有粮有钱的大地主。在马家堡有所谓的“八大家”大地主，还有30里外的大地主刘日新，都是当地富得流油的富豪。刘日新有个儿子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是杨虎城第十七路军里的一个营长。他仗着有钱有势，在这一带抢田霸产，无恶不作，家有存粮七八百石。刘志丹决定先礼后兵，与刘日新谈判，让他带头做表率，带动马家堡“八大家”地主捐粮。

刘志丹派人到刘日新家交涉谈判，不料刘日新根本不把来人放在眼里，蛮横地拒绝，并声称不会捐出一粒粮食来。派出去的人回到镇上，报告了刘日新的态度后，刘志丹又派出陈鸿宾，再去刘日新家交涉谈判。刘日新仍然态度蛮横，不肯捐出粮食。陈鸿宾见软的一套不行，当即严令刘日新：限期交出20石粮食，否则军令无情。临走时，陈鸿宾气愤地把刘日新狠踢一脚。

刘日新一生横霸乡里，从来受人奉迎，哪能受得了这份窝心气。他死也不低头从命，即服大量大烟土自杀，表示顽抗到底。

此时，已在中共陕西省委担任交通员的高岗从西安赶到职田镇，带来了省委的书面指示。省委的指示密写在一本《红楼梦》书的字缝，放在点心盒子里。省委指示：刘志丹所带领的部队，在公开打出红旗的条件还不

成熟之时，为保存革命武装实力，暂编人杨虎城部苏雨生的警备骑兵旅，与苏雨生联合，以扩大革命力量。正好苏雨生也从彬县派人到职田镇送信，念及旧日情谊，表示愿与刘志丹联合。

刘志丹根据省委指示，除派出赵二娃、贾生财等带少部分人分散到合水县一带活动，再扩大队伍外，留在职田镇的部队接受了苏雨生的收编。苏雨生将刘志丹的部队改编为一个补充团，任命刘志丹为团长，杨树荣为中校团附，陈鸿宾为少校团附，马锡五为军需官。补充团下辖两个连，魏佑民为第一连连长，刘约三为副连长，同宗贵为第二连连长。补充团仍在职田镇、杨家店一带驻防。

## 生死关头

1931年4月下旬，苏雨生要刘志丹来彬县，商量部队收编后的有关事宜。刘志丹便带少数随从队伍从职田镇出发，赶到彬县。到了彬县县城的当天，苏雨生请来了县里政界的头脸人物和地方名绅富商，设宴款待，接风洗尘，好一番热闹场面。次日，苏雨生又专门派人陪着刘志丹到城外的名胜古迹花果山和水帘洞游览了一趟。

但正在这时，刘日新的儿子在西安听说其父亲因抗粮不交被刘志丹的队伍逼得自杀，即串通职田镇一带大大小小几十个地主一齐到西安，联名向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省党部告状，说刘志丹是共产党，在职田镇一带四处抢掠民财、杀害人命，并准备搞起义云云。

刘志丹到彬县的第三天晚上，苏雨生突然神色慌张地从门外撞进来，显出一副万般无奈的样子告诉刘志丹：“事情坏了，上边下来密令，要我就地把你扣留，西安还派来一个营，在暗中监督我，说你在职田镇打土豪、闹共产，逼死了绅士刘日新，要把你押往西安。”

刘志丹被苏雨生关押进了牢房。苏雨生随即下令，将刘志丹所带随从队伍的枪支全部收缴。

在刘志丹所带随从队伍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叫师智，侥幸脱险。师智出了彬县县城，飞快地朝西安方向奔跑，找到中共陕西省委汇报了情况。省委获悉刘志丹在彬县被捕后，立即派出高岗、马志贞前往彬县，要求积极

营救。接着，省委又通过时任国民党省政府秘书长的南汉宸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高级参议杜斌丞设法营救刘志丹。

关押刘志丹后，苏雨生派出两个骑兵团连夜赶到职田镇，将职田镇团团包围。当时，杨树荣前往西安给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未归，留在职田镇补充团的王世泰、刘景范、马锡五、刘约三等人面对突变的情况，召开部队党的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会上，虽有人坚决主张打，但因双方兵力悬殊，且补充团枪支弹药装备极差，打是打不出去的。这时，苏雨生的军队提出条件：缴枪不动人，否则先杀了刘志丹。



白冠五

在这种情况下，补充团为保证刘志丹的生命安全，决定派出刘约三为代表带几个同志，与苏雨生两个团的带队团长直接谈判。刘约三在谈判中提出三个条件：一是以立即释放刘志丹为主要前提，如做不到这一点，宁愿以死相拼；二是部队缴枪后，不愿当兵的发放路费让回家；三是不准伤害补充团一人一马，不准搜腰包。

上述三个条件，带队的团长将第二、第三条一口答应下来，但对第一条说做不了主，不过可以保证刘志丹的人身安全。

当补充团一、二连缴枪之时，二连在同宗贵、杨志贤密策下，乘隙带着二连近百人的队伍脱逃，但仅带出一支枪。一连有 70 多人缴枪后，被押到彬县，编为一个运输队，住在东关城外娘娘庙，不发给一枪一弹，处在被半监视的境地，由魏佑民任队长，刘约三任副队长。

这时，中共陕西省委又派出史直斋来彬县，被以一个士兵身份安排在运输队负责党的工作。史直斋一到彬县，就在运输队积极筹备枪支，找到在苏雨生部第三团二营搞兵运工作的李秉荣、习仲勋，商量营救刘志丹的对策。

苏雨生部有个参议叫白冠五，陕西神木县人。1925年毕业于山西兴县

中学，1928年考入太原北方军校学习，是刚打人苏雨生部的共产党员。白冠五在太原北方军校毕业后，奉中共北方局指派通过陕北高志清骑兵旅参谋长刘天民(共产党员)的介绍到苏雨生部开展兵运工作。中共北方局交给他的任务是争取在苏雨生部掌握部分兵权。他受命先到宁夏去找苏雨生，半途听说苏雨生叛离冯玉祥，与“五马”交战失败，接受了杨虎城的收编驻防彬县，于是又赶到彬县。白冠五到彬县见到苏雨生，苏雨生的情绪正十分低沉，看了刘天民的介绍信，对白冠五说：“如今队伍缩编成一个旅，下连带兵不行了，还是在司令部当个参议吧。”

刘志丹被关押后，先监押在司令部的副官处。正好白冠五有事去找副官处的王主任，见门口增设了四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白冠五一直朝里走去，站岗的士兵认识白冠五，便未加阻拦。王主任正满脸阴沉地坐在椅子上，敞开着门的隔壁套间里有几个士兵正给一位身穿军大衣的人砸脚镣。王主任看见白冠五进来，点头打招呼让座。

白冠五猜测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但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随便问道：“有什么事？”

王主任只是“唔”了一声，不打算多说话。白冠五心中犯疑，有意追问：“什么案子？”

“共产党！”王主任的回答很简单。

“他是谁？”白冠五一听是与共产党有关的事，心里顿时紧张起来。

“刘志丹！”

白冠五顿时被惊呆了。到彬县后还没来得及与刘志丹接上关系，万万没想到刘志丹出了事。白冠五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话题岔开，扯起别的闲话。不一会儿，隔壁套间的几个士兵走出来，王主任便从椅子上站起来。白冠五有意坐着不动。王主任见白冠五没有离开的意思，只好向白冠五说：“你且少坐，我出去一下就来。”

王主任把手一挥，带着几个士兵走出副官处的房门。这时，副官处只剩白冠五一个人了。白冠五急忙跨进隔壁套间，上前双手抱住刘志丹的肩头，急切地说道：“志丹同志，想不到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见面了！”

刘志丹抬起头，审视着这个陌生人，平静地问道：“你是谁？”“我叫

白冠五。”

“从哪里来的？”“太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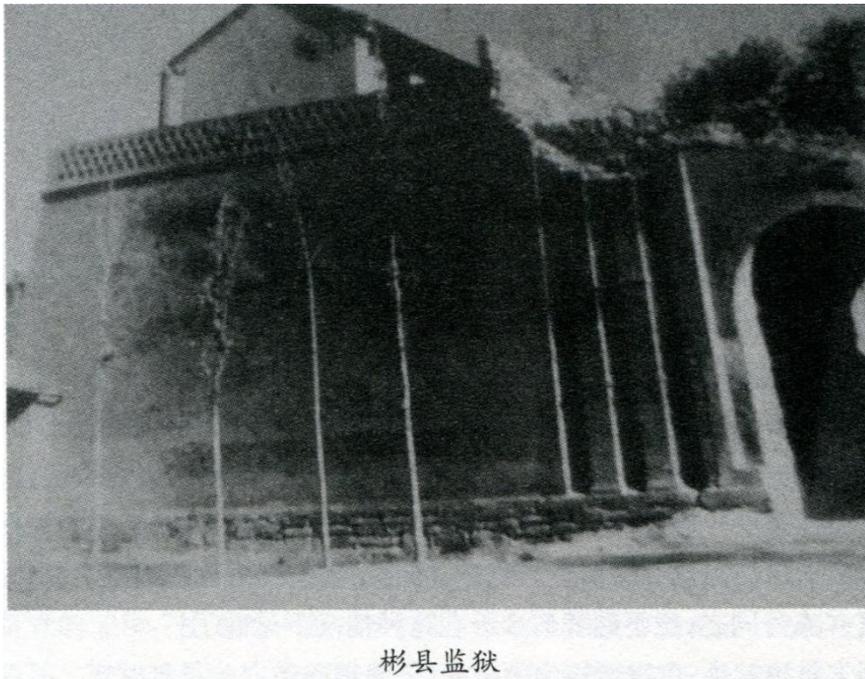
“是谁派你来的？”

“刘天民和杨怀英。我现在司令部当参议。”白冠五说完，看看外边没有人，急忙问道：“这是出了什么事？快告诉我，我好想办法救你出去！”

刘志丹对白冠五说：“事情回头你就会知道。”

刘志丹给白冠五的指示有三：一是立即转告马锡五、刘景范、刘约三等稳定补充团的情绪，防止发生动乱；二是要做好第十七路军总部的工作，对死去的劣绅刘日新，要辩明其死亡与共产党无关；三是事不宜迟，千万不能让国民党省党部插手。

第二天，白冠五到娘娘庙找到马锡五、刘景范、刘约三等，转告了刘志丹的指示，便开始研究营救的办法。大家认为：苏雨生的态度一时难以捉摸，但副旅长谷莲舫是个性情温和、处事稳妥的人，且同情革命，请他在苏雨生面前替刘志丹说隋最为合适；在第十七路军总部拟请杜斌丞先生出面帮助周旋；对第十七路军总部应诡称刘志丹病重，要求保外就医，使得刘志丹尽早获释脱离险境。



彬县监狱

这时，甘肃军阀陈畦璋的副官李勤甫到天津为陈畦璋的军队购买武器返回，路过彬县。苏雨生听说李勤甫是刘志丹的同乡，又见他带了大批武

器，怀疑与刘志丹的队伍有关，立即下令将李勤甫扣押起来，并与刘志丹关押到同一间牢房里。李勤甫虽与刘志丹并不相识，但对刘志丹的威名早已耳闻，两人在牢房中谈得十分投机，并很快成为朋友。李勤甫在牢房关了不长时间，经谷莲舫周旋获释。

当时，除副旅长谷莲舫给苏雨生陈说利害、替刘志丹说情外，苏雨生部下仍保存有一大批共产党员，这些党员分头活动，给苏雨生施加压力，抱怨苏雨生不讲旧情，背信弃义，不该把刘志丹抓起来，强烈要求释放刘志丹，或缓押刘志丹到西安。此时，西安国民党省党部连续两次急令，要苏雨生就地地处决刘志丹。

苏雨生旅的政治参谋叫酒玉五，是国民党省党部安插在苏部的特务，专门搜集共产党的情报，他像催命的小鬼，以省党部的名义给苏雨生施压，要苏雨生立即执行省党部的电令。苏雨生放也不敢，送也不能，杀也不忍心，心里确实左右为难。

在牢房里，刘志丹脚戴 12 斤重的大脚镣，生死泰然，毫无惧色。高岗、马锡五、刘景范、刘约三等先后到狱中探望刘志丹，准备武力劫狱救出刘志丹。刘志丹顾全大局，坚决反对，认为这种武力劫狱不但很难成功，同志们要付出极大的牺牲，而且会堵塞了其他营救渠道。一次，有一个共产党员来牢房探望，刘志丹对他说：“你告诉高岗，我遭毒手，要死就死，绝不连累任何同志，叫他自己小心。”

## **杜斌丞施救**

正在刘志丹生死攸关之际，杜斌丞奉杨虎城之命，到彬县来视察工作。这时，杜斌丞是第十七路军总部的高级参议员，也是深得杨虎城信任的一位心腹知己。

杜斌丞此行名为视察工作，其实是受中共陕西省委及南汉宸等的重托，前来营救刘志丹。杜斌丞一到彬县，就立即命令苏雨生释放刘志丹。

杜斌丞了解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后，当即致电杨虎城第十七路军总部：这次事件乃职田镇军民失和，乡绅刘某从中周旋无效，故而气急交加，致旧病复发，不幸身亡，并无共产党之情由。刘营长丧父，理应同情，但讼

词失真，宜实事求是，善加安抚。望顾全大局，息事为上。

苏雨生见机顺水推舟，以刘志丹身患重病和由谷莲舫具结作保、保外就医为幌子，将关押 20 余天的刘志丹释放。刘志丹出狱后，在一个小店里和高岗住在一起。

杜斌丞专门来到小店看望自己的学生，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应站在前线上，不要站在后线上，要站在长线上，不要站在短线上(后线、短线指国民党)。”

在离开彬县时，杜斌丞又给刘志丹赠送手枪一支，留下银洋 50 块，鼓励他努力创业。高岗也向刘志丹等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的最新指示：要谢子长、刘志丹在甘肃地区很快策动甘军五个旅的起义；由刘志丹和高岗到平凉，与甘肃警备司令陈畦璋谈判，在宁县收编李培霄近千人的饥民武装，首先改编一个旅暂归陈畦璋部，待后拉出，打起红旗。

1931 年 6 月，刘志丹获释后，在实难与苏雨生再联合的情况下，决定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到甘肃陇东陈畦璋部开展兵运活动。苏雨生带着埋怨对刘志丹说：“你还搞共产党，把我也牵连进去了。”

刘志丹满怀信心地说：“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要实行耕者有其田，我就是实行他老先生的这一条。我要走了，请多关照补充团的兄弟。”

这时，陈畦璋的副官李勤甫正要离开彬县，杜斌丞派秘书姬伯雄将刘志丹、高岗安排到李勤甫拉运武器的车上，一起朝平凉方向开去。临行，苏雨生部的共产党员纷纷前来相送。白冠五一直把刘志丹送到大佛寺，临别赠诗一首：

未曾识面早心知，  
难忘彬州罹难时。  
灵犀虽通咫尺远，  
囹圄抚肩恨见迟。

刘志丹回赠诗一首：

丹心绵绵欲诉君，  
五中耿耿千秋铭。  
西出阳关击螃蟹，  
旭日东升遍地红。

## 第三十六章

### 合水脱险

#### 收编李培霄

陈畦璋，又名庆瑞，甘肃庆阳县人，生于1901年。幼年因家道衰落而辍学，当过店员，先后在陇东驻军统领谢有胜的手下当兵，在黄得贵部任副官，后因部队被西北国民军打败回到庆阳城。1926年，陕军姜宏谟部兵临庆阳城，庆阳民团司令谭世麟率民团军弃城逃避。陈畦璋聚集酒朋赌友将城门关闭，并用土炮向城外轰击。姜宏谟疑有伏兵，率部撤离，全城免遭洗劫。谭世麟回城后恼羞成怒，决心除掉陈畦璋。陈畦璋闻讯逃走，到油坊里做工。后得油坊主的资助返庆阳，约赵文华等数十人在华池的南梁揭竿举事，号称“甘肃义军混成团”，赵文华任团长。1928年初，打起反对西北国民军的旗帜，并以“求食活命”为口号，抗官府、劫富豪、济饥贫，队伍猛增至过万人，逐步发展成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地方武装。

1929年7月，义军混成团攻打合水县城，赵文华中弹毙命。陈畦璋被推为首领，攻克县城后将所部改编为甘肃义军混成旅，自任旅长，下辖四个团及两个直属连。

1930年3月，冯玉祥将陈畦璋部收编为国民军第四路暂编第一旅，陈畦璋任旅长，移驻西峰镇。5月，进军平凉。入城后陈畦璋借故杀了陇东行政长官兼绥靖司令杨承基，收编了杨部的所有武装，部队扩编为师，总兵力达3万余人，掌握了陇东地区。6月，蒋、冯、阎中原大战局势渐显分晓，陈畦璋趁势反戈，与甘军各地方势力结成“甘肃联军”，通电反冯，打出“陇

东联军司令”的旗帜，与西北国民军形成军事对立。12月，中原大战结束，陈珪璋部被改编为

陆军新编第十三师，陈畦璋为师长，授中将军衔。此时，主政陕西的杨虎城以潼关行营名义，委任陈畦璋为甘肃第一路警备司令。陈畦璋同时接受蒋介石、杨虎城两方的委任，亦与刘志丹建立了联系。

陈畦璋的总部设在平凉县城。他虽统治了陇东14个县的地盘，但处境很艰难，四处都有他的敌手，与他争着地盘，时有战事发生。如镇远县的毕梅轩旅、固原县的杨万清旅、靖宇县的张应坤旅、三边张鸿儒和张廷芝的父子兵、宁县李培霄1000多人的饥民武装及彬县的苏雨生旅，这几路势力都想争占陇东，使他处处防备不及。陈畦璋想利用刘志丹的人气，为的是扩充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地盘。而刘志丹也想利用陈畦璋的名义，为的是有个合法身份，便于秘密拉起一支革命武装。

刘志丹和高岗一到甘肃平凉县，先找到陈畦璋部下警备团长刘保堂。刘保堂，陕西保安县人，人矮脸黑，为人老实忠厚，一身侠气，是个十分重情感的人，与刘志丹是旧交。刘保堂早年在保安县拉起一股队伍，后被陈畦璋收编。

刘保堂听说刘志丹要投陈畦璋，当即陪同刘志丹去见陈畦璋。陈畦璋欣喜万分：“刘志丹，就是刘景桂，是咱这地面上一个大人物呀！”

在刘保堂、李勤甫的极力保荐之下，陈畦璋委任刘志丹为新编第十一旅旅长，陈鸿宾任参谋长，并把刘保堂的警备团拨到第十一旅，归刘志丹指挥，派往宁县早胜镇驻防。

新编第十一旅除了刘保堂的警备团外，是个空架子，部队里没有多少人。

刘志丹为扩充队伍，派人从上畛子、职田镇、合水等地把散去的人员召集回来，并派王世泰亲自到彬县，让魏佑民、刘约三把被苏雨生编为运输队的原补充团全部人员拉到早胜镇。

在彬县被苏雨生编为运输队的刘志丹旧部，在诸多共产党员的秘密策划下，几天内几乎全部离开。刘志丹一见到运输队的共产党员们，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们正在利用陈畦璋给的十一旅番号‘招兵买马’，你们回来

太好了，部队正缺乏党员骨干啊！”

陈畦璋为把刘志丹笼络成自己的心腹，提出要结成拜把子弟兄。刘志丹同意了，但提出还有几个朋友(共产党员)也可以参加，陈满口答应。刘志丹把刘约三、马云泽等人都叫来，一起举行了结拜仪式。不久，马锡五、刘景范、王世泰、白冠五、张秀山、曹化民、傅剑寒、朱侠夫、杨植本、杨彦麟、魏长顺等一批共产党员相继来到早胜镇，部队很快发展到300多人。

不久，陈鸿宾有新的任务，被中共陕北特委调回陕北，由朱力凯继任参谋长，曹化民任书记官，张秀山任手枪队队长。高岗仍是中共陕西省委交通员，在第十一旅没有实际职务。后高岗离开宁县早胜镇，前往陕北三边开展兵运活动，在安边被捕，幸得在保安县民团任团总的党组织负责人曹力如交涉，高岗始取保获释，化装成脚夫返回西安。

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收编宁县李培霄的队伍时颇费了一番周折。刘志丹先派出同宗贵、杨志贤到李培霄部，做收编工作。李培霄认为满足不了自己的条件，拒绝接受收编。由于收编未成功，李培霄还借故打死杨志贤，一时成为僵局。

小石崖、关家洞一带颇有声望的哥老会“龙头大爷”罗礼臣、前清进士萧翰林与李培霄关系甚密。刘志丹写信给罗、萧二人，请他俩出面劝说李培霄接受收编。不久，罗礼臣说服了李培霄，并由罗礼臣亲自带着李培霄的全部人马到早胜镇，接受了刘志丹的收编。李培霄的队伍被改编为第十一旅第一团，李培霄被任命为第十一旅副旅长兼第一团团长。

宁县早胜镇第十一旅的防地和庆阳县西峰镇第五旅的防地相邻。第五旅旅长刘庆祥、副旅长蒋云台都是陈畦璋眼里的红人。为协商两旅的联防事宜，刘志丹派白冠五到西峰镇，面见第五旅副旅长蒋云台。蒋云台一见到白冠五，当面说得好听，说自己曾是西安中山军校的学生，中山军校的教员中多系刘志丹的黄埔同学，表示对两个旅所辖地区的联防之事一定合作。

白冠五从西峰镇回到早胜镇，将与第五旅的联防商谈情况向刘志丹作了汇报。大家认为，第五旅为扩充自己的势力，原来也想收编李培霄的队

伍，结果被刘志丹抢先收编走了，蒋云台虽表面不露声色，装出一副亲热的样子，但心存忌恨，很有吃掉第十一旅的野心。刘志丹提醒大家，对第五旅的一举一动都要注意，有所防备。

不几天，刘志丹要去平凉，向陈畦璋汇报收编李培霄部队的有关情况。临行再三告诫李培霄要谨慎设防，小心第五旅有所动作。李培霄虽嘴上上一一应诺，但心里不以为然，仍然麻痹大意，这就给了第五旅可乘之机。

一天夜里，风啸云黑。蒋云台乘李培霄警戒懈怠，果真带领第五旅从西峰镇前来偷袭早胜镇。由于第十一旅没有任何防范，李培霄在睡梦中被激烈的枪声惊醒，才仓促应战，结果部队不堪一击，损失惨重。李培霄看着残局不可收拾，自觉无颜面见刘志丹，便带着本部残兵逃回东山，又当他的“山大王”去了。

第五旅的这次袭击，不但使刘志丹对李培霄队伍的收编告以失败，而且使第十一旅受到重挫，兵力锐减。

## 高广仁哗变

1931年7月间，驻定边县第八十六师任和亭团在高广仁、马宗祥等的煽动下全团哗变，背叛了陕北军阀井岳秀，把队伍拉到了甘肃环县境内的古萧关，变成一股到处烧杀掠抢的土匪。

任和亭团在定边县驻守时，杜嗣尧正在定边县以城关小学校长的身份作掩护，通过社会关系使中共陕北特委派出的李景波等共产党员打入该团开展兵运活动。当时，因部队突然哗变，李景波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只得脱离这支队伍。

陈畦璋闻得任和亭团哗变后，从定边进入陇东地区，即派出李勤甫为总代表，协助刘志丹的第十一旅前去收编。刘志丹派白冠五为第十一旅的代表，与李勤甫同往环县执行收编任务。

谈判时，曾是神府骑兵旅旅长高志清义子的高广仁提出条件：必须要自成体系，把哗变队伍单独编为一个旅。李勤甫不敢擅自做主，遂电告平凉请示，陈畦璋慨然照准，将高广仁、马宗祥所带不足1000人、马不过100匹、长短枪500余支的哗变队伍编为第十三旅，委任高广仁为旅长，开赴

宁县早胜镇整训。陈硅璋委派刘志丹、刘保堂、李勤甫为总部代表负责整编事宜，由白冠五回平凉县为高广仁第十三旅领取军需。

高广仁、马宗祥带着改编后的第十三旅，从环县古萧关开驻到宁县早胜镇，第十一旅换防他处。不久，驻在彬县的苏雨生警备骑兵旅背叛了杨虎城，欲回宁夏，向北开来。早胜镇是苏雨生北上的必经之地。陈硅璋得此消息后，立即派刘志丹、刘保堂带着第十一旅前往早胜镇，协助高广仁第十三旅阻击苏雨生北上。

刘志丹、刘保堂一到早胜镇，高广仁便假惺惺地派人到第十一旅，说一定要设宴招待。在早胜镇有人传出消息，说高广仁有叛变行迹，刘志丹要刘保堂严加防范，刘保堂认为这是谣传不可信。结果在席间高广仁突然将刘志丹、刘保堂扣押，缴了第十一旅的枪，并对外宣称这是第十三旅和苏雨生的联合行动。

高广仁第十三旅在早胜镇背叛陈硅璋后，挟持刘志丹、刘保堂和第十一旅，带着叛军朝合水县方向开去。沿途经盘克塬，打开安吉堡，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行至西华池一带，匪兵抢掳许多青年妇女，绑上骡马驮走，妻呼夫唤，儿哭女啼，惨不忍睹。

陈硅璋闻报，气急败坏，速派蒋云台率兵截击。由于误传，陈硅璋认为高广仁的叛变是刘志丹策划，刘志丹的第十一旅也叛变了，即把在平凉给高广仁部队领取军需的白冠五扣押囚禁在泾川。

高广仁部行至合水县城东时，遭到合水县城陈硅璋驻军的阻击，蒋云台带领第五旅也随之赶到。高广仁的第十三旅被前后围堵截击，溃败不堪。高广仁只带着残部逃窜到宁夏，后被马鸿宾部歼灭。

高广仁第十三旅在早胜镇哗变后，由高广仁派出一个姓马的团长监押着第十一旅，把官兵的子弹搜个精光，只让扛着空膛的枪支。在合水县城东，高广仁的叛军与蒋云台的第五旅一交火，刘保堂为向蒋云台证明第十一旅未和高广仁一起哗变的事实，就对走在第十一旅最前面的特务二团喊：“特务二团枪放下！”

尽管如此，蒋云台仍视第十一旅为叛军，虽把枪支继续留给第十一旅，但又将枪支上的枪栓全部卸掉。刘志丹、刘保堂和第十一旅再次变成了蒋

云台第五旅的俘虏。

当天晚上，第五旅进驻合水县城内，刘志丹所带的第十一旅却驻在城外东关的骡马店。刘保堂进城去见蒋云台，向蒋云台陈述了早胜镇事变的经过。蒋云台曾参加过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叛变，他以早胜镇失守是刘志丹第十一旅没有守住等为借口要抓刘志丹。蒋云台部还有一个连长是甘军营长黄二子的儿子，说过去刘志丹在太白镇杀了他父亲，也声称要替父报仇。

### 刘志丹只身脱险

夜里，暴风雨骤起。刘保堂得到蒋云台要对刘志丹下手的消息，不敢在城里逗留片刻，随即冒着风雨跑出城外到东关骡马店给刘志丹报信。刘保堂到第十一旅的旅部，将情况告诉刘志丹，并催他迅速离开部队，否则难以脱身。张秀山、刘景范等一听刘志丹又有险情，都要求保护刘志丹一起离开部队。

由于情况紧急，刘志丹当即对第十一旅里共产党的骨干分子作了安排，让王世泰、曹化民、刘景范及彬县运输队来的一批共产党员跟着刘保堂部回平凉；张秀山、魏佑民负责陈畦璋部党组织的工作，并要张秀山、魏佑民等在陈畦璋的军队里积极创造条件，伺机发动起义，拉出一支武装队伍来。刘志丹把打入第十一旅的所有共产党员留下后，向刘保堂提出的条件是：当需要这些人的时候要拉得出去。刘保堂诚恳地表示：对留下的全部共产党员，保证不残杀、不虐待。

刘志丹把一切安排停当，只带着一个副官王璧成(因王璧成是哥老会成员，在这一带又熟悉，可以得到哥老会的保护)，冒着大雨离开东关的骡马店。刘志丹刚离开旅部，蒋云台派出抓捕刘志丹的百余骑兵队就赶到东关，很快把第十一旅驻地包围，没有找到刘志丹，即又尾追而来。刘志丹与王璧成钻沟绕梢，朝蒿渠堡奔来。

这时，贾生财利用社会关系，已在合水县民团当了团总，民团驻在蒿渠堡。刘志丹刚到贾生财的民团，蒋云台的骑兵队就已赶到，将贾生财的民团驻地包围起来，并冲入驻地，房里房外地大搜查。由于贾生财把刘志

丹藏了起来，蒋云台的骑兵队找不到。贾生财好烟好酒应酬一番，才将他们打发走。

蒋云台的骑兵队刚撤离蒿渠堡，马锡五因担心刘志丹在路上再遇到麻烦，也从合水县城东关离开第十一旅，赶到贾生财处。贾生财怕刘志丹住在蒿渠堡不安全，让马锡五把刘志丹接出，护送到贾家沟赵二娃的队伍里。

途中路经姚家园子，刘志丹和马锡五走进一户姓姚的人家里。姚家正请来一个纸工扎糊金斗、银斗之类的祭品，刘志丹随手替纸工画了几幅琴棋书画、梅兰竹菊，那个纸工和姚姓一家人赞不绝口，说刘志丹是“贵人遇难”，并备饭留宿。

次日，刘志丹和马锡五从姚家园子动身，来到贾家沟赵二娃的队伍。此时，赵二娃在这一带又拉起几十个人和几十支枪的一支武装。刘志丹在贾家沟住几天后，把马锡五留在贾家沟帮助赵二娃继续组织扩大队伍，他去保安联系和了解刘兆庆、曹力如、王子宜等在保安永宁山的活动情况。当刘志丹赶到保安县，不料保安县的中共组织刚遭到国民党的严重破坏，党的工作陷入瘫痪状态。随行的两个人心灰意冷，表示不愿再干，告别刘志丹而去。

保安县党组织这次遭到破坏，发生在刘志丹打人陈畦璋部期间。当时党组织的负责人曹力如、王子宜等积极筹购武器，准备拉起一支游击武装，派刘兆庆、胡立人到山西，买到一挺冲锋式机枪，装入牛皮筏子里运过黄河，藏到米脂县的王守义家中；后王守义给王子宜写信联系转送枪支事宜时，在邮递中信件被榆林缉私机关查扣；陕北军阀井岳秀立即密令保安、米脂等县抓捕“涉嫌军火”人犯审讯，严刑拷打。亏得党组织事先获得情报，及时通知大家，串好了口供。尽管用尽酷刑，被抓捕的涉案人员都守口如瓶，供词一致，井岳秀无奈判以“危害民国嫌疑罪”，将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刘景山、刘兆庆等关入榆林监狱。

此时，在保安县境内，杨培盛已搞到了几支枪，拉起不足 10 人的队伍。刘志丹与随后从赵二娃处赶来的马锡五商量后，决定以杨培盛的这支队伍为基础，重新创建一支游击武装。经刘志丹一番活动，队伍很快就发展到 60 多人。到今年秋天，这一支游击武装在陕甘边一带已小有声威。

张廷芝得知刘志丹又拉起一支队伍，活动在陕甘边交界一带，便贼心不死，再生恶念，企图以收编为名把这支队伍吃掉。一天，刘志丹和马锡五到榆树沟村，正好碰上给刘志丹送家信的记脸子。

刘志丹拆开信一看，是父亲劝他回家，要他向张廷芝妥协云云，心里明白是父亲被张廷芝胁迫而说的违心话。刘志丹随手把信撕掉，对送信的记脸子怒斥道：“我能在他张廷芝的下巴底下去捉狗蝇吗？！”

距榆树沟村一二十里处，就是高玉亭队伍驻守的旦八寨。刘志丹为避开记脸子的盯梢，以防他告密，当晚与马锡五离开榆树沟村，悄悄转移到别处住宿。

不久，中共陕西省委作出《接受中央来信与陕西党目前中心政治任务及中心工作决议案》。该决议中再次强调：“组织革命兵变与农民斗争相结合，以开展革命的游击战争。……加强士兵工作，党必须加紧发动士兵群众的辅助组织(如弟兄团)，组织革命士兵委员会，积极准备和组织革命兵变，对于自发的兵变更要一刻不放松地去领导，以开展游击战争。”

刘志丹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认真总结过去几年来多次兵运工作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在陕甘边地区以桥山山脉子午岭山区为中心建立革命武装。

在甘肃南梁堡、林锦庙的子午山区一带，当时聚集着一大批荷枪实弹的绿林武装。这些人当中，有少数为浪荡江湖、落草为寇、打家劫舍的土匪，但更多的是不堪忍受反动当局迫害和地主劣绅剥削的贫苦农民。刘志丹从陕甘边地区的实际出发，先后将贾生财的民团和赵二娃、胡立亭、杨培盛、唐青山的几支队伍聚集起来，在山区占据一定的地盘，为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创造了条件。

1931年9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倒水湾整编上述队伍，正式组建起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公开打出红旗。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为军需，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赵二娃，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队长杨培盛，副大队长白冠五；第三大队队长贾生财。部队很快发展到300多人，并在南梁堡开始创建根据地，作为立足之地。中共党史把这次南梁游击队的组建称为“倒水湾整编”。

南梁游击队成立后，刘志丹坚持以南梁为中心，依托桥山山脉开展游击活动。刚组建的游击队士气旺盛，首战二将川就旗开得胜，全歼张廷芝的一个骑兵连，缴枪 30 余支、战马 40 余匹。接着，又击溃合水县民团的进攻，一时南梁游击队声威大震，队伍很快由 300 余人发展到 400 余人。

JIXIYOUJIDUI  
JIHONGERSHISIJUN

第六部 ★

## 第三十七章

# 传达中央纠“左”指示

### 小兵朱敏与军长高桂滋

清涧起义失败后，杨重远受中共陕北特委的派遣，于1928年夏东渡黄河，通过关系打入驻河北遵化县的高桂滋第四十七军开展兵运活动。这时，魏野畴等在杨虎城第十军、高桂滋第四十七军中领导发动的阜阳起义失败，部队刚从安徽皖北迁驻遵化整训结束。

杨重远在高桂滋部的公开身份是刘杰三师的副官长，后又为高桂滋部军需官。他一到高桂滋部，就在部队秘密建立了中共军委，自己任军委书记，朱侠夫、黄子文为委员。部队的中共军委隶属中共顺直省委直接领导。这时，活动在高桂滋部的共产党员还有朱敏、陈以平、井树声、马汝骥、吴岱峰、杨觉天等。

杨重远到高桂滋部不到一年时间，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并在一些营、连建立了中共支部组织。当时，高桂滋部为培养一批军事干部充实部队，在遵化县开办了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中共北方局和中共顺直省委决定借这个机会派出共产党员打入高桂滋部队，先后派来杜学波、胡廷俊、符又坚、曹鸿兆、田有莘、史俊才、白树梅、刘应元、刘绳武等人。另外，还派来一批进步学生，如温思学、拓振兴、陈应元、蒲正平、刘昌汉、王培富、刘玉朴、陶振亚等五六十人。这些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成为这支部队中的革命骨干。

遵化县城坐落在长城以南的河北平原上。第四十七军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的校长由军长高桂滋兼任，校内设监督一人，名叫高书宸。高书宸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又是高桂滋的红人，教育学生用的全是法西斯的一套，轻则训斥辱骂，重则拳打脚踢，体罚禁闭。广大学员备受欺凌，人人痛恨他。部队中共军委决定利用形势组织学员通过斗争将这个法西斯分子从学校赶走。

军委为避免暴露部队共产党的组织，决定让年龄最小而机灵的学员朱敏充任学校学员代表，面见军长高桂滋，揭发高书宸的问题。



朱 敏

朱敏，陕西榆林县镇川堡人，1928年在米脂三民中学上学期间加入共产党。同年9月因米脂县“中秋节事件”中共组织遭到破坏，未及毕业离家出走，怀着一腔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奔走千里，投到高桂滋部当了兵。部队军委派出一个小兵向一个带领千军万马的大军长请愿，朱敏的心中还是有些虚怯，唯恐自己不能完成任务，但有党组织做后盾，有军事政治干部学校200多名学员撑腰，他勇敢地走进军司令部。

高桂滋见进来一个娃娃兵，竟大胆自称是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的学员代表，根本没看人眼，拍着桌子吼道：“你能当什么代表？叫你们管用的来见我！”

朱敏大声申辩说：“我叫朱国藩，是200多名弟兄推荐的代表！”

高桂滋见这个娃娃兵毫无怯意、有胆有识，又满口的陕北口音，颇感兴趣地问道：“你多大了？”

“报告校长，16岁。”“不小哇，你想家吗？”

“革命军人，四海为家。”

“人不大，口气倒不小。家是哪里的？”

“陕西榆林镇川堡。”

“哦，像个陕北汉子，”高桂滋更感亲近地说，“你知道老子是哪里人？”

“陕西定边。”

“不错，都是老乡，你们给惹什么事啦？”

朱敏像背书本一样一口气流利地将高书宸在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如何虐待学员、如何横行无忌、如何贪污的行径给高桂滋汇报了个一清二楚。他请求说：“报告校长，高监督不是人，欺负我们。您不能眼看着别人欺负陕北老乡嘛！我们知道校长一向爱兵如子，绝不会不处理高监督这种人，要不真还会冷了下边弟兄们的心！”

没几天，高书宸卷起铺盖离开了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不久，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改编为教导营。营长仍由军长兼任，副营长叫易子奇，教育主任叫何天凤。这两个人都是国家主义派的骨干分子。教导营分学员、学生两个队，学员队为军官队，轮流培训的是军内现任军官，学生队是招收来的学生。学生队的队长是阎揆要、杨耀。

在教导营，由阎揆要、杨耀、杜理臣三个共产党员同中共北方局派来的学生与学员建立了党支部。营内党支部书记由部队中共军委委员朱侠夫、陈以平先后兼任。

教导营的副营长易子奇作风粗暴，经常打骂学员，克扣学员的伙食费，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在过农历大年的这一天，全营官兵以为新春佳节能吃到一顿好饭菜，不料仍是平日的粗米淡饭。有两名学生说了几句怨言，被易子奇听到，走进食堂劈手夺去那两名学生的饭碗，摔到地下，并用皮带在他们身上乱抽打。学员和学生们实在看不过眼，纷纷上前解劝。易子奇竟斥为是“聚众闹事，图谋不轨”，无故体罚全营学员、学生跪在大雪纷飞、寒风凛冽的雪地里，并声言：“风雪不要钱，叫龟孙子们吃饱喝足，好好过个年！”

在风雪交加的雪地里，全营官兵冻饿难忍，有一个士兵手脚冻僵、昏倒在地。众学员和学生见状十分愤怒。这时，只见朱敏从雪地跳起身来，怒吼一声：“走！告狗日的去！”教导营的学员、学生共 200 多官兵，顿时像狂潮一样向军司令部涌去。

军司令部立即出动警卫营，全副武装，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教导营

的学员、学生围堵在军司令部的大门口，齐声高喊：

“我们要见军长！”

“严惩打人凶手！”

“查办喝兵血的易子奇！”

军司令部的一个副官走出大门，一见大门外教导营的学员、学生群情激愤，怒气冲天，像爆发的火山一样，慌忙跑回报告军长高桂滋。高桂滋闻报大为震怒，命请愿的学员和学生派出代表来见。副官把教导营推选出的代表带进军司令部，高桂滋抬头一看，又是那个小兵老乡朱敏。朱敏历数易子奇等在教导营欺压学员、贪污受贿、克扣军饷、无视军规的罪行后，高桂滋答应立即查明事实，严惩不贷。

教导营学员和学生请愿后没几天，高桂滋就将副营长易子奇停职查办。朱敏小小年纪两次勇闯军司令部请愿，面见军长高桂滋，撵走高书宸、易子奇，一时在第四十七军传为佳话。

在教导营的两次斗争中，许多进步学生受到了考验和锻炼，表现最好的，学员队有蒲子华等 10 余人，学生队有蒲正平、温思学、拓振兴等 10 余人。这些表现好的学员和学生均被发展为共产党员，壮大了教导营中共共产党的力量。

## 杨重远赴天津

1928 年 4 月，高桂滋的主力部队刘杰三(又名刘天禄)第一。九师已进入山东，与方振武部会合，参加了著名的济南抗日突围战。

1929 年初，蒋介石为排除异己，以裁军为名，将高桂滋第四十七军缩编为第一三三旅，下辖三个团，王守义为一团团长，刘杰三为二团团长，高建白为三团团长。1930 年 1 月，蒋介石将高桂滋第一三三旅扩编为第十九师，下辖三个旅六个团，归属陈调元指挥，调山东驻防。教导营学生结业后，学员全部分配到基层营、连当见习排长，其中的共产党员成了各连队的革命骨干。当时，高桂滋部所辖的六个团，除遵化驻守两个团外，鲁东南就驻守四个团。在临沂、沂水两县驻守的第一团中，中共组织负责人是刘明德、陈以平；在诸城、日照两县驻守的第二团中，中共组织负责人

是田有莘、温思学；在峰县、枣庄两县驻守的第三团中，中共组织负责人是拓克宽、胡廷俊；在莒县、安丘两县驻守的第四团中，中共组织负责人是蒲子华、蒲正平。

在此期间，中共军委经常派马汝骥向中共北方局汇报高桂滋部第一、二、三、四团的情况，同时带回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和文件。在高桂滋部第三团驻守峰县、枣庄两县时，杨重远、拓克宽、胡廷俊、吴岱峰经常到地方学校，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从多方面积极积蓄革命力量，时刻准备武装起义，在鲁南建立革命根据地。杨重远曾先后派出拓克宽，两次请示中共北方局，要求在部队里举行武装起义，中共北方局认为条件尚未成熟，两次都没有批准。

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组织工农武装的精神，高桂滋部的中共军委十分重视抓武装斗争。作为军委书记的杨重远，利用出差到燕峰口、热河一带侦察地形，与地方党组织秘密取得联系，准备按照毛泽东、朱德等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在高桂滋部拉出一支共产党的队伍，搞武装割据。经过一番筹划，杨重远把军委拟出的计划派人送到中共北方局。中共北方局认为遵化县一带党的组织力量较差，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尚不成熟，指示要继续积蓄力量，创造条件，等待时机。

1928年11月，杨虎城携妻子从日本回国，先任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部队仍驻鲁东南。当时，刘黑七匪部驻莒县和大店，与顾震匪部互相策应，为地方一祸患。1929年2月下旬，杨虎城亲率全师人马击溃刘黑七匪部，之后立刻挥师诸城，彻底打垮顾震匪部。

中原大战结束后，杨虎城就任陕西省主席兼西安绥靖主任及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他一到陕西，即邀杜斌丞出任第十七路军高级参议。

在冯玉祥的部队从西安撤防交接之际，先后在西安被捕入狱的中共陕西省委党、团负责人潘自力、刘继曾、蒲克敏、徐梦周、吉国祯、贾拓夫等30余人乘隙砸毁镣铐越狱。

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开战中，由于高桂滋反蒋，高桂滋的部队被蒋介石的嫡系陈调元、马鸿逵的部队围困在莒县、诸城一带，长达半年多。当高桂滋从鲁东南突出围困后，由于损兵折将、损失惨重，所剩

部队不到 4000 人，被迫退到山西平定县一带，投靠了张学良，被改编为孙楚部正太护路军陆军第十一师，后又改编为第八十四师。

随高桂滋所部在鲁东南突围中，杨重远身负重伤，不能随部队一起撤到山西，只好留在当地农民家里养伤。待伤稍愈，即化装成商人，突破蒋介石军队设在沿途的层层封锁线，从山东辗转到天津，向中共北方局汇报高桂滋兵败山东及所部中共军委的工作情况。

此时，正值谢子长、刘志丹、高岗等在陕北和陕甘、陕宁交界一带举行的武装斗争此起彼伏。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畅，掌握情况不够准确，中共北方局对陕北的革命发展形势难以正确指示武装斗争方向，急需要派人到陕北视察。

中共北方局决定派出刚从苏联列宁格勒学习回国的孔祥祯(一说乔国祯)到陕北出任特委军委书记，指导陕北地区的武装斗争。同时，为指导和开展陕西省的武装斗争工作，中共北方局决定派出李杰夫去陕西，出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但因中共北方局交通员杨璞在陕北未归，一时还没选好交通员护送孔祥祯、李杰夫二人到陕西去。

杨重远来得太巧了，北方局认为他最合适，决定由他做交通员，负责把孔祥祯、李杰夫两人护送到陕北(一说是杨璞为交通员)。

杨重远、孔祥祯、李杰夫三人化装成商人，从天津出发，经河北、山西，一路艰难险阻虽遇到不少，但终于西渡黄河，安全到达陕北吴堡县的宋家川。一住到中共地下党员宋四瞎子开的骡马店里，大家才算放下了心。

宋四瞎子原名叫宋华居，他的骡马店是中共陕北特委设在吴堡县宋家川的秘密联络站。宋家川是陕北地区黄河沿岸最大的渡口，是陕晋两省的水路交通码头，从陕晋两省过往的共产党员经常到这个小店传送情报。

杨重远、孔祥祯、李杰夫三人在宋四瞎子的骡马店住宿一夜。次日，从吴堡出发，赶到绥德县时正值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县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

### **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

1930 年 10 月，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召开，地点在绥德县城附



赵伯平

近的黑龙古庙里。当时，白明善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奉命先赴天津、北平，后到中共河北省委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中共陕西省委派赵伯平为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刚到陕北赴任。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谢子长、刘志丹、马明方、李力果、刘耀三、冯文江、杨璞、苏士杰、刘澜涛、常黎夫、常立德、崔田夫、惠泽仁、张德生、张肇繁、崔玉瑚、霍维德、李文芳、唐洪澄等 20 多人。杨重远、李杰夫、孔祥祯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李杰夫宣读了从中共北方局带来的文件，传达了中共中央 6 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中共北方局关于发动陕北游击战争的任务。赵伯平宣读和传达了从西安带来的中共陕西省委关于陕西、陕北今后发展武装斗争的有关指示。

杨重远、李杰夫、孔祥祯从天津出发时，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月下旬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中共中央的工作开始转到正常轨道之上，但因他们一行离开天津时日已久，毫不知晓，仍按照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冒险计划，在会议上要求中共陕北特委成立陕北总行动委员会，由赵伯平任书记，孔祥祯任军委书记，谢子长、刘志丹分任行动委员会的正、副总指挥。

在这次会议上，参会同志主要围绕加强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在陕北和陕宁、陕甘、陕晋交界以及其他各省的军阀军队中，利用一切社会关系，采取秘密手段，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上层、中层、下层军队人物，迅速积蓄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实行起义，建立共产党独立的革命武装，并把这些革命武装汇集于陕北，



张德生

形成大的军事优势，力争首先夺得一个或几个县城，造成一定的军事割据局面，重打红旗，迎接又一个新的全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正当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会址被国民党绥德县党部的特务发现，绥德驻军朝着黑龙古庙的方向悄悄包抄而来。在庙外山头上放哨的警卫人员一发现，急忙跑到古庙报告。特委书记赵伯平等负责人面临危情，沉着稳定，机智应对，让参加会议的同志化装成当地农民迅速地分散转移，并约定了参会人员新的集中地点。

在转移中，刘澜涛、张德生到绥德县城躲藏，被大街上涌出的国民党特务人员认出，逮捕关入监狱。中共陕北特委的其他参会同志按照转移之前的约定，先后到义合镇集中，在霍维德家中继续开会。

会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因被暴露遭到破坏，由绥德迁往榆林，马明方、常学恭、毕维周等先后参加特委机关工作。刘澜涛、张德生被捕后，通过杜斌丞在西安周旋，托即赴绥德上任的县长高望之设法释放。

12月，中共北方局派特派员王芾南专程到陕北，向中共陕北特委传达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北方局指示，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同时宣布撤销陕北总行动委员会，恢复中共陕北特委原有职权。

不久，中共北方局通知：陕北特委直属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与中共陕西省委为平级关系，并要求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人赵伯平与王芾南、常黎夫到中共北方局直接汇报和讨论工作。

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虽然在陕北地区的影响不长，中共陕北特委并未实际付诸执行，但是仍使陕北各县党组织遭到一定的破坏，如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县的常设机关暴露，被迫转移至榆林；中共陕北特委各委员在国民党特务人员和军警的到处搜捕下，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各特委委员之间一时失去联系，一些农村党组织陷入瘫痪；中共绥德、清涧两县县委组织遭到破坏，暂时被迫停止活动；绥德四师被井岳秀第八十六师绥德驻军姜梅生派兵查封；在神府开展兵运活动的共产党员景仰山、李来宾、刘子安、苏子秀、孙计一、杨岐山等33人，由于暴露了身份，被井岳秀密令抓捕，而又因景仰山被捕后叛变，导致刘世英、苏建勋相继被捕，中共府谷县委遭到破坏。

## 第三十八章

### 东渡黄河

#### 战友情深

1930年10月，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结束后，杨重远受中共陕北总行动委员会（当时该委员会未撤销）的派遣，旋即到山西平定县高桂滋部开展兵运活动。杨重远离开绥德县行至吴堡县宋家川，住到宋四瞎子的骡马店里，无意中碰到几年不见的白锡龄。两人一见面格外亲切，有说不完的话题。

原来清涧起义部队从宜川县城突围、接受王保民部收编后，对部队是否举行二次起义，唐澍与李象九产生重大意见分歧，唐澍背着李象九将旅部甩到韩城西庄镇，带着部队北上。时随李象九旅部的白锡龄、阎红彦、呼延震西等人的心情均沉重不堪，只得与李象九一起东渡黄河，到了山西绛州县。在绛州县，李象九曾欲再拉起一支队伍，进入梢山深处打游击，怎奈他们在这里人地两生，既与党的组织联系不上，又没有群众基础，只好先在呼延震西家开着的杂货铺子里住了10余天，后不得不各自离开。

李象九因是清涧起义的领导者，陕西省各地国民党的官府正在到处通缉抓捕他，为避风险就到郑州一带去了。白锡龄、阎红彦辗转到永和县境。

白锡龄、阎红彦到了永和县城，一天，在街上与赶着两头骡子的雷恩钧、黄石山不期而遇。此时，白锡龄、阎红彦始得知清涧起义部队在西庄镇举行二次起义北上，唐澍带着部队盲目攻打宜川县城损失惨重，后兵败于甘肃豹子川。党组织并未因清涧起义的失败和军阀井岳秀的白色恐怖所

吓倒，新成立的中

共陕北特委像一杆不倒的大旗把人们消沉、悲观、涣散的心又重新凝聚起来。白锡龄、阎红彦在山西漂泊数月，终于又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雷恩钧、黄石山这次到山西永和县城，是受陕北特委的派遣带着特殊任务而来的。当时，特委刚成立不久，急需搞到一批枪支弹药，黄石山因是清涧人，家住东区黄河沿岸，与山西仅一河之隔，对河东的地理人缘关系都比较熟悉，与雷恩钧被派来购买武器。黄石山、雷恩钧赶着两头骡子，背上装的是两驮大烟土，正欲寻找军火交易的主儿。

这时，正值冯玉祥军队东出河南，与奉系军阀在中原混战，败落到地方的散兵游勇到处皆是。有不少人出于不同目的，想从这些散兵游勇手里搞些枪支。因这些人往往是没有诚信可言，充满着种种形式的欺诈和陷阱，最后有人是钱枪两空，甚至有人还丢了性命。雷恩钧、黄石山带着大烟土要与他们交易武器，正顾虑两个人势孤力单，这一下子有了白锡龄、阎红彦的相助，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四人先找了一家小店，把骡子背上两驮大烟土卸下安顿好，就让黄石山到外面通过社会关系打探“生意”去了。

没几天，黄石山跑回小店，说有几个从前线败逃下来的散兵带着几支枪，通过关系说好了双方交易的条件。这几个散兵都是些大烟鬼，听说有两骡驮子大烟土要换他们手里的枪支，早就大烟瘾发得直龇牙。生意做得十分顺利，没费多少讨价还价的嘴舌，用两骡驮子大烟土就交换到几个散兵的一挺机关枪、两支长枪，还有一支短枪。为了把交换到的枪支安全带回陕北，他们想了个好办法。在永和县城的街上买来两大包棉花，枪支裹到棉花中间，外边套上麻袋严严实实地扎住，往骡子背上一驮，化装成购棉花的小商贩，就平安无事地把枪支运回陕北，顺利交给中共陕北特委。

阎红彦、雷恩钧回到陕北，由中共陕北特委派到陕甘边一带开展兵运活动。此时，苏雨生平凉兵败后，谢子长、刘志丹已离开苏雨生部，投到甘军谭世麟部下招兵买马，阎红彦、雷恩钧被派往宜川县后九殿杨庚武的土匪部队。杨庚武与阎红彦、雷恩钧一起参加过清涧起义，后因起义失败，思想蜕化，不愿革命，变成独霸一方的地方土匪势力。阎、雷二人虽未能说服杨庚武归返革命，但成功地拉出杨庚武部周维琪的一连队伍，投到谢

子长、刘志丹在谭世麟部组建的陇东民团军第三骑兵团。

白锡龄、黄石山回到陕北，由中共陕北特委派到清涧、绥德、吴堡等县的黄河沿岸组建游击武装。白锡龄和黄石山扮成挑夫模样，一人拿着一根扁担，先到绥德县枣林坪镇。枣林坪镇上驻守着井岳秀的一连队伍，在进镇子的路口设着岗哨。当他们快进镇子时，在路口处正好有一个站岗士兵背着一支长枪，两眼睡意蒙眬地站在一棵大树下。黄石山手执扁担绕开大路，溜到那个士兵站着的大树背后。那个士兵听见背后有响动，正要转身时，黄石山两只大手已经死抓住士兵肩上背枪的挂带。黄石山长得高大魁伟，那个士兵要开枪来不及，要喊叫又不敢，要挣扎又不是对手，只好乖乖把枪交出来。

白锡龄、黄石山缴得一支长枪，已离开枣林坪镇很远了，才听到驻军派出的追兵响起一片枪声。自此，白锡龄、黄石山用夺到的一支长枪起家，先组建了几个人的游击小组，后发展成为十几人的一支游击武装。当时，由于这支游击队武器匮乏，没有枪支的人员除持长矛、大刀外，还有不少人干脆用扫炕的笤帚裹块红布，朝腰带上一插，冒充一把把短枪吓唬地主劣绅，活动在黄河沿岸一带。这支游击队因无番号，群众称之为黄河游击队，那些地主劣绅对这支游击队的活动恐惧一时，惊呼这支游击队是在黄河沿岸的一股“土匪”！

杨重远听了白锡龄在这些日子里风风火火的经历后，提议一起到山西平定县高桂滋部策动军队内的起义，拉出一支大的革命武装。白锡龄告诉杨重远，黄河岸边有一股土客队伍，虽然已经打进去了自己的人，但还没有拉到手里，仍需做大量工作，只要土客队伍策反顺利，就来山西平定县一起干事。

第二天，杨重远要从宋家川坐船东渡黄河到山西去了。渡船早等在河湾里，白锡龄一直把杨重远送到船上，站在河滩上仍不舍离开。杨重远关心地对白锡龄说：“锡龄，你的年龄可不小了，如有合适的人家，快点说上一门亲事，不要一直打光棍。”

白锡龄满不在乎地说：“现在还不是考虑个人事的时候，等到咱们把革命闹成功再说。”

艄公摇着橹杆，渡船在船工号子声中离开河滩。白锡龄凝望着远去的渡船，一直目送其靠上山西界的军渡码头，两眼噙满了泪水。

## 设立汾阳联络站

杨重远返到山西平定县高桂滋部，继续在这支部队里担任军需官之职。此时，由于部队从鲁东南突围出来，归编张学良部进入山西境内，中共北方局为了方便部队军委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转介高桂滋部中共军委直接受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

当时，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是刘天章。中共山西省委指示高桂滋部的中共军委：高桂滋部从鲁东南突围中，军委组织也遭受到一定的损失，应在原组织的基础上进行整顿。

刘天章，又名刘望，字云汉，陕西高陵县人，生于1897年。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1921年加入共产党。1924年大学毕业，先协助李大钊做党的工作，后到开封等地开展党的活动。1925年中共豫陕区委成立后任区委军事委员。1927年任陕西国民日报社社长、中共陕甘区委委员，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开封监狱。1929年获释后赴天津，在中共顺直省委负责宣传工作。1930年再次被捕，同年9月获释后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



刘天章

1930年冬，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决定利用蒋、冯、阎军阀混战刚结束的有利时机，在山西吕梁山区一带首先建立一支红军游击队。

这一计划确定后，中共山西省委即积极开始了部署和准备。为了隐蔽好筹划起义的组织人员，在太原城的大南门外开办了一个并州养蜂场作掩护，作为中共山西省委与高桂滋部军委之间的联络机关。

杨重远派陈以平拟订发展并州养蜂场的章程，利用合法地位向社会公开招股，并由共产党员带头出资认股。当时，中共组织并

没有什么活动经费，但为了很快把并州养蜂场的招牌挂起来，高桂滋部军委负责人均出资入股，由杨重远、陈以平、刘明德、井树声、吴岱峰、拓克宽、崔玉成、蒲正平、胡廷俊、田有莘等人筹到股金约计 1600 块银洋。

朱敏见许多共产党员争先恐后入股，为组建中共地下秘密联络机关集资，自己囊空如洗，实感脸上无光，决定回榆林县老家也筹些许资金。朱敏从山西赶到榆林县镇川堡老家，向家人提出借钱之事，不但遭到家中老小的一口拒绝，思想正统的祖父还视其为“赤匪”，叫来家族里的人将他吊起毒打一顿。后经族人朱维祯的劝说，祖父无奈之下，只好拿出 200 块大洋，让朱敏带走。

并州养蜂场正式开业后，中共山西省委派出朱敏、田有莘为并州养蜂场的负责人，主持秘密联络机关的联络工作。刘天章、马汝骥、任户明、黄子文、谷雄一、梁干臣等经常来到并州养蜂场，抓紧运筹高桂滋部的起义事宜和吕梁山区游击队的组建工作。

并州养蜂场成立不久，中共山西省委为了使高桂滋部起义后的队伍能顺利地撤到预定的吕梁山区一带，派出高桂滋部军委的负责人杨重远、拓克宽、李成兰、胡廷俊等人到汾阳县，又设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站，由杨重远担任联络站主任兼临时党支部书记。

这个联络站以开办骡马店作掩护，其任务主要是通过联络站向晋西吕梁山区先行秘密转移共产党员（当时，吕梁山区共产党的基层力量十分薄弱）以及准备好的枪支弹药、军用物资，以筹备起义队伍进入山区后的接应工作。

汾阳是太原到吕梁山区以至通往陕、甘、宁的必经之路，驻有冯玉祥的一个教导团和一个负责维持治安的团队。杨重远把秘密联络站设在东关商业区的万义客栈。栈房经理是李海山、阎万清，他们同情革命，先后协助游击队掩护从太原兵工厂和高桂滋部调来的骨干转到山区，共有 30 余人；通过联络站转运到山区的晋造三八式枪 6 支、湖北造枪 3 支、马步枪 5 支，还有拓克宽、李成兰、曹鸿兆等随身带来的盒子枪 9 支、勃朗宁手枪 2 支，共计长短枪 25 支。

中共山西省委将杨重远派往汾阳县后，杨重远经离石、柳林返回陕北，

向中共陕北特委汇报了中共山西省委准备在高桂滋部发动起义和在吕梁山区建立一支红军游击队的情况。中共陕北特委十分重视中共山西省委的这一重大行动计划，并决定积极给予配合和支持。

这时，张鸿儒、张廷芝父子诱阎红彦到安边城，缴了所部 30 余人马的枪，阎红彦只身脱险，回到中共陕北特委汇报兵败情况。特委认为阎红彦、白锡龄熟悉山西的地理环境，决定由他们二人带领黄河游击队转入吕梁山区，与杨重远共同配合中共山西省委的这次重大行动计划。

杨重远从陕北返到汾阳县，很快通过汾阳联络站联系离石、临汾、孝义、柳林、石楼、中阳等县中共组织，把选送来的 30 多名共产党员安全护送到吕梁山区，并将高桂滋部中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及抽出组建游击队的骨干通过这个联络站顺利转入吕梁山区。

## 接受新任务

白锡龄、黄石山准备在陕北黄河沿岸收编一股土客队伍，但没有成功。中共陕北特委决定留黄石山在清涧县东区继续开展地方武装斗争，派出白锡龄和阎红彦带着黄河游击队 10 余人赴山西吕梁山区接受新的任务。白锡龄、阎红彦受命带着游击队，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直奔汾阳联络站。

汾阳县距陕晋黄河交界有 300 多里的路程，游击队的战士因带着几支长枪不好隐蔽，白天不敢走大路，只好绕着梢山小道前行，而且 10 多人结队行走，又怕地方民团发现惹出事端，只能三两人结伴，化装成当地农民模样，饥一顿饱一餐地朝汾阳方向走去。本该是三四天的路程，他们却足足行走了 10 余天，才赶到了汾阳联络站。

白锡龄、阎红彦带着黄河游击队到了汾阳联络站，杨重远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杨重远正要护送白锡龄、阎红彦带着的游击队伍转入吕梁山区预定地点时，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听说中共陕北特委派来了游击队，援助山西省委在高桂滋部发动起义和在吕梁山区组建游击队，立即派人到汾阳联络站，说要面见中共陕北特委派出的游击队负责人。于是，杨重远便把白锡龄、阎红彦护送到太原，在并州养蜂场见到了刘天章。

刘天章一见到白锡龄、阎红彦，就紧紧握住两人的手，对他们的到来

表示热烈的欢迎。刘天章向他们分析了山西的形势，介绍了中共山西地下党的发展情况，并传达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在吕梁山区创建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

刘天章说：“吕梁山，冈峦起伏，地形险要，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在这里，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十分凶残。农民受尽欺压和剥削之苦，有着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就像一个炸药库一样，在等着我们去点燃。在那里，有一些往来于黄河两岸的武装土客，以保护走私大烟土为主要生路，反抗官府收税。这些人员大部分是生活无着、铤而走险的无业游民。省委决定，首先要把这些土客争取改造过来，作为我们在吕梁山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所以，我们的工作先要从这里开始人手。”

听了刘天章的介绍后，白锡龄、阎红彦对于争取改造武装土客觉得没有把握，说他们在陕北的黄河沿岸都曾和一些土客队伍有过往来，并打人过一股土客队伍，想拉出他们成为共产党的武装，但最终都化成了泡影。阎红彦担心地说：“这些土客队伍都是些唯利是图的地痞流氓、烟酒之徒，无法无天，走东抢西，恐怕咱们难以改造他们。”

刘天章满怀信心地说：“只要加强教育，这支力量是可以利用的。对其中不接受改造的可以清洗出去。”

在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直接派遣下，白锡龄、阎红彦和拓克宽等人首先打入吕梁山区的土客队伍，开始了艰难地争取、改造土客队伍的工作。

## 第三十九章

### 威震晋西

#### 在土客队伍

晋西的吕梁山区山高沟险，地陡坡立，丛山绵绵，林深梢密，人烟稀少。正因如此，这里成了晋西黄河沿岸一些土客队伍下山“掳粮”、进山“为王”的好去处。在吕梁山区，共有四股土客队伍，头目分别是师储杰、萧永胜、杨琪、贺兆瑞。其中，数师储杰的一股土客队伍人多势众，武器精良。在土客队伍里有一句“人多必有势，枪多必是王”的顺口溜，因此，师储杰也就顺理成章地当了几股土客队伍之首领。这四股土客队伍活动的范围主要在孝义、离石、忻县三地交界的温泉一带。

土客队伍里成分十分复杂，兵痞流氓甚多，也由于他们经常替那些陕晋黄河两岸的大烟土贩子当保镖过境，为防人劫货和贩烟养兵，每个人都染有抽大烟土的毛病，一天没有大烟抽几口，就个个大牙齧着合不拢，两眼涩得直淌泪，浑身上下发软提不起劲。

师储杰，陕西清涧县人，长期混迹江湖，南北闯荡，打家劫舍，挥金如土，可称是恶习满身的一个黑道人物。

杨琪，陕西延川县人，四股土客队伍里的二头领，为人刚强坚毅，富有正义感，敢于为穷苦人抱不平。他于1925年将近30岁时奔赴河南投在冯玉祥部第二军郑思诚团王子谋营当兵。同年秋，郑思诚为扩大自己的势力，派杨琪回陕北老家招兵买马。杨琪也想借此拉起一支队伍，杀富济贫，为民除害。于是，他联络了数十名陕北籍的士兵返回老家。在返回途中，

将搞到的 100 余支步枪装到几口棺材里，以送运死亡官兵为名，从河南经山西，进入陕北延川县的延水关。此时，他们的行踪被陕北军阀井岳秀得知，在拓家川附近设下埋伏，伏击中随从士兵多数牺牲，杨琪也负了重伤。不久，杨琪被井岳秀逮捕，后经亲友营救出狱。出狱后，杨琪到西安投国民军第三军杨虎城部下，当了数月排长，再次返回陕北，利用关系又搞到一些枪支，拉起一支 20 多人的土客武装队伍，潜入晋西的吕梁山区。



杨 琪

白锡龄、阎红彦、拓克宽按照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的指示，进入吕梁山区。要想把这里的四股土客队伍全部收编过来，确实还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他们经过一番讨论分析后，决定先行打入四股土客队伍之首师储杰的山头，只要把师储杰说服，其他三股土客队伍也就容易对付了。白锡龄、阎红彦、拓克宽到了师储杰盘踞的山头，先未暴露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师储杰十分豪爽地留下他们，并让三人分别在他的土客队伍里担任了班长。

日子一长，白锡龄、阎红彦、拓克宽便给师储杰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革命势力有多大，谢子长、刘志丹在陕北闹革命如何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并劝导他放弃这种“占山为王”、与大烟土有关的养兵方式，拉出土客队伍跟共产党干事业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师储杰是个精明人，虽然嘴上表示赞同革命，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与他们存在原则上的分歧。

贺兆瑞与师储杰是拜把子弟兄，流氓成性，无恶不作。在西宋庄看见农民侯三的妻子侯仙儿长得俊俏，就强暴霸占了。侯三发现后，要跟贺兆瑞评个理，贺兆瑞不仅把侯仙儿抢到他的山头上，还把侯三毒打得几天躺在炕上下不了地。当地群众十分愤慨，但都敢怒而不敢言。

白锡龄、阎红彦、拓克宽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派人抓回贺兆瑞，并在

师储杰的土客队伍里召集共产党员开会讨论，研究如何处理。这些党员中大多是通过汾阳联络站选送、打入到师储杰土客队伍里的，也有少数是在这支土客队伍里发展起来的新党员，大家一致主张对贺兆瑞从严惩处，以挽回土客队伍在当地的声誉。



拓克宽

师储杰心里实在是不愿意从严惩处贺兆瑞，但看见参会的人意见占着上风，心里想保下贺兆瑞的一条命，嘴里又说不出话来，只好硬着头皮，装成大义灭亲的英雄汉子，表示同意大家的意见。

第二天，师储杰把自己的土客队伍和杨琪、萧永胜、贺兆瑞的土客队伍全部开到西宋庄，并召集四邻乡村群众前来参加，召开了审判贺兆瑞的群众大会。在大会上，由阎红彦宣布了贺兆瑞的罪状，最后当场就地枪决。

贺兆瑞被处决后，在各股土客队伍中引起极大的震动，有的暗暗流泪表示

对贺兆瑞的同情，有的惶惑不安地担心自己身上有不少浪荡作风，怕也会被共产党的人盯上。师储杰郁郁寡欢，甚感共产党不给他面子，让几股土客队伍对他产生非议。枪决贺兆瑞后，又发生了一件事。一天，白锡龄、阎红彦、拓克宽等人为了给中共山西省委筹措高桂滋部起义中所需的资款，抓了两个大土豪，让其家人赎人，筹到一大笔银洋。在筹来的银洋应如何处理的问题上，拓克宽和中共山西省委派来的同志与师储杰有意见分歧，双方争执不下。拓克宽等要求把筹到的银洋全部交给中共山西省委，师储杰坚决要把这笔银洋留到土客队伍里使用，拓克宽与师储杰各不相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拓克宽在一气之下，未考虑会引发的后果，半夜时分擅自放走了由他负责看押的两个土豪。接着，带上筹到的银洋，拉走了他带着的一班土客人马，离开了师储杰的山头。

在贺兆瑞被枪决后，师储杰对共产党的不满情绪早就想借机发泄，当拓克宽一夜之间把一个班人马拉得无影无踪时，师储杰对白锡龄、阎红彦也产生了极大的疑忌，担心他俩也会像拓克宽一样，把自己多年拉起的土客队伍全部带跑。于是，师储杰也一不做，二不休，命令手下强行收缴了白锡龄、阎红彦的枪，并责令二人立即离开他的山头。

白锡龄、阎红彦从容镇定，据理力争，与师储杰进行辩论后，虽然把枪争回到手里，但由于师储杰对共产党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最终，白锡龄、阎红彦没能把师储杰等四股土客队伍拉到共产党的队伍里。

## 晋西游击队成立

白锡龄、阎红彦被迫离开吕梁山区的土客队伍后，经汾阳联络站到太原，向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汇报了这次争取改造土客队伍失败的情况。中共山西省委经研究，决定采取其他积极措施，重新部署打入吕梁山区的革命力量，从太原兵工厂抽调出马佩勋、尹子安等十多个工人党员，派出吴岱峰、胡廷俊到离石、吴城一带，找回拓克宽所带的一班土客队伍，组织到一起，迅速转到吕梁山区。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工作，一支红军游击队在吕梁山区诞生了。

1931年4月下旬，在孝义、中阳、汾阳三县交界处的孝义县大麦郊娄底村，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正式成立。会场四周贴满了“打倒蒋介石，打倒阎锡山”等标语，一座土台子上高插着一面缀有镰刀斧头的红旗。游击队的战士个个脖子上系着红领带，精神焕发地排成长队，大步走进会场。

大会由拓克宽主持，他庄严地高声宣布了晋西游击队正式成立，公布了经中共山西省委批准的游击队领导人名单：由拓克宽任大队长，黄子文任政委，阎红彦、吴岱峰任副大队长。游击队下设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由阎红彦兼任，第二中队队长白锡龄。同时宣布杨重远为中共山西省委军委代表兼游击队党支部书记。杨重远在会上带领游击队战士宣誓：

吕梁山上红旗飘，

红军诞生在今朝。  
马恩列斯为导师，  
共产主义是目标。  
队前宣誓决心表，  
革命到底不动摇。

最后，阎红彦讲了话。他介绍了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扩大以及红军反“围剿”所取得的胜利，讲解了成立工农武装的重要意义及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特别讲解了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在井冈山制定的游击战十六字诀。



黄子文

在晋西游击队正式成立的这一天，师储杰、萧永胜、杨琪亦应邀带着土客队伍前来庆贺。师储杰、萧永胜、杨琪看到 200 多名游击战士如此的精神面貌，再回头看看自己的土客队伍，一张张脸蜡黄，一个个张嘴发着大烟瘾，自感自己的土客队伍远比不得共产党的游击队。他们担心共产党的游击队会吃掉自己，决定带着土客队伍离开吕梁山区，把这块多年经营、盘踞的老巢让给游击队。

在师储杰、萧永胜、杨琪将要离开吕梁山区时，晋西游击队对这几支土客队伍的争取改造并没放弃，为把这股武装拉到共产党的一边，杨重远、拓克宽、黄子文、阎红彦、吴岱峰、白锡龄等游击队负责人专门设了几桌酒宴，为他们送行。

杨重远对师储杰、萧永胜、杨琪恳切地表示道：“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劳苦大众的队伍。你们离开这里后，如在其他地方混不下去，我们晋西游击队双手欢迎你们前来合作。”

师储杰、萧永胜、杨琪带着土客队伍撤离出吕梁山区后，这里的地盘

完全被控制在了晋西游击队的手里。中共山西省委为了巩固这块山西境内唯一的革命根据地，加强游击队的战斗力，又从高桂滋部派出共产党员周维仁、曹鸿兆、陈玉清、符又坚、史俊才、李生茂，还有并州养蜂场的田有莘和部分革命青年计 20 余人，参加到游击队中。

与此同时，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亲自部署，留在高桂滋部的共产党员紧锣密鼓地准备择机举行起义，并派出中共山西省委特派员李志敏到高桂滋部，协同高桂滋部军委负责人蒲子华、赵树生、史仙洲、刘子祥等人实施起义的具体工作。为保证发动起义时能拉出更多的队伍，中共山西省委还确定谷雄一到第一团组织指导工作(不久又返回中共山西省委)，牛清明、吴耀礼分别到第二、三团组织指导工作。

## 攻打留誉镇

晋西游击队刚成立不久，在孝义、中阳、汾阳几县抓紧发展中共地方党组织，建立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地方党组织和农会帮助游击队代购粮食，搜集敌人情报，组织发展妇女会、儿童团、青年团等，发动群众抗粮、抗税、抗款，斗争地主恶霸，没收他们的财产。尤其是农会，成为配合红军开展革命斗争的一个有力组织。

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多次从各地向吕梁山游击区派来许多参加游击队的人员。游击队为保证这些参加游击队人员的安全，经常在离石县、王营庄、白马仙洞沟到柳树湾一带活动，进行接应。

西宋庄是靠近吕梁山山顶的一个大村庄，地势险要，人口较多。晋西游击队首先把根据地建立在这里，由农会帮助，开办了一所列宁小学，儿童一律免费入学，由队委党永亮负责主办，有文化的游击队员轮流讲课，教唱《国际歌》。同时，游击队还办了一个农民夜校，吸收附近农会干部和贫苦农民参加学习，由游击队员们分担课程，讲地主豪绅如何剥削压迫穷人、穷人为什么穷，讲怎么组织和团结起来闹革命的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发动他们组织起来同国民党政府作斗争，为成立农村苏维埃政权培养了骨干。这一带很快开展了打土豪、斗地主、分牛羊、分浮财的斗争，劳苦群众笑逐颜开，青年农民积极参军。

此时，在北方的吕梁山区正是春耕和农忙的时候。游击队指战员一有闲时，就到贫苦农户家帮着干活，送肥、翻地、整田，还给无劳力的穷人家砍柴挑水等，和群众在劳动中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附近驻守的晋军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群众很快就向游击队报告。游击队除了打仗、宣传组织群众、帮助老乡干活之外，还经常抓紧时间搞各种军事训练，如爬山、瞄准、射击、劈刺、投弹，传达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讲利用地形地物和各种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使游击队的战斗力得到进一步提高。游击队由党永亮、蒲正平等专门负责刷写革命标语。标语的主要内容有：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苏维埃政府、建立农村政权、没收地主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等。

当时，在中阳县留誉镇驻守着晋军一个 20 余人的巡击队，有步枪 10 多支，是晋军在吕梁山的一个防御据点，距游击队驻地有 80 多里。队委会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决定拔掉这个据点。这是游击队首次与晋军的实战交锋，大家心里都没数。

一个深夜，游击队从驻地悄悄出发，一路疾步行进，次日拂晓到达留誉镇。趁着天未大亮，由拓克宽指挥，把部队分成两路，一路由阎红彦带着一个中队主攻留誉镇，一路由白锡龄带着一个中队负责中阳县城的警戒，以迎击增援的晋军。阎红彦带着的中队还没靠近镇子，就被镇子里驻军的哨兵发现，鸣枪报警。镇子里的驻军听到枪声，立即全部龟缩在碉堡里。

拓克宽急于打好这一仗，下令对碉堡发起猛攻。田有莘、阎茂林冲锋在前，两人都负了伤。拓克宽发了怒，命令游击队的全部火力集中向碉堡射击。躲在碉堡里的晋军不知红军势力的虚实，一时惊慌失措，立即从碉堡后面的通道偷偷逃跑了。游击队冲入碉堡后，只缴获晋军在慌乱逃跑时丢下的一支步枪。

战后，游击队分析了这次出师不利的的原因，主要是战前对敌情了解不详，情报不实，战斗时又因地形不熟，轻易出击，以致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指战员都认为应吸取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

## 永安起义

晋西游击队刚成立不久，杨重远、拓克宽等为了迅速扩大游击队的力量，瓦解周边晋军，决定先跟汾阳联络站取得联系，争取晋军驻守中阳县永安镇的一个排举行起义。

永安镇晋军的这个排约40人，装备精良，但由于上司长期拖欠军饷，引起士兵极大的不满情绪。因此，党组织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后，条件逐渐成熟，士兵情绪激愤，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汾阳联络站不失时机，要求游击队很快派人到永安镇，以争取这个排起义。

1931年4月下旬的一天，晋西游击队派出白锡龄、阎红彦、胡廷俊三人前往永安镇。他们化装成商人模样，各带短枪一支，潜入永安镇。到了镇上，他们在同情革命的白文轩、景芝贵开办的一个卖肉的小店住下，然后与晋军中的共产党员牟排长和班长冯金福接上头，一起秘密制定了起义的具体方案。

在白锡龄、阎红彦、胡廷俊的指导下，在一个大雾茫茫的夜晚，牟排长、冯金福以打野味为名，成功地将这个排完整地拉出永安镇，发动了武装起义。当起义队伍向西开到王家池时，永安镇的晋军才发现，连忙派出一个连的队伍尾追而来。晋军一连队伍赶到王家池，立即与起义队伍交上火，枪炮声顿时响成一片。起义队伍以一个排对付晋军一个连的兵力，力量悬殊，处于危险的境地。

在这紧急关头，起义队伍里的一些士兵见追来的晋军队伍人多势众，有些动摇，一个士兵突然把枪口对准阎红彦，大声质问：“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阎红彦对着这个士兵的枪口，面无惧色，从容镇定地说：“大敌当前，你用枪打死我也没用，我们还是先打仗，过后给你详说情况。”

这时，牟排长、冯金福急忙跑过来，与阎红彦一起向这个士兵晓以大义，讲了一番革命道理，这个士兵终于掉转枪口，跟大家一起投入战斗中。

晋军一个连在王家池渐渐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起义队伍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为了使刚刚起义的队伍能安全转移出去，白锡龄不顾个人安危，决定带领少数起义队伍设伏阻击晋军，让阎红彦、胡廷俊等带着大部起义队

伍先行撤出王家池。

阎红彦、胡廷俊带着起义队伍撤出后，晋军已包围了白锡龄所带领的少数担任掩护的起义队伍。当晋军一进入村口的伏击圈时，白锡龄一声喊“打”，担任掩护的起义队伍一齐举枪，朝着晋军一阵子猛打猛击。白锡龄弹无虚发，一连撂倒几个扑在前头的晋军。

这时，晋军虽然很多，但因天色已经黑了下來，且又突遭伏击，不敢轻易冲到跟前，白锡龄乘着晋军犹疑不定之隙，带着队伍冲出王家池。晋军不敢继续追击，只好退回永安镇。

这次战斗中，白锡龄仅用所带的十几个人就把晋军一连队伍吓唬住，在吕梁山区传为佳话。

在白锡龄带着队伍追赶上起义队伍时，已是临近天亮。白锡龄、阎红彦、胡廷俊将起义部队带到预定的地点，与晋西游击队胜利会合，并将这次起义的一个排改编为晋西游击队第三中队，由牟排长和冯金福分别担任正副队长。

## 楚家塬战斗

1931年5月初，晋西游击队惩处了平遥县果子沟的郝守富、孝义县碾头村的武世恭、离石县王营庄的白寡妇、中阳县上桥镇的杜寿海等土豪劣绅、恶霸地主，被群众称为“天兵天将”。

中阳县上桥镇的杜寿海，家有两架大山的土地，年雇长短工二三十人，剥削农民十分凶残，周围几十里地的群众都对他切齿痛恨。游击队帮助农会发动群众除掉了这个地主，没收了他的粮食和财物，分给群众。在孝义县，根据当地群众的要求，在农会的帮助下，阎红彦带领四个游击队员，乔装打扮成商人，深入驻有晋军的介休县张兰镇，智擒了一个大恶霸。

接着，又对平遥县果子沟的地主兼资本家郝守富进行了打击。郝守富在平遥县有山庄多处，每年到处收租，时常骑着大马，群众称“大马收租”。在抓这个土豪时，有一个自小给郝守富放羊的雇工郝金标，自告奋勇给游击队带路。惩处郝守富后，郝金标坚决要求参加了游击队。在郝金标的影响下，先后有张应棋、戴丙章、马三保等20多名贫苦农民参加了游击队。

郝守富被游击队惩处的消息一传开，孝义碾头村的群众也纷纷要求游击队来抓横行乡里的大恶霸地主武世恭。武世恭依仗儿子武孟幽当山西省议员的权势，在碾头村鱼肉乡民，作恶多端，罪大恶极。武世恭听说游击队要抓他，慌忙逃到太原。不几天，武世恭刚潜回碾头村，当地群众就报告给了游击队。

马佩勋带着游击队员从家里抓住武世恭，没收了他家里的财产，分给了贫苦农民，组织群众烧毁了他剥削穷人的账簿，由农会除掉了这个恶霸。接着，游击队又惩处了离石县王营庄的白寡妇。

此后，游击队开到孝义、中阳两县交界的楚家壩休息。

楚家壩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山高林密，地形险要。这时，约有一个营的晋军向村子里开来。双方开始都没有发觉，待晋军开到了村口，游击队担任警戒的哨兵杜星桓才被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惊动。他抬头一看，晋军队伍距自己只剩十几步远了。他一边急忙举枪报警，一边拔腿跑回村里报告。

晋军队伍猛听一声枪响，才发现村子里有游击队，于是，连忙抢占了村外的一座山头。晋军占领了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后，向村子里一阵猛烈地射击。但因一时摸不清村里究竟有多少游击队，只是盲目举枪扫射，不敢贸然冲进村里去。

游击队知道有了敌情，杨重远临危不惧，立即命令阎红彦带着第一中队，白锡龄带着第二中队，分别迅速抢占村子西边和北边两座晋军还没有来得及占领的山头。阎红彦带着第一中队立即构筑掩体，与晋军火力对阵。

白锡龄带着第二中队抢占北山头后，挑选了曹鸿兆等几个枪法好的战士，组成一支突击队，由白锡龄亲自带领，从北山绕到晋军所占的山头侧翼。此时，在晋军占领的山头下，正好有晋军一股骑兵团。白锡龄命令战士们猛向山下的晋军开火。

白锡龄是出了名的神枪手，他看见晋军队伍里有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人，像是一个军官，即举枪瞄准。只听一声枪响，骑在马上的人从马背滚下。那个人果真是晋军队伍的军官，骑兵团顿时乱作一团。占领村外山头的晋军见山下的骑兵团突然不战即乱，误认为被游击队包围，一时也乱了

方寸，纷纷从山上阵地撤下去。

阎红彦在李象九营当兵时，曾当过司号兵。他机智地从身边司号员的手中夺过军号，乘机吹起冲锋号。号声一响，枪声四起，西北两个山头上的游击队战士像猛虎一样直冲山下。

正在这时，突降大雨，风吼雷鸣。晋军不知游击队的虚实，不敢恋战，丢盔弃甲，仓皇溃逃。这次战斗是晋西游击队成立后第一次与晋军大交锋，首战告捷，缴获了不少枪支，还有几匹战马，使游击队的装备得到了补充。

### 奇袭灵城岭哨所



胡廷俊

楚家塢战斗后，晋西游击队又决定采取奔袭作战的战术，出其不意地消灭小股晋军，武装自己。经派出人员侦察后，目标选择在离石县灵城岭的一个晋军团的哨所。采取这种远距离的奇袭战术，必须速战速决，人数不宜过多，否则就会暴露行迹，难得成功。于是，经过游击队的领导筹划，决定派出拓克宽、胡廷俊、董金芝、李成兰四人，组织一个精干的游击小组，打扮成商人模样，跋山涉水，行程百余里，赶往灵城岭。

到了灵城岭的晋军哨所，拓克宽、胡廷俊、董金芝、李成兰四人身穿长袍，头戴礼帽，大摇大摆朝着晋军哨所走去。晋军哨所的哨兵看见他们的这身打扮，以为真是商人，毫无戒心。

拓克宽走近哨兵跟前，突然从长袍下掏出一支手枪，枪口顶到哨兵的胸前命令道：“不准出声！”哨兵吓得魂飞魄散，乖乖缴了枪。四人乘机直向晋军哨所的窑洞奔去。

窑洞里的士兵听到外边有响动，有两个士兵要去取挂在墙上的枪。这时，胡廷俊、李成兰已冲到门前，一脚把门踢开，手举枪响，“叭、叭”两声，那两个士兵就顺墙躺倒在地上不动了。

窑洞里其余的几个士兵见去取枪的那两个士兵倒地，自己又赤手空拳没有武器，自知反抗也没用，只得乖乖举手做了俘虏。

## 交山伏击战

1931年盛夏的一天，石楼县水头镇党组织派人给晋西游击队送来紧急情报，说驻水头镇晋军有一个连的队伍，准备向游击队的驻地开来，企图偷袭。得到这一情报后，游击队根据晋军的行动路线，决定在晋军必经的险要地方设伏，痛歼来敌。

为了打好这场伏击歼灭战，游击队先派出白锡龄带着几个战士化装成农民，潜入水头镇摸清了晋军的行动路线，并在水头镇西边的交山处选择了设伏的地点。交山这一带，山岭险峻，林高草密，游击队悄悄在这里设下伏兵，不露蛛丝马迹，等待着晋军队伍的出现。



李成兰

天刚蒙蒙亮，水头镇晋军一个连出发了。晋军一出水头镇，就摇摇摆摆拉开队列，朝着交山方向走来。当晋军刚走进交山下的一条狭长的石沟地带，埋伏在石沟两侧的游击队员一齐向晋军开了火。

晋军做梦也没想到游击队竟然会出现在交山，枪声响起时，因无任何防备，顿时乱成一团。晋军连长准备撤军窜回水头镇，但早被阎红彦带着的第一中队截断退路。连长见退路被堵，急忙命令队伍拼命地向近处一个小山头冲去，以控制有利地形企图顽抗。

没等晋军爬上小山头，白锡龄带着的第二中队已经直冲到山前。由于游击队占领着有利地形，在战士们的勇敢冲杀下，晋军一连队伍死的死、伤的伤，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士兵们纷纷举枪投降。晋军连长只带着几个残兵夺路而逃，狼狈跑回水头镇。

这次交山伏击战斗中，游击队大获全胜，俘虏晋军50余人，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

交山战斗结束后，晋西游击队的战士斗志高涨，继续乘胜追击，接着又一举攻占了水头镇。四乡群众高兴得杀猪宰羊，送茶送饭，热烈庆祝游击队取得的胜利。

当天，游击队在水头镇召开了群众大会，拓克宽在会上讲了话，阎红彦向被俘的晋军士兵宣布了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愿参加红军者表示欢迎，愿回家者发给路费。俘虏们感动地说：长官给了我们活命，我们再也不当兵打红军了。

晋西游击队在成立后的短短几个月中，连连打了胜仗，使得吕梁山区数县的晋军大为震惊，原分散在一些村镇驻守的小股晋军闻风丧胆，都纷纷退进县城和大的据点里，不敢轻举妄动。至此，晋西游击队威震整个晋西。

## 第四十章

# 红二十四军

### 平定起义

193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在吕梁山区建立晋西游击队后，就立即把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到高桂滋部。这时，驻守山西平定县高桂滋部的中共军委除把一部分共产党员抽调到吕梁山区，成为晋西游击队的主要领导和部队骨干，开展游击战争外，留在军队的另一部分党员还有60余人。

高桂滋部驻守山西平定县后，因不属晋军，更非中央军，在山西处于客军地位，军需供应受到刁难，士兵连饭都吃不饱，军心不稳。中共山西省委认为时机成熟，决定在高桂滋部举行起义。

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亲自起草拟订起义战斗部署、起义文告等，计划将高桂滋部的三个团拉出去，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简称红二十四军），在五台山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与吕梁山晋西游击队的革命根据地形成南北犄角之势。

这一重大的起义计划，中共山西省委经报中共北方局同意后，刘天章



谷雄一

即派朱敏赶到平定县向高桂滋部中共军委传达，并派谷雄一再赴平定县领导这次起义。谷雄一到平定后，多次与高桂滋部中共军委负责人万锡福、蒲子华、窦时寻商讨起义的具体部署。



万锡福(赫光)

谷雄一从太原动身前，先把打人商震部军官教导团的共产党员吴耀礼、牛清明二人从太原调出，分别派往高桂滋部的第二、三团，掌握这两个团的全盘起义工作；又派马芳廷到一团，组织实施起义计划。为了便于联系和组织起义，谷雄一决定把牛清明调到第三团三营副营长蒲子华的身边当护兵。临行时，还让省委委员娄凝先专为起义军的军旗书写了大字，由娄凝先的妻子杜涤生(杜聿明的妹妹)刺绣制作了两面起义军的军旗，一面司令部用，一面政治部用。

这时，因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导致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国统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平定起义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忽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张学良从上海一个叛徒口中得知一批共产党员名单，其中有个叫刘玉珊的就在高桂滋部队任排长。张学良立即电告高桂滋把这个排长抓起来。这一事件的发生，引起士兵情绪极度紧张，原来准备参加起义的少数军官和士兵，为免遭不幸，有的借故离队，有的结伙潜逃，起义面临夭折的危险。

在危急关头，高桂滋部的中共组织速派担任副营长的共产党员刘明德，星夜赶往太原请示中共山西省委。省委对此非常重视，省委书记刘天章决定提前举行起义。谷雄一、杨大华匆匆从太原乘火车，与刘明德赶往平定。

1931年7月3日下午，谷雄一、杨大华装扮成国民党军官，与刘明德携带起义旗帜、印章及各种印刷品，从太原坐火车到达阳泉火车站。万锡福派出数十名士兵骑马整队，前往车站迎接。

当天晚上，谷雄一、万锡福召集高桂滋部军委各党支部负责人和骨干

分子在城东一个旧窑洞里召开紧急会议，传达省委指示，决定利用高桂滋及所部团长去北平为高桂滋之父庆寿的机会行动。起义的时间定在7月4日。这天是星期天，军官们都要回家，正是起义的大好时机。

7月4日，谷雄一、万锡福、蒲子华、牛清明等召开党员骨干会议，商定了起义的具体计划，定在当天午夜12时打响起义的枪声。由万锡福宣布了行动方案，决定届时先放火烧仓库，以火为起义信号（一说拍枪托三下，以“立”为号；一



蒲子华

说是以鸣枪为号)，要求参加起义的士兵必须一律系红领带，表明为革命敢于牺牲（指战员称其为“牺牲带”），趁高桂滋全军大乱之机，进驻平定县城的第一团起义部队立即抢占城内的司令部，第二、三团起义部队距平定县城较远，担任攻占阳泉火车站和破坏兵营的任务；高部秘书处机要室译电员陈子毅负责破坏敌人的通讯联络。第一团抢攻司令部时，首先要击毙高桂滋的亲信及袁营长，若万一遭到敌人的包围时，可通过城墙东南角的暗道向城外撤退，速至平定城东关友爱医院门前与参加起义的第二、三团集中，把三个团的几个连队全部拉出去。

不料，就在行动前的几个小时，司令部手枪连一个班长（共产党员）在城中“兴盛魁”饭店喝酒，醉酒之后竟然将起义计划泄露，被高桂滋的表弟贺纪善得知，报告了临时负责师部工作的第一团二营营长刘孔章。刘孔章立即派勤务兵传八连连长王子固、七连连长窦时寻到司令部去“开会”，以探听虚实。

王子固、窦时寻都是共产党员，又是第一团起义的主要骨干。一听司令部要召他俩去开会，感觉情况不妙，就将传令的勤务兵扣下。但是，这时的刘孔章已经加强了戒备，控制了县城的交通要道。万锡福、谷雄一得知王子固、窦时寻扣留司令部勤务兵，在来不及通知第二、三团参加起义

部队的情况下，果断决定提前半小时举行起义。

晚 10 时许，天空电闪雷鸣，突降暴雨。第一团起义士兵全副武装，打响了起义的枪声，全团七个连共 1200 余人，集合到二营驻地平定县城的城隍庙。

队伍集合完毕后，谷雄一在暴雨中正式宣布脱离高桂滋的部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工农革命武装。万锡福一声令下，指挥第一团二营攻占了团部，将高桂滋的表弟贺纪善击毙。营长刘孔章听到枪声后，急忙从后门逃跑。

接着，起义部队攻打高桂滋的司令部。司令部驻上城，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且高部早有准备，起义部队唯恐附近孙楚和李生达的军队赶来增援，战斗约半小时，在四处张贴标语口号后，第一团的起义部队即撤离平定，经河下、白羊墅，越过正太线，沿五渡、杨树沟、三都向盂县挺进。

参加起义的第三团驻守在距平定县城二里之外。晚 10 时许，蒲子华、牛清明在三营，正准备到时指挥三团部队起义，忽听得在暴风雨中响起隐约的枪声，两人怕一团情况有变，决定亲自去一团驻地侦察。当到一团驻地时，只见营房空空，到处乱七八糟，估计一团情况有变，一定是已经提前起义了。这时，他俩想再返回三团驻地吧参加起义的部队拉出来，已经是不可能了，便只得放弃拉出三团起义部队的原定计划，决定去追赶谷雄一、窦时寻、万锡福的起义部队。

蒲子华迅速从一团的马棚里牵出两匹战马，一口气追到盂县清城村外，始赶上谷雄一、窦时寻、万锡福的起义部队。这次起义中，因二团失去联系，未能拉出一人一枪。

蒲子华、牛清明赶上起义部队时，谷雄一、窦时寻、万锡福在盂县清城村已将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谷雄一正式宣布红二十四军成立，由万锡福任军长，谷雄一任政委，刘明德任副军长，窦时寻任参谋长，刘子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纵队。谷雄一、万锡福一见到三团的蒲、牛二人随后赶来，即告知了一团提前举事的原委。

中共山西省委原确定高桂滋部一、二、三团起义后，由蒲子华担任起义部队参谋长，但因蒲子华未能一同起义，且在整编时又未到来，起义部

队已另选定窦时寻为参谋长。于是，谷雄一就让蒲子华到战斗力较强但指挥力量较弱的第二纵队担任参谋长。

起义部队整编后，因孟县地处正太铁路中间，东接石家庄，西距太原较近，交通方便，高桂滋的军队会很快追到。故根据当时的形势，红二十四军决定向冀晋之间的太行山转移。部队经过五台县柏兰镇迁回到孟县上社镇，歼灭了国民党的一支武装警察队，缴获了一大批枪械。

7月28日，红二十四军经太行山进入河北省境内，一举攻占了阜平县城，在阜平县建立了河北省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 阜平诈降

1931年7月，红二十四军占领阜平城之时，正值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平定红二十四军起义和阜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震惊了国民党朝野。高桂滋向全国发出通电称：为“剿灭”占据在阜平城的红军，“誓愿追随党国，捐躯至死，沥血披阵，伏惟昭鉴”。

天津《益世报》惊呼：“太行山脉，蜿蜒千里，北可横截平绥一线，南可出折断平汉要冲……假使有共军千人，则不久就能满万。俟其羽翼养成，……较之江西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这时，人称脑后长反骨的石友三因出兵反奉，遭到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南北夹击全军覆灭，只身逃往山东德州，托庇于韩复榘麾下。沈克带领一个军的残部龟缩在河北曲阳一带，眼看大势已去，为保存实力，想投靠张学良。张学良只允沈克军缩编为陆军新编第一师，并为考验他的忠诚，以“拿下阜平，消灭红二十四军”作为接纳条件。

走投无路的沈克为了取得张学良的信任，满口答应。沈克借石友三战败、部队寻找新的出路为名，给阜平县城的红二十四军送信，诡称要求收编，请红二十四军领导人到阜平县城外的五块镇接应。

接到沈克送来的信件，红二十四军领导多数认为石友三反张失败，沈克部已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之境，前来投靠红军是自然的事。蒲子华、牛清明等少数人认为沈克用的是假投降的欺骗手段，意在吃掉红军。

谷雄一不听蒲子华、牛清明等人的意见，坚持己见，决定到阜平县城

外的五块镇接受“请降”。

8月9日，红二十四军再经一番争论，决定留军长万锡福、副军长刘明德、政治部主任刘子祥、蒲子华在城内负责防守，由政委谷雄一、参谋长窦时寻领着刘应融、李英兰一行五人，并带上猪、羊、牛肉和白面等慰问品，前往城外五块镇接受“请降”。

这时，在五块镇的沈克部第二十六旅旅长赵海清和第二十七旅旅长赵渤已设好埋伏，焦急地等待着红二十四军出城。当谷雄一、窦时寻等一走进五块镇，赵海清、赵渤带着脖子上围着绿毛巾号称“绿军”的部队将他们全部抓捕，次日，将五人押往北平，向张学良请赏。一到北平，张学良把窦时寻送到军人反省院，在西直门外护城河边将谷雄一杀害。不几天，窦时寻也被杀害。

沈克的诈降阴谋得逞后，急派赵海清旅开到距阜平县城五里地的法华村，派人进城诡称：“奉谷政委命令，前来接受改编。”并声称现部队给养困难，人心涣散，要求军长万锡福立即到法华村接见部队，以稳定人心。

谷雄一、窦时寻等人在五块镇落入敌手的信息被封锁，阜平城红二十四军主要领导人毫无察觉。军长万锡福、副军长刘明德、政治部主任刘子祥又相信了沈克再次设出的骗局。第二天一早，万锡福、刘明德、刘子祥骑马出发，兴冲冲地带着七名随行人员和慰问品到法华村。赵海清早已在法华村的大路口等候。

法华村距县城不远，一眼就能望见阜平城墙上插着的一杆杆红旗，正在微风中飘荡。赵海清把受降大会会场设在法华村街内的一棵大槐树下。8时左右，赵海清请万锡福给他写下几个大字标语后，即陪同万锡福、刘明德、刘子祥到达会场。万锡福一到大槐树下，扫视会场，只见山坡上、屋顶上、村口、路口都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把守着，这才发觉中了圈套，此时已无法脱身。万锡福沉着地走到台阶上，向伪装受降的士兵们讲话。他说：“你们到此起义，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今后共同对付敌人，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并说：“弟兄们很困难，今天我给大家发饷。”这时，赵海清按照预定的信号几次捋胡子抹嘴，暗示部下的士兵动手。万锡福早就看穿了他的诡计，在讲话中严厉地提出了警告。赵海清急

了，一声吼叫，命令特务连动手。会场上立时枪声四起。

赵海清像条恶狗似的扑上前去，拦腰抱住了万锡福。万锡福拔出手枪击伤了赵海清的大腿，挣脱后连越几道矮墙突围，遭到阻击，在一个碾子边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刘子祥等六名随行人员也壮烈牺牲，只有刘明德和一名战士侥幸跑了出来。万锡福牺牲后，沈克残忍地将其头颅用铡刀铡下，装进酒桶，送到北平，拍成照片，命令士兵传阅。

刘明德回到阜平县城后，立即召集蒲子华和一纵队参谋长王子固等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刘明德、蒲子华、王子固三人组成中共红二十四军临时军委，刘明德任军长，将蒲子华提任军参谋长。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蒲子华分析形势后，建议红二十四军暂避敌锋芒，迅速撤离阜平，转战到冀晋绥蒙边界，向陕北进军，与中共陕北特委取得联系。蒲子华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这时，企图围歼红二十四军的沈克师已逼近阜平县城。蒲子华临危受命，与刘明德、王子固等率军突围，冲出阜平县城。部队先经史家寨、段庄向灵丘县方向转移，后经浑源、繁峙，到达应县。在小石口捣毁了一个国民党区公所，歼灭国民党的两个连，缴获了十几支步枪和一挺冲锋枪。在应县稍作休息，部队派出牛清明返回太原，向中共山西省委汇报部队阜平失利的情况和请示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

部队从应县出发，经代县、朔县、平陆、左云、右玉，出杀虎口，到达绥远的清水县。到清水县，部队经过短暂的休整，即向山西的保德县挺进。

自平定起义开始至此，前后历经一月多，红二十四军行军 2000 余里，沿途大小打了十多仗，不仅击败晋军、绥军和蒙军的围追堵截，而且还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摧毁了一些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

## 两河岔被围

红二十四军经山西保德县进入河曲县境，部队处于危境。前面是波涛汹涌的黄河，后面有晋军的追击。此时，蒲子华以代军长的身份受命去陕北府谷、神木两县联系当地中共组织。他带着三个会游泳的战士，偷泅黄

河到河西的府谷县，经秘密查访，找到共产党员柴汉生。柴汉生带着蒲子华找到不少船只，将红二十四军从山西河曲安全渡运到陕北的府谷县境内。

部队进入陕北的北部地区后，时值深秋，天气转冷。800多战士衣着单薄，吃穿困难，且不断遭井岳秀军队的袭击，军中消极涣散之情绪日增。经部队军委研究，决定派蒲子华返回太原，向中共山西省委汇报起义部队的情况。

蒲子华在返回太原途中，正好遇到红军晋西游击队负伤战士蒲正平。蒲正平与蒲子华是绥德县的同乡，两人结伴来到太原，当找到省委时，才知省委书记刘天章和牛清明、王宗玉等已离开太原，到陕北找寻红二十四军去了。蒲子华闻讯非常高兴，立即离开太原，返回府谷县。

刘天章从太原出发行至途中，得知红二十四军已转入应县，立即由牛清明带路，与王宗玉、梁子修等赶到应县。到了应县，红二十四军已转战到保德县境内。刘天章再赶到保德县，部队又已渡过黄河进入陕北的神府两县一带。

刘天章等人到了保德县城，住在王宗玉哥哥开的店铺，派牛清明、梁子修过黄河，到对岸的府谷县寻找红二十四军的下落。牛清明、梁子修一去无音讯，后来才知道被国民党当做红军的探子关进监狱。刘天章在保德等了数日，没有见牛清明、梁子修的回音，只好返回太原。

蒋介石电令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派出重兵对红二十四军严密防堵。这时，由于红二十四军人马众多、声势浩大，驻守榆林的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已有防备。井岳秀调集驻守肤施的高双城部北上，加强榆林的防守。同时，急令在神府一带的刘润民部全力堵击红二十四军南下。

蒲子华返到府谷县，仍未见到中共山西省委来人，即带领红二十四军准备从府谷县十里长滩动身，遭到段幼庵团的袭击。蒲子华带领战士奋勇冲杀，只半小时许，就歼灭段幼庵团的两个连。

随之，红二十四军行进到府谷县清水堡、木瓜堡一带，准备迅速南下，寻找中共陕北特委。此时，傅作义部的骑兵部队尾追而来，并有井岳秀派出的刘润民、高双城两个旅的重兵向北围堵而至。红二十四军南下受阻，

被迫与傅、刘、高的三支大军展开激烈的战斗。由于起义部队的战士英勇作战，终于打退腹背之敌，突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

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为有效地避敌锋芒，突出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保存起义部队的力量，蒲子华与刘明德决定把部队分为三路转移：一路向西，转入内蒙古大沙漠；一路沿长城一带，隐蔽行动；一路南下转入内地，开展群众工作。由于红二十四军避实就虚，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灵活应变，不但未被国民党的各路军队围歼，而且在陕蒙交界的杨肥峪、哈叶尔乌素、大昌汗沟、五子旗、新庙等地的多次战斗中有力地打击了围追之敌。

当红二十四军到达河口窝兔采当一带会合后，部队又陷入国民党各路军队的重围之中。当时，红二十四军一些领导人把希望寄托在谈判上，试图通过谈判取得国民党军队的让步。蒲子华、刘明德、王子固坚决反对。但个别意志不坚定的领导成员即开小差脱离了部队，使得部队战士情绪产生极大的动摇。在部队军心不稳的情况下，蒲子华鼓励大家：中共山西省委和中共陕北特委一定会支援我们的，要坚持战斗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

蒲子华带领部队再次突出国民党几路军队的重围，继续向内蒙古乌审旗方面转移。途中，部队又遭到井岳秀部的围攻。红二十四军的两个纵队长井树声和穆班臣均负伤，部队伤亡很大。为使部队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围攻，蒲子华亲自带几个战士实地侦察部队的撤退路线，不意与府谷县警察局局长韩子仁相遇。韩子仁与蒲子华从前在高桂滋部相识，当即将蒲子华抓捕，押送到榆林。后蒲子华惨遭杀害，时年 25 岁。

蒲子华被捕后，刘明德、王子固带领红二十四军转战到榆林以北百里之地的两河岔。这时，由于叛徒出卖，部队遭国民党几路军队重围，终因敌强我弱、力量悬殊，全军覆没。至此，轰动北方数省的红二十四军彻底解体。

刘天章返回太原后，由于中共山西省委遭国民党特务破坏，不幸被捕惨遭杀害。太原并州养蜂场被国民党查封，朱敏、田有莘等的身份暴露，被迫离开山西。牛清明、梁子修在两河岔一带找到红二十四军失败后失散的几个战士，便分散隐蔽到神木县的南区，后与中共神木县南区区委取得

联系，成立了最早的一支临时特务队。

对于红二十四军从起义到最后全军覆没的深刻教训，有人作了这样的总结：一是保密工作不够严密，致消息泄露，提前起义，来不及联系二、三团，使起义的兵力大大削弱；二是红二十四军主要领导人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对敌人的诈降缺乏应有的警惕，结果因起义军主要领导人全部前往受降中了敌人的奸计，致红军遭到重大损失；三是不善于用人，如接受“请降”可派代表出面，又如探查撤退路线可派得力的人去，不必主要领导人事必躬亲，如若这样就不会造成红军主要领导人两次被俘和被杀的恶果。

## 第四十一章

### 转战陕北

#### 坡牛山突围

红二十四军转战陕北后，晋西游击队已发展成为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武装部队，声势浩大，威震晋西，吕梁山地区各县国民党政府纷纷向省里告急。

就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把晋西吕梁山区活动的晋西游击队作为重要进攻目标，调集晋军一个师、一个炮兵团及地方民团武装约万余人，推进到吕梁山的边沿，遍设哨卡，步步进逼，重重封锁，对游击队发动“围剿”。

中共山西省委指示游击队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在夏末，阎红彦等先从太原秘密运回 2000 发子弹和其他武器；后又返到太原，向省委汇报了吕梁山地区的严酷斗争形势。省委根据阎红彦的汇报决定：如晋军调遣强大的兵力向吕梁山游击根据地发动“围剿”，游击队无法立足时，为保存这支红色武装力量，应西渡黄河转移到陕北去，并与中共陕北特委取得联系，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这时，中共山西省委由于被叛徒李来宾出卖，遭到严重破坏。一时，游击队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中断。游击队在晋军的步步紧逼下，被困在吕梁山区，处境极为险恶，只得撤离游击根据地，转出外围开展游击战。

游击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拔除晋军据点，在石楼县的暖泉、隰县的水口、永和县境等地扫除了晋军哨所，抓捕了地主豪绅。游击队紧紧依

靠群众，昼伏夜出，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采用奔袭消灭晋军的小股武装，时而与晋军主力周旋。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晋军依仗强大的兵力加紧搜山，使游击队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只能找地方组织设法掩护。

一天，游击队行至隰县的坡牛山时，与晋军的一支“搜剿”部队遭遇。游击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同晋军展开激烈的战斗，部队伤亡很大。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队委会领导认为不宜恋战，决定冲出晋军的重围。拓克宽命令李成兰带着几个队员负责掩护，三个中队以班为突击单位，分散突围，向东山顶的小白庙转移集中。游击队经一场殊死的战斗，跳出晋军的包围圈。

当晚，在小白庙集中部队清查人员时，有杜星桓等八九人失踪，张琪负伤，后派张忠继护送张琪出山，找到地方党组织，隐蔽在群众家中。

从小白庙刚转移到土桥一带，游击队即得悉晋军已占驻关上、娄底、西宋庄等游击根据地，杀害农会干部，烧毁了游击队住过的老乡房舍。游击根据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部队隔断了与群众的联系，也得不到群众送粮送物的支持。队委会为避免与晋军主力作战，决定部队向南移动。

从土桥出发，经过一夜的行军，游击队拂晓赶到石楼县的老鸦掌。老鸦掌地形险要，重山叠岭，树高草茂，周围没有村庄，只是半山腰有一个骆驼场。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战士疲倦不堪，就宿营在这里。

天亮后，在老鸦掌发现了晋军的便衣侦探。警戒班刚捉到几个便衣侦探，衔尾追来的晋军就发现了游击队，爬到高山上的一股晋军向游击队开了枪。拓克宽一听到枪声，立即带着部队上南山占领有利地形，向晋军还击。

晋军向南山步步逼近。待晋军靠近南山时，拓克宽一声令下，手榴弹和冲锋枪一齐猛投猛射，晋军士兵死伤不少，被迫退下南山。晋军几次组织力量发起进攻，均被游击队打退，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

当时，对于游击队来说子弹是最宝贵的，不可与晋军打消耗战。战斗进行到午后，部队被迫撤出南山，转移到老鸦掌。晋军步步紧逼，最后将游击队围困在老鸦掌的一座高山上，队员们只能在极狭小的山林中露宿山头，靠挖野菜和摘野果子充饥，队伍很快减员到 50 余人。

1931年9月1日，队委会根据部队所处的危急情况，在老鸦掌的高山顶上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应急措施，解决队伍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在会上，参会人员意见分歧，有的人在强敌面前产生了悲观情绪，主张埋枪散伙，待机再起；有的人由于对晋军屠杀的仇恨，产生了急躁情绪，主张冲下山去孤注一掷，与晋军拼个死活。杨重远、拓克宽、阎红彦、吴岱峰、白锡龄、胡廷俊、符又坚、陈玉清等坚决主张按山西省委的指示精神，西渡黄河，转战陕北，在西北地区开展斗争。也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离开家乡，也不主张过黄河转移到陕北去。

在激烈的争论中，拓克宽、杨重远、阎红彦等反复地分析了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山西方面，徐永昌视晋西游击队为心腹之患，下决心要消灭这支武装，在军事力量上，晋军多于红军数百倍，层层封锁，隔绝了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群众的联系，游击队失去了和山西省委的联系，很难在晋西坚持下去。陕北方面，大革命时期就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组织转入地下，在农村和农民群众中都有基础，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条件较好，晋西游击队到陕北人地皆熟，而且陕北军阀统治力量较弱，一些军阀部队中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估计谢子长、刘志丹还在西北活动，能找到他们便可以共同开展对敌斗争。

经过摆情况、讲道理，大家终于统一了认识，决定突出晋军重围，西渡黄河，转移到陕北去打游击，以保存和发展这支历尽千辛万苦创建并经过严峻考验的红色武装。当时部队里有许多晋西人，经征求他们的意见，决定给留下的人员每人发给30块银洋，对仍愿意搞武装斗争的人员，允许带走枪支弹药，暂时分散隐蔽，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经过整顿，晋西游击队只剩30人，全都是共产党员，每人带有好枪2支，计盒子枪18支、冲锋枪21支、步枪24支、小手枪2支，共计60余支。其余武器就地掩埋山中，请在当地隐蔽的人员设法联系地下党组织予以处理。

这支30人的队伍，在杨重远、拓克宽、阎红彦、黄子文、吴岱峰、白锡龄等的带领下，立即从老鸦掌的深山出发，向西行动。同时，先派黄子文西渡黄河与陕北特委联系。黄子文在陕北与特委书记赵伯平接上关系，

确定游击队到陕北后的隶属关系后，因爱人在北平被捕，受组织委派去了北平。

是夜，游击队经过一场激战，在老鸦掌冲破晋军的重围。队伍行进在一条山沟中，迷失了方向。这时，突然发现远方隐约发出一道亮光，游击队即循着光线走去，原来是一位看瓜棚的老乡。

说也巧，这位老乡姓郭，是陕北瓦窑堡人，早年逃荒到这里，正好认识阎红彦。这位老乡对阎红彦说：“山上和路口，都有晋军的哨卡，只有前面一条石沟没有哨卡，从石沟摸出去就躲过晋军了。”

游击队根据这位老乡的指点，朝着石沟摸索前行。这条石沟两山相夹，荒草齐膝，多年只有野兽出没，没有行人之迹。队伍艰难地走出沟口时，却被一道陡峭的绝壁截断了出路。

这时，大家借着朦胧的月光，立即把绑腿、皮带、旗杆等一切可以使用的东西全部利用起来，搭成人梯，奋力攀上绝壁，继续在草深泥泞的树林中前进。

## 抢渡黄河

1931年9月3日，晋西游击队日夜兼程，急行军200余里，终于摆脱晋军的围追堵截，到达石楼县的转角镇。

转角镇是晋西地区黄河沿岸的一个小镇子。从这里渡过黄河，对岸就是陕北地区清涧县境的老鸦关。游击队到了转角镇的黄河渡口，想找一只渡船过河，谁知河上的渡船早已全部被控制到黄河西岸，由陕北井岳秀的军队看守了。

游击队找不到船只，一时无法渡过黄河。这时，从小在无定河边长大的白锡龄向大家建议，可派人找地方老乡，做些牛皮筏子，在没有船只的情况下，能帮助队伍渡到西岸。队委会采纳了白锡龄的意见，



吴岱峰

即派出白锡龄、阎红彦到转角镇去找老乡，解决渡河牛皮筏子的问题，并寻找水手。

白天，游击队隐蔽在河岸边一个岩洞里。等到晚间，白锡龄、阎红彦才摸到村庄里，找到王怀安等三四个水手，赶制了几副牛皮筏子。有了牛皮筏子和水手后，游击队决定立即乘夜渡过黄河。

9月的河水，正值涨潮。黄河骇浪滔天，波涌起伏，水势湍急惊险。游击队战士毫无惧色，在杨重远的指挥下，王怀安等几个水手脱得赤条条的，推着牛皮筏子，在带着寒气的河水中，将游击队战士一批批护送到西岸。

白锡龄、吴岱峰等是最后一批到西岸的。当最后一批牛皮筏子快漂到河西岸时，突然迎头一个巨浪，将拴在牛皮筏子上一个油篓的绳子打断，油篓掉入浪涛汹涌的河水中。油篓里装的全是枪支，牛皮筏上的人都吓呆了眼。眼看油篓顺着浪涛朝下游冲去，白锡龄心里十分焦急，从牛皮筏上一个筋斗跳入河水中，朝下游追去。同筏坐着的吴岱峰也急了眼，随即也从牛皮筏上跳入河水，随后追赶而来。

牛皮筏上坐着的其他战士，只见白锡龄、吴岱峰在河水里露出的两个脑袋，被激流打得时沉时浮，都为他俩的安危捏着把冷汗，但不一会儿，就看见白锡龄和吴岱峰推着油篓子浮上西岸来。战士们见他俩的水性这样好，都惊叹不已。

晋西游击队到达陕北后，由清涧县的老鸦关出发，先到白明善的家乡高杰村。杨重远、白锡龄、阎红彦希望能找到白明善，联系到中共陕北特委。

不料一打听，他们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白明善在同年元宵节从河北省委回到清涧县城，住在一个亲戚家时，由于叛徒告密，遭国民党特务逮捕。井岳秀将白明善押解到榆林，始引诱，继之以酷刑，白明善守口如瓶，始终不暴露共产党的任何机密。井岳秀残酷地将白明善施以绞刑杀害。

在高杰村附近，游击队找到了地下共产党员白志强，立即派他给中共陕北特委送信，报告红军晋西游击队已进入陕北的情况，请求陕北党组织调配一批党、团员参军，以迅速壮大游击队的力量。部队在这里稍作休息后，经川口镇，继续西进。当晚赶到白家川。白家川是白锡龄的家乡，在

白国华的帮助下，当地群众给游击队烧汤做饭，战士们像回到家里一样温暖。

9月5日早晨，游击队从倒柳树出发，翻过一座高山到了清涧县的石嘴驿镇。这里是榆林通向西安的南北大道。这天适逢集日，摊贩遍街，赶集的群众很多。部队到了这个镇上，群众见他们买卖公平、价格公道，又都是本乡本土口音，多近前问长问短。队长拓克宽命令部队在镇上休息，并利用休息时间，向老乡们讲革命的道理，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说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这支红军由山西到陕北来是为打倒军阀井岳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赶集的群众奔走相告。

晋西游击队渡过黄河来到陕北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石嘴驿镇周围的村庄。

游击队行至一山上的小村庄宿营。乡亲们看到全副武装的队伍，都怀着疑惧的心情。战士们一面向群众宣传，一面帮助老乡担水、扫院子，消除了群众的顾虑。有的群众还向部队反映了当地的敌情。次日一早，部队下山沿着淮宁河西行至安定县南沟岔一带。

## 南沟岔斗豪绅

这天，游击队到南沟岔时，正值大雾弥漫，几十步之外看不清东西。在前行中，不意与国民党地方驻军的六七个士兵迎面相遇。这些士兵以为对面来人是当地农民，还没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被游击队缴了枪，没收了携带的银洋。被俘的一个军官正好与拓克宽原来就认识，拓克宽未经游击队领导集体研究同意，就将游击队收缴的枪归还给那几个士兵，并放走了他们。全体战士见此情景，心里极端不满。

当游击队到达柳树滩休息时，大家议论纷纷，一致要求召开队委会，调整游击队的原有领导成员。于是，在柳树滩召开了队委民主大会。在会上，讨论了游击队的整顿问题和如何发展西北游击战争的问题，并通过战士的民主选举，确定阎红彦为大队长，杨重远为政委，吴岱峰为副队长，白锡龄为军事委员。游击队下设四个班，李成兰、胡廷俊、马佩勋、周维仁分任班长。

在这次会议上，游击队为扩大到达陕北后的影响，决定在地方上开展斗争土豪劣绅活动，将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赢得群众对游击队的理解和拥护。

在南沟岔，游击队获悉附近的涧峪岔有个作恶多端的大豪绅叫薛华英，群众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于是，阎红彦、杨重远等决定首先从薛华英开刀。

当天晚上，游击队从南沟岔西进到涧峪岔。狡猾的薛华英闻得游击队进村，连夜从家里逃走。游击队到了村里，没有抓到薛华英，即打开薛华英家的粮仓，将粮食分给贫苦的农民群众。

一开始，当地的群众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队伍，都不敢拿游击队分给的粮食。为了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杨重远、阎红彦等决定让战士们把粮食分别背到每家每户，并向群众宣传：“红军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穷人的队伍，这支队伍专门为穷人除恶铲暴，杀那些欺压老百姓的土豪劣绅、地主恶霸。”

经过宣传，村里人知道了游击队的情况，立即主动跑来，许多群众争着要分粮食。分粮的群众在薛家大院进进出出，直到第二天太阳出山，一些群众还没有散去。



马文瑞

经过宣传，村里人知道了游击队的情况，立即主动跑来，许多群众争着要分粮食。分粮的群众在薛家大院进进出出，直到第二天太阳出山，一些群众还没有散去。

游击队到陕北后，还一直未能与中共陕北特委取得联系，大家的心里都十分焦急。为了尽快与特委接上关系，杨重远、阎红彦等决定带领游击队到谢子长的家乡安定县枣树坪去打探情况。到了枣树坪，找到谢子长的哥哥谢德惠，得知谢子长参加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之后一直在陕甘、陕宁一带军阀部队里搞兵运活动。并通过谢德惠的联系，找到了时任中

共安定县委书记的马文瑞。马文瑞见到杨重远、阎红彦等，立即对晋西游击队的到来表示欢迎，动员当地群众杀猪宰羊，慰问部队，并连忙派人向中共陕北特委作了汇报。

不几天，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派张资平来到游击队，指示杨重远、阎红彦带领游击队，在安定、清涧、延川、延长等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不久，中共陕北特委派马云泽到安定。部队在安定县活动期间发展很快，先后有强龙光、强世清、侯凤孝、侯凤来、侯凤高、郭立本、赵福祥、惠怀玉、李维俊、惠泽仁、阎宝忠、路文昌、陈志刚、姬升元、郭才芝、王得民等参加游击队，使晋西游击队由西渡黄河时的 30 人迅速扩大到 70 余人。中共陕北特委决定晋西游击队改称陕北游击队。

## 第四十二章

### 南梁会师

#### 安条岭胜敌

1931年9月10日，杨重远、阎红彦等决定开赴安塞县境打听刘志丹的情况。杨重远、阎红彦带领陕北游击队离开安定县，翻山越岭，向安塞县境行进。经过安塞县平桥，刚在一片枣树林下休息，突然枪声四起，子弹向游击队休息的地方飞过来，却看不见打枪的人躲在什么地方。经一番仔细观察，才发现有国民党的一小股队伍隐蔽在山上，朝枣树林打枪。阎红彦立即带着两个班，由正面向山上发起反击，白锡龄带着两个班绕到后山，从背侧包抄过来。这时，天空突然雷鸣电闪，降起大雨。游击队冒雨前后夹攻，很快冲上山头，这小股国民党士兵像水鸡一样狼狈地溃散逃跑。

平桥一战后，游击队向西行进，进入保安县境。部队在夜色中沿着山岭走了80里，赶到安塞县的侯家河湾宿营。次日早晨，正准备开饭，李家嘴的民团前来袭击。当时，晨雾弥漫，只听见枪声，看不见敌人，游击队只有在浓雾中迎着枪声还击。在大雾中，民团不敢轻易冲入村庄，游击队也不敢恋战，乘隙冲出李家嘴。部队由安塞县进到保安县境。

部队在安塞、保安两县时，曾几次寻找刘志丹，多方打探，都未能得到刘志丹的消息，只听传闻说刘志丹去甘肃了。于是，杨重远、阎红彦等为避开与地方民团频繁作战，决定带着部队沿安条岭北进。

安条岭是保安与安塞两县交界处的一座大山，向北延伸到三边(安边、定边、靖边三县)。这里沟深谷险，道路崎岖，人烟稀少，时有土匪出没。

群众一看到游击队大都逃跑了。部队行至一个山庄后，通过对村内群众宣传红军的革命主张，始有大部分群众相继返回。晚上，游击队没收了一家地主的财产，分给群众。第二天离开村庄时，部队把住过的房子、院子打扫干净，吃了农民的粮食后写个条子，把钱压在条子下，给群众留下很好的印象。

部队离开这个村庄，沿着山间小道前进。正在行进中，一位骑着毛驴的老乡急匆匆地赶来送信，说是驻保安的国民党军队高玉亭营步兵、骑兵有 300 多人来袭击游击队。

一日，部队行至安条岭，已到深夜。这时果真发现敌情，游击队遭到高双城部驻保安县高玉亭营和民团 300 多人的南北夹击。根据侦察判断南路是高玉亭营，北路是民团。

杨重远、阎红彦决定先打退战斗力较弱的北路民团武装，然后集中力量攻打战斗力较强的高玉亭营。战斗一开始，阎红彦大喊一声：“跟我上！”在阎红彦的带领下，游击队战士个个冲锋陷阵，勇猛冲杀，民团经不住一阵猛烈的攻打，就四散而逃。阎红彦带领游击队折向南，集中火力向高玉亭营展开猛烈的攻击。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高玉亭营也被击溃，高玉亭带着残兵败将狼狈逃窜。

这次战斗，游击队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地歼俘高玉亭营 100 余人，缴枪 100 余支、战马数十匹，扩编成立了一支骑兵分队，声威大震。但在战斗中，原晋西游击队队长拓克宽负伤牺牲。

9 月中旬，游击队北上，进入靖边县陕、蒙交界的沙漠草原地区。杨重远、阎红彦派出胡廷俊化装成商人，经内蒙古到神府一带打听从山西平定起义后转战到陕北北部地区的红二十四军的下落，希望与其会合。

不久，胡廷俊返回，带来红二十四军在两河岔全军覆没的消息。杨重远、阎红彦决定带领游击队南下，重返安定县一带活动。

## **营盘山激战**

1931 年 10 月 4 日，陕北游击队挥师南下。在安定县寨儿山，游击队击退了一直跟踪尾追的井岳秀第八十六师万宝山营。

10月6日，白锡龄奉命带着一个班外出侦察敌情，发现有一支国民党军队正朝游击队的驻地后湾镇方向偷偷摸摸地开来。白锡龄急忙将出现的敌情报告杨重远、阎红彦。游击队当即选择有利地形，决定设伏布阵，给出其不意的袭击。于是，杨重远、阎红彦带领游击队急行军，快速赶到地形险要的营盘山设下伏击圈。

这次来的还是万宝山营，且纠集了横山县民团，准备前来偷袭。万宝山营一到营盘山，即从侧面向游击队发起进攻。游击队据险防守，双方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战斗非常激烈，形成对峙局势。

杨重远、阎红彦观察了四周的地形后，命令白锡龄、强龙光、强世清、周维仁、马佩勋等十余人组成一支精悍的突击队，快速绕过深沟，偷偷插到万宝山营侧后，截断其退路，瞅准其指挥所，以前后夹攻之势发起攻击。当山前山后枪声一响，指挥所一受到攻击，万宝山营顿时晕头转向，混乱不堪。万宝山不敢恋战，带着一营人马仓皇溃逃。杨重远、阎红彦指挥游击队乘机正面发起冲锋，俘虏30余人，缴枪50余支。

战斗结束后，游击队把俘虏集中起来，由杨重远向他们宣传共产党优待俘虏的政策，对愿意参加游击队者表示欢迎，对不愿意参加游击队者每人发给回家的路费。俘虏们听后，都纷纷表示愿意参加游击队当红军。

当天晚上，游击队在孙家河宿营。刚到孙家河，即有两个自称是师储杰打发来的人，要找游击队负责人。来人掏出一封信交给杨重远、阎红彦，两人一看不禁大喜。原来师储杰、杨琪、萧永胜等带着的土客队伍也从山西渡过黄河到了陕北，正在到处寻找晋西游击队，主动要求接受收编。

杨重远、阎红彦商量后，决定派有与土客打交道经验的白锡龄，随师储杰派来的人一起去执行收编这几股土客队伍的任务。

## 收编土客队伍

在山西吕梁山区组建晋西游击队时，阎红彦、白锡龄打人师储杰等土客队伍里，虽收编未能成功，但使他们对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有了深刻的印象。师储杰、杨琪、萧永胜被礼送出山后，这几股土客队伍一直未改旧业，继续游荡在黄河沿岸的山西境内干着私运大烟土和以保镖为主的老本行，

也未受到晋西游击队的歧视，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络。

西游击队在晋军重兵的“围剿”之下从晋西转战到陕北后，师储杰、杨琪、萧永胜等的队伍又成了晋军围歼的主要对象。他们在山西境内不能立足，也被迫西渡黄河。

师储杰、杨琪、萧永胜带着队伍西渡黄河，先到了陕北的吴堡县境。中共陕北特委获悉后，派出白雪山、李宗白、崔仲英到吴堡县做争取工作。经白雪山、李宗白、崔仲英陈述利害，终于促成师储杰、杨琪、萧永胜同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接受收编。白雪山、李宗白、崔仲英请示特委，特委决定将这几股土客队伍带到安边、保安一带，编入陕北游击队。

就在这时，土客队伍在吴堡县打开一个民团寨子，师储杰部下的一个护兵队长和一个士兵乘着混乱之机抢劫寨子里群众的财物，并强奸了妇女。这件事被白雪山、李宗白、崔仲英知道后，为了肃清在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经说服师储杰，师储杰表示愿意从严整顿队伍纪律，即在当地召开了群众大会，对这两人宣布罪状后将其当场枪毙。

白锡龄赶到吴堡，找到师储杰、杨琪、萧永胜后，根据土客队伍里兵痞流氓多、成分复杂的实际情况，与特委派出的白雪山、李宗白、崔仲英共同就收编的有关事宜进行了商量，提出收编的三个条件：一是要服从陕北游击队的领导；二是要遵守红军纪律，不拿、不吃穷人的东西；三是要公买公卖，不得强奸妇女。

师储杰、杨琪、萧永胜的队伍被收编后，旋即离开吴堡县向西开到安定县。杨重远、阎红彦为了改造好这些队伍，挑选白雪山、李宗白等优秀共产党员到其中任政治指导员。

## **玉家湾歼灭战**

1931年10月10日，由中共陕北特委派到游击队的特派员慕嘉绩到玉家湾购买物品，被瓦窑堡驻军开来的一个骑兵排抓走，押到瓦窑堡杀害。这个骑兵排气焰十分嚣张，扬言要一举歼灭游击队。杨重远、阎红彦与杨琪、萧永胜、师储杰等研究决定先发制人，出其不意地歼灭这股狂妄之敌。

当天夜里，杨重远、阎红彦带领游击队300余人翻山越岭急行军，赶

拂晓时到达玉家湾，将这个骑兵排团团包围。游击队战士勇猛冲进玉家湾村，骑兵排大部分士兵被当场击毙，有的士兵在炕上还来不及穿衣服，赤着身子就当了俘虏。

这次战斗是这支游击队自西渡黄河入陕以来打的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全歼骑兵一个整排，缴获了大批武器和马匹，还补充了大量军需物资。

## 攻打瓦窑堡

玉家湾战斗后，杨重远、阎红彦分析敌情，估计瓦窑堡的守军还没有察觉，认为应乘胜主动出击，进攻瓦窑堡。

瓦窑堡是安定县城以东 15 公里处一座依山为堡的古城，建于元代，是安定县的重镇。

当天，陕北游击队新组建的骑兵队绕到川道前进，步兵沿山间小道前进，迅速赶到瓦窑堡近郊。瓦窑堡城内守军毫无防备，城门大开，进出城门的人群熙熙攘攘。突然，城外的人群一片惊呼，只见一支骑兵队从城外沟里冲出，直奔城东门冲入城中，步兵紧随其后。

瓦窑堡城内的守军惊慌失措，城内一切防守皆形同虚设，士兵们仓皇之中边打边退，都像受惊的兔子朝着城内的米粮山奔逃。米粮山是城内最高的据守要地，筑有碉堡、寨壁。游击队向米粮山发起几次冲锋，守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负隅顽抗，死守待援。

杨重远、阎红彦观察战局，认为战斗时间若拖久，安定县城的援兵赶到，游击队就会腹背受敌，即下令全军撤出瓦窑堡城，向南转移。当夜，部队退到延川县永坪镇休整。

游击队攻打瓦窑堡虽未克，但引起了井岳秀的极大恐慌，他急令驻肤施高双城部全力围歼。高双城集结步兵、骑兵 700 余人，企图歼灭游击队。

阎红彦的家乡就在瓦窑堡。当群众得知他带领游击队来攻打瓦窑堡的消息后，便一传十，十传百，使阎红彦一下子成为当地传奇式的英雄，也成为井岳秀悬赏追捕的“匪首”。瓦窑堡的驻军捣毁了阎红彦家的窑洞，逮捕了他年老多病的父亲，兄嫂弟妹被逼投奔亲友，流落异乡。阎红彦的父亲在监狱受尽了酷刑，直到 1935 年陕北红军到瓦窑堡，砸开铁牢，才得以

重见天日。

## 雁门关伏击战

陕北游击队撤出瓦窑堡，转永坪镇休整。在永坪镇的一所小学有个职工叫张云，是地下共产党员。他积极为部队提供油印机、刻板和纸张等制作宣传品，宣传红军打击国民党军队的胜利消息，使当地群众知道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穷人的队伍，有不少青年农民踊跃报名，要求参加游击队。

这时，地方党组织派人送来情报，驻肤施的高双城到榆林向井岳秀拜寿，只带着一支护卫队，即将返回肤施。队委会决定带领部队立即南下，在他必经的雁门关险要之处设伏，活捉高双城。

次日拂晓，游击队从永坪镇出发，一路急行军，赶往雁门关。当部队到达雁门关附近准备抢占折顶山设伏时，高双城早已派军队占据了山顶。高双城的军队在折顶山上，以居高临下的优势地形，很快发现游击队向山上奔来。当部队冲到半山腰，山上突然开枪射击。折顶山只有一条上下山的路，山坡陡峭，没有障蔽，地形既不利向山上进攻，更不利就地隐蔽。游击队发动几次强攻，均未能冲上山去。

战斗打得异常惨烈。部队在几次冲锋中伤亡很大，冲在最前面的突击队战士大多中弹倒下，三位原土客首领萧永胜、张福才、贺得胜在冲锋中牺牲。

由于游击队处在十分不利的地形下，队委会决定撤出战斗，向北行进。

## 清平川突围

陕北游击队撤出雁门关，北进延川县。当到了延川县清平川岔口的时候，得到可靠情报：高双城已经绕道经瓦窑堡、蟠龙回到肤施。高双城一回到肤施，立即纠集各县驻军和民团向北开来，企图寻找战机，向游击队进攻。杨重远、阎红彦立即严密警戒，监视动向，并随时准备行动。

次日拂晓，高双城纠集各县驻军和民团出现在清平川岔口，即对陕北游击队驻地形成了包围态势。游击队立即占领了有利阵地，并与高双城的前哨部队发生战斗。

高双城的军队与游击队接火后，却迟迟不前进，也不组织力量向红军阵地逼近，双方对峙，只是远距离地枪战一天。

根据高双城军队缓慢进攻的情况，队委会领导认为，在清平川岔口出现的军队一定是高双城的前锋部队，正在等待后续主力部队到来，妄图一举消灭游击队。果不出所料，天近暮黑，高双城的后续部队相继赶到，对游击队形成围歼之势。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杨重远、阎红彦决定突围。天黑以前，部队选择好了道路，做好准备。深夜，游击队全部人马从一段陡坡滑下去，突出重围，高双城的军队竟然未曾察觉。

第二天，当高双城的军队发起进攻冲上山时，山上已空无一人。游击队从清平川岔口成功突围后，顺利地转移到永坪镇附近。此时，为了迷惑敌人，甩开高双城军队的尾追，游击队传出向北行动的消息。高双城的军队信以为真，随即向北追击而去。

## 受命南下

陕北游击队在永坪镇略作休整后，转到安定县凉水湾。一到凉水湾，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派人传达陕北特委指示：要避开敌人主力，转移到甘肃陇东一带，与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合兵一处开展游击战争，并由陕北特委通知中共陕西省委派人与游击队接洽。

接到陕北特委指示后，为做好进入甘肃陇东地区的准备工作，游击队由凉水湾转到蟠龙附近的贯家屯休整。队委会进行了周密布置，一面放出风来称红军要北进三边一带活动；一面命令师储杰部为一路，陕北游击队与杨琪、杨鼎部为一路，分别向甘肃陇东地区转移，两路队伍约定在葫芦河一带会合。

师储杰率部从贯家屯北上，经十里长岭南下到金堂，渡洛河，经白沙川、瓦子川、平正川，即向葫芦河行进。

陕北游击队与杨琪、杨鼎部从贯家屯出发，西进到保安县顺宁川，抵达野鸡岔以北，与驻守安边城的张廷芝部遭遇。

马佩勋、郝金标等带着前锋尖兵班，首先同张廷芝部的一个连接火。

游击队迅速占领制高阵地，展开争夺山头的战斗。张廷芝部连长被游击队员郝金标击毙。爬到半山腰的士兵见连长死去，人心惶惶，慌乱地朝山下退去。尖兵班乘势消灭一部，其余一部丢下一批枪支弹药和战马，仓皇溃退。

张廷芝的后续部队赶来后，由于游击队预先占领了险要地形，火力射击猛烈，故无法前进，只得向北溃退。陕北游击队行至桃柳洼，稍作短暂休息。然后从桃柳洼出发，向红柳沟方向西进。阎红彦带着先头队伍刚到红柳沟，又与张廷芝部的一个连遭遇。

张廷芝的这个连首先向前进的游击队发起进攻，部队迅速抢占一个高山阵地进行还击。该连连长看到游击队在山上的人数不多，就把一连队伍展开，向红军占据的山头猛力冲锋。

阎红彦命令战士们坚守阵地，顽强阻击。这时，游击队的后续部队赶来。在部队步兵、骑兵的前后夹击下，张廷芝的一个连被打得狼狈溃逃。

这一战，游击队缴获张廷芝部战马 10 余匹、步枪 10 多支和一些军用品。不料战后集合时，阎红彦却不见了。部队立即派人四处寻找，都没有找到，大家都为他的安危非常担忧。

几天后，阎红彦找到了部队。原来，那天红柳沟战斗中，红军前后夹击张廷芝一连队伍，阎红彦脚下一滑掉下深沟，被摔得昏迷过去，幸未受重伤。他苏醒后，见游击队已转移，忍着浑身疼痛，攀山越岭，终于赶上部队。

游击队进入保安县，在永宁山渡过洛河，经白沙川、瓦子川，南下到甘肃合水县平正川、葫芦河。这时，师储杰部已到葫芦河，两路队伍会合。

这时，刘志丹在艰辛曲折的兵运工作实践中，认识到利用军阀是暂时的，无产阶级应该也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条件，搞革命的武装。他曾总结陕甘宁地区 70 多次起义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于是：他吸取以往开展兵运工作的经验教训，改变了主要依靠军阀势力“借鸡下蛋”的方式，于 1931 年 9 月来到南梁平定川倒水湾，将杨培盛、赵二娃、贾生财三支农民武装集合整编，建立了陕甘边地区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陕甘边南梁游击队。

10月下旬，陕北游击队南下到达陕甘交界的合水县南梁地区，在这里与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师。

刘志丹见到杨重远、阎红彦、吴岱峰等人格外亲热。阎红彦当即把自己一支心爱的驳壳枪送给刘志丹，作为见面礼。